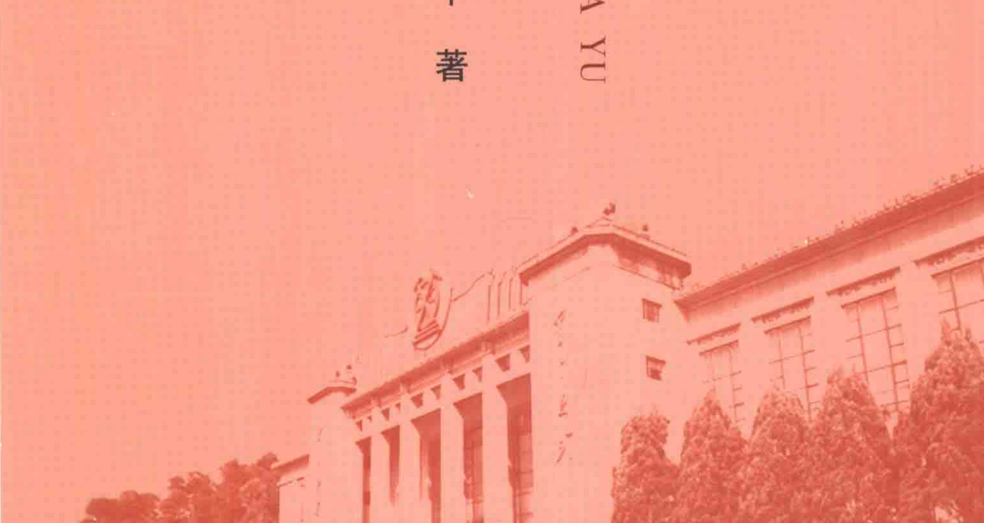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

JIANGXI HONGSE ZIYUAN KAIFA YU JIAOYU YANJIU

——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李康平 著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结题成果（BEA050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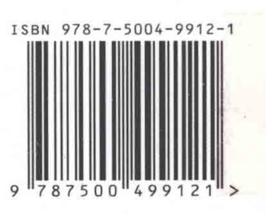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

——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定价：45.00元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

JIANGXI HONGSE ZIYUAN KAIFA YU JIAOYU YANJIU

——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李康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结题成果（BEA050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李康平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04-9912-1

Ⅰ．①江…　Ⅱ．①李…　Ⅲ．①革命史-研究-江西省　Ⅳ．①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8260 号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石春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前　言

九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江西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进行了中国革命一幕幕英勇雄壮、高亢奋进的斗争实践，写下了永存史册的壮丽的红色史诗。

一、江西红色资源的特点与研发意义

江西这块神圣的红土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这里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开创性革命理论，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思想文化，培育了具有原创意义的井冈山精神。

江西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路、革命理论、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在这里生成与实践，并得以成熟和发展，且不断走向胜利。在这块红土地仅留下姓名的英烈就达 25 万人。江西的贡献与牺牲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永恒无价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红色故都瑞金考察时曾指出："要把中央苏区红色资源品牌做好。"因此，开发利用好江西丰厚的红色资源品牌，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

江西红色资源得天独厚，具有本源性的特点。在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与发展中，江西红色资源具有源头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特性。安源是中国路矿工人运动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南昌诞生了第一支人民军队，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摇篮；井冈山首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摇篮；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区域，被誉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原创意义的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革命里程碑式的实践，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尤其是

在井冈山斗争中培育和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源头，它不仅成为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的直接源头，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分和精神之源。

江西红色资源具有丰厚性，几乎遍布全省各地，甚至于每个县乡都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红色资源。而江西的井冈山、南昌、瑞金、安源、兴国、葛源、上饶等地，则是红色资源非常集中的区域。其内容丰富而富有革命的传奇，有众多的红色遗址，有革命先烈、先辈留下的丰厚遗物，更有丰富的红色经典的战例和事件。红色将领和英雄们的传奇，特别是红色苏区留下的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的精神和物态成果，更是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实践、崇高理想、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不朽的精神。这不仅是被中国革命实践与胜利证明了的宝贵资源，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文化根基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源泉。

江西红色资源具有优质性。首先，是思想的深邃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等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深刻性、远谋性与务实性。其次，是革命实践的科学性与首创性。井冈山革命斗争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现实典范，它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性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从失败走向正确、从正确走向胜利。进而被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科学理论。最后，是文化的先进性。井冈山革命文化、苏区文化乃至江西红色革命文化，在精神形态上充分体现了井冈山精神、“八一”精神、安源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长征精神先进性的特质。“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斗争”的文化内涵，无不反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内核，深刻地揭示了“为人民得解放，为人民谋幸福”先进文化的思想境界。

江西红色资源的本源性、革命性、丰厚性、优质性，客观天然地展示了其开发的价值，又现实地展示其运用的时代功用。

二、江西红色资源开发的价值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具有永恒的教育意义和时代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情系江西这片红土地，多次来到他们战斗、生活、思念过的红色

故土考察，看望江西人民，并深情期望、真情地要求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建设好祖国！

1951 年 8 月 6 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以谢觉哉为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来到江西，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锦旗赠送给江西人民，表达毛泽东主席对江西人民的深切思念和真切的教诲。

1965 年 5 月，毛泽东主席在离开井冈山 38 年之后，千里来寻故地。在井冈山，他“故土重游，感慨万千”，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两首词。毛泽东一生为井冈山写了三首词，这足以表达他对江西、对井冈山的深厚感情。他谆谆告诫后人：“现在我们胜利了，要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井冈山！”他首次发出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的伟大号召。

1962 年 3 月，红军总司令朱德重上井冈山。他一下车就说：“井冈山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天，我回家看看。”在这里，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天下第一山”。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当年首任红都“京官”的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在其第二次政治复出前的 1972 年 11 月，偕夫人卓琳来到久已情系心系的井冈山。他语重心长地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同年 12 月，邓小平又回到了红都瑞金，回到了他曾工作和生活过的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参观考察。1984 年 12 月，为缅怀井冈山革命英烈，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邓小平亲笔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1991 年 9 月，中共江西省委、赣州地委和瑞金县委隆重纪念中央根据地创建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60 周年，邓小平欣然题词“纪念中央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并倡导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发扬苏区干部的好作风。

1989 年 10 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到井冈山。他在视察井冈山时感慨地说道：“虽然我们今天不再像井冈山时期那样，每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了，但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一天也不能忘记。”他明确指出：“井冈山是革命摇篮，毛主席在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他强调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1996 年 9 月 20 日，

江泽民来到瑞金和兴国等县市参观考察，看望江西老区人民。2001年“七一”前夕，江泽民第五次来到江西视察工作，再次发出号召：“在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和全国上下始终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作了精辟的概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1993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来到井冈山瞻仰革命圣地，看望江西人民。2003年8月28日，胡锦涛又专程从北京来到赣州，前往瑞金、于都和兴国等市县视察、参观。他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英烈用鲜血与生命培育的井冈山精神，是江西人民的宝贵财富和政治优势，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和政治优势。”他强调：“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红色江西的深情厚谊，对江西人民的亲切关怀，对江西红色资源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的充分肯定，更加凸显出其政治价值和教育意义。

红色江西革命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先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践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实践中，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井冈山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井冈山革命道路的思想教育农民和红军战士，特别是武装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使他们能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自觉革命，奋勇杀敌。这就充分展示了理论掌握群众的革命实践成果，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成功经验与价值导向。

红色江西革命实践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观，是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政治根基与源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性实践，这与当代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育同宗同根，又与时俱进。坚定井冈山革命道路必胜的信念，构成了江西红色资源的核心思想内涵；坚定井冈山革命道路信念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体现了革命理想的“源”与共同理想的“流”价值的统一性，从而构成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红色江西革命的伟大实践，培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和长征精神，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爱

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它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内涵同质，精神同魂，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精神基石。红色江西革命的伟大实践，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苏区好作风、革命道德品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道德情操，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相承相容，天然地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思想道德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区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凝练的红色资源，历史地印证着它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优质的资源和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区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孕育了真正革命意义的党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发端。中国革命斗争的大局，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中心任务，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做保证，并提供精神动力支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理论掌握群众、武装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大局所必需的理论武装和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斗争大局下，我党思想政治工作也成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最大政治优势。革命理想信念教育、革命理论宣传教育、革命纪律教育，苏区的肃贪反腐教育，特别是红军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民群众教育，都真实地再现了党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教育成果。这些生动的教育实践与成功的教育经验，为加强当代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与重要的借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民族传统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具有较强的免疫力”；①“老祖宗不能丢啊！”②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及其成果运用，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红色资源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优秀文化、高尚品行、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革命先辈、先烈战斗生活过并遗存的物态文化，红军官兵的英雄壮举，红色事件的革命传奇，红色历史文化的魅力，都能够为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厚重的历史责任感，成为鲜活生动的教育素材，为开展体验式、情境式、实践教育教学，调研考察式的教育教学，提供厚实的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和实践基地，也必然会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5页。

和吸引力，取得教育实效，从而使红色资源教育教学的价值得以实现。

红色资源开发及其品牌的利用，对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具有较好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红色革命遗址的挖掘和开发、红色物态文化的研发、红色人文精神的提炼、红色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利用等，对于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的设计，红色旅游文化品牌价值的提升，特别是社会教育价值的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增值功用。在江西丰厚的红色历史文化中，蕴涵着传奇的红色故事、惊心动魄的革命事件、经典的红色战例、浩气长存的红色英烈等，通过联合、技术、立体式研发利用，形成红色品牌文化成果，对于红色图书出版业、红色演艺业、红色影视业、红色会展业、红色旅游文化用品业等价值的实现，均有优质性与品牌性相统一的升值功用。

红色江西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首创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论，铸就了伟大的革命精神，生成了具有红色革命意义的先进文化。其历史地位永驻华夏大地，其价值永存民族复兴大业。

三、江西红色资源研发思路与主要内容

本书的研究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的精神和相关政策，以《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国家项目研发为主题，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为契机，来实施本结题成果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思路为：以江西红色历史为研究背景，以革命摇篮、人民军队摇篮、人民共和国摇篮和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为研究的切入点；以革命理论、革命道路和革命精神为研究主线，以中央革命根据地整个井冈山区域（闽湘赣）红色资源与价值实现为研究面，采取“点、线、面”相承接的研究纵向路径，以江西红色资源中“物、事、人、魂”为横向研究路径，以江西红色资源联合、动态、技术开发为研究路径，以实现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价值实现为研究目的。完成该项结题成果的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以江西红色资源研究的“点”作为历史与逻辑起点，来揭示其本源性及其在中国红色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研写了以袁玉冰、赵醒侬、方志敏为代表的爱国革命志士，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创立的《新江西》与江西改造社成立的革命实践。展示了革命先进分子把先进科学理论运用到江西红色革命的伟大实践，并同江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相结合，开

辟了中国路矿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也由此揭开了江西红色革命历史的帷幕。然后转入研究以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为历史转折点和以南昌“八一”起义为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是不行的”革命真理，缔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论述了江西红土地是军旗升起的地方，是人民军队的摇篮。进一步阐述了南昌“八一”起义中党指挥枪的政治文化观、人民军队的军魂和革命的核心价值观与利益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起义”与“秋收起义”虽然取得了“以城市为中心”革命的局部胜利，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新路，决定开拓革命实践的新区域。“八一起义”与“秋收起义”的革命武装向井冈山进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区域的文家市，我党做出了“文家市决策”，决定实施引兵井冈的革命策略，从此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相继创建井冈山、赣西南和闽西红色革命根据地，全国多块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建立。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全国各苏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组织实施好中央苏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国革命统一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就应运而生。江西红都瑞金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始了局部执政，它创造了“中国新社会的序幕”，“继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新的伟大一页”。

江西红色资源研究“点”的史实，展示了中国红色革命里程碑式的革命意义：揭示了中国路矿工人运动的开端性实践，再现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发端，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局部治国理政的先河。这就从研究的整体上揭示了江西红色资源的本源性与革命实践的首创性。

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研究江西红色资源开发的主线和核心问题：革命理论与革命道路问题。在研究江西红色革命原创性的基点上，历史地抽象出其“点”的本源性与“线”的本质性相对应的研究，体现本成果“点”与“线”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艰难曲折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探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真实勾画出井冈山革命道路的正确抉择与胜利前景，内在

地展示了革命道路与革命摇篮的同源相承的逻辑关联，并论述了井冈山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渊源关系。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井冈山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井冈山革命道路的探索与经验总结，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性实践的成果。在探索、实践与局部经验提升中，毛泽东总结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思想，写下了具有本源革命理论意义的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这在客观上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诞生。这一特色的革命理论本质上体现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坚持的实践。这条革命道路探索实践的理论升华，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理论的诞生和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论的科学指导，革命道路的正确探索和伟大实践，特别是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洗礼和积淀，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价值目标就是为民族得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价值取向就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价值内涵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的实践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形成了井冈山革命文化，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它与革命道路、革命理论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线。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整体上和时空延伸上全景式地研究江西红色资源的开发与价值的实现。研究了江西红色资源分布与特点，开发运用的现状与基本实践。再转入研论了红色江西的历史地位、红色江西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魂的铸造、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最后论述了江西红色资源开发成果运用的当代价值：红色江西革命实践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价值；红色江西文化精神对江西经济的价值；红色江西历史文化与新中国。从而再现了一幅波澜壮阔、艰苦卓绝、勇于胜利的红色历史画卷，凸显了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的永恒价值与不朽精神。

本书的完成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 90 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80 周年之际，这是我们课题组全体研究人员为此而献上的一份真挚的学术礼物，以表达我们对红色江西革命先辈与英烈的崇敬之情，对红色江西历史的忠诚！

目　　录

第一章

红色安源

1840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中国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江西省萍乡县的安源，因为爆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安源工人大罢工，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奠定了它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摇篮地位。江西红色革命的历史正是从这里揭开了帷幕。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后安源的社会状况

一、政治状况

萍乡县位于江西省西部，东靠宜春县、安福县，南邻莲花县和湖南攸县，西接湖南省醴陵县，北连湖南省浏阳县。1916年，全县总人口为59万。19世纪末以前的萍乡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落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和手工业是萍乡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除从事农作外，农民还兼营小煤窑、石灰、陶瓷、造纸、鞭炮、夏布等开采业和手工业。清代中期，萍乡发现了较多的煤矿，如萍乡东路的安源、高坑、天子山，南路的五坡下，西路的水口，北路的杨岐山、石观前等地都有小煤矿，聚集了一定数量的采煤工。其中，有的地方还会炼焦煤。清末光绪年间，安源的商办小煤井增至300多个，“各山土井林立，密如蜂房，甚至数丈内并开两井”[①]。这些煤井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世纪末，自安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史工业史资料》第3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44页。

源创办萍乡煤矿始，当地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新的变化。

安源位于萍乡县境内。这里山岭重叠，林木丰茂，气势雄伟。贫穷的安源人民就是靠挖煤维持生活。明末清初，安源土法采煤有了发展，据有关记载，当时开挖的土井就有260多个。19世纪末，晚清的官僚买办兴办起机械开采工矿企业，这里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焦产区。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了大冶铁矿；1896年，由洋务派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炼铁需要焦炭，最初只能依赖西方国家如德国和美国运煤焦供应。因为路途遥远，价格十分昂贵，便决定就近自行开采，于是，“重金聘请外国矿师英国人郭师敦和德国人赖伦在长江一带调查勘探。1898年2月，发现安源周围九十余华里，煤藏量丰富。3月，清廷批准张之洞、盛宣怀的禀奏，以安源为中心，圈定1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矿区，禁止别人在这个范围内开采；收购和封闭所划矿区的土井有321口，收购良田1300亩”[①]。1898年4月，萍乡煤矿局成立，清政府投资白银百万两，作为建矿资金，由盛宣怀的亲信张赞宸及德国人赖伦经纪其事。他们吞并土井，划定矿界，霸占了整个矿区，然后着手凿井、开巷、修路、建厂，一个较大规模的机械开采矿区就这样在安源出现了。

安源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只有水道与外地相连，受天气影响较大，所产煤焦常常无法及时运输。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于1899年至1905年间，分段修建了长达90公里的株萍铁路。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冶萍”）。“汉冶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之一。1914年，“汉冶萍”改为完全的商办，萍乡煤矿也同时改组，进行了一些改革。企业虽然名义上改为商办，但它的官僚买办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整个企业仍然被盛氏买办集团把持，他们将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向帝国主义大借外债。帝国主义对安源煤矿的控制就是通过与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构成三位一体的上层统治来实现的。从建矿开始，矿区的一切事务都要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控制和摆布，听任他们的压榨和剥削。建矿初期所生产的财富，绝大部分流入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口袋。1899年，正在长江流域寻找侵略据点的德国帝国主义看中了安源煤矿，于是授意礼和洋行出面通过在安源握有实权的赖伦，同张之洞、盛宣怀签订向安源贷

---

①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款400万马克的合同，规定其中的300万马克用于向德国购买机器设备，100万马克用于建矿工程。合同还规定由赖伦任总工程师，其余生产部门的“矿师”、“监工”之类的职位，均要由德国人充任。这样一来，整个矿区的生产、管理大权，就被赖伦等帝国主义分子全部把持。1901年义和团运动波及安源时，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才席卷掠夺的资财仓皇而逃。

继德国帝国主义之后控制安源煤矿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向中国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并急欲掠夺中国矿藏资源，尤其企图染指大冶铁矿和安源煤矿为其军国主义扩张服务。1904年，日本政府乘汉阳铁厂筹款困难，无法改炉之机，授意日本兴业银行以预支矿价名义，向盛宣怀贷款300万日元，规定以200万日元给汉阳铁矿，100万日元给安源煤矿，为日资渗入这些企业敞开了大门。1905年5月，日本大仓组财团又两次向安源贷款，共200万日元，年利七厘五，并指定以安源矿所有财产及焦煤做担保。1907年，日本大仓喜八郎与安源订立了《售焦合同》，期限三年，计焦24000吨，以售价所得作为偿付安源所借大仓组财团债款的本息。继德国之后，整个安源矿区的生产资料就这样牢牢地被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之上，成为向日本帝国主义提供大量焦炭资源的基地。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安源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在此初步发展起来。但是，安源的自然经济并没有完全解体，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渐趋形成。

为了掠夺与榨取，帝国主义与官僚买办、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建立了一套军警遍布、网罗周密的统治机构。萍乡煤矿自成立开始，就由德国人赖伦担任矿师，并陆续聘用德国人分别担任各工作处总监、监工、医师和会计等，“在矿局任职的德国人，1912年达25人，稍后又增加到30多人”[①]。他们在萍矿为所欲为，肆意虐待工人。除了萍乡矿务局下辖的矿警队、法庭、监狱外，萍乡的赣西镇守使署和专员公署还驻有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军队，这些统治机构像一道道枷锁紧扣在工人的头上。开矿之初成立的巡警处，有巡警300人；1916年，改为矿警局，人数最多达到900人，分为四区两队。矿警局内设有法庭和牢房。“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于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

①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①在这样的严密监视和残暴统治之下，广大煤矿工人没有半点自由，只能过着任人压榨欺凌的牛马般的生活。

封建统治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萍乡广大农民遭受地主阶级和封建家族势力的残酷统治。当时萍乡最有名的封建氏族，分布在东南西北四路，统治整个萍乡，号称“十大家族”，即彭、吴、文、李、张、姚、刘、肖、段、黄姓。他们或借宗族势力，或依靠军阀政府对雇工进行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巧取豪夺。1915 年，赣西镇守使署从宜春迁驻萍乡，负责萍乡、莲花等 13 个县的边防和治安。残酷的封建军阀统治，剥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当时有一个营的兵力常驻安源。只要工人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反抗，路矿当局便请军队出动，与矿警相配合，实行镇压。地方军政头目除了担任安源路矿当局的“顾问”、领取“薪水”和“车马费”、安插亲信外，当工人斗争被镇压下去后，还要求路矿当局付给他们“犒赏费”或“军费”，每次至少一两万元。1906 年，在镇压萍浏醴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调来的军队都从路矿获得数额不等的军费。据萍乡煤矿局账本记载，仅 1906 年 12 月 29 日一天，就向军队支付 1.4 万两②。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民族和人民灾难的根源，也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二、经济状况

农业。清末民初，萍乡逐步由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20 世纪初，萍乡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自行雇工经营外，一般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据 1952 年土地改革中的统计，土改前，萍乡占农村人口 80% 以上的雇、贫、中农，仅占有耕地面积的 30.16%；而占农村人口 4.01% 的地主、富农，却占有耕地面积的 46.71%。“安源大地主王振南趁萍乡煤矿开办之机，大肆进行土地买卖，一度霸占了安源 90% 以上的耕地，而占人口 92.12% 的农民，却只占耕地

①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撰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6 页。

② 萍乡市政协、浏阳县政协、醴陵市政协合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0—442 页。

面积的10%"[①]。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有向地主租地耕种，缴纳沉重的田赋，同时还要受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1901年到1911年，萍乡全县的田赋正税有地丁、南米。地丁即土地税和人头税；南米即供应南方驻防官兵之军粮。据1934年出版的《经济旬刊》第3卷第4期载："萍乡田赋附加太重，每地丁1两（白银）竟征收十五元四角三分五厘之多，且各区又所带征亩捐、购枪费等总计每两共需完纳税银25.435元，再加购枪费等，约在30元上下。"[②] 广大农民在重租的盘剥下，一年所剩无几，迫于生计唯有向地主、富农借钱、借谷度日。地主通过放谷、放钱、高利贷剥削农民。据1937年出版的《江西农业统计》载，萍乡全县向地主借钱的农户占80%，月息1.5%~2%；借谷的农户占70%，利息为借二还三，或借一还二。更有甚者，青黄不接时，春借秋还也要交一年的利息。无论钱谷，到期无力偿还，则将利转本加息进行盘剥。安源石塘冲17户人家就有6户被逼得卖儿卖女。1895年至1911年，萍乡遭受大旱，水稻枯萎，几乎颗粒无收，许多人食观音土充饥，农民四处逃荒要饭。"据不完全统计，萍乡县1911年有水田38.5万亩，到1928年水田降至22.5万亩，再加上旱田，最多也不超过30万亩；1916年有劳动力13万个，到1944年减至8.2万个。"[③] 从上述可知，当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阻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工业。20世纪初，萍乡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较快。萍乡煤矿自1898年开办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到1907年基建工程竣工，共耗银670万两，整个煤矿由土法开采变成西法机器生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器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之一，步入当时"中国十大厂矿"的行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国际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萍乡煤矿的原煤年产量达到90多万吨，焦炭年产量达到20多万吨。1916年和1917年，萍矿煤炭产量连续两年达到或接近95万吨。"一战"结束后，军火需求量减少，汉冶萍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萍乡煤矿内部的各种矛盾逐渐显露和激化。由于企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受制于外国资本，推行封建的、奴役性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贪污盛

①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② 萍乡市编撰委员会编：《萍乡市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③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行。1915年12月9日，上海《时报》一篇披露萍乡煤矿腐败情形的报道提到，萍矿每年亏空50余万银两，但“许多员司，今年多有红利分派”，甚至自行决定薪水和红利数额。“德国矿师赖伦，每月工资高达200英镑，合银元2120元，是工人月平均工资的265倍。他离职后，每年领取所谓的‘赡养费’480英镑，合银元5088元，是工人年平均工资的53倍。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克扣工人工资3000多元，‘超过其正薪的七倍’。”[①] 在萍乡煤矿大机器生产建立和发展的同时，由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建立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也在缓慢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控制政权，实行封建买办军阀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不过，近代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萍乡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增长。

三、阶级状况

19世纪末，随着萍乡煤矿的开办和株萍铁路的修建，一个崭新的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在安源诞生和崛起。在萍乡煤矿的开办和株萍铁路修建的过程中，原来在安源矿区内各商井做工的许多工人，由于商井被萍乡煤矿兼并而转到矿上做工。同时，附近各县来安源谋生的大批劳苦群众，也陆续加入了路矿工人的行列。据刘少奇、朱少连1923年8月所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当时萍乡煤矿“全矿雇佣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需增加），内计窿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株萍路局工友共一千一百余人”[②]。路矿两局工人约1.3万人。此外，安源矿区常有失业工人四五千人。这些工人平常以短途挑运煤焦和其他临时性工作为生，矿局需要工人的时候就到矿上做工。他们是路矿的产业后备军。

安源路矿工人阶级的诞生，比西欧产业工人阶级晚了一百二三十年，比本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也要迟三四十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它只有23年的历史，其中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人也才只有五六年的工龄。路矿工人的人数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200万的比例不足百分之

---

①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②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撰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6页。

一。同时，由于路矿处在中国内地农村包围之中，同周围广大农村人口相比，工人的人数显得更加微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同中国其他无产阶级一样，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和特殊优点，在安源路矿工人身上同样存在。

四、"五四"运动对萍乡和安源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萍乡籍学生张国焘、罗运磷等人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家乡的父老乡亲通报运动信息，邮寄刊物，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风潮迅速席卷江西。在江西早期的革命史上，袁玉冰和方志敏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赵醒侬是创建江西党团地方组织的第一人，他们被称为"江西三杰"。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大为惊慌，对北洋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取缔学生爱国运动。北洋政府不敢违抗，竟下令禁止学生上街讲演，并不准各报刊登载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江西军阀陈光远仰承北洋政府的旨意，封闭"南昌学生联合会"，勒令解散学生宣传队，禁止学生上街讲演，派出武装军警包围各学校，镇压南昌学生爱国运动。面对禁令，学生的斗争不屈不挠，一面发动总罢课，一面冲破军警的包围阻挠，采取分散形式，继续上街宣传。南昌农业专科学校的饶守谦等五人以绝食抗议陈光远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省立女师学生程孝芬，激于校长金振声遏阻学生参加运动的义愤断指写血书，以表达爱国的热忱。这些不平凡的行动，都深深地激励了学子们的斗志。"江西三杰"之一的袁玉冰在"五四"时期发起组织了"改造社"，编辑出版了《新江西》杂志，在风雨如晦的旧江西吹响了建立光明的新江西的号角。此外，各个组织和团体纷纷出版刊物，编写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萍乡中学是萍乡最早传播并声援五四运动的地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02年，萍乡学堂成立，后改名为萍乡中学。萍乡中学的学生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分向往。1907年，4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革命党人李烈钧的军队；1909年，29名学生在校发动"剪辫子"运动；1910年，学生黄钟杰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捕

牺牲，成为萍乡中学第一个革命烈士。1911年上半年，萍乡中学学生纷纷参加革命军，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也相继传入萍乡中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受到萍乡中学师生的衷心拥护。所以，当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萍乡，萍乡中学师生率先响应。他们纷纷罢课游行，集会演讲，散发传单，绘制漫画，排演文艺节目，讽刺贪官污吏，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动员各界民众起来拯救国家。街头巷尾到处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的标语口号；楼堂店铺，到处是“誓死争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的彩色传单。抵制、查禁和销毁日货的斗争，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当时，萍乡中学校长张德潢是个留日学生，他官气十足，出入学校乘大轿、排仪仗，举牌张灯，上写“赣西镇守使顾问”、“萍乡中学校长”头衔。学生对他这种官僚作风早就厌恶至极。而此时他对学生的革命行动亦恼羞成怒，勾结赣西镇守使方本仁派军队包围学校，企图武力镇压学生运动，并公然宣布开除几名组织和领导罢课的进步学生，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师生们义愤填膺，纷纷冲进张德潢的住所，焚书烧稿，捣毁日货，吓得张德潢从孔庙仓皇逃走。赣西镇守使军队迫于压力，深恐事情闹大，慌忙从学校撤出，学潮获得胜利。五四运动激发了萍乡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或投笔从戎，或外出求学。萍乡中学的学生彭树敏等10人毅然打点行装，告别家人，于1920年年初赴法国勤工俭学，探求先进知识和救国救民真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极大地振奋了萍乡人民的爱国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逐渐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的发生、新思潮的传播，鼓舞了安源路矿工人。恰在这时，萍乡煤矿接连发生了德籍总管和总监殴打工人的事件。于是，安源工人掀起了驱逐德国人的浪潮。1919年6月23日，总平巷德籍总监工乌生勃里克将窿工工头汪大全打成重伤，导致工人心中久积的怒火一起迸发。100多名工人将乌生勃里克住所围住，另有100多名工人聚集在总平巷公事房门前。矿长急忙派矿警到场弹压开导，一面派人将汪大全抬到医院检查和治疗，一面找有关人员查问情况，私下利用职权开除了目睹乌生勃里克打人的工长刘增余，以阻止其作证。这一举动使工人激愤彻底爆发，做出了在矿上看到德国人即将其杀掉的决定。公司迫于形势，只好辞去全部德国雇员。这样，盘踞安源20多年的德国雇员终于在1919年7月中旬全部被

赶出了矿山。

然而，安源工人的境遇并未因此而改善。他们仍然“被压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各管班工头及职员对工人无不可以打、骂、罚跪、罚工钱，以及明抢暗夺的种种剥削。工人若稍有表示反对，轻则开除，重则置之监狱”①。1921 年 8 月到 10 月，株萍铁路火车运行的数量因湘鄂军阀战争而有所减少，路局便借此不发工资。屡次交涉，均无结果，导致工人罢工，并在这次罢工斗争中形成了“工人的团体”。但是，这个团体很快就被当局破坏了。“民国十年，……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九月，派人到安源组织分会，路矿工友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之组织是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友。对于此地久受压迫困于地狱中的大多数煤矿工友，不免有向隅之憾。”② 总的来看，同上海等大城市的工人相比，安源工人此时的组织与斗争还比较落后，在斗争中形成的团体，不仅规模小而且松散脆弱，没有形成工会组织。斗争的目的仅限于驱逐几个洋人以泄愤怒，或争到一点欠饷，只是经济要求，而且要求非常低，没有看到本阶级独立的政治要求。因此，安源工人当时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这些组织和斗争对工人阶级的逐步觉醒起了促进作用。

与安源工人相比，五四运动以后萍乡农民的组织与反抗斗争，其规模和声势要大得多。萍乡农民斗争形式有两类，一类是和平的举动。如，1919 年冬，萍乡的许多农户无粮过年，一些胆大的庄稼人便开始酝酿去财主家里吃“磨饭”。他们往往联合几百户人家上千人，一同到财主家里等饭吃，不吵不闹，不打不骂，吃饱了便一哄而散。萍乡的大小财主及其城内的大店铺均被吃过“磨饭”。一时间，萍乡吃“磨饭”成风，吃得贫苦农民喜形于色，“磨”得地主豪绅叫苦不迭。另一类是暴力反抗。在萍乡县南路，1918 年冬开始兴起一支农民武装队伍，实行劫富济贫。1919 年到 1920 年，队伍发展成各不相属的若干个队，每队数百人、上千人不等，有的队竟达到三四千人，时聚时散，多活动于边境山区。官府屡剿不获，无可奈何。萍乡农民 1920 年的反抗斗争引起了正在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不久他便亲临萍乡考察，并写下了《告中国

---

①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撰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65 页。

②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撰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6、117 页。

的农民》一文，热情地歌颂了萍乡农民的斗争。

第二节 安源工运

一、湖南共产主义者对萍乡的关注

正当萍乡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湖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于1920年11月下旬首次到萍乡，进行了社会考察和理论思考。当时，毛泽东的公开职业是学校教师，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师、附属小学主事，但他的主要精力是从事社会活动。1920年6月，驱张（张敬尧）运动取得胜利以后，他和新民学会会长何叔衡、彭璜等发起和大力推进湖南自治运动，力求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改良，造成一种较为良好的环境，以便为社会的根本改造做具体准备。同时，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发起赴法勤工俭学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同年秋天，他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开始秘密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下旬来到萍乡时，他本人的思想认识，正在因湖南自治运动失败而发生急剧变化。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处在由酝酿到正式成立的转折时期。

据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和26日在萍乡写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信中所说，他1920年到萍乡是“近因积倦，游览到萍”①。事实上毛泽东原本打算到醴陵考察教育，但就当时萍乡的活动形势，他并未在醴陵停留，而是乘火车一直到达萍乡，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一边游览，一边工作。他当时主要做的工作是：研究新民学会会友蔡和森、萧子升等当年8月各自从法国写给他的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建党和社会改造的道路问题；同时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二两集（仅第二集的序言是回长沙后于11月30日写的），确定了第三集的内容和信稿。在编辑第一、二集的过程中，给5位会友各写了一封信，又在4位会友的信后各写了一篇答词或按语，共写了9篇文稿②。

---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1、556页。

②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毛泽东在萍乡的一个星期是他人生中思想发生急剧变化，并产生重大飞跃的时期。1920 年夏天，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开始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他认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只在全国“这个大组织上用功”，因而主张“改途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①]。他认为中国还不具备俄国那种“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只能从分处下手”[②]，实行分省自治，并从湖南做起。同时，他对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存有幻想——他希望由省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建设“新湖南”[③]。但是，湖南自治问题提出以后，“空气至为黯淡”，“多数人莫名其妙”[④]。毛泽东本人则因为组织了 10 月 10 日长沙各界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而遭到省政府的追究和迫害。11 月 7 日，长沙工人、学生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示威游行遭到军警镇压，标志着湖南自治运动失败。这使得毛泽东头脑中残存的政治改良幻想彻底破灭，思想认识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无情的事实告诉他，从分省自治着手行不通。那么，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改造中国呢？毛泽东从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从法国写来的信中找到了答案。

1920 年 8 月，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等从法国给毛泽东来信。信中告知留法勤工俭学会友在蒙达尼开会讨论学会进行方针和方法问题的详情。蔡和森陈述了他在蒙达尼会议上提出的采取俄式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的主张。蒙达尼会议和蔡、萧等人来信所提出的问题，与毛泽东当时因为湖南自治失败而引起深思的问题不谋而合。他在萍乡期间，一面进行社会调查，一面仔细研究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来信，开始了新民学会交由他负责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结合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就建党问题和社会改造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从而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这个飞跃突出反映在他在萍乡写的 9 篇文稿和回长沙后于 12 月 1 日回复蔡和

---

①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3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08 页。

③ 同上书，第 532 页。

④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5 页。

森等人的信中。在这封长信中，他对蔡和森提出的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的主张表示深切赞同，认为萧子升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等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并对自己的见解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他终于明白，从分省自治着手绝无希望，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组织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着手，为此，必须组织共产党。他后来在回忆这一转变的情形时说：1920 年 11 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军警镇压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确立起来的群众政治权利，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一九二零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①] 这封信标志着毛泽东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二、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就是其中一次最具影响力的工人运动。如果说毛泽东 1920 年 11 月到萍乡的考察使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安源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的主观条件，那么安源社会历史和当时状况则为后来工人运动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客观条件。

1. 中国共产党为安源工人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其明确指出，当时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与组织工人运动，而组织产业工会与教育工人是当时的两大重点工作。对工人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举办劳动补习学校，以“作为组织产业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所授学说，最重要的是能唤醒劳工觉悟，并使其明了组织工会的必要”；二是加强党的宣传，“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由党员直接经办或编辑”。[②] 可见，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

① ［美］斯诺著，吴黎平译：《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 页。

② 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安源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 页。

的那天起，就把解放无产阶级当成了首要任务，也把中国的工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邓中夏所说："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了'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①]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进一步指出：当前工运要在产业工人中首先组织铁路工人，全党要"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②]。随后，中共中央局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把建立矿山工会、海员工会同铁道工会一起，列为工会运动的三个重点。全党开始了全力开展产业工人的运动，以造成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阶级基础。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湖南的许多革命者总是把萍乡和安源路矿纳入自己活动的地区范围，组织安源工人和湘赣边界萍乡、浏阳、醴陵各县人民共同举行反清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湖南的中华工会机械会已经派人在安源组织分会。鉴于上述情况，党便把开拓安源工人运动的任务放在了中共湖南支部的肩上。这样，当时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便把开展工运的目光投向了安源。事实上，在党把安源划为中共湖南支部的工作范围之前，毛泽东已经对安源有所了解。早在1915年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了一本《明耻篇》小册子，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和袁世凯卖国的罪行，陈述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勿忘国耻，奋起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念。书中多处提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汉冶萍公司和萍乡煤矿。毛泽东阅读这本书时，曾在这些内容旁加过眉批。以后，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稿中，也多次提及萍乡。毛泽东当时不但熟悉萍乡和安源的情况，而且对这里民众改造社会的力量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2. 安源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使革命运动易于产生和发展

安源路矿由于是中国封建势力同外国垄断资本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十分明显。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里表现得尤其集中和典型。从1898年清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

---

① 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页。

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依靠清政府和德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在这里封闭土井、圈占土地、引进西方近代技术创办萍乡煤矿开始，本国的封建买办势力和外国垄断势力就在这里织就了一张罗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压迫。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里始终是最直接的，先是德国帝国主义以贷款相要挟，派出大批雇员和监工控制了萍乡煤矿的生产、财务、管理大权。他们可以随意打骂、处罚、开除中国工人，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压迫。1907 年，日本帝国主义也开始把魔爪伸了进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完全取代德国掌握了对汉冶萍公司及所属企业的控制权，并使之成为它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据点。另一方面，封建主义的压迫在这里尤为沉重。汉冶萍公司及安源路矿的当局者是从大地主转化而来的买办阶级，他们先后倚仗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支持，用封建的买办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来统治和摧残人民群众。他们大批封闭地方土井，压制民族工业发展，强行圈占土地，迫使周围的大批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破产，实行封建包工制，对工人进行奴隶式的剥削。同时，安源因地处内陆，同受资本主义影响较早的沿海地区相比，封建主义势力更加雄厚。当地的一些大地主、大土豪与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矿区建立地主武装“保卫团”，伙同矿局一起统治和镇压工人。因此，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安源异常尖锐。

3. 铁路工人与煤矿工人的优势互补，为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安源路矿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是中国较大的煤矿企业，号称“江南煤都”，是 20 世纪初全国的十大厂矿之一。作为旧中国的一个典型的重工业企业，该企业尽管采用了机器生产，但主要还是靠大量矿工的手工劳动。从性别构成上看，万余名工人中几乎均为男性，女工绝无；从技术构成上看，除少量机械工人为技术工人外（而他们也正是安源最早走上工人斗争的群体），几乎均为非技术工人；从工作场所看，由于产业集中，因而工人多在一起工作。可见，与上海等地工人内部的技术差异较大、工人分裂严重的情况不同，安源路矿工人内部差异较小，工作环境恶劣而又声息相通，从而为大规模的集体运动提供了一个政治动员的良好场所。此外，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的优势互补也是当年安源被共产党选为工人运动策源地的重要原因。铁路工人通过株萍铁路沟通了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株萍铁路与粤汉铁路和湘江航道相连，成为连接赣湘鄂三省

的交通要道，使铁路工人具有接触面大、见识较广等特点。路局机械工人、技术工人的文化水平较高，因而在路矿斗争中往往担当领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如湖北铁路学校毕业的株萍铁路机车司机朱少连，后任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修车房工人李涤生、周镜泉均是工人俱乐部的发起者。而煤矿工人在艰险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养成了团结互助、吃苦耐劳的非凡品质，而且由于受剥削压迫最重，其反抗意识、斗争意志也更强。铁路工人与煤矿工人的这种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为我们党在这里开展工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4. 安源工人阶级特殊性优点是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的重要原因

安源路矿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方式及其所处的时代和地理位置，以及它的经营内容和企业性质，使安源路矿工人阶级成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产业军。

第一，安源工人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安源工人所在的汉冶萍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之一，而安源路矿则是这个公司燃料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安源路矿的兴衰对汉冶萍公司和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影响甚大。安源工人同资产阶级相比，他们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和体现者；同农民相比，他们所体现的是社会先进生产力；同其他一些产业工人相比，他们所体现的是全国的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安源工人分布集中，团结力很强。安源路矿工人除 1400 余人分居在紫家冲、醴陵和株洲外，都集居在安源。工人来源地区主要集中于湘赣交界处，亲情与乡情较重，工人的地域性明显，早年的张之洞将其形容为“民情强悍，颇有楚风”。[①] 刘少奇则称之为“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团结”[②]。安源工人分布集中，具备了极强的凝聚力，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和运动的开展。此外，安源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多为湖南和萍乡人，如李立三是醴陵人，刘少奇是宁乡人，多来自于工人们的老家，因而容易与工人形成一种亲密的同乡关系，从而使万众一心的团结局面容易生成。

第三，安源工人拥有天然的同盟军——农民，有利于工农联合。安源

① 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8 页。

② 中共萍乡市委宣传部编：《安源工人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4 页。

工人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大多数路矿工人来自附近各县，许多工人也并未脱离农村，保持了和农民的天然联系，有利于工农联合。据长沙《大公报》记者调查，萍矿“管理机器的工人多半是浙江、广东的；矿工却湖南人居多，湘潭、长沙、醴陵等县约占大半，本地也不太少”[①]。正因为如此，安源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从开始就同湘赣两省，特别是湘东赣西农民的反抗联系在一起。这种便于形成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有利形势，受到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特别关注。

第四，安源工人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三种压迫，受苦最深，革命性最强。安源路矿工人毫无人身自由，经常遭到工头、职员、矿警的打骂、处罚和各式各样的凌辱。矿工工作条件极其艰苦，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工人在井下干活，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工具，赤身裸体，仅备一条约三尺长的蓝布，在井下包在头上，出矿井用来围身遮羞，到澡堂便当洗澡巾。采煤工作面通常很低矮，工人无法直立，只能蹲着或侧躺着挖煤。“他们工作时使力，非用手，亦非用肩膀，乃是伏身头顶，口含小油灯，四肢爬行，如牛马之驮车。”[②] 井下的巷道和工作面因通风不良，温度很高，工人常在36摄氏度甚至更高的温度下作业，渴了只能喝地下渗出的脏水。井下安全设备差，工程质量低，经常发生冒顶、穿水、瓦斯爆炸等事故。工人的生活条件尤其糟糕。他们吃的是霉米、烂米、干菜，里面有虫、草、树皮。劳动条件的恶劣，物质生活的低下，不少工人患有职业病和其他各种疾病。工人生病无钱治疗，或因病、因工负伤、被工头打伤致残，或年老体衰等而不能工作，便被一脚踢开，在贫困中死去。安源工人阶级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生活极端痛苦，具有改变自己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正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3年9月发表的宣言所指出的：“在这三重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他们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更激烈。”

第五，安源路矿工人具有无畏的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安源工人从建矿的那天起，就不断地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而进行斗争。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北方各省兴起。1901年，路矿工人以捣毁铁路、码头及机械设施，以示对即将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反对。1905年5月，因为

---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史工业史资料》第3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53页。

② 刘善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德籍矿师随意扣罚工人工资引发路矿工人罢工和痛打洋人的斗争。1906年8月，萍乡煤矿局以节约经费为由，将窿工的“三班制”改为“两班制”，并由此解雇了一批工人，工人群起反对，举行罢工。同年12月，安源工人以特殊的方式参加了同盟会在湘赣边界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因为起义计划有变，安源工人没有接到起义号令，未能按计划投入战斗，但是，他们以枕戈待命的六千之众和在矿区内尽可能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牵制了官府的注意力和大量兵力，对起义的一度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13年，安源路矿工人先后开展了同工头清算工价的斗争和反对德国工程师殴打工人的斗争。1919年1月，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当月，萍乡煤矿工人掀起了驱逐德国人的斗争。这些抗争与起义虽未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嚣张气焰，开创了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先河，所以得到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的关注。

三、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基于对安源的社会矛盾、阶级状况以及历史和现状的综合分析，安源被中共湘区委员会确定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1. 黑夜明灯（1921.7—1922.9）：安源共产党支部、青年团和工会组织的建立

毛泽东到安源之前，他就已经同安源路局火车房的几个工人保持着通信，并寄去一些革命报刊和书籍。为了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秋天，28岁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书记以走亲访友的名义第一次来到安源，点燃了安源革命的烽火。他住在一个叫“八方井44号”的老乡毛紫云家里。在短短一个星期里，他不畏辛劳，多次深入矿井、工棚、家属之中，先后到了总平巷、西平巷、餐宿处、株萍铁路安源机务段、洗煤台、锅炉房等井上井下48处，目睹了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情景，了解了工人的思想情况。长期以来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路矿工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近似麻痹的神经使他们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见此状况，毛泽东耐心地向工人讲解，受穷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然而，当面对工人们眼神里流露出的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表情时，毛泽东更坚定了他改天换地的决心。他恳切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工人不是天生的奴隶！创造社会财富的是我们劳工，没有工人的辛勤劳动，就

没有社会的一切。我们要挺起腰杆结成一团，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铲除不合理的制度。他经常用“小石子与大石头”，“一根筷子与一把筷子”来形象地向工人讲解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毛泽东白天深入矿区各处，广泛地接触工人群众，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晚上又和工人交谈至深夜，启发大家的阶级斗争觉悟。毛泽东在安源首次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离开安源回到长沙后，经常将安源工人的疾苦挂在心间，并委派党的干部去安源开展工作。并指出，安源工人众多，生活非常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逐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核心。1921 年 12 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这次陪同毛泽东来安源的还有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李立三。李立三以办学校为名开始了在安源的工作。他采取了毛泽东的“争取合法斗争办平民教育”[①] 的策略。为取得合法公开的地位，李立三等人在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介绍下，开始创办平民小学，学生多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然后又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在工人中进行工作，筹办工人补习学校。1922 年 1 月，在安源五福巷成立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当时学生有 60 多人，以路局工人居多。因为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班都设在同一座楼上，白天平民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上课，晚上工人补习班上课，所以工人们称工人补习班为“夜校”。夜校的主要课程有两门：国文和算术。课本是教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编写的。夜校名义上是教文化，实际上是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平民学校成立之后，为取得合法地位，李立三等人给当时的萍乡知事写了一份呈文，要求将平民学校立案，寻求合法地位[②]。由于李立三本人是醴陵有名的富户之子，当地的一个开明的绅士又给予了李立三很大的帮助，因而该呈文很快得到县知事的批准立案，从而使工人运动得以在合法的掩护下进行。

但李立三发现当局对开办夜校仍怀有警惕态度，为了防止敌人混入夜校破坏，就给每一个到夜校听课的工友发听课证，而且安排专人在外面站

---

① 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8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编：《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 页。

岗放哨。另外，还给每个学员发一本铅印的《国民课本》，以备突击检查。如果衙门或矿局有人来探听，他们就把革命书籍放在识字课本底下。在夜校开办的过程中，没有教材，李立三就自己编撰。当时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是义务教书，教师队伍中还有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刘少奇的夫人何保贞。为了使工人用简单的方法掌握通俗易懂的知识，李立三还组织编写了《安源旬刊》。《安源旬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工人阶级自己的读物。工人夜校的创办，不但使工人掌握了文化和科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训练了工人的战斗能力，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在安源发展第一批中共党员，并建立安源第一个党支部。1922 年 2 月，在萍乡煤矿的一个火车房，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了，李立三任书记。这个支部诞生时虽然只有 6 个工人党员，但就是这 6 个工人改变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结构。

安源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以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筹建工人俱乐部。1922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16 日，在安源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召开了三次筹备会议，选举了正副主任，吸收了 300 多名部员，并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时正是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的时候）隆重集会，正式宣布俱乐部成立。1922 年 5 月 1 日清晨，安源路矿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工人们手持小彩旗，涌向牛角坡工人夜校前的广场。广场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庆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随着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俱乐部也不断壮大。工人俱乐部是党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党领导工人对敌斗争的司令部。它的成立把安源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的同时，安源工人还有意识、有准备地成立了工人监察队。在同年 9 月中旬爆发的大罢工斗争中，俱乐部为了有力对抗和预防反动派的武装镇压，扩大了工人纠察队，成立了工人侦察队，这是我党领导下最早的具有武装性质的工人武装组织。

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于 1922 年 5 月中旬来到安源，并召开了工人俱乐部干部会议。毛泽东热情地赞扬了安源工人日益高涨的革命激情，并勉励大家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注意策略。在白色恐怖下，只有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使得安源工人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 安源风雷（1922.9—1923.2）：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日益巩固壮大。俱乐部通过夜校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工人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这时，路矿当局拖欠工人工资已经几个月，加上物价一日数涨，工人们怨声载道。1922 年 7 月底，汉阳铁厂的工友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武力封闭俱乐部，举行了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安源的广大工人，他们认识到不奋起与资本家作斗争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于是，工人们来到俱乐部，纷纷要求俱乐部的负责人像汉阳铁厂那样，带领大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举行大罢工。

路矿当局自从听到汉阳铁厂罢工的消息以后，惶惶不可终日。汉冶萍公司是一个整体，汉阳罢工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恐慌至极的资本家妄图将这股革命的热潮扑灭下去。他们首先用金钱百般拉拢俱乐部同志，遭到义正词严的斥责。资本家见利诱不成，便凶相毕露，公开诬蔑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并加紧勾结萍乡县镇守使，扬言工人俱乐部如不自行关闭，就要武力查封。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如不赶快离开安源，就有杀身之祸。安源路矿的干部和工人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坚定沉着，誓把斗争进行到底。

1922 年 9 月，毛泽东又一次从长沙来到安源。他在听取了干部和工人代表的详细汇报后，毛泽东向大家讲述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他指出，广州、香港、上海、湖南等地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多次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就给安源工人以很大影响。安源路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夜校学习，阶级觉悟有了迅速提高，斗争决心很大。工人俱乐部在工人当中有很高的威信，通过党团骨干，完全能够把绝大多数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安源煤矿是中国很重要的工业区，产业工人多而集中，如果在安源搞起罢工，对全国会有很大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做出了非采取罢工手段不可的决定，并对罢工的组织准备工作做了全面而周密的部署，对成立工人纠察队坚守矿山要害锅炉房等问题也都做了重要指示。他要求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群众勇往直前，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在斗争中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离开安源后，毛泽东通过书信对安源工人大罢工的一些具体策略做了进一步的指示。他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有坚固的团结和坚

强的斗志，同时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必须采取“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安源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党员们夜以继日地在工人中奔波，暗地里串联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1922年9月11日，刘少奇被派往安源，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和李立三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就在刘少奇抵达安源的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了三项最低要求：第一，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工人俱乐部；第二，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费用二百元；第三，七天内发清欠饷。限两天之内做出圆满答复，否则即行罢工；同时俱乐部抓紧时间向部员们宣传，教育工人，一切行动听从俱乐部的命令，号召部员做好随时罢工的思想准备。9月12日，路矿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承认第一和第二两条，但对第三条却借口目前矿上财政闲难，万难办到。延至9月13日午夜，中共安源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中共湘区区委的指示发出了罢工命令，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组织工人纠察队，召开工人代表会，宣布罢工纪律，决定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因关系矿井安全和安源全体人民生活不能停工外，其他各处工人一律停工，没有俱乐部的命令，不得上工。1922年9月14日凌晨四点，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工人俱乐部代表17000多名路矿工人向路矿当局提出了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以及废除把头制等17项条件。“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这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和“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长沙、上海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了安源大罢工的消息，不少工厂和学校也来电声援。

安源实现全面罢工后，平日耀武扬威的路矿反动当局惊恐万分。他们一面向赣西镇守使署、萍乡县署和上海总公司连发了两份“乱党造反”的告急电报，请求出兵弹压。另一面吩咐召开包工头紧急会议，命令包工头去动员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工友下井、进班，并许诺只要进了班，坐着、躺着都可以，工资照发。路矿反动当局的阴谋诡计被工人们逐一击破。面对武力镇压，安源工人同样严阵以待、毫无畏惧！罢工延至9月17日，资本家仍然不答应复工条件，俱乐部决定采取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锅炉熄火！捣毁锅炉房！锅炉房是矿山的要害部门，它供给全矿井下抽水机的

用电和打风机用的蒸汽。如果锅炉房停止工作，整个矿井就会瞬间被水淹没。如果发电机停止工作，整个工作面就会人无饮水，夜无灯光。局方终于在9月18日被迫答应复工条件。至此，大罢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知安源大罢工胜利的消息，立即发来电报祝贺，热情地赞扬了安源工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22年冬，在斗争胜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又一次亲临安源，了解工人罢工后的思想情况，检查俱乐部工作。他指示安源党组织，要趁罢工斗争的胜利，积极而慎重地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壮大党的组织。安源党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将中共安源党支部由1个逐步发展到13个，成立了中共安源地区委员会。团支部由1个逐步增加到26个，成立了团地委，俱乐部部员由700多人逐步发展到13000多人，并建立了株洲、湘东等3个分部。工人夜校由1所发展到7所，还设立了1个解决工人家属学文化、学职业技能的妇女职业部。

3. 硕果仅存（1923.2—1925.9）：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巩固与发展

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后，全国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安源工人运动却“巍然独存”，巩固和发展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使之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硕果仅存”的典范。

第一，废除了压迫工人20多年的包工制，工人的生活大有改善。包工制的废除，既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终结，也是一场经济斗争的一个重大成果。在俱乐部的领导下，通过大量艰苦具体的工作，安源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安源的工人，做完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弟读书不要钱。秩序由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纠纷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资本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订购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与从前相比，工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建立了最早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曾指示要在安源办工人消费合作社，以便减轻商人对工人的中间剥削。同时，派党的干部到安源筹备建立工人消费合作社。1923年2月7日，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开始正式营业。消费合作社设有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并设兑换、粮食、服物、器用四股，每股设经理一人。毛泽东的

大弟弟毛泽民任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并从大罢工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选派工人代表参加管理。

第三，提出了巩固工人俱乐部的三项措施。即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能力。“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很快接到了北京政府交通部的电报，要他们封闭俱乐部，一些工头和资本家蠢蠢欲动，安源工人运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时，李立三已调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代理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的刘少奇依据毛泽东的指示改变了斗争策略，提出了工人运动要“立取守势”的策略思想，教育工人要看清形势，不要骄傲，内部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以防止资本家的进攻。但对资本家的破坏，就要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同时利用反动当局内部的矛盾和空隙，尽量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争取工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使工人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第四，修建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1924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正式落成，整个建筑气势庄严，可容纳 1000 多人。此后，安源工人经常在这座礼堂里举行各种集会和演出以及游艺等娱乐活动，俱乐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工人学校的演讲会、游艺会也经常在这里举行。俱乐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经常性的活动，对安源工人起到了重大的组织和教育作用。

第五，刘少奇在安源创办了中共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培养革命急需的无产阶级干部和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 年秋，在刘少奇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安源地方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由党、团合办党校。“党校分初级班、高级班，开设了政治经济学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 3 门课程，每周上课 3 次共 6 小时，分别训练工人和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①] 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开办的一所党校。

4. 血雨腥风（1925. 9—1927. 9）：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曲折中发展

1925 年夏天，汉冶萍公司的太上皇日本人完本顾问秘密来到安源，密

---

① 刘正英：《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工运是我国早期工运的典范》，《福建党史月刊》2001 年第 11 期。

谋策划武力血洗工人俱乐部的计划。当时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盛恩颐成为具体执行该计划的负责人。盛恩颐是大官僚买办盛宣怀的儿子，极尽压迫剥削工人之能事，接到命令之后，马上奔波湘赣两省，用金钱买通了江西军阀方本仁、湖南军阀赵恒惕和赣西镇守使李鸿程，并于9月16日从长沙来到安源。9月18日是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安源13000多工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在矿局办公大楼前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们的正义行动使盛恩颐倍加恐慌，于是加快了血洗安源的行动。

1925年9月20日深夜，赣西镇守使李鸿程的一团反动军队偷偷地开进了安源。敌人架起机枪，封锁了安源的全部出口，包围了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工人补习夜校等地方，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搜捕。9月21日凌晨3时，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亲自坐镇安源，在湘赣两省军阀的支持下，由赣西镇守使李鸿程亲自出面，趁工人当时正处于交接班之际，派军队迅速占领工人俱乐部，逮捕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及干事9人，工人们奋起反抗，结果遭到军警们的屠杀，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军方还洗劫学校、俱乐部、消费合作社。接着，汉冶萍公司悍然宣布对煤矿进行整顿，开除工人，为了彻底摧毁安源工人运动，他们用刺刀逼着几千名工人离开安源，驱逐出萍乡境界。没有开除的工人也全部停工，失业者达一万多人。留在矿内继续上班的工人不超过八百人。这就是中外震惊的安源“九月惨案”，安源劳资双方近三年的和平局面宣告终结。

“九月惨案”之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详细地陈述了事件的全部经过和真相，向全国人民愤怒控诉了敌人的滔天罪行。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许多进步团体都纷纷发来声援电。全国许多进步报刊都纷纷发表文章，抨击敌人对安源工人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江西、湖南、湖北等省许多地方民众，汉冶萍总工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还举行了集会和罢工，声援安源工人的正义斗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牺牲后，遗体被安源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抢了出来用火车送到长沙，沿途各站都为烈士致哀。长沙的工人、农民、学生，还为黄静源同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几千名学生抬着烈士的遗体，冲破反动政府的重重阻挠，在长沙街上举行了悲壮的大游行，表示要继承烈士的遗志，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九月惨案”后，上万名安源工人遭遣散回到湘赣两省的农村，从而

点燃了当地农民的革命之火，因而湖南的醴陵、浏阳、株洲、湘潭、衡阳、长沙市郊及湘南各县、江西的萍乡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升温。安源的工人运动开始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始了工农联合、工农运动互动的发展局面，使中国的革命运动由城市转向农村率先在安源附近得以实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安源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面坚持就地斗争，一面派出大批工人奔赴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安源工人以极大的革命热忱，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当时，在萍乡、浏阳、湘潭、醴陵、衡山、株洲等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安源工人在农村中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大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从 1925 年年底到 1926 年上半年，安源党组织先后派了 2000 多名工人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北伐军。1927 年 3 月，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一些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又赴武汉学习。从农讲所学习回来的安源工人，于 1927 年年初在萍乡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安源工人、农民运动骨干 100 多人。教员向学员们讲授自己在农讲所学到的革命道理，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许多重要指示。他们还结合萍乡的实际情况，编写了一些教材。通过讲习班的培训，学员们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骨干。第一期农讲班学员毕业之后，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农村开展工作，使萍乡地区的 17 个区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八万多人。1927 年 2 月，萍乡县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麦大会同时召开，标志着安源工农运动日益紧密地结合，标志着萍乡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曾这样评价安源工人："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也是安源工人做起来的，远的岳北农民暴动，近的农村斗争，最发展的醴陵与挨近的萍乡，都是很多安源工人在那里的影响。"① 有着义无反顾、敢为人先信念和精神的安源工人，将安源变成了湘、赣、鄂、粤四省的一个重要革命中心区域，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点燃起秋收起义的熊熊大火，准备和积蓄了革命的薪柴、火种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把支持大革命作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因而在"九月惨案"之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倡导下，当初被派往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

① 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等编：《秋收起义在江西》，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3 页。

学习的安源工人大部分参加了北伐军，很多人担任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并有不少人担任了中、下级军官。他们经过多次革命斗争的考验，有很高的觉悟，作战非常勇敢。1926 年 7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不到半年时间，国民革命军占领了湘、鄂、赣、闽、浙、皖六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北伐军以势如破竹之势直逼长沙。消息传到安源，大大地振奋了安源工人的革命斗志。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一批批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侦察队，等等，赶赴前线或深入敌后积极助战。特别是安源工人组织的破坏队，在敌后不断破坏铁路、公路和电话线，使敌人陷于混乱，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安源工人为北伐与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5. 革命星火（1927.9—1930.12）：秋收起义的主要策源地

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安源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为目标的新的暴力革命。

1927 年 9 月，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阐明了“八七会议”确定的新方针——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介绍湖南省委改组的情形，以及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与会者报告了各地军事情形和工农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就军事问题和工农暴动的布置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如下决定：第一，确定了部队的建制和名称。将驻修水、铜鼓的浏阳、平江两县农军和卢德铭所部警卫团，驻安源的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五县的农军，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第二，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安源行动委员会。第三，确定了军事行动和民众暴动计划。分三路合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平江农军为主力，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浏阳农军及卢德铭所部警卫团为主力。在这三路中，又以第三路为主力军。会议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①

安源张家湾会议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探索武装斗争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相结合，这也是实现由进攻城市转入退却农村，到农村

①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撰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26、727 页。

建立革命根据地战略转变中的重要环节。

此后，安源路矿工人还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提供兵源。先后到井冈山参加红军的安源工人有6000余名。二是提供物质上的援助。安源的中共组织利用该地离湘赣等地的大城市较近的优势，为当时处于封锁之中的井冈山根据地采购了大量药品、武器。在安源修理厂里，工人们为红军修好了许多枪支，工人们还拿出了一百多担炸药、雷管，交给红军。负责给红军挑运这些炸药、雷管的工人，后来组成了我军第一支工兵连。三是担当交通中转站。当时中共的一些重要的秘密机关都驻在安源，如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湘东特委、中共安源市委等。安源的党员为沟通井冈山与这些重要机关的联系，开辟了许多秘密通道，使井冈山与外界的联系得以保持。

第三节 安源丰碑

安源工人运动在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安源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

安源工人运动斗争时间长，一波三折，斗争的阶段性演变体现了我党工人运动政策与时俱进的特点。从1921年秋天兴起至1930年9月终结，开创了前后长达十年之久的辉煌历史。安源工人运动具有以下特点：

1. 安源工人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罢工”不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全部。从1922年9月至1925年9月的三年时间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和平斗争时期，安源工人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与资本家进行了和平斗争，并且取得了令中外瞩目的成就。1925年9月至1927年9月，是安源工人运动从和平斗争向武装起义的过渡时期。安源工人在“九月惨案”后，逐渐转入农村，与江西、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了周边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自1927年9月起，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正式进入了武装起义阶段，积极参加了秋收起义，接着大批安源工人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参加了红军，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还有很多安源工人积极领

导与参与了赣西、湘东的农民暴动，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为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安源工人运动体现了我党工人运动政策与时俱进的演变特点，即从早期的和平斗争转为武装起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转为与广大农民的结盟。安源工人运动完整地见证了这种转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2. 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杰出才能

安源工人运动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除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外，蒋先云、毛泽民、林育英、李求实、陈潭秋、贺昌、肖劲光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优秀干部曾奉派到安源任职。党、团中央和湖南区（省）委及湘东特委的领导成员高君宇、李维汉、蔡和森、林育南、恽代英、夏明翰、滕代远等曾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红军将领曾率领红军部队到安源活动和扩军。在党的领导培养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在安源工人及其家属中以及在安源党组织领导下的路矿周边各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朱少连、刘昌炎、涂正楚、朱昌炎、袁德生、高自立、孔原等群众领袖和党的重要干部。他们在安源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安源工运蓬勃兴起，独树一帜，形成和积累了许多重要而宝贵的经验，并及时为全国主要工运地区提供借鉴和指导，安源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也因此被中共中央称为“无产阶级的大本营”①。

3. 安源工人运动走过了一个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工人的斗争还是自发的、不成熟的，大多属于为了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尚提不出本阶级的独立要求和政治纲领。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普遍性的是为争取经济权利而展开的斗争，也就是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当时，安源煤矿工人大多数是附近农村破产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思想觉悟低，家庭困难，生活压力大，他们从农村来到矿山挖煤是为了讨生活，因此，早期安源工人的斗争目标也仅仅是争取能够生存的基本权利。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随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1 页。

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源工人运动走过了一个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4. 安源工人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安源路矿大罢工前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在安源向工人群众宣传的是马列主义和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向工人讲述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道理，同时领导和组织安源工人建立党团组织。尤其是安源俱乐部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宣传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使他们明白了改造社会的道理，开始自觉地把眼前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的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在安源罢工胜利之后，安源工人迅速全面地转入工会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党的建设和创办经济实体等各项具有建设意义的事业和工作之中，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如创办《安源旬刊》、设立工人图书馆和读书处、兴建俱乐部大楼、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开办消费合作社、发行股票筹资、创办党团学校等。而这一切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其他罢工斗争中，几乎都没能开展，即便有也只是初步的尝试。

二、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地位

安源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尝试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需要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实现这个转变的过程必须要有一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比较熟悉，且对无产阶级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愿意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有不堪忍受反动派残酷压迫，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存在；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无产阶级的大脑，以唤起阶级的觉悟，并成为指导工人行动的思想武器。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正是由于具备了以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变条件，而成为我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尝试，也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和直接的经验借鉴。

2. 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总演习”

安源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有益探索，为国际共运史

和中国革命史谱写了重要篇章。安源大罢工以“不伤一人，不废一事，而取得完全胜利”的结果为中国的工人运动树立了榜样，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安源工运不仅局限于1922年9月间的安源大罢工，它从1921年秋兴起至1930年9月终结，开创了前后长达十年之久的辉煌历史。它既是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辉煌篇章，又是我党早期工运中的成功范例，全景式地完整体现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发生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从最初以中共党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依次经过第一次大罢工、“二七”惨案后的坚持和发展、实行国共合作、团结农民和其他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直接和间接地配合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武装进攻长沙和据守安源、秋收暴动、创造工农武装割据、支持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到1930年大举参加红军，将工人运动的主力转移到农村和战场。这就是安源路矿工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步改造社会，不断成长和前进的大致过程。这一过程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发展的基本进程是一致的。

3. 安源工人运动带动了周边广大农村地区的开放和进步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涌入，首先在广大沿海地区和邻近内陆城市最早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但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其自然经济的封闭落后，经济生活依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安源工人运动所产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到萍乡周边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广泛地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开放和进步。“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大批安源工人奔赴湘鄂赣各地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和其他民众运动。这些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成果并不因革命失败而完全消失。”① 湖南全省和江西赣西地区的农民运动取得显著成效，与安源工人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湖南第一个农民革命团体、代表湖南农民运动先声的衡山县岳北农工会，其主要组织者谢怀德就是由安源派出的工人骨干。中共安源地委所属湘潭县八叠乡农民协会也是湖南最早的农民革命团体之一，其组建过程中亦有安源工人的参与。在萍乡，党组织讲演队分赴农村讲演，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后，工人俱乐部被封闭，一大批被解雇的工人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当时分散到湖南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安源工人不下

① 刘善文主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千人，其中多数集中在农民运动最激烈的醴陵、湘潭、衡山、浏阳、长沙市郊以及湖南其他县，其中有不少人担任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职务。因此，安源工人运动在推动农村社会运动、促进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的发展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我党后来开展农村社会变革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经验。

三、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

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演习”。这场革命显示和检验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探索了中国由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方向，为我党将工人运动引入武装斗争做出了示范。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党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等政权建设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为后来全国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注重思想文化教育与实践调查研究是成功开展工人运动的基本方法

党用先进思想文化在安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志士，促进了工人觉悟的提高与认同感的加强，使安源成为当时党的干部摇篮和培训基地。大罢工前毛泽东的多次实地考察为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初步基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提高安源工人的思想觉悟起了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多样，而且通俗易懂：一是利用学校这个主阵地，系统地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启发工人觉悟；二是利用各种集会、演讲、戏剧表演等场合，有目的地宣传进步思想，使工人的思想得到熏陶；三是以工人俱乐部层层组织为媒介，以各级代表会议的召开为契机，使各种进步的思想逐层地传达给每个工人，使工人在组织中得到思想的提高。随着安源工人的自豪感与阶级认同感的加强，安源工人的团结力加强，使安源工人运动有了坚实的基础。安源工人思想觉悟在提升过程中体现出了速度快、整齐度高等特点，而这种思想发展的特点往往是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所必需的。

党组织尤其重视对党团员和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进行先进思想文化教育。1922 年 2 月，安源工人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前后，常用个别谈话或有关会议，结合工作和斗争实际对党团员进行宣传教育。1923 年，党组织在工人学校内开设了“特别班”，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党团组织基本知识教育、马列主义原理和斗争策略教育、及时了解国内外经济政治状况和各

种重大事件及党团组织的政策、学习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在党团员和工人中的影响。1924年，经安源党团地委决定，于12月开办了党校（亦为团校），开设了“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三门课程。1924年8月和1925年9月，先后两次选派了8名党团员赴苏联学习。由于党组织对党团员和工人优秀分子采取了这种特殊教育和特殊培养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又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使安源党团组织和党团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23年党的“三大”时，安源有党员40人，约占全党总数的十分之一。1925年党的“四大”时，安源党员约200人，约占全党总数的五分之一。1922年12月，安源有7个青年团支部，90名团员。1924年12月，发展到36个团支部，245名团员，占全国团员的十分之一。这批党团员在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党的事业的骨干和脊梁。有的人后来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朱少连曾担任过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李求实曾担任过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刘昌炎担任过党的安源地委书记，先后6000多名安源工人参加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其中几十人成长为党的领导者和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杨得志、王耀南、吴运铎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党用先进文化教育培养和造就了干部队伍和工人队伍，促使一批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迅速健康成长。

2. 严明规范的组织纪律是成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前提

在安源工人运动中，路矿工人不畏官威与权势，英勇善战、团结战斗，其中严明规范的组织纪律起了重要作用。安源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与指挥机关，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组织建设和纪律约束。俱乐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使工人俱乐部代表工人意愿，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俱乐部采取了“由小到大”的民主集中制选举办法。其基本组织为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由“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是由工人选举“总代表”组成的“最高代表会”。俱乐部的办事系统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再由主任委任股长八人（后改为委员会），各股委员若干人，组成俱乐部的办事机构。这种由下而上、由小及大的选举办法，既满足了工人的参政要求，又使办事机构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构筑了工人与俱乐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俱乐部除建立有系统的组织外，还成立了其他一些相关团体组织，如青年部、劳动童子军、园艺会、同乐会、出

版执行委员会、经济审查委员会、合作委员会等一些团体，联系特定的人群，使安源的每个工人均处于特定的组织网络中，更加提高了成员的凝聚力。在俱乐部的领导下，工人从以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社会成员转变为有组织、有纪律、受约束的社团成员，从而为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3. 灵活的斗争策略是成功开展工人运动的关键要素

安源工人运动不同阶段采取的斗争策略的连续性、灵活性与科学性是成功开展工人运动的关键要素。“哀而动人”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有理有力有节争取工人权利斗争的总策略。在第一次罢工之前，毛泽东等组织者根据安源的实际情况，吸取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上海纱厂、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等经验教训，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即在全力依靠工人群众的团结和坚强斗志的同时，注重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与当局斗争。这一策略的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首先争取了安源商会对工人采取同情态度，充当了调停人，还成功争取了一些行会、帮会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使整个罢工斗争朝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此外，在废除包工制的斗争中采取了“将计就计”的策略，使工头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成功地解决了包工制。在“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安源的工人更是采取了“弯弓待发”的策略，隐蔽精干，避敌锋芒，同时又对敌人的进攻毫不退缩，使安源的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失败，反而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

安源工人运动中多种策略的灵活运用，其科学性的理论依据即是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罢工工人首次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灵活斗争策略，依靠工农联盟，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使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成为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组织得最好的一次罢工。

4. 党的组织和领导是成功开展工人运动的根本保证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选派大批干部到安源组建了一批党团组织和工人组织。1922 年 2 月，中共安源支部建立，当时有党员 6 人，书记是李立三。随着斗争的扩大与党员人数的增加，后又改名为安源地委。1921 年 12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路矿支部建立，书记也是李立三，有 8 名团员，后易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执行委员会，这些非公开性的党团组织

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实际领导核心。而成立于1922年5月1日的安源工人俱乐部，表面上以“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为宗旨，实际上是工人运动公开的领导机关。安源发展了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在大罢工时安源党员总数不过20余人；1923年，也只有30余人；1925年，安源党组织成为当时全国党组织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党员人数达198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994人的五分之一。到1927年7月，中共安源特别区委下辖30个支部，党员700余人，直至1930年3月，中共安源特别区委仍有10个支部。从1925年9月到1930年10月，安源先后组建了中共安源地委、安源特区委、安源市委和安源特别区委。安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遵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革命任务和斗争方向，全力投入到党的武装革命斗争中去。

党的领导是安源工人运动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障。从1920年11月下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曾先后5次到安源煤矿，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的觉悟和认同感。在此期间，李立三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安源路矿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1922年1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2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1922年3月26日）、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1922年6月20日）、创办了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1922年7月）、参与发起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1922年8月）、拥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劳动立法运动，使安源工人有了明确的斗争纲领。在党的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一个个胜利。

我党在安源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安源工运蓬勃兴起，独树一帜，形成和积累了许多重要而宝贵的经验，并及时为全国主要工运地区提供了借鉴和指导。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是安源工运的开创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安源是建党后最早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党的许多著名革命家和重要干部都曾在安源从事过革命活动或担任安源党、团、工会组织的重要职务，如李立三、陈潭秋、蒋先云、毛泽民、林育英、林育南、贺昌、李求实等；中共中央、团中央和湖南省委曾多次直接派特派员、巡视员来安源指导巡视工作，如高君宇、李维汉、蔡和森、恽代英、夏明翰、滕代远等。安源还产生了我党最早的工人身份的中央委员，从党

的“三大”到“六大”，均有安源工人党代表参加，培养了朱少连、刘昌炎、涂正楚、袁德生等一大批我党早期重要的工人领袖。如此众多的党的领袖和重要干部聚集安源，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5. 工人的团结及工人组织的高度集中是成功开展工人运动的核心条件

安源工人运动是我党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党的领导和决策的至关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我党在其他地方也领导了工人运动，却多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偏居两省交界的弹丸小镇——安源的工人运动可以一枝独秀呢？其中一个核心条件就是安源工人自身的特点及安源地区独特的人文与自然背景。罢工的主体是工人，工人的地域来源、技术水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等因素是影响其斗争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源工人内部的团结、工人组织的高度统一是安源工人斗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在罢工开始前，帮会在工人中的势力很大，能否把工人从帮会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工人领袖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李立三在罢工之前采取了统战政策，“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帮会中的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①。这一策略在安源是成功的，得到了帮会对罢工的支持。罢工以后，伴随着工人力量的壮大与自身地位的提高，工人开始陆续退出了帮会，12000多名工人几乎全部成为工人俱乐部的成员。帮会等旧式组织一直是困扰近代工人运动的一个障碍，而安源工人运动由于成功地排除了这个“隐患”，从而使工人的组织高度集中，工人的组织网络无所不在，从而促进了安源工人运动的胜利。

四、安源工人运动的当代价值

一部安源工人运动历史就是安源工人阶级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1. 安源工人的创新精神是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安源工人运动发生于党成立之初，中国工人运动正处刚刚启动之际，如何在当时血雨腥风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走出

① 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一条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新道路，这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党还是安源工人阶级，都是一项极富冒险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可贵的是，面对此种挑战，安源工人阶级在全国工人运动中做出了表率，他们发扬了一股敢闯、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中国工人运动中的诸多先例。通过举办平民教育的形式培育了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建立了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首创了工人学校和秘密的党校，开创了我党加强对工人阶级教育和对党员教育模式的先河。首创了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股份制的形式开展经济活动，为互济工友和革命活动提供资金。在持续 10 年的革命运动中，安源工人阶级从未满足于取得的成就而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面对变化了的形势而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开创不同的工作方式。在开展工人罢工运动以后，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又向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深入农村广泛发动农民运动迈进。大革命失败后，安源路矿工人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新道路，在秋收起义中他们是起义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并在全国第一次举起了誓与国民党决裂的“工农革命军”旗帜，战斗中他们更是敢于冲锋在前。这一系列首创是安源工人运动历史中最为辉煌的一部分，其中所透出的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气概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弘扬安源工人的斗争精神有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安源工人从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便始终在党的指引下义无反顾地坚持斗争。即使是在两次全国性革命低潮期间（1923 年“二七惨案”后和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运仍是奇迹般地巍然独存；即使在自身的两次失败（1925 年 9 月失败与 1928 年 8 月失败）以后，也能重整旗鼓，迅速恢复。与此同时，安源工人中的一批批成长起来的先进分子，带着安源革命的理念与经验，奔向全国各地开展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正是安源工人这种强烈的革命斗志、远大理想和团结奋进、敢于牺牲的革命气魄与胆识，不断地激励着后来人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努力进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3. 安源工运告诉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安源工人运动显示了产业工人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战斗力。安源煤矿是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十分先进的矿山，工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才可以上岗作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安源工人阶级革命的自觉性、信念的坚定性与斗争的彻底性结合一起，迸发出强大的阶级力量和斗争的威力。在九

月大罢工的艰难日子里，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阶级，不惧强暴、不畏利诱，他们自觉维护秩序、讲求团结、顾全大局，以文明罢工的形象誓将罢工进行到底。罢工胜利后，路矿工人积极参加俱乐部和党、团组织，自觉地推进工人运动的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安源工人运动既是对安源路矿工人的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对中国产业工人的一次大检阅。它表明以安源路矿工人为代表的中国产业工人，不仅是中国历史前进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主人翁和主体力量，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和现实的必然要求。

4. 安源工运期间反腐斗争的实践为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1922 年 9 月至 1923 年 7 月之间，安源工运中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滋生并日益凸显。大罢工取得胜利之后，俱乐部急剧发展，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工作机构缺乏有效管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官僚习气、管理失职、规则混乱、侵吞挪用公款等腐化现象。当时安源的各项工作都要找工会，工会就是半政权机关。因此，安源党组织主要围绕加强俱乐部建设及如何加强对经济实体的管理，开展了反腐倡廉工作。

俱乐部在刘少奇、李立三、毛泽民、朱少连的领导和主持下，从 1923 年 7 月至 1924 年年底，集中开展了整顿与惩处相结合的反腐倡廉工作。刘少奇在对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兴起与现状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之后，写下了两篇涵盖工运建设和反腐倡廉内容的文章——《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俱乐部组织概况》，这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涉及反腐倡廉内容的历史文献。针对俱乐部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俱乐部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设立由主任团和七个股构成的俱乐部组织机构，形成了总代表、百代表、十代表的工人代表制和权力行使模式。二是不断完善俱乐部与合作社管理的规章制度和运行机制。先后制定和实行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等，规定对俱乐部和内部机构工作实行报告制和公开制，对重大事项实行专题报告制，从部员、代表大会、各组织机构和经济事务等方面，在工作职权、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工作要求、经费收支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安源工运期间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不能单打一或只注重一点，必须多管齐下，采取批评、教育、制度与惩处并举的办法，

才能取得实效，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

5. 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经验对当前的工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为我党早期工会斗争取得胜利的成功范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我党对工会工作的探索史，分析与总结经验，可以为今天的工会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如，当时的《汉冶萍总工会章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乃至《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与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宗旨如出一辙，诸如代表的产生、最高权力机关、领导机构的组成与运作、经费、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也相差无几，体现了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巨大影响力。当今中国，工会组织是我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组织，是党与政府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工会工作，要以工会为载体，不断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此外，安源工人俱乐部实践中的党领导工会的指导原则和工会组织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的宗旨，也是我们新时期必须时刻牢记并要践行的重要经验。在新的形势下，工会组织要以服务工人阶级为己任，大力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不断改善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者。

第二章

军旗升起

看到“八一”军旗迎风飘扬，就不能不想到“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坐落在英雄城繁华地段上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当年名为江西大旅社，今天静静地伫立在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大街上。1927年，随着一声震撼世界的枪声在这里响起，这座银灰色的建筑从此走进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99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江泽民总书记为纪念馆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

历史的车轮挟带着风云，滚滚向前。50多年来，先后有上千万参观者走进纪念馆，人们在这里追寻那逝去的枪声、飘散的硝烟，追寻那凝聚光荣与梦想的峥嵘岁月。英雄的城市至今仍旧在铭记、传承着英雄的旋律。

第一节　大革命的失败与教训

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大革命辉煌的历史画卷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晶。

“二七惨案”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在中国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此时，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要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因而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一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并确立了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在于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只有举行北伐才能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会议确定党在当时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决定要在北伐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这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推动和帮助广东国民政府进行北伐战争的军事和物资准备；另一方面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为北伐战争准备牢固的群众基础。有了焕然一新的革命政党，有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有了从挫折中奋起的工人，有了从沉睡中觉醒的农民，革命的洪流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中国南部，逐渐汇成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6年5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北伐的主要敌人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和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军阀孙传芳及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战争开始时，湖南、湖北是主要战场。北伐军英勇善战，在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等战役中，屡建战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胜利，使孙传芳十分惊恐。1926年8月间，孙传芳陆续调集部队入赣，准备同北伐军决战。9月初，北伐军向江西孙传芳军发动进攻，开辟了江西战场。11月5日，北伐军占领九江；8日，进占南昌，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北伐军胜利的影响下，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驻守粤闽边境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3个师没有经过大的战斗，于11月相继攻占漳州、泉州等地，12月5日，进占福州，中旬占领福建全省。

1927年年初，北伐军继续向长江下游进攻。2月，相继攻占了安庆、芜湖、杭州等地；3月，攻克南京。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

起义，解放上海。这样，东南5省广大地区为北伐军所占领，孙传芳的反动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北伐战争取得了又一重大胜利。

在南方北伐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原退守绥远地区的冯玉祥国民军，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参加革命。随后，冯玉祥采纳了李大钊的进军方略，经甘肃向陕西进军，于11月占领陕西全省。不久，东出潼关，进兵河南，策应北伐军的进军。

北伐军出师还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占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等省，解放了长沙、武汉、南昌、福州、杭州、南京、安庆等大中城市，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大革命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它是近代史上真正的人民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要革命阶级的联合革命，是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新高潮。北伐战争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工农运动是这次革命的基础。它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国民革命虽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却使中国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洗礼，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得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为革命建立了新起点。

二、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与白色恐怖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没有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阴谋事件，蓄意篡夺革命领导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华的权益，在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和继续支持北洋军阀负隅顽抗的同时，加紧施展种种阴谋手段分化革命统一战线，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活动，极力拉拢蒋介石。江浙财团也积极拉拢蒋介石。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了。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先后发生了杀害共产党

人、捣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拉拢下，蒋介石加紧了背叛革命的活动。

1927 年 3 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起义工人占领的上海。4 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清党”。4 月 12 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各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 2000 多人。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1927 年 4 月 28 日，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 38 岁。早年，李大钊曾在一篇名为《牺牲》的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地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城，血雨腥风，大革命到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把汪精卫看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从而导致了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右倾的迁就政策。这次大会没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五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未能解决当时紧迫的建立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在这之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 5 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公开准备叛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7 月 15 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 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书中深情地希望："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必定会胜利。这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但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培养了一批革命领导骨干，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并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就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从主观上说，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难以避免的。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

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陈独秀右倾妥协退让错误的思想根源，既有理论上的失误，也有策略方针上的失误。就理论失误来说，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因此，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应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认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共产党估计过低，导致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丧失领导权。从策略方针上的失误来说，陈独秀认为只有采取退让的方针，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政策，才可以表明共产党人没有夺取权力的企图，使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放心，国共合作不至于破裂。在农民问题上，否认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压制农民运动。陈独秀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提出种种限制，反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指责农民运动，从而使无产阶级失去了可靠的同盟军。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做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错误有直接影响。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这是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全党更加坚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第二节 八一南昌起义与人民军队的诞生

一、南昌起义的成因

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历史背景”展厅，有一幅照片，透射出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烈画面：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

代替了光明。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贺龙、彭德怀、叶剑英、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这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党的行列中来。他们重新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风暴中去。十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个时刻时说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伫立在周恩来会见贺龙的巨幅画前，人们的耳边仿佛回荡着贺龙铿锵的声音——"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在一片血雨腥风中，我党毅然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从而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我党发动南昌起义，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一系列深刻原因的。

1. 我党的革命路线与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根本的不同

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所要进行的革命，只是打倒北洋军阀等旧军阀，建立他们当政的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我党代表的则是以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为主的广大人民的利益，我党所要进行的革命，是包含土地革命在内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工农政权。因此，二者虽然在打倒旧军阀的共同目标下暂时联合起来了，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的。

2.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面前，除了武装反抗，别无出路

1924年，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由于我党力量比较弱小，经验不足，因而我党要联合国民党进行革命，革命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无力领导革命，我党在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没有努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伪装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力量日渐强大，乃至在国民党内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并窃取了革命的领导权，包括军队的领导权。当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旧军阀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时，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伪装，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鉴于当时革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的声势还很浩大，他们便利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采用暴力屠杀这种方式来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三个：一是不再革命，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二是束手就擒，引颈受戮；三是武装反抗，继续革命。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逐渐清醒了，他们意识到已被逼上梁山了，要想将革命进行到底，只有武装反抗这一条路可走。

3. 我党掌握和影响了一部分军队，有能力进行南昌起义

我党在成立初期不懂得军队的重要性，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如京汉铁路大罢工等），逐渐懂得了斗争的残酷性，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当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时，我党对军队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不但派了一批党员到黄埔军校从事教学和管理活动，还动员了一批党员和先进青年报考军校，并在军校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此外，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周恩来、王若飞等，还吸收了朱德、叶挺等一批军事人才入党。这些军事人员和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一起，通过他们的革命热情、政治宣传和英勇战斗精神，扩大了我党在军队中的影响，甚至掌握了部分军队。因此，尽管大革命时期我党对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还是掌握和影响了一部分北伐军，如叶挺独立团、贺龙的第 20 军等，使得我党具备了发动南昌起义的军事实力。

4. 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行动，为我党举行南昌起义提供了时机

汪记国民党和蒋记国民党虽然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但由于争权夺利，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装着继续革命的样子，发动武汉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东征讨蒋”，实际上是想借机消灭蒋介石的势力，夺取国民党的主要领导权。“东征讨蒋”行动，使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集中于江西南昌、九江一线，为发动南昌起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5. 汪精卫的分共行动，成为我党举行南昌起义的导火索

一开始，汪精卫还只是秘密分共，想在“东征讨蒋”中让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打前锋，使之和蒋介石军队在拼杀中相互削弱乃至耗光，后来一看形势变了，便公开分共，并密谋分化、瓦解、消灭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要么听之任之，撤出军队中的党员，使在军队方面付出的多年心血付诸东流；要么发动起义，武装反抗。最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多数共产党人，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奋起反抗。

6. 起义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

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集中在南昌和九江一线，起义地点是在南昌还是在九江为好？最后选在南昌而不是九江，是有其原因的。其一，南昌地理条件比九江有利。九江毗临长江，交通发达，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均在长江两岸集结重兵。不仅如此，九江还时时处在横行于长江上的帝国主义海军的威胁下。而南昌则不同，它地处赣江之滨，北距长江 130 余公里。一方面，周围地域辽阔，物产丰富，部队机动范围广，回旋余地大，有利于部队起义后的发展；另一方面，交通不很发达，铁路仅有南浔线与九江相连，其间尚有宽约千余米的赣江阻隔。纵贯江西腹地的赣江，虽紧挨南昌城西流过，经鄱阳湖可直通长江，但其通航能力有限，不利于敌人快速向南昌大规模机动兵力，因而可以大大减轻起义军的敌情顾虑。后来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起义军从九江至南昌后，随即破坏了南浔铁路，直至 1927 年 8 月 7 日起义军撤离南昌两天之后，敌人才从九江方向赶来"收复"南昌。其二，在南昌举行起义能达成我优敌劣的兵力对比。起义前夕，敌人在南昌城内和近郊只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长朱培德的指挥部及警备团，该部所辖第 3 军的第 23、第 24 团，第 6 军的第 57 团，第 9 军的第 79、第 80 团，南昌卫戍司令部和省政府的警卫部队，共约 10000 人；而在我党掌握或影响下，能够向南昌集结参加武装起义的部队，有贺龙领导的第 20 军，叶挺领导的第 11 军第 24 师，受叶挺影响的第 11 军第 10 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 4 军第 25 师的大部分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等部队，共约 30000 人。后来虽然部分兵力未能及时赶到，但在举行起义时，我军仍在南昌城内及近郊形成了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其三，南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北伐战争期间，南昌及周围地区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在蒋介石公开其反革命面目之后，南昌的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英勇的斗争。直至 1927 年 7 月 25 日，即起义部队到达南昌的前两天，南昌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其他革命群众还举行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不屈不挠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南昌人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正是我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良好群众基础。

总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由于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我党做出了在南昌起义的决策。但是，整个决策的制定过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

二、南昌起义的决策

1. 南昌起义的提议

1927年7月15日，我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以前对我党态度较好、当时尚未公开反共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州，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当李立三等人于7月19日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到汪精卫一边，我党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于是，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聂荣臻、恽代英、叶挺、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在7月20日的谈话会上，提出要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南昌起义。“当时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 P. 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 P.’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第一次会议（即7月20日的九江谈话会——笔者注）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①

7月20日的九江谈话会后，李立三、邓中夏立即赶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谈话会上提出的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意见，得到了瞿秋白的赞同，因为瞿

---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

秋白要到武汉去参加中央紧急会议，便请他将此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赶快决断。

2. 起义时间最初定为7月28日晚

过了两天，局势更加紧张，汪精卫、张发奎企图欺骗叶挺和贺龙到庐山开会，再乘机解除他们的兵权，这一消息为我党所知。同时，谭平山已将南昌起义的计划告诉了贺龙，得到了贺龙的热烈响应。在这种情况下，7月23日晚，在九江的我党同志又开了一次会，决定参加起义部队7月28日以前集中南昌，7月28日晚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央征可否？"[①]

3. 临时中央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提议

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加以7月22日周恩来当面争取张发奎的最后谈判没有成功，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独立发动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起义；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起义；但对起义地点是在九江还是南昌，有不同的看法。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到九江后，立即召集在九江的负责同志开会，对在南昌还是在九江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讨论。经过全面分析，综合比较，权衡利弊，会议最终决定把举行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

4. 起义部队集中南昌

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师、第10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学生，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团、第75团及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警察武装等部队，共两万多人。7月25日至26日，参加起义的第11军、第20军部队分别在共产党人叶挺和贺龙（在南昌起义后参加共产党）指挥下，陆续由九江等地抵达南昌集中；第四军第25师部队在起义战斗胜利后的8月2日赶到南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后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则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5. 前委会成立并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成立

---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江西大旅社成为领导起义的指挥中心。由于有大量的起义准备工作要做，时间上来不及，前委会当即决定推迟起义，将起义时间由7月28日晚改为7月30日晚。

6. 张国焘阻挠起义和起义时间的最终确定

7月30日晨，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赶到南昌的张国焘（当时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带来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的最新意见，认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才可举行；否则不要举行，并将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同志退出来，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后才可举行起义，否则不要举行。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委会成员的一致反对，李立三认为起义势在必行，周恩来气得拍桌子，要辞职，谭平山则愤怒得要将张国焘捆起来；结果大家争论了数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他不同意，起义之事一时决定不下来。后来，李立三在和张国焘单独相处的时候，反复说明起义之事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加上汪精卫、张发奎想在八月一日赶到南昌来，到时起义可能搞不成，后果也难以料想，使得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举行南昌起义。7月31日中午，前委会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行动。7月31日晚上10点多钟，贺龙部队一个副营长叛变，向敌人泄露了起义消息。得知这一情况后，前委会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最终起义时间确定为8月1日凌晨两点。

南昌起义决策的曲折过程，说明我党举行南昌起义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缜密考虑后的抉择。在当时极为复杂、异常严峻的局势下，党内对于举行南昌起义这样一个从未搞过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出现不同意见，乃至激烈争论，都是正常的，它是我党逐步走向成熟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真实映照。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我们党就初步表现出了克服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外来干扰，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能力，这种能力后来一直为我党所保存，并在遵义会议上再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党才能走上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苏联解体后，屹立不倒。

三、南昌起义的经过

1927年8月1日凌晨零点半左右，觉察到南昌要举行起义的敌省政府卫队不甘心被消灭，想在起义战斗打响前以搞野外演习之名溜出城去，结

果刚出省政府后门，就被严密监视省政府的贺龙第20军第1师发现，哨兵鸣枪告警，使得人们"至晚十二时半，即发现枪声"①。随着这一声枪响，枪声接二连三地响开了，起义军纷纷开始行动，如曾参加起义战斗的侯镜如回忆："我……看看表，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同时，听到市内传来激烈的枪声，事不宜迟，我即向各总队下达了命令：开始攻击！"②这样，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开始了南昌起义的战斗。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由贺龙指挥的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由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同日下午，驻九江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和第75团，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参加起义，于2日拂晓开到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合。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任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所属第11军（辖第24、第25、第10师）由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20军（辖第1、第2师）由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9军由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全军共两万余人。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424页。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 月 3 日起，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乌进入广东省，先攻占东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而后再攻取广州。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 10 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8 月 7 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 1.3 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 3 天，继续前进。8 月 25 日，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这时，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 9000 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至壬田，阻止起义军南下；调黄绍竑部 9000 人由南雄、大余向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人马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当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 26 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激战至 30 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 6000 人，缴获步枪 2500 余挺。起义军伤亡也近 2000 人。9 月初，起义军一部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击退黄绍竑部的进攻。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陆续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9 月 22 日，第 11 军第 25 师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 23 日占领潮州、汕头。在此期间，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 25 师，令黄绍竑部经丰顺进攻潮州，令陈济棠、薛岳部 3 个师 1.5 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起义军主力决战。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前委决定，第 20 军新建的第 3 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 6500 余人迎击东进之敌。9 月 28 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县玉湖附近地区同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继向汤坑（今丰顺市）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 30 日，起义军伤亡 2000 余人，无力再战，遂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州。10 月 3 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今普宁市）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部队大部溃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 1300 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驻守三河坝的第 25 师，在给钱大钧部

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州转移，10 月 5 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第 3 师一部会合。此后，这两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粤赣湘边区，最后保存起义军约 800 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 1928 年 4 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四、人民军队的诞生

1. 人民军队的创建

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它是我们党领导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右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且摒弃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个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这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的整个形势的反映。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此外，南昌起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后来我军许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对此，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① 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南昌起义作为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7—548 页。

造红军，也就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是有深刻原因的。

第一，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开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虽然确定要通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由于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了解不多，还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通过什么步骤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完全清楚。当时全国才 50 多名党员，且多为知识分子，没有开展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将精力集中到组织工人上。1922 年党的“二大”，认清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但还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当然也就不懂得中国革命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党在“二大”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工人运动，如省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在工人运动中，既有胜利，也有失败，使党取得了一些经验教训，如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必须争取革命的同盟者；又如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靠罢工等合法斗争，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1923 年党的三大时，鉴于我党的力量还很弱小，而孙中山开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党采取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一种合作方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重视组织和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的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做好了准备，但我党此时仍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认为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直到党的三大，我党都没有认识到要自己来领导民主革命，更谈不上领导人民革命战争了。

1925 年党的“四大”，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实现领导权问题，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等问题，均未做出具体的回答，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政权和武装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党的“四大”后，革命的领导权仍然在国民党手上，党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上，如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等；二是放在了协助国民党统一广东、准备北伐、开展北伐上。此时的党，没有积极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对蒋介石这样的国民党新右派缺乏足够的认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击了国民党老右派等反共势力的进攻，但面对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时，却采取了以退让求团结的策略，导致我党在国民党和军队内的权力受到削弱，蒋介石的权力显著上升，为以后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由此也

可看出，处于此种状态的我党，是不会去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实际上，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已开始进一步反共，并破坏革命了，我党则仍然采取退让的政策，幻想以此换得蒋介石留在革命阵营内。结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叛变革命，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党在武汉召开了“五大”。在形势极为严重的关头，党的五大并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解救危机，没有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给予及时、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更没有挺身而出自己来领导革命，而是把以前对蒋介石的幻想放在了汪精卫等人身上，对他们一味退让，以求团结，想象他们会代表国民党“左”派来领导革命。无情的事实再一次撕碎了我党的幻想，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敌人的屠刀下，许多英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牺牲了，一些不坚定分子退党了，还有一些甚至叛变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就此毁灭，要么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反抗。此时，我党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只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进行革命战争。也正因为如此，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开端。

第二，南昌起义是我党完全独立自主领导人民军队的开端。

我们党对军队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党的一大虽然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但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时，因为党员人数少，且几乎全为知识分子，因此“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①]。党的二大虽然提出反帝反军阀，但也不懂得军队的重要性。党的“二大”后，党内部分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开始对军队和革命武装有一些认识，如周恩来，曾于 1922 年 12 月 15 日在《少年》杂志第六号上发表文章认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②] 又如，1923 年 2 月 27 日，我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镇压后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③] 此一时期，党开始吸收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 页。

③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6 页。

一些有军事斗争经验的人加入组织，如朱德同志就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人数极少，党主要地仍然是有计划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到了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虽然对于军队问题没有怎么涉及，但是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包括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从全国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共产党员周恩来还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先后来到军校任教。实际上，此时我党对军队的重要性已开始有所认识，并开始尝试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如1924年11月，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我党领导下的最早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但是，这种认识是很有限的，乃至到党的“四大”时，我党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后，我党是基于国共合作的精神，以国民党的名义来开展包括军队政治工作在内的各项军事工作的，军队的各项工作都要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包括统一广东的两次东征等战争。一直到1925年11月，我党才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所掌握的第一支军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是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主要通过国民党来开展国民革命工作，因而人数不多的叶挺独立团，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和其他的国民革命军一样，其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且要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大元帅府装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看做是我党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认为它们为我党后来创建人民军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却并不把它们的建立看做是人民军队创建的开端。

北伐战争中，我党对军队和独立领导革命的重要性依然认识不足，我党党员依然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开展军队工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不过数量始终有限。直到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叛变革命，举起屠刀，我党才猛然意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才发觉自己已不得不挺身而出，担负起独立领导革命的重担。

如果说，大革命失败前，我党对军队的重要性还存在着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急剧深化，南昌起义则是我党对军队认识发生这种根本转折的标志。正是从南昌起义开始，我

党才真正完全独立自主地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并试图以自己的军队力量做后盾，来独立领导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打天下。虽然南昌起义时我党出于诸多考虑，仍然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国民政府的名义，军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名号，但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敌人，都知道是共产党在领导着这一切，“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是 C. 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的遗嘱，想起来真好笑!”① “此次，共产党徒麇集南昌，煽兵构乱，其中如谭平山等，本党中央执行委员，竟敢为叛乱之举动，罪无可逭，最近发现彼辈组织革命委员会，除彼辈数人甘为主动者，并背签本党中央委员数人姓名于其间，以冀混淆视听，险恶狙诈，尤可痛恨。”② 因此，南昌起义是我们党完全独立自主领导军队的开端。我党后来确立南昌起义爆发的日子——八月一日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是名副其实的。

2. “八一”建军节的确立

1933 年 6 月 26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的日子。”6 月 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对为什么确立“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做出了解释：“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年的艰苦战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历次进攻，根本动摇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了革命高涨的基本杠杆之一，成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是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本委员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③

1933 年 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决议如下：（一）批准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2 页。
② 同上书，第 500 页。
③ 同上书，第 169 页。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二）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三）在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乡苏维埃政府土地部与内务部共同管理之下及在乡苏维埃政府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1933 年 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八一”反帝反战争日与红军纪念日告红色战士书》，号召“全体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红军，拥护我们百战百胜的红军，慰劳我们红军的家属”。同时，要求红军在“新的战争中，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锻炼我们自己，解除敌人的武装，武装我们自己，使我们铁的红军在不断的胜利中日益壮大起来”。

随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笔者注）就如何搞好第一个红军成立纪念日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还特别统一拟定颁布了 16 条宣传标语和 31 条口号，颁布了《“八一”纪念宣传大纲》。苏区党、政、军领导纷纷进行动员，毛泽东专门撰写了《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发表在 7 月 29 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博古作了以《战斗的纪念节，战斗的任务》为题的多场专题演讲。与此同时，苏区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开展了集会、游行、晚会活动，红军各部的宣传活动更为热烈。

根据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决定，中央苏区全面开展纪念“八一”活动。红军各部队加强军政训练，特别是对红军官兵进行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的再教育，增强官兵的政治责任感。全国总工会发布文件，号召苏区工人突击赶制 3 万双布草鞋慰问红军。苏区共青团中央局号召共青团员，积极参加红军和开展慰问红军活动。少共苏区中央局号召青年妇女，突击做 10 万双草鞋送给红军来纪念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江西省委、福建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也相继做出布置，要求各县委做好“八一”慰问工作。苏区广大人民在县、区、乡党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组织下，纷纷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

1933 年 8 月 1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举行阅兵、宣誓、授章、授旗仪式，庆祝第一个“八一”建军纪念日。为防止国民党军的空

袭，活动于 17 时到 19 时 30 分进行。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中共临时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和机关部门领导及代表，青年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与代表，瑞金城附近的部分群众，非受校阅部队代表，受校阅部队，总部直属队，共数万人。

受阅部队由 4 个有代表性的步兵团组成。即由原红 3 军一部编成的，代表“继续井冈山的精神”的红 1 军团第 1 师第 2 团；由原红 4 军一部编成的，代表“发扬南昌暴动的精神”的红 1 军团第 2 师第 5 团；由原宁都起义部队一部编成的，代表“发扬宁都暴动的精神”的红五军团第 13 师第 37 团；由原江西博生县等县地方武装一部编成的，代表“光荣的博生模范师”的红 14 师第 40 团。阅兵指挥员由红 2 师师长徐彦刚担任。阅兵首长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陪阅首长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17 时，阅兵部队代表、非受阅部队代表、总部直属队和参观人员入场。17 时 30 分，在军乐队的欢迎曲中，阅兵首长和陪阅首长入场。17 时 35 分，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在陪阅首长陪同下，依次检阅了受阅部队。

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中革军委通令，授予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稼祥、刘伯承、陈毅、张云逸、罗炳辉、罗瑞卿、彭雪枫等二等“八一”红星奖章；授予王震、杨得志、苏振华、钟赤兵等三等“八一”红星奖章。随后进行授旗仪式。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宣读了中革军委通令，决定授予每个团一面军旗。每团派代表 1 名、护旗 2 名，列队统一受旗。

19 时，举行分列式。军乐队奏乐，受阅的红第 2 团、红第 5 团、红第 37 团、红第 40 团以团为序，以连为方队，端枪行注目礼，高呼“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正步通过阅兵台。他们高举着军旗，带着从国民党军缴获的各种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总司令和总政委的检阅，给了苏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从 1933 年 8 月 1 日起，“八一”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在“八一”节期间开展纪念活动，也成了全体军民的光荣传统。

3. 人民军队建设的将帅

195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决定。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了将帅名单。

这次公布的共和国元帅共10名，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5名：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聂荣臻；起义军南下途中赶上并加入起义军的有1名：陈毅；与南昌起义关系密切的有1名：叶剑英。共和国大将10名，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2名：陈赓、粟裕；加入南下途中起义军的有1名：许光达；与南昌起义关系密切的有1名：张云逸。共和国上将55名，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4名：萧克、周士第、赵尔陆、杨至诚。共和国中将177名，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有6名：唐天际、谭家述、谭甫仁、彭明治、赵熔、聂鹤亭；加入南下途中起义军的有1名：郭化若。另外，在1955年公布的少将名单中，有5名参加过南昌起义，他们是：王云霖、周文在、袁也烈、李逸民、廖运周。

以上将帅，从南昌起义开始，逐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统帅和高级领导人，为人民军队的党的建设、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民军队的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海军等诸兵种的创立和建设工作，无不凝结着他们的鲜血和汗水。还有许多没有被封为将帅的起义军将士，也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那一大批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中牺牲的起义军将士，包括叶挺同志等，更不应为人们所忘记。可以说，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壮大，和南昌起义军将士所付出的血汗，是密不可分的。南昌起义对于人民军队的创建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人民军队创建的经验与价值

1927年8月1日，人民军队诞生于南昌。此后，从井冈山下的血火鏖战，到长征路上的斩关夺隘；从拯国救民的抗日烽火，到转天换地的解放战争；从保家卫国的异域战场，到东南海疆的利剑冲霄，这一支雄壮的军队已经走过了84年的光辉历程。

人民军队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将“人民”两个大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84年来，我军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指导，

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战争年代，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防御作战，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不断加强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出色地履行着保卫人民，维护和平，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的历史使命。

南昌起义的枪声虽已远去，但人民军队创建的经验、起义者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幸福安康甘愿流血牺牲的精神却代代相传。今天，从大江南北的演兵场，到风雪边关的连队哨卡；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工程工地，到老少边穷地区打响扶贫攻坚战的村镇；从抢险救灾斗争的一线，到双拥共建的现场，人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经验和精神的传承。

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南昌起义开始，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诞生，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1.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完成所肩负的政治使命的保证

在旧中国，一个铁的事实就是，“谁有军队谁就有权，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① 南昌起义前，我们党对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因而虽然民众运动做得非常出色，但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一叛变，反动军队一屠杀，我们党就受到重大损失，党员人数由 6 万多人剧降到 1 万多人。而党的许多重要分子，正是在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保护下，才得以幸存。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南昌起义时，我党正是靠着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才取得了胜利。虽然起义军后来南下受挫，但其保存下来的军队，却成了我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宝贵本钱。从南昌起义开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抗美援朝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争的胜利，

① 李德生：《军事思考录》，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6 页。

巩固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因为有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因此，无论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还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要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政治使命，都离不开人民军队，必须要有人民军队保驾护航才行。只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确保党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地位，才能实现党的政治目标。

2.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可靠保证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必然要求人民军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宗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旧中国，国民革命军建立以前的旧军队成为大小军阀欺压人民、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后，国民革命军开始有了一股与旧军阀军队不同的新气象。但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其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也沦落为蒋介石等新军阀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领导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发动南昌起义，公开打出了“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代表平民利益的主张”① 等旗号，要求起义的广大官兵“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②。从建军伊始，就要求人民军队按照党的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不要沦落为个人或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此后，正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形成了军民鱼水情，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

3.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军在 70 年的光辉历程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中，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发展壮大，最根本的是靠党的坚强领导。”[①] 南昌起义时，在起义部队中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并建立了军、师、团等各级党组织，开创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先河，为确保起义胜利，为起义火种的保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因为在军队中建立了各级党组织，人民军队有了党的领导这个政治核心，才有了比单纯的军事编制要牢固得多的组织架构，才能始终保持统一的意志、坚强的团结和钢铁的纪律，才会在各种艰难险阻面前，拖不垮，打不烂，才会一遇到合适的时机，又如星火燎原一般，迅速发展壮大。也正是因为有了党的绝对领导，在生死抉择面前领导带头往前闯，在困难面前共产党员带头向前冲，人民军队才会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从而渡过种种难关，不断发展壮大。

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裂？如果仅仅从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周恩来等个人身上去寻找原因，那是很难揭示历史的真正面貌的，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原理的。历史不是由几个英雄人物决定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共两党破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二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就是二者的信仰不同。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虽然他们声称信仰三民主义，骨子里信仰的却是法西斯主义；周恩来等坚定的共产党人代表的是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年代，对蒋介石等法西斯主义信徒来说，信仰不同，所要走的道路和所追求的奋斗目标不同，就不仅仅是不相为谋了，而是要大开杀戒了。因此，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可不是什么提拔、升官、发财之类的好事，而是时刻都有可能献出生命的危险。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是真信仰还是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见分晓。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者，或投入了敌人的怀抱，或虽然没有投入敌人的怀抱，却也脱离了党组织；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者们，一部分英勇地牺牲了，还有一部分则开始拿起枪支，武装反抗残暴的敌人。南昌起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者武装反抗的开始，八一枪声就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随着这第一枪的响起，许多人的命运起了重大变化。对他们来说，要是不参加南昌起义，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立马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而参加南昌起义，则个人前途未卜，生死未可预料。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共产党人如此，非共产党员的贺龙就更不用说了。当时贺龙是敌人重点拉拢的对象，从个人来考虑，只要他不跟共产党走，升官、金钱是少不了的，自己的队伍也可以扩充；而跟着共产党走，则不但已有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极可能失去，性命也极可能失去，甚至还要面对敌人对其名誉的诋毁，一些共产党人和部下对其的误解。但他在许多人谈共色变，唯恐避之不及时，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走，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起义军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原因促使贺龙及坚定的共产党人做出了人生中这一重大抉择呢？从思想上说，最主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和信仰，为工农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理想。革命先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这种坚定性，在世界风云变幻、中国社会转型的今天，具有特殊的学习意义。

有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容易形成相应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从而凝聚人心，将人团结起来。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① 坚定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执著，自然也会对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产生感染作用，成为人民军队形成共同理想、坚定信念和奋斗目标的核心因素，而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奋斗目标是凝聚人民军队军心的基础。正因为这样，即使在南下受挫后，起义军余部仍能在朱德等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率领下，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存下宝贵的火种，为以后形成星火燎原的革命形势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坚定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奋斗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目标，后来一直为人民军队所继承和保持，成为凝聚军心的基础，成为广大指战员的精神支柱，也是人民军队不管怎样也拖不垮、打不烂，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主要秘诀所在。从老红军战士李德生同志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对此可窥见一斑："联系我的经历，我体会在两种情况下，坚持理想和信念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是在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极艰苦、作战环境很险恶时，理想和信念能支持你去克服各种困难，坚定胜利信心。例如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生活条件困难到了人的生理难以忍受的极限，又有敌人的围追堵截，那时，部队仍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没有悲观，没有失去信心，相信困难能够克服，能有胜利的一天……二是在个人受到打击或受到委屈时，理想和信念会使你经受住打击和挫折，经受住考验，继续革命。也是在长征时期……虽然我受了很大的冤枉，但理想和信念使我没有动摇革命的决心，我相信党，相信错误会得到纠正，我继续跟着党进行长征。"①

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有着坚定信仰、共同理想、坚定信念和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打败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尤其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服务祖国和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党员干部，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在各方面起表率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为军心的凝聚提供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保证，使人民军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中不腐化变质，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旺盛的战斗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驾护航。

三、继承和发扬"八一精神"

南昌起义以及伴随其产生的"追求真理、坚定信念，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八一精神，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精神财富。

---

① 李德生：《军事思考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1. “八一精神” 包含一种追求真理、坚定信念的精神

南昌起义的将士，都有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有的为此远渡重洋，不远万里，上下求索，如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有的为此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如贺龙等人。尽管他们各自找到真理的时间有先后，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找到真理以后，便不顾高官厚禄的吸引、金钱美女的诱惑、前途未卜的恐吓、刀光剑影的威胁，毫不犹豫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并将它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将它转化为自己救国救民的奋斗目标，转化为自己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转化为自己行动的依据。理想和信念是行动的先导和内在动力，人们为此可以牺牲生命而在所不惜，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以周恩来、贺龙为代表的南昌起义将士，敢于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作斗争、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基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基于他们在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这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为指导，怀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使本次起义有了正确的思想和信念指导。起义的军事将领叶挺、朱德、刘伯承，尤其是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忠诚地听从前敌委员会的指挥，最终保障了起义的胜利。南昌起义的计划确定前，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军长贺龙 6 月间在武昌就对周恩来表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①] 这充分体现了起义将士追求真理、坚定信念、捍卫真理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依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八一精神” 包含一种勇于拼搏、不怕牺牲的精神

当时，从全国的形势看，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事力量非常弱小，敌人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以如此弱小的力量和强大的敌人相对抗，要想取胜，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没有过人的胆量，没有勇于拼搏的精神，对于举行南昌起义，是不敢想象的。同强大的敌人对抗，发动南昌起义的结

① 余伯流：《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铸造——纪念南昌起义 80 周年》，《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8 期。

果，很可能是失败。这样，起义者即使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也会面临敌人的搜捕，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脑袋；当然，也可能起义胜利，但起义胜利不等于中国革命就胜利了。由于敌人极其强大和我方力量极为弱小，革命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算起义胜利了，起义者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也定要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甚至革命尚未成功，便已牺牲了。因此，没有不怕牺牲、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也是不敢毅然发动和参加南昌起义的。事实上，起义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起义战斗和以后的南下战斗中牺牲了，在以后的残酷革命斗争中，又牺牲了一批人，他们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坚持革命到底并看到了新中国成立的起义者，所剩不多，但都是革命的精华；我军大部分元帅和相当部分大将，都是南昌起义的幸存者。我们今天在缅怀幸存革命先辈们的功绩时，更要看到参加了起义的革命烈士们所作出的贡献，没有他们的生命付出，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今天，在我国面临复杂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既可以用来熔铸人民军队的军魂，也可以用来充实中华民族顽强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其价值不言而喻。

3. “八一精神”包含一种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

南昌起义的成功是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党内主张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斗争的结果，体现了一种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当时党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周恩来等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起义成功了当然好；若是没成功，大革命失败后幸存的党员以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损失了，后果是很难预料的，主张进行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难辞其咎的。但周恩来等人在权衡利弊后，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将革命进行下去，不进行武装反抗，别无出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党的力量很可能会逐渐损失殆尽，到时想武装反抗也无能为力了。为了革命的大计，他们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丢在一边，毅然决然地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这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个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虽然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周恩来、叶挺等人受到过责难，但起义的革命火种保存了下来，而如果没有这个火种的话，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否坚持下来，就很难说了。尤为可贵的是，在南昌起义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反抗此起彼伏，由此开始了我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程。正因为如此，人们终于认识到周恩来等人所开拓的武装反抗道

路是对的，并最终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南昌起义所体现的这种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意义更非比寻常。我们今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继承这种精神的写照，我们今后还要不断发扬这种精神，不怕各种艰难险阻，不怕失败挫折，永远保持自强不息、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大力发扬不辱使命、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四、南昌起义红色资源的价值

南昌城头升起了第一面军旗，人民军队在这里诞生，从此南昌被誉为英雄城。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起义纪念塔、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等成了人们缅怀先烈、开展继承和发扬他们革命精神活动的好去处，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昌还有八一广场、八一公园、八一大道、八一礼堂等以“八一”命名的建筑，以及众多用“八一”命名的企业。英雄城的人们以此铭记那段光辉的历史，用革命先辈创造的精神财富建设幸福家园。

一支“汉阳造”步枪做旗杆，撑起的是一面不朽的旗帜。火红的八一军旗，在英雄城的上空高高飘扬。近几年，南昌在下大力气建设现代花园城市的同时，注重以“八一”为标志的城市文化内涵的发掘和保护，使八一起义纪念馆、贺龙指挥部旧址（起义军总指挥部）、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旧居、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旧址等一大批相关历史建筑保存和恢复完好，为开发南昌起义红色资源价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昌起义红色资源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精神教育价值。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也有必要相应得到提高。南昌起义红色资源是对人们进行精神教育的有效载体，通过对南昌起义革命前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革命精神的反思性理解，有助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并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创造和实现人生价值。它所具有的人格教育、美感教育功能等，是其他的德育资源所不具有的。它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是无价的，是军队开展军史教育、军魂教育的绝佳基地。二是历史见证价值。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见证了南昌起义为人民军队创建所做的巨大贡献，有力地印证了江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南昌乃至江西社会重要的软实力，影响着南昌乃至江西人民的心态，激发了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经济发展价值。南昌起义红色资源是发展南昌乃至江西红色文化产业的优质资源，既可以提高南昌和

江西的知名度，也可以形成相应的品牌效应。它不仅可以用来发展旅游业，还可以融入到文学艺术、广播影视、音像制品、网络服务、教育信息、体育竞技、企业商标等行业之中，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文化产业链，经济价值十分巨大。

八一起义是南昌的独有资源，英雄城是南昌的旷世美誉，“八一”这张品牌是历史赋予南昌最丰厚的馈赠。八一起义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它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和世界人民正是通过八一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来了解南昌这个内陆城市的。

五、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

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对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做了深刻阐述，并将其高度凝练地概括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①]。胡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对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迫切需要

当前，摆在我军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挑战主要有：一是西方敌对势力搞垮我们党、搞垮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是一贯的，他们利用各种时机和手段对我军进行政治和思想文化渗透，竭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妄图搞乱官兵的思想。近年来，随着我军与外军交往的不断增多，官兵目睹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很容易被其表面现象迷惑。二是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使官兵的理想信念、奉献精神和价值追求受到冲击，有些官兵出现弱化党的传统、淡化党的意识等倾向。特别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另类文化”，如“戏说经典”、“新解名著”等，容易使人们的价值观产生混乱和动摇，对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消极影响。三是网络不良信息对官兵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目前全球约有70万个色情网站、数万个赌博类网站、近两千家“法轮功”或“民运”反动网站。形形色色的网络信息，对官兵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网络的虚拟性、隐匿性和不可控性，增大了对官兵思想行为的管理难度。

---

① 贾永等：《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战略举措——党中央、中央军委倡导和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纪实》，《人民日报》2009-04-07（01）。

面对这些新挑战，追切需要培育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把官兵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党的旗帜下，引导到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追求上。因此，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是我军当代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培育工程。南昌起义中所蕴涵的优质红色资源和人民军队创建的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为我军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发挥独特的政治文化优势，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军事文化资源。

2.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有效举措

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很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美军历来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和灌输，各军兵种和院校都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如，美国陆军把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忠诚、职责、尊敬、奉献、荣誉、正直、勇敢”七个方面；俄军强调“认真履行军人的天职，勇敢地捍卫俄罗斯的自由、独立和宪法制度、保卫人民和祖国”；法军强调“纪律、忠诚、献身”；印军倡导“克制、自尊、守纪、集体精神”；英军为培养官兵“效忠国家”的价值观念，在新兵训练中就反复灌输“殉身报国”的思想。我们应当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外军的有益做法，加紧培育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以促进官兵战斗精神和良好品格的形成。南昌起义中革命先辈们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立场、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不怕牺牲的精神等，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和革命军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从南昌起义胜利、起义军南下受挫、起义军余部坚持革命斗争、起义军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终于星火燎原、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看，南昌起义的革命军人价值观具有本源性价值。这为培育当代军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源头活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发源于南昌起义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才有了人民军队今天的辉煌。通过追本溯源，我们可以更加明了地在人民军队和军校学员中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意义。

3. 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可以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资源

价值观与利益观有着天然的联系，价值观中就包含有人们如何来处理利益关系的内容，一个人价值观是怎样的，会在利益观中表现出来；同样，一个人的利益观是怎样的，也会在价值观中展现。当今社会，利益多

元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每个人的利益都生动而又具体，这种具体化了的利益必然地与国家、社会、他人发生关系。此时，军队和军人与人民的利益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同向、同步，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存在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看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会一目了然。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必然要求人们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导向，将广大人民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为它让路。这一点，在灾害发生、人民群众遇到危难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每当灾难来临，军人都要奔赴灾区，其中有的官兵自己的家人就在灾区，这种情况下是首先考虑自身利益，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出自我牺牲，反映着军队和军人恪守的价值观。汶川特大地震“十万大军以命搏命”的壮烈情景，就是人民军队坚守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和信念的感人体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军只有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才拥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才配得上“人民军队”这个称呼。道理不难理解，一旦军队着力谋求集团利益，必与人民利益相冲突；一旦拥有强制能力的集团把谋求私利作为第一要务，社会动荡就成为必然，中国的发展就不复存在，中华民族的强盛更无从谈起。此时，这支军队就不是人民军队了，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没有力量之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运用包括红色资源在内的一切有用资源，来帮助革命军人树立正确利益观的主要原因。其中，红色资源开发又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因为在我军的创建和发展历程中，蕴涵了极为丰厚的红色资源，其中有许多资源是与正确的利益观密切相关的。拿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来说，她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它必定可以为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正确的利益观导向。

4.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激励官兵履行好使命的基础工程

军事上不过硬的军队一打就垮，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军队更是不打自垮。要保证高标准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人民军队必须在提高硬打击能力的同时，构建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精神在内的军人核心价值观，培养官兵与履行使命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目标追求，使他们不断强化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不断强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强化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只有这样，人民军队才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从南昌起义开始，人民军队的历次战斗经验表明，中外敌人在与我军作战时，最害怕的就是我军拥有当代革命军队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不怕牺牲的精神。与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可以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优秀军事文化根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必然要以先进的军事文化作支撑。南昌起义中所蕴涵的优秀军事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无往不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军人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军人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军人气节。这种优秀的红色军事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挖掘与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使之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本源达到了有机统一，客观上、本质上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优秀文化根基。

5.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围绕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引导官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始终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红色资源中包含人、物、事迹，包含文化和精神，结合红色资源开发，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宣传渗透，能保证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系统性和实效性，使广大官兵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建设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去。将与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开发成果运用到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增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红色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与南昌起义有关的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说，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都可以在与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与南昌起义有关的红色资源，利用其成果，开

展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人们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综观南昌起义，分析人民军队创建的经验与价值，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必须对人民军队加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塑造人民军队的精神灵魂，使人民军队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引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保持蓬勃的朝气，始终拥有取之不尽的精神动力，不腐化、不堕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始终紧密团结，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只有这样，人民军队才能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击败任何军队国家化的图谋，以汗水和热血践行忠诚于党的誓言，坚决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成为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有力臂膀。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世纪、新环境中，不断将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塑造成当代“最可爱的人”，使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军民鱼水情等优良传统，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永葆人民子弟兵的政治本色，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锻炼出过硬的思想、政治、军事及相关业务素质，不断为人民排忧解难，为人民谋取利益，为人民无私奉献，从而不断得到人民的支持，无愧人民军队的称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人民军队熔铸成社会主义祖国钢铁长城，使广大指战员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民军队坚决维护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外来侵略，反分裂，坚决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祖国的长治久安，反对各种破坏祖国安定团结局面的行为，坚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不断奋斗，从而永不变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支柱，不断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南昌起义的勇士们在四面白色恐怖包围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掌握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们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追求真理、坚定信念，勇于拼搏、不怕牺牲，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八一精神等，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南昌起义以及伴随其产生的理想信念、

宗旨使命、政治立场、精神品质和思想作风等，上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美德，下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它犹如一首史诗，中国人民谱写的革命乐章，就发自于它的主旋律里；它犹如一块基石，中国共产党构造的人民军队精神大厦，就建筑在它的基础上。

第三章

革命摇篮

井冈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它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这里雨量充沛，温和湿润，山高林密，地势险峻。井冈山地区包括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醴县（今炎陵县）、茶陵等县，方圆五百余里。

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造和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因而，朱德称井冈山为“天下第一山”，彭真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一、毛泽东领导起义部队引兵井冈

1. 秋收起义

1927年8月7日，面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最主要的任务。

会后，党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与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8月16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书记。8月18日，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举行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浏阳、湘潭、宁乡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二步攻占长沙。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

委员会，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

8 月 30 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肩负组织秋收起义的重任，他当晚从长沙出发，乘火车抵达株洲。在对株洲地区的工作作出指示后，随即前往江西安源。9 月 1 日，毛泽东到达安源张家湾，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等在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驻安源、修水、铜鼓三处的警卫团、安源警卫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辖 3 个团，兵力共 5000 人左右。另外，余洒度等在起义前还收编了驻防修水县城、被警卫团打败的邱国轩部为第 4 团。会议决定军队作战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先夺取平江、浏阳、醴陵和株洲，再兵分三路合攻长沙。

9 月 9 日，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县城向起义部队授旗，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首先破坏武（汉）长（沙）和株（洲）萍（乡）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当天，第 1 团从修水出发，向平江长寿街进军。11 日，队伍越过平修边界，占领龙门，当行至离长寿街 15 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即第 4 团投敌叛变，致使第 1 团损失惨重。团长钟文璋化装逃走，从此下落不明。

9 月 10 日中秋之夜，在安源的第 2 团按部署攻打萍乡。激战一天未克，改攻老关。12 日，第 2 团在占领老关之后乘胜攻占醴陵。后因遭敌重兵围攻，部队主动撤出醴陵，于 16 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陷入敌军重围之中，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二。当晚，团长王新亚等拖枪出走，下落不明。

9 月 11 日，第 3 团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向浏阳进发，当日占领白沙镇，次日占领东门市，9 月 13 日遭敌两个团的反扑，经 6 个小时激战，伤亡较大，为保存革命力量，部队被迫向上坪撤退。

至此，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均处于被动局面，第 1 团在金坪失利，第 2 团在浏阳溃散，第 3 团在东门受挫，到了“军威因是不振”、“竟然溃不成军”的局面。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

2. 文家市决策

在起义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率第 3 团于 9 月 14 日黄昏从东门撤至上坪，当晚，在上坪召开第 3 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会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放弃原定会攻长沙的军事计划，并写信报告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计划。随后，经过

艰苦的战斗，各路起义军保留下来的部队于9月19日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

文家市是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这一天，毛泽东召集起义军余部的师、团负责人召开了重要会议，主要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开往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这一意见，否定了余洒度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此次会议史称“文家市决策”。

按照文家市决策，起义部队开始退兵。9月23日拂晓，当起义军余部进入萍乡芦溪时，突然遭到敌人的伏击，年仅23岁的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部队伤亡惨重，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降至此时的不足1000人。由于战斗频繁且连遭失利，加之总指挥的牺牲，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悲观的情绪，许多人认为大势已去，纷纷不告而别，其中还有一些军官。毛泽东在摆脱了敌军之后，把部队带到了莲花陈家坊，此时队伍只剩下了800余人。

就在毛泽东处于极度劳累、困惑与迷茫之际，宋任穷带着江西省委的密信赶到陈家坊。毛泽东在信中得悉宁冈有我们自己的武装且有几十条枪，笼罩在心头的阴影一下子就消失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与毛泽东的“上山当革命的山大王”思想不谋而合。毛泽东旋即命令部队向宁冈方向开进，9月25日，部队冒雨攻打莲花县城，不到半小时，就攻取了莲花县城，取得了文家市退兵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进城后，部队解救了100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还打开粮仓分粮，救济当地贫困百姓，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奔走相告“莲花来了革命军”。

3. 三湾改编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来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这是一个有50多户人家的村庄，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龙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

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时，人员不足千人，部队官多兵少、枪多人少，很不利于作战。尽管部队指战员中多数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党团员和工农运动骨干，但也有少数未经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一些人经不起考验，认为败局已定，悲观动摇，有的不辞而别，有的背叛革命。军

官打骂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官兵关系紧张，军纪松弛；加上此时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没有确立，党组织不健全，一个团只有一个支部，无法开展有力的工作。很显然，如果不改变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鉴于部队的实际情况，部队到达三湾村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即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进行组织整顿。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资遣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改编后的部队计有700人左右；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将以前一个团一个支部，改成班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第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废除繁文缛节，规定长官不打士兵，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建立起新型的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支部建在连上”，使革命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① 改编后，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部队更精干了。毛泽东后来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

4. 古城决策与大仓会见

三湾改编后，为了早日进军宁冈，毛泽东分别给宁冈党组织和袁文才写信，说明“上山”的原委，托本地老表李德胜送往茅坪。

三湾村来了部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宁冈，惊动了盘踞此地的“山大王”袁文才。袁文才旋即做了应对的准备，将农民自卫军撤至茅坪。当他

①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的初创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当即召集在茅坪坚持斗争的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等人进行商议。当获悉毛泽东是党内同志，并且是秋收暴动失败领兵到此之后，袁文才当即派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三人前往三湾与毛泽东接头，探听情况。

10月3日，毛泽东下达了部队开往古城的命令。当晚，毛泽东在古城连奎书屋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和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及袁文才的代表，共计40余人，会期3天。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团结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并对他们进行帮助；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以宁冈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政权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古城决策”。这次会议是三湾前委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初步确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为我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在龙超清的穿针引线下，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进行了首次会见。毛泽东向袁文才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秋收起义的经过和古城会议的情况，并说明了工农革命军欲在宁冈落脚安家，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原因，消除了袁文才的顾虑。毛泽东得知袁文才急需枪支的情况，主动提出要赠送100条枪。袁文才深为感动，回赠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并热情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安家”。毛泽东感谢袁文才的鼎力相助，称赞袁文才寻求革命的精神。大仓会见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为毛泽东引兵井冈战略决策的实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奠基

1. 茅坪“安家”

大仓会见的第二天，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茅坪进发。当队伍开进茅坪时，戏班子敲锣打鼓，吹起唢呐，群众点燃鞭炮，并以杀猪迎客这一当地传统的最高礼节迎接工农革命军的到来。这一切，使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深为感动，切实体会到了回家的感觉。欢迎仪式后，毛泽东作了简短讲话，袁文才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龙超清代表宁冈县党组织也作了一个发言。

当天晚上，毛泽东参加了宁冈县党组织在攀龙书院召开的党员大会。会后，毛泽东在八角楼接见了永新、莲花在茅坪隐藏并坚持斗争的共产党

员贺敏学、王怀、刘作述、刘仁堪、贺子珍等。

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终于使这支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装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在袁文才和宁冈县党组织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先后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创办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一所医院——茅坪后方医院，并在象山庵建立了后方留守处，将伤病员、辎重队等包袱放下来了。从此以后，这支饱受磨难的部队终于得到了休整，在茅坪安下了家，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实践。

茅坪“安家”后，工农革命军开始了沿湘赣各县的游击活动。10月24日，毛泽东率部来到大井，受到王佐及山民的热烈欢迎。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为了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上山之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的“雷公石”处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随着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后来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并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形成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水口建党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联络边界各县农民军，同时解决部队给养，以创造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基础，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沿湘赣边界各县开展游击活动。

10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湖南酃县水口村。随后不久，在湖南酃县的十都，毛泽东派何长工前往长沙、衡阳，寻找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中共酃县党组织得知工农革命军到达水口的消息，立即派出代表与革命军接头。毛泽东在团部朱家祠堂会见了酃县党组织的代表，详细地了解酃县党组织的情况，并对酃县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指导。

部队到达水口前夕，有一部分投机分子背弃革命，走向叛变或消极的道路，到达水口后，仍然有人逃跑。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也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离开了部队，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也随他一同脱逃。

余、苏的脱逃，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他决计在水口建党，以巩固三湾改编的成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连队党代表挑选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发展入党。在部队到达水口的第二天下午，各连队党代表秘密通知入党对象到团部开会。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水口村叶家祠堂亲自主持了赖毅、陈士榘、李恒、欧阳健、鄢辉、刘炎6名连队优秀战士的入党仪式。阁楼中，摆放一张农家方桌，几条长板凳，桌上点着一盏马灯，桌子正前方横垂着两张长方形红纸，一张写着“CCP”三个字母，一张写着“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六句入党誓词。仪式开始后，先由各位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了新党员的简历和政治表现；接着毛泽东依次同6个新党员谈了话，询问了他们为什么要加入党组织，入党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随后，毛泽东又向他们解释了入党誓词和“CCP”三个字母的意思。最后，毛泽东庄严地握起右拳，带领6名新党员宣誓。

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建党活动，在我军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次建党的活动，使军队中党的建设由秘密转为公开。此后，各个连队都相继开展建党活动，人民军队中党的建设工作从此不断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3. 象山庵会议：湘赣边界党组织的恢复

1927年10月22日，工农革命军主力游击至遂川县大汾镇，遭遇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损失惨重。毛泽东将部队重新整理后，于10月下旬进驻王佐部控制的茨坪。11月初，毛泽东率部回到茅坪。工农革命军半个月来的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为了布置边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各县迅速行动起来，重建和恢复边界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打土豪筹款子。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永新的王怀、刘真、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莲花的朱亦岳、刘仁堪，宁冈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

毛泽东召开象山庵会议，是针对边界党组织的状况而决定的。10月间，工农革命军到达边界时，因为“马日事变”，边界各县剩下若干避难隐藏的党员，党组织差不多全被敌人破坏了。“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①] 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创造红色割据，党组织的重建乃是头等大事。为此，毛泽东到茨坪数天后，迅即回到茅坪，着手抓这件大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会上，毛泽东针对边界的状况，作了长篇发言。他引经据典，阐明了斗争的迫切性、重要性及艰巨性，号召各县党组织“打埋伏”的同志尽快出山，回原地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巩固和发展地方自卫军。

毛泽东总结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六项注意”。这“三大任务”就是：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六项注意”就是：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三大任务”和“六项注意”的提出，对人民军队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象山庵会议后，湘赣边界党的建设呈现出勃勃生机。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各县迅速掀起了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性游击暴动，并在斗争中恢复、重建和发展地方自卫军。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立党的时期”。“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县委，酃县有了特区，莲花也开始了党的组织，与万安县委亦发生了关系。”可见，象山庵会议是毛泽东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4. 改造袁、王部队

袁文才、王佐是大革命前夕雄踞于井冈山的两支重要绿林武装首领，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政策和力量的感召下，袁文才、王佐两人相继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成为湘赣边界农民武装力量的首领、井冈山上的“双雄”。

在宁冈古城会议上，工农革命军确定对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大仓会见后，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毛泽东折服，两人都给予工农革命军经济援助，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样，为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也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重要条件。

袁、王部队的成员，大多是受苦受欺的农民群众，有着强烈的反对地主豪绅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他们成为井冈山地区很有号召力的农民武装。但是，由于长期的绿林生活，加上农民出身的局限性，因此还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弱点。如政治目标不明确，缺乏长期的斗争目标；阶

级路线不清，只讲义气与交情，有时不分敌我；组织纪律不严，时常侵犯群众利益；官兵关系存在上下不一致、官兵不平等的不良风气。

袁、王部队存在的这种不容忽视的弱点，极大地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壮大，制约了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去迎接更加严峻的战斗。因而，加强对他们的改造，肃清他们的不良风气，使他们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主要工作。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高瞻远瞩，周密安排，先后派出有相当水平的军队负责干部徐彦刚、何长工等人，到袁、王部队开展工作，帮助他们进行整顿、改造。

在袁、王部队，徐彦刚、何长工等人从实际出发，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广大官兵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靠谁革命的道理。与此同时，积极培养基层干部及士兵群众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以及党代表制度。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确立的工农革命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实行民主主义的各项制度，逐步运用到袁、王部队。

何长工、徐彦刚等人在组织上对袁、王部队进行了整顿。一方面把思想纯正、革命坚决的青年农民吸收进来，一方面把作风恶劣、品行不端的坏分子清洗出去。经过组织的整顿，袁、王部队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

在整治改造、组织整顿的同时，工农革命军的干部积极帮助袁、王部队开展军事训练，着力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及杀敌本领。此外，还帮助他们学习、运用正确的游击战术，学习、掌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能力。1928 年年初，何长工运用工农革命军的作战原则，帮助王佐消灭了夙敌尹道一部，增添了王佐对工农革命军的信任与崇敬，从而加快了接受改造的步伐。

前委非常关心袁、王部队的改造工作。毛泽东不时向徐彦刚、何长工等人传授开展工作的方法，还经常直接做袁、王本人的工作。当地党组织也为袁、王部队的改造做了不少配合工作。在前委及地方党组织的关心、帮助下，袁、王部队进步很快，1928 年 2 月中旬，在宁冈大拢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第 2 团，这标志着袁文才、王佐部队改造工作获得了成功。第 2 团辖两个营共 200 多人，袁文才任团长兼第 1 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 2 营营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

大拢改编，使袁、王部队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成功，为改造

地方武装、扩大人民军队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同时，也使工农革命军如虎添翼，为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三、边界三县红色政权的建立

1.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

毛泽东在茅坪安家之后，便开始对边界各县的情况进行考察并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派何长工寻找南昌起义队伍。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部至酃县水口，在此得知茶陵空虚的消息。为了扩大影响，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第3营、特务连和第1营第1连去遂川等地，另一路由前委委员、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1营第2连、第3连经安仁攻打茶陵。

10月21日，宛希先率部攻城。到达城的外围时，宛希先派谭震林带一个班到攸县和酃县的交叉路口警戒，以防意外，自己带领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的部队大摇大摆走进城的西门。茶陵县政府的警察以为是国民党军，还向他们敬礼。他们趁其不备，立即下了警察的枪械，张贴革命标语，直捣县署衙门。县署官吏及城内豪绅惊慌失措，望风而逃，县长钻到茅房里躲起来才侥幸保住性命。工农革命军砸开监狱，救出80余名在押待毙的工农革命骨干。为了防止敌人的反扑，两天后，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茶陵，回师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合，随后一同回到茅坪。这次军事活动，史称"一打茶陵城"。

11月初，毛泽东经过调查了解到宁冈是个小县，其周围有茶陵、永新、遂川、酃县、莲花五县。宁冈是中心，易守难攻。各县经过农民运动洗礼，革命都有了基础。茶陵、永新是六县中的大县，人口多，地域宽，经济强。茶陵是井冈山割据地区通往湖南的门户和屏障。"同时向茶陵、永新发展，可以影响两省，并两省上游。以此为大本营的意见，毛泽东早已有了，便有边界特委组织的建议"；"宁冈因为完全在赤色政权的保障之下，自然也有好的发展。"①

在确定了以宁冈为落脚点的同时，毛泽东加紧了对茶陵的经营，并很快做出了工农革命军"二打茶陵城"的决定。11月15日，部队奉命在大垅集中，毛泽东向干部、战士作战前动员。11月16日，团长陈皓、第1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团部和一营及特务连离开大拢，向茶陵进发，部队经宁冈睦村、酃县瑞口，于17日击溃敌军罗克绍团的骚扰，连夜潜入与茶陵一水之隔的中瑶。经对茶陵城里情况侦察，得知城里没有正规军，只有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部队。18日早上，工农革命军开始攻城。罗定的部队没怎么抵抗就闻风而逃，县长刘拔克逃回攸县。

茶陵县城是工农革命军占领的第一个县城，11月18日，"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成立。由于缺乏管理一个县的经验和充足的思想准备，上级派曾做过安徽旌德县长的谭梓生担任县长，但谭对于如何当红色政权县长，心中没数，"没有经验，开始时是按旧章办事"。[①] 一切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衙门还是原来的衙门。团长陈皓不带部队打土豪筹款子，部队的供给由商会派，对部队的管理"只停留在每天'三操两讲二点名'上，既不做群众工作，也不做御敌的准备。茶陵的群众大为失望，说是同旧军队、旧政府相比，'换汤不换药'"。[②]

宛希先将茶陵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毛泽东接信后，回信指示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的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按照毛泽东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重新讨论茶陵的问题。经过协商，鉴于来不及召开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各方推选自己的代表，组成县工农兵政府。其中，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会议一致推选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在县城洣江书院举行，成千上万的群众欢天喜地庆祝这一新政权的诞生。谭震林在会上讲了话，公布了由工农兵代表共同签署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布告》，号召全县群众行动起来，恢复工会、农会、建立基层政权，惩治土豪劣绅，茶陵各地扬起了红色狂飙。

2. 建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

为了解决部队冬衣和拓展红色割据区域，毛泽东和前委根据遂川守敌

---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087年版，第208页。

② 《谭震林传》编撰委员会：《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5页。

薄弱的情报，决定攻打遂川。1928年1月2日，毛泽东和团长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宁冈砻市；4日，进抵遂川重镇大坑。5日，工农革命军打垮了萧家璧的靖卫团和一个连后，兵临遂川城下。守城敌军弃城而逃，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遂川县城。

由于敌人战前造谣污蔑我军，不少市民受到蒙蔽，对革命军缺乏认识和了解。我军进城后，城内一片冷清，不少店铺关门。为此，毛泽东命令部队以班、排为单位进行分兵活动，深入群众，宣传党的主张。1月10日，遂川县城的工作局面基本打开，逃跑的市民陆续返回城中，工厂也恢复了生产，商业、船业、木业、作坊业等行业协会也恢复了运作，组建了遂川县工人赤卫队。于是，毛泽东将工农革命军团部和特务连留在城里继续做群众工作，部队其余人组成宣传队，兵分三路到于田、草林、大坑等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

1月16日，趁此日逢圩，毛泽东在万寿宫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保护中小工商业及其他各项政策，号召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夺取革命胜利。1月21日，毛泽东返回遂川县城，并嘱咐陈正人等人着手拟制一个《施政纲领》。陈正人很快就将《施政纲领》初稿写出来，毛泽东又亲自做了修改。这个纲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共30多条。为了方便群众容易理解，毛泽东用了许多通俗易懂的语言代替原有的一些语句，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子”，“废除聘金聘礼”改为“讨老婆不要钱”等。

1月24日，时值大年初二，万余人聚集在县城张家祠堂的大草坪前，集会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大会颁布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纲领》，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王次淳担任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下设土地、教育、裁判、劳动、财政等部。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工农革命军深入草林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揭露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鼓励中小工商业者开门做生意。对大土豪兼大奸商采取没收的办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狠狠打击。对中小工商业者则采取保护政策，不罚款、不抽税，不动他们一粒盐、一个红枣、一寸布，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合法经营，使之有利可图。工农革命军还分头深入草林圩镇各角落张贴“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保护中小工商人”、“取消苛捐杂税”、“工农革命军是贫穷工农的军队”等标语。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部队

存在的纪律问题，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使遂川人民对工农革命军和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刻，以往的误解很快被消除，那些离开县城的中小工商业者纷纷回来，重操旧业，草林地区迅速掀起了以废债毁约、打土豪分浮财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结果，草林圩得到了复活和繁荣，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圩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写道：“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①] 草林圩的复活，对于活跃和沟通根据地的商品交换，满足根据地军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建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

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点燃的革命之火，照亮了当时江西黑沉沉的夜空。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坐卧不安。1928 年 1 月下旬，他下令驻吉安的杨如轩第 27 师，以第 81 团和第 79 团的一个营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以第 79 团的另一个营进攻宁冈新城，向工农革命军发动了第一次“进剿”。

新城是宁冈的县城所在地，西连砻市，南通茅坪，北扼宁冈至永新的通道。敌人占此据点，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割据造成严重威胁。毛泽东一面写信给宁冈县党组织，命令发动群众袭扰敌军，一面又迅速把工农革命军从遂川撤回宁冈茅坪，做好歼敌准备。

2 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 1 团会合袁、王所部第 2 团。17 日，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方案。当天，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急行军到新城，拂晓前，各部队迅速进入指定位置。毛泽东、张子清等登上新城门外的旗山亭指挥战斗。清晨，城内驻军照常来到南门外操场出操。当架好枪支做徒手操时，毛泽东、张子清当即发出战斗信号。敌人仓皇弃枪逃入城内，紧闭城门。紧接着，东门、南门也打响了。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时至中午，城门仍未攻开。经过周密思考，毛泽东决定施用火攻。由南门、北门发起佯攻，第 1 营集中火力攻打东门。几十名战士两人一组，披着沾湿了的棉絮，夹着干草、煤油，冒着枪林弹雨，把东门烧穿。随即，第 1 营战士奋不顾身穿过浓烟，冲进城内。

东门一破，城内守敌无心再战。南门、北门相继告破，敌军纷纷逃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8 页。

窜。县长张开阳、营长王国政夹在敌军中企图从西门向外奔逃，遭到袁文才部的猛烈射击被迫退回城中，又被进逼的第1营、第3营封死退路，王国政被当场击毙。张开阳在一片混乱中夺路逃跑，躲入西门外的小沟里，被参战的古城区大江边暴动队队长文根宗生俘。是役，共歼灭赣敌一个正规营、宁冈靖卫团及县公署反动武装300余人，俘虏近100人，取得了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辉煌胜利。

新城大捷后，前委即紧张地筹备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2月21日清晨，宁冈及附近县的农民万余人开始聚集砻市沙洲广场。毛泽东、张子清、宛希先、袁文才、龙超清等军队和地方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上午10时许，大会司仪宣布大会开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宣布文根宗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大会还宣布成立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任县委书记；成立了县赤卫大队，石敬庭任大队长。大会最后一项是审判反动县长张开阳，结束了张开阳的反动一生。

会后，宁冈各区、乡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并在县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建立地方武装，创造了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的坚实基础。

4. 边界“三月失败”

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之时，正值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时期。“左”倾盲动错误路线领导人对毛泽东率部退往农村，依托农村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大加指责。在1927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撤销。次年3月上旬，受盲动错误影响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批评前委“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①。

周鲁传达湖南特委的决定：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何挺颖任书记。师委是军中党的领导机关，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负责。毛泽东改任师长。周鲁还传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即“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候补委员”，“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的处分。[①] 周鲁在传达时，误传为中央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还代表湖南特委指示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湘赣边界，前往湘南，策应湘南的“年关暴动”（即“湘南起义”）。尽管毛泽东、张子清、宛希先、何挺颖等与周鲁进行了强烈的抗争，但最后前委还是必须接受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的指示。

为了执行湘南特委的指令，1928 年 3 月中旬，毛泽东、何挺颖在砻市集中了工农革命军第 1 团、第 2 团，传达了前往湘南、策应湘南起义的命令。决定：部队分三路向湘南进发。毛泽东、何挺颖率第 1 团从砻市向酃县；袁文才、何长工率第 2 团第 1 营从大拢出发；王佐率第 2 团第 2 营从大井出发，一起开往湘南。

3 月 18 日，三路人马先后抵达湖南酃县的中村暂住下来休整。工农革命军在中村集结期间，毛泽东、何挺颖曾布置部队以连为单位，深入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时，传来了湘南起义部队处境危险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何挺颖等毅然决定，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湘南挺进。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领第 1 团为左翼，揳入汝城之间；何长工、袁文才率第 2 团为右翼，向资兴碰公庙方向前进，以策应、掩护湘南部队安全转移。

部队出征湘南，边界兵力空虚。国民党军乘虚而入，卷土重来。宁冈作为革命的大本营，在敌人反攻倒算时，宁冈人民承受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在敌人的疯狂烧杀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除茅坪、大拢、大小五井、九龙山等山区仍掌握在地方武装手中外，遂川、茶陵两县城丢失，其他平原地段红色区域被敌人占领一个多月。这就是惨重的边界“三月失败”。

边界“三月失败”的主因是中共中央的“左”的政策，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对这样的“左”的政策积极实施并加以发展，推向极端，直接导致边界的“三月失败”。

---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1 页。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

一、朱、毛会师井冈

1. 湘南暴动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一起义”。起义部队于 8 月 3 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期建立新的根据地，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起义军南征部队一路与敌激战，伤亡惨重。朱德、陈毅率领保留下来的部队，经过“赣南三整”后，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于是，朱德经起义军党组织的批准写信给他的同学、驻广东韶关和湖南汝城、资兴一带的国民党第 16 军军长范石生，表示愿意就合作事宜与他谈判。11 月中旬，范石生回信请朱德到汝城谈判。经过两天磋商，范石生暂时接纳了起义军。但不久，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转告范石生，“就地解决”朱德部队，范石生将消息透露给朱德，并送来万元银元和 10 箱子弹以示友好。1928 年 1 月 3 日夜晚，朱德部以“野外演习”为名，冒着大雨，切断了敌人的电线，从仁化改道西进，直奔湘南。

朱德部进入湘南后，在宜章县境的莽山洞作短期休整。获悉朱德、陈毅部队进入莽山后，中共宜章县委书记、湘南特委委员胡世俭和县委委员高静山、毛科文等即前来联系，并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智取宜章，即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 16 军第 140 团副团长名义写信给宜章县长，说是奉范军长命令由家乡抵抗从广东北上的共军，借以麻痹敌人，尔后率两个加强连，进城控制局面，并邀请以县长为首的反动头目赴宴，来个“一锅端”，最后由朱德率主力进城，解决县团防武装。

1928 年 1 月 11 日，胡少海率先遣部队进入宜章县城。在当晚宴席上一举擒获敌县长等反动官绅，解决了警察局、团防局的武装，缴获枪支 400 挺，俘虏警察、团丁 400 余人。智取宜章的胜利，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智取宜章是在旧历年前 10 天，故又称“年关暴动”。

宜章暴动的胜利惊动了蒋介石，他立即命许克祥率 6 个团的兵力向宜章扑来。为保存实力，朱德、陈毅指挥这支 1200 人的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和运动战。从 1 月 31 日起，

先后取得岩永、粟源堡、坪石战斗的胜利，共俘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挺，迫击炮、山炮30余门，子弹无数。尤其是坪石大捷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是起义军进入湘南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对推动湘南暴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朱德说："我们军队起来就靠那一仗。"坪石大捷后，部队立即挥师北上郴州、耒阳，发动湘南总暴动。

2月4日至16日，在湘南各县党组织和起义军的配合下，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相继攻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3师、第4师、第7师、永兴赤卫警卫团、资兴独立团，起义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在起义中，还先后建立了中共祁阳、资兴、安仁县委，成立了郴县、永兴、耒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湘南各县的工会、农会、妇运会、青运会、商运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恢复、重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暴动，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湘南苏维埃运动的兴起，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组织基础，威胁了湘赣两省敌人的安全。为了扑灭这团革命火焰，敌人组织了9个师的兵力，对湘南革命力量进行南北夹击。由于湘南特委滋长的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极力推行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思想，实行所谓的"焦土战略"，结果失去了民心和社会的同情，损害了党的威信，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了不少地方中间分子的反水；加上豪绅阶级的利用，一时间，挂起白带子，反对工农革命军，极大地削弱了湘南革命势力，动摇了湘南武装力量的基础。① 在敌人过于强大兵力的攻击下，在湘南特委"左"倾政策的影响下，轰轰烈烈的湘南总暴动归于失败。

2. 朱德率部上井冈

在大敌压境、敌众我寡的关键时刻，朱德、陈毅等一方面抵制湘南特委的"左"倾错误，尽量减少损失，挽回群众影响；另一方面为保存南昌起义的有生力量，率部主动转移，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

朱德在做出主动撤离湘南的决策后，为使部队安全转移，一方面指示安仁的唐天际迅速发动安仁暴动，并派出部队给予支援，同时将工农革命军第1师主力及司令部由耒阳迁移至靠近安仁边界的鹜山庙；另一方面调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集耒阳数万农军，做好防止敌军南犯的准备。

3月下旬，毛泽覃率特务连到达耒阳，向朱德汇报了毛泽东部已进入湖南，准备策应湘南暴动部队的行动。于是，朱德于3月29日正式下达撤离命令，一场奔上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转移开始了。

朱德、陈毅兵分两路，互为掎角。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及耒阳第4师经安仁、茶陵方向向江西宁冈进发；陈毅率宜章第3师、郴县第7师向资兴、桂东移动，逐渐向江西宁冈靠拢。

朱德一路离开耒阳县城后，由观音阁直入安仁。沿路敌军慑于朱德威名，不战自溃，安仁县长周一峰弃城而逃。4月1日，朱德部占领安仁城。部队稍事休整后，绕道茶陵，于4月20日退至酃县沔渡。安仁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唐天际，按照朱德指示，完成警戒尾追之敌的任务后，率领安仁县党政干部和农军撤出县城，一路边打边赶，在酃县沔渡追上了朱德部队。

由陈毅率领的宜章农3师和郴县农第7师东撤后，在折岭重创了前来尾追的范石生部一个团和宜章县邝镜明保安队，于4月8日到达资兴。同日，黄克诚带领永兴县农军千余人，刘泰、邝鄘带领耒阳县农军700余人，黄义藻、李奇中率资兴农军1600余人也赶到资兴集结。当集结部队尚未撤出资兴县城时，敌军第13军第2师一个团即尾追而来。郴县农7师第3团在团长蒙九龄的指挥下，与敌展开巷战。战斗中，双方伤亡较大，蒙九龄牺牲。正在这时，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2团赶来支援，敌人才不敢追击。

向井冈山进发的这支农军，人员庞杂，加上沿途群众，队伍越走越多，行军速度越来越缓慢。为保障部队和群众安全，陈毅精心组织、疏导，鼓励移师的信心与斗志，引导部队和群众向井冈山方向前进。当部队到达资兴彭公庙时，会合了从井冈山下来的何长工、袁文才部队，于是，一路往桂东插入酃县中村、水口，于4月21日到达酃县沔渡，一同与朱德部队主力会合。

在沔渡小街上的一间民房内，陈毅、何长工、袁文才和湘南几个县委负责同志会见了朱德。朱德十分高兴，他所期望的胜利撤离湘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为了进行两军会师的准备工作，4月22日，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先行离开沔渡，回师宁冈。

3. 朱毛会师与红四军的成立

1928 年 3 月下旬，毛泽东得知朱德部队在起义中失败且正向井冈山方向转移的消息后，立即兵分两路前往接应。当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已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退至酃县一带时，急忙率部向宁冈进发。途中，毛泽东率部在酃县县城附近进行了阻击战，为朱德、陈毅部从酃县沔渡一带安全退往宁冈赢得了时间，为朱毛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在毛泽东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所部万余人先后退入宁冈，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为欢迎朱、陈部队的到来，先行回到宁冈的何长工、袁文才的第 2 团，在宁冈县委的紧密配合下，在砻市、古城一带广泛发动群众，筹集了两万余人半个月的粮食。砻市附近家家腾出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欢迎南昌起义部队的胜利到来。

随后，毛泽东率部回到了宁冈。毛泽东听说朱德等住在龙江书院，在何长工的迎接下，带领何挺颖、宛希先等赶往龙江书院。朱德、陈毅闻知，立即和王尔琢等军队领导，走出下榻的龙江书院，来到门外等候。

何长工远远地看见朱德，便对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示意。当走到龙江书院门口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早早地把手伸出来。很快，两位巨人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了。①

历史记载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见，时间是 1928 年 4 月 24 日。

在龙江书院，参加会见的有张子清、蔡协民、何长工、王尔琢、伍中豪等。会见时，双方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毛泽东介绍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方面的情况，朱德介绍了湘南暴动及其后转移上山等方面的情况，这就是著名的"朱毛会师"。从此，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两军会师的第二天，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红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为：其一是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红四军（6 月，根据中央指令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其二是决定红四军编为 3 师 9 团的序列及军、师、团的主要领导人；其三是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9 页。

成立军委，并选举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

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5 月 4 日，在宁冈砻市举行了两军胜利会师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大会从上午 10 时许一直开到下午 1 时许。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根据地的新局面，迅速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①，使根据地进入到全盛时期。

二、连破敌军“进剿”与红色区域的拓展

1. 三占永新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实力，也震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江西军阀朱培德。4 月中旬，湘赣两省敌人调集了一个师的兵力，开始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5 月 2 日，赣敌 27 师杨如轩以永新为大本营，兵分两路向井冈山进发。

毛泽东、朱德等分析了敌情，决定对江西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南敌人采取守势，并总结历次战斗经验，首次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产生了我军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此时的红军，刚刚会师不久，锐气正旺。根据毛泽东、朱德的部署，由参谋长王尔琢率第 18 团在五斗江首战告捷，击溃杨如轩第 81 团，首占永新城。

朱、毛占领永新城的消息很快由南昌传到南京。蒋介石大为恼火，急令湘赣两省“加紧剿匪，不得有误”。5 月 13 日，朱培德命令杨如轩、杨池生由吉安、樟树反攻永新。得知敌人开始向永新进攻，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动撤离永新，退回宁冈。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毛泽东、朱德成功地采取了“声东击西，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了高拢、七溪岭、草市坳战斗的胜利，又一次打败了敌人的进攻，二占永新城。

湘赣边界的红色风暴越刮越猛。蒋介石、朱培德急红了眼。于 6 月下旬，以第 9 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第 9 师的 3 个团，加上惨败的杨如轩部 2 个团共 5 个团的兵力由永新向井冈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面对强敌压境，毛泽东果断下令：分兵在永新、莲花的红四军主力立即撤出根据地中心宁冈，集结待命。其后研究部署战术，仍然是声东击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由朱、毛亲率红军主力先佯攻酃县，迷惑杨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60 页。

生，然后迅速秘密回师宁冈。杨池生果然上当，分兵向宁冈进犯。23日，战斗在宁冈、永新交界的新老七溪岭展开。红四军歼敌2个团，击溃敌5个团，缴枪七八百支，史称“龙源口大捷”。随后，红军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根据地一片欢呼。群众编了一首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畅快，畅快！”

2. 永新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1928年5月9日，红四军第一次攻打永新并占领永新县城以后，永新四乡群众在永新县委的组织下进城慰劳部队，红四军在县城休整了两天。随后，由永新县委主持，在县城校场坪召开了欢迎红四军、庆祝永新胜利解放的军民大会。

是日，到会群众上万人，毛泽东在会上以深入浅出的话语，指出了劳苦大众终年劳动而不得温暖的根源，肯定了永新党组织和永新人民为反抗统治阶级而斗争的贡献，号召永新人民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同时，毛泽东还交代了政策，如农民自由往来，商人自由买卖以及公买公卖。会上，毛泽东宣布成立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会后，选举彭文祥担任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永新县工农兵政府下设军事部、财政部、裁判部、土地部、妇女部等，县机关设在县城左家祠。

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全县普遍建立了区、乡工农兵政府。县、区、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产生，起初是采取简单的民主形式，先经党内研究，确定人选名单，然后向群众宣布，将一批在斗争中表现坚决的积极分子提拔到政权组织中来，为工农掌权。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是继茶陵、遂川、宁冈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成立的湘赣边界第四个工农兵红色政权。

永新县工农兵政成立后，在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永新比一国还重要”的思想指导下，配合红四军在永新境内的近距离分兵，积极开展“创造群众割据，布置长期战争”的工作，以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坚实基础。

永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人刘真、贺敏学、贺子珍、彭文祥等积极引导、配合红四军第28团、第29团、第31团广大指战员，深入到东乡东里、石桥、高桥，南乡洲湖、龙安、烟阁，西乡芰田、塘边、夏幽、南城；沙市，北乡花溪、象形等乡村集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永新县境内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暴动，群众发动起来了，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了，例如，以九陇山为中心，成立了东南特区工农兵政府；以天子山为中心，成立了西北特区工农兵政府等。

为了加强永新的工作，大力经营永新，“造成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还派出得力干部谭震林、蔡会文、宛希先、陈士榘等人，分别到小江区、东南特区、西北特区指导工作。谭震林回忆说：“所谓大力经营永新，就是要在全县深入土地革命，层层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把田分下去，各项政策贯彻下去。在永新，我们半个月内分兵发动群众，建党，扩军，成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①

三、边界全盛时期红色政权的建设

1. 边界党“一大”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成立

朱、毛红军会师后，边界的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红四军先后取得五斗江、草市坳等战斗的胜利，两次占领永新县城，鼓舞了边界军民的革命热情。但此时，边界党内却有些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②

当时，边界党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早在 1927 年 12 月，毛泽东就以前委的名义，通过湘南特委和吉安县委分别向湖南、江西省委及中央写报告，建议组织边界特委。1928 年 1 月、3 月，又先后几次向湘、赣两省省委和中央报告，陈述成立边界特委的理由。但湖南和江西两省省委都没有明文批准。在 1928 年 3 月以前，边界的工作还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3 月上旬，前委被取消后，边界“顿失中心”，形势要求必须建立边界党的统一领导机关。4 月底，赣西特委转来了江西省委的一封信，同意边界组织特委，湖南省委也有这样的意见。此外，边界斗争开展了半年多，边界党组织还未产生具体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8 页。

由于以上原因，根据湘赣两省成立特委的批示，1928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谢氏公祠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党组织和永新、宁冈、遂川、莲花、酃县、茶陵等县的代表，共 60 余人。

会上，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总结了边界斗争的经验教训，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同时，会议还研究和制定了边界党的政策，即“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根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①。会议着重讨论了在边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各级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会议还通过了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别委员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宛希先、谭震林、龙高桂、王佐、陈正人、刘真、谢桂标等 23 人为委员，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 5 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宛希先负责组织，刘真负责宣传。

湘赣边界特委为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设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下辖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 5 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

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边界党、政、群、团组织建设和干部的思想建设，以及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根据地的巩固扩大，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会议统一了边界党内的思想，坚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决心和信心，为边界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边界特委成立以后，为了统一边界各县政府的领导，5 月底，毛泽东又在宁冈茅坪召开了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由袁文才任主席。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财政、土地、司法等部以及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 页。

农、青年、妇女等委员会。军事部由张子清负责，财政部由余贲民负责，土地部由谭震林负责，司法部由邓允庭负责，青年委员会由萧子南等负责，妇女委员会由吴仲莲等负责，工农委员会由宋乔生、毛科文负责。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在茅坪仓边村的袁家大屋，为边界最高机关。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辖茶陵、宁冈、莲花、遂川、酃县等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和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

2. 酃县、莲花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28 年 6 月 23 日的龙源口一仗，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四次“进剿”，红四军迅即占领永新、莲花，红色区域得到广泛推广。在红色区域推广的高潮中，酃县、莲花工农兵政府宣告诞生。

酃县，是红军经常活动的地方，也是红色政权建立较早的地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8 年 3 月，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创建了酃县第一个工农政权——中村区工农兵政府，并在区内普遍开展插牌分田斗争。3 月底，因工农革命军撤离中村，地主武装乘虚而入对区工农兵政府进行破坏。5 月中旬，由于叛徒出卖，酃县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刘寅生不幸牺牲。为重新开辟酃县工作，湘赣边界党“一大”后，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帮助重新组建了酃县县委，指派李却非为县委书记。酃县新县委成立后，立即回到酃县，分赴各地重新开展工作，恢复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在新县委的积极努力下，酃县工作大有起色，相继建立了东南部的青石冈、大院等乡政权，县赤卫队也四出游击，拔掉了敌人的几个据点。

6 月上旬，酃县县委在大院西坑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20 余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中心区域、然后波浪式地扩大根据地的指示；确定了建立以大院、青石冈为中心，然后向四周发展，与井冈山连成一片的工作方针。讨论通过了三项决定，即《关于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决定》、《关于根据地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定》、《关于发展地方武装的决定》；选举产生了 9 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共酃县委员会，李却非任书记。按照大会部署，县委很快开展了工作。不久，青石冈区委、区工农兵政府成立，姚晓圆任区委书记，张明光任政府主席。区委下辖青石冈、姚源洞、泮垅 3 个支部。青石冈区委决定工作重心以青石冈为中心，向十都发展。

6 月上旬，召开了酃县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30 余人，会议主要议程是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色区域问题。会后成立了酃县工农兵苏

维埃政府，推选徐鼎燕任县政府主席。7月，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青石冈区和大院乡开展插牌分田，组建两区、乡赤卫分队，扩编赤卫大队。1928年年底，共组建了4个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8个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红色区域扩大到500多平方公里。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军队“会剿”井冈山地区，与井冈山毗邻的大院根据地同时失陷，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被破坏。

1929年12月下旬，在石洲板下楼召开酃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酃县苏维埃政府（后迁至柳树坝河石洲锅厂下），设主席1人，秘书1人，下设土地、财政、粮食、裁判、文化5个部及邮政局。[①]

大革命失败后，莲花农民自卫军60条枪仅剩1条枪。但到了1928年2月间，莲花县的革命党人就是凭着这一条枪，发展到20余支，并成立了县赤卫队。后来，毛泽东又指示部队给莲花赤卫队送去几条枪。3月，湘南特委派周鲁来到宁冈，指令莲花新生的红色武装去湘东醴陵一带开展活动。莲花特支的同志没有执行这一指令，继续在莲花境内深入开展打土豪活动，避免了类似“三月失败”的损失。4月底，赤卫队扩大为红色独立团。独立团在县特支的领导下，打土豪、抓劣绅、端敌巢，有力地推动了莲花县的工作，端阳节前夕，还捣毁了县警察局桥头派出所，处决了派出所所长文正宾，为推翻反动政权铺平了道路。

龙源口大捷后，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四军第29团分兵莲花，协助莲花县的工作。盘踞在莲花县城的反动靖卫团慌忙潜逃出城。6月28日，第29团占领莲花县城，随即开仓放粮，释放被监禁的工农群众。接着，分兵四处广泛发动群众。

中共莲花临时县委书记朱亦岳和刘仁堪等闻知红军进入莲花，立即赶到县城，与第29团接上关系，统一部署了莲花境内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关事宜。在红军的帮助下，莲花全县的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6月底，全县以乡农会为单位，每乡派2名代表在县城万寿宫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宣告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选举刘仁堪为县政府主席。同时各地还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莲花全县除一小角外，8个区130个乡都建立了红色政权，基本上实现了一片红。

① 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酃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347页。

3. 边界土地革命的风暴

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从政治上发动农民群众、从经济上使农民群众得到翻身的有效途径。插牌分田、实行土地革命，成了开辟、巩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任务，成了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前提条件。

早在1928年的三四月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途经酃县中村以及桂东沙田村时，就曾开展小范围的土地斗争，为边界的土地分配摸索到了经验。在这前后，毛泽东还曾在宁冈、永新两地开展深入的农村调查，详细了解边界的政治、经济状况，为大规模的土地斗争做了重要的准备。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的湘赣边界党一大，专题研究了土地分配的问题。随后各县先后成立了土地委员会，1928年5月至7月，边界各县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红军的协助下，领导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当时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做法是：

（1）成立分田领导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各县、区、乡的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县、乡、区各级都有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进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① 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制订分田方案和划分阶级，分田时以阶级身份来决定是否分田。但那时划分的阶级，都比较简单，"主要对准地主、富农来进行土地革命。"②

（2）红军干部下到各地指导分田

边界的土地革命运动全面开展时，边界特委抽调和派出了大批红军干部深入各县的乡村，发动群众，掌握政策，指导分田。当年被派到宁冈葛田乡的王紫峰回忆说："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田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我到葛田乡帮助分田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我们在葛田乡帮助农民分配土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

② 同上书，第187页。

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①]

（3）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

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在试点的基础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在实践中，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是容易为地主、富农利用的……后来改为以乡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毛主席调查研究，经过斗争实践的摸索和总结才找到的。”[②] 这个办法较之毛泽东于1927年8月19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提出的《土地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土地纲领》规定的是“以区为单位”，而在此时及以后形成的《井冈山土地法》却提出了以乡为单位、以几乡为单位、以区为单位等三种方法，不仅更机动，也更切合各地的实际，更能调动贫苦农民的积极性。

（4）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在边界各县，当时实行的是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标准是以人口为单位，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分田，“小孩得大人之半数田，手工业者地主一律照分。”后来接到中央六大决议案，中央只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在边界已经实行，如改过来将贫民分到手中的田地再还给富农、地主，就会挫伤贫农阶级的积极性，所以就决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后再分按中央政策办。”

（5）实行以原耕为基础，好坏搭配的原则

井冈山区地域广阔，土地贫瘠与肥沃情况差距很大。开始“在分配土地时，原来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后来发现，这办法有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因为富农的地，一般是比较好的，贫雇农种的地，一般是比较差的。如果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那么，富农中的好田就分不出来……后来主席就提出要抽肥补瘦，把富农的好田抽出来，补给贫雇农耕，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③]。所以，“当时按4担谷1亩估计，分上、中、下三种田，田也造册，按上、中、下搭配分。”[④]

在土地分配时，有些地方的地主豪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土地斗争，在红军对他们的破坏行为予以充分揭露、狠狠打

---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88页。

④ 同上。

击，同时又在军事上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之后，种种破坏行为得以遏制，各县的土地才顺利地分了下去。

土地的普遍分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搞好生产的热情。在根据地内，分到土地的农民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纷纷成立了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用枪杆子来保卫土地斗争的成果。他们还多打粮食、发展生产，获得了农业上前所未有的好收成。宁冈一带的群众都踊跃交公粮。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①] 这一切，为边界武装割据的进一步推广创造了最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曲折发展

一、"八月失败"

1. 永新联席会议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特委的组织关系隶属于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双重领导，有关根据地的大政方针必须请示两省省委。只要两方中的一方点头首肯，即算合法，方能实施。1928 年 6 月间，正当边界斗争一片生机盎然的时候，对井冈山负有指导责任的湖南省委不切实际地对井冈山提出了错误的要求，导致了边界的"八月失败"。

当时，湖南省委派代表杜经修来井冈山，要求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向湖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②]。在南方统治阶级处于暂时稳定时期，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而冒进湘南，实属非常危险的行动。

对于湖南省委的指示，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很不理解，1928 年 6 月 30 日，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 20 余人，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杜经修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杜经修传达了湖南省委 6 月 26 日的指示，并解释了到湖南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1 页。

②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 页。

的理由：因为中央把湘、鄂、赣、粤列为全国中心，湖南省是四省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革命的中心。只要整个湖南的局势迅猛地向前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革命的总爆发。显然，这是一种盲目乐观和十分有害的“左”倾观点。大家听后纷纷发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与会人员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此时红四军去湖南有百弊而无一利，“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做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被敌人消灭”。[①] 面对多数人做出的决定，袁德生、杜经修也只得表示同意。于是，联席会议最后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红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深入各县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会后，毛泽东以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向湖南省委报告，陈述了红四军不能冒进湘南的六条具体理由，建议湖南省委收回成命。

2. 红军主力冒进湘南

永新联席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抵制“左”倾错误，但是终究改变不了湖南省委不切实际的指示，“八月失败”不可避免。

1928 年 7 月 4 日，湘敌吴尚第 8 军按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根据地的协议，乘红四军主力在永新、宁冈之际，以第 1、第 2 两个师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袁文才率第 32 团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但寡不敌众。9 日，敌人突破砻市防线，向新城推进，意欲与赣敌第 6 军胡文斗部和第 9 师杨池生部会合，在永新南北夹击红四军。此时，赣敌尚未到达永新。根据这一情况，红四军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立即派朱德、陈毅、王尔琢率第 28 团、第 29 团进攻湖南酃县，然后直逼敌巢穴茶陵，迫使湘敌回援，以切断湘赣两敌之联系；毛泽东率第 31 团在永新钳制赣敌。7 月 12 日，第 28 团、第 29 团攻克酃县，湘敌闻讯，怕茶陵有失，仓皇逃回茶陵。湘敌刚退，赣敌王均、金鼎汉部 5 个团、胡文斗 6 个团，进入永新。

朱德率红军大队攻克酃县后，本计划在攻取茶陵后回师永新，与第 31 团协力进攻永新之敌，这样不但能粉碎敌人的“会剿”，而且根据地也可以趁机扩大。但是，攻克酃县后，第 29 团借口湖南省委有要红四军去湘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8 页。

南的命令，在7月12日晚，瞒着军委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13日开往湖南。该团由宜章农军组成，自“年关暴动”离开家乡已有大半年时间，很多人思乡心切。尽管红四军军委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士兵委员会议等，进行多方面的解释工作，加以劝阻，但效果甚微。

在形势十分复杂、一时难以决断的情况下，为了稳定部队的情绪，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原则上红军大队去湘南，但部队的实际行动必须在取得毛泽东的指示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会后，军委立即派杜经修经由酃县回宁冈茅坪向毛泽东请示，但此时毛泽东已去永新。杜经修在宁冈只将情况向特委书记杨开明做了汇报，杨开明也主张部队按湖南省委的指示去湘南。这样，在杜经修和杨开明的错误指导下，7月17日，红29团由酃县水口开往湘南。为了保护该团的安全，第28团只得一同前往。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深感事态严重，写信要求部队转回井冈山。18日，部队接到毛泽东的信，当晚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来信。会上，只有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维护毛泽东的意见，主张部队回师边界，但主持会议的杜经修以及第29团党代表龚楚等人坚持去湘南。会上意见不一，最后不欢而散。第二天一早，第29团便向湘南进发，第28团只得随后跟进。

3. 红军主力兵败湘南

杜经修把红四军第28团、第29团拉向湘南的第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攻打郴州。7月23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下。当时的部署是：第29团进攻牙石桥，第28团进攻苏仙桥。

7月24日凌晨，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第29团就开始发起进攻。对面之敌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范石生部，范石生部在战斗打响之后并未用力，而是不战自退，第29团于当日上午轻易攻进郴州城。

第29团进城后，局面开始失控，党组织失去了作用，许多战士以为战斗获胜就可以离开队伍，无组织无纪律，三五成群上街理发、买东西、上馆子。下午4时，范石生部组织起猛烈的反攻，第29团腹背受敌，抵挡不住，纷纷撤出战斗。第28团闻讯赶来增援，但敌军兵力数倍于我，经过激战，不得不撤退，红军转胜为败。

郴州一战，第29团几乎全军覆没，当日收集的余部不过100余人，后编入第28团。被打散的第29团大部跑向宜章老家，结果一部分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终。所幸主

力红28团还在，由朱德、陈毅率领退往桂东。但此刻，失败的气氛笼罩着第28团，部队思想一片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在沙田一带转来转去，徘徊不前。

郴州一战，我军“先胜后败，撤出战斗”，损失惨重。第29团从此不复存在，此事史称“八月失败”。

4. 黄洋界保卫战

红军大队离开边界后，到达永新的敌军已达11个团，而边界红军只剩下第31团、第32团。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边界特委决定由袁文才率第32团防守宁冈，毛泽东率领第31团以游击战争在永新困敌。

为了在永新拖住和拖垮敌人，毛泽东把第31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各路成立行动委员会。在毛泽东的统一指挥下，三路部队密切配合与合作，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使敌寝食难安，将敌11个团困在县城周围及附近30里内长达25天之久，坚决地遏制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进攻。创造了红军游击战史的奇迹，也进一步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然而，红军大队在湘南失败的消息及我根据地内的真实力量被敌探悉，敌人继而大举反攻。为保存有生力量，第31团主动撤出战斗，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斗争，赣敌于是进占永新、莲花、宁冈。不久，赣敌发生内讧，第6军胡文斗6个团仓皇退出，随后与王均的第3军战于樟树。留下来的金鼎汉5个团，亦仓皇退守永新城内。敌人这一次“会剿”宣告失败。

1928年8月下旬，湘赣敌军趁我军大队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通电合谋，调兵遣将，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会剿”。

湘赣两省敌军共7个多团的兵力企图分进合击，先后占领宁冈茅坪，再进攻大小五井军事根据地。但是，慑于我军声威，实际直接向我军事根据地发动进攻的仅有湘敌吴尚的3个团，赣敌王均的1个团，其余敌军不敢贸然出击。

8月下旬，留守根据地的第31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获悉敌人发动第二次“会剿”消息后，即率第31团第1营两个连退守井冈山，会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敌军集结在黄洋界哨口下面。红军把黄洋界之外的四个哨口交给王佐把

守，把第31团第1营两个连，调到黄洋界。黄洋界海拔1343米，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正面，山岩陡峭。站在黄洋界，一眼可以望见山脚下的小村庄。四个团的敌军，正聚集在那里，而上面的红军只有两个连。

30日清晨，旭日初升，敌军开始向山上发起进攻。红军在第31团党代表何挺颖、第1营营长陈毅安的率领下，凭借黄洋界的有利地势，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与敌激战一天一夜，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保卫了井冈山，取得了第二次反“会剿”战役中有决定性意义一仗的胜利。赣敌王均部一个团的敌军正准备经茅坪进攻黄洋界，听到了我方红军发出的炮声，又听说湘敌移师酃县，也匆匆后撤，退回到永新。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凭借山险，红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不仅保存红军最后的根据地，且使敌胆为寒，不敢轻视红军，为边界名战之一。毛泽东在返回途中闻讯后，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诗，以表达喜悦之情。

二、边界党的整顿及根据地的恢复巩固

1. 红军主力回师井冈

红军大队离开井冈山后，为了挽救根据地的危急局势，8月下旬，毛泽东在永新西乡九陂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应敌对策。会议开始不久，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带来了湖南省委给红四军的《给湘赣边界特委的补充指示》，湖南省委在指示中命令红四军向湘东发展，并要求红四军毫不动摇地执行。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决定不去湘东。

就在会议争论期间，传来红军兵败湘南的消息。经紧急商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宛希先率第31团第3营前往湘南迎回红军大队，留下第31团第1营、特务连会同第32团坚守井冈山。

九陂村会议之后，毛泽东率31团第3营前往湘南寻找红军大队。8月20日，部队到达湖南桂东境内，毛泽东写信给朱德、陈毅，相约到县城会合。23日，第31团第3营在桂东县城与第28团胜利会合。随后，毛泽东、朱德等商议，借这次会合之机，召开一次会议，认真总结红军大队冒进湘南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行动和工作。

8月23日晚，毛泽东在桂东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宛希先、龚楚、杜经修等参

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通报了红军离开边界后的一些情况，杜经修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会议对部队的下一步去向做了研究，决定重回井冈山。下午，会议进行时，湘敌吴尚部在地方挨户团的配合下，突袭桂东县城。毛泽东、朱德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为了避开强敌，随即撤离县城，转移到寨前村。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决定，留下杜经修、龚楚组织湘南特委，深入发动群众，重新创立割据局面。

红四军在往返湘南期间，帮助建立了汝城、桂东两个县委，连同原有的资兴、郴县两个县委，组织起了湘南特委。

8 月 25 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兵分两路从寨前村出发，回师井冈山。归途中，第 28 团第 2 营营长袁崇全企图率所辖的几个连投敌，军参谋长兼第 28 团团长王尔琢率部追回了部队，但他自己不幸被叛徒袁崇全杀害。

2. 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

由于在“八月失败”中，湘赣边界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28 年 9 月以后，湘赣边界开始“厉行洗党”。“洗党”实质上就是整党，但着重于在组织上清洗与整顿。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

1928 年 5 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党的组织也进入一个大发展局面。这时，边界各地党组织开始了公开建党建团。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征收党团员，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和“拉夫式”的方法，一时党员大增。

由于“党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重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①]。“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②]为此，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的重点在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区域，即宁冈、永新两县。“洗

①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 页。

党”的主要做法：一是进行组织整顿；二是建立秘密组织。

当时的“洗党”对象是：不起党员作用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革命的；投敌叛变分子；赌钱打牌、贪污腐化、流氓成性的。其中的重点对象是投敌叛变分子。被清洗的党员本人不到会，会上宣布他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除名的党员本人当时不知道。没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记，逐级上报。当时整个边界被清洗的党员计有4000人左右。其中，宁冈县党员数量经“洗党”后由2400多人锐减为400多人。

通过“洗党”，党组织更为纯洁并重新转入秘密状态。虽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但战斗力反而增加了，党的基层支部，成为边界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九月“洗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成功的整党运动，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3. 边界党的“二大”

“八月失败”以后，党内有些同志被暂时的困难和挫折所迷惑、吓倒，对前途感到渺茫，曾在5月间出现过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又提了出来，表现出了极大的危害性。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大会。参会的有宁冈、莲花、遂川、酃县的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以及红四军的负责人，共100多名代表。毛泽东代表第一届特委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报告详细地论证了国内的政治形势，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重大意义；同时，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大会总结了边界斗争的经验，研究了边界党的改造与建设、各县工作问题、农村斗争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士兵运动问题、宣传问题、训练问题、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青年团问题等，讨论并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工会组织法》。大会号召边界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即行动起来，广泛发动群众，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和第三次“会剿”而斗争。

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重新推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袁文才、王佐、宛希先、王佐、何挺颖等19人担任委员。由于杨开明患病，由谭震林代理特委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大会是井冈山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

次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从理论上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统一了认识，坚定了大家必胜的信心；制定了边界党组织有关斗争策略，保证了井冈山斗争能够顺利发展。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色政权理论的初步形成。会后，湘赣边界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根据地的割据局面出现新的转机，红色区域不断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

4. 根据地的建设

1928 年 9 月，红军回师井冈山后，重开了边界的武装割据局面。由于半年来鏖战不休，部队在干部、士兵人员和成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整排、整连从敌军起义过来的部队，迫切需要改造，因此，部队急需进行一次大整训。11 月 9 日，红四军占领永新县城后，前委即指示留下第 32 团一营在永新观察敌人动静，其余红军主力全数返回军事大本营宁冈，相应集中在宁冈的新城、古城、柏路、砻市一带，开展冬季整训。

冬季整训的对象是红四军，但考虑到为扩大红军力量，提高边界地方武装的素质，将莲花等地的赤卫大队也调集到新城参加整训。整训的内容有二：一是进行政治教育，二是开展军事训练。

整训工作在严格的要求下进行。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训练时参照苏联红军的战法，利用地形地物练兵。主要练习隐蔽，练习跑步时背着枪，有时还背上石头，爬山、抢山头，训练速度。由于弹药有限，实战演习在工事里进行，找准目标再射击。

当时，部队中悲观失望和盲动急躁的现象仍未完全消除。所以，毛泽东常给部队作政治教育报告，意在“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的人生观”①。

整训工作直至 12 月中旬即敌人第三次“会剿”前夕才结束。冬季整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整训后的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全军上下协调一致，政治、军事素质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为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为了加强军事根据地建设，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以后，在茨坪成立了边界防务委员会，由王佐任主任。边界防务委员会成立后，为加强井冈山根据地军事根据地的防御，组织群众修筑了黄洋界等五大哨口，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4 页。

组织人员修建了小井红军医院，组织军队和群众挑粮上山，在大小五井囤积了大批粮食。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时发起的红军挑粮运动中，朱德身先士卒，不辞辛劳，亲自参加挑粮上山运动，“朱德的扁担”的故事，成为当时湘赣边界军民广为流传的佳话。

三、红五军挺进井冈山

1. 平江起义和红五军的成立

平江地处罗霄山脉北段，北抵湖北通城，东起江西修水，西接长沙，西北与汨罗、岳阳接壤，是湘赣鄂三省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大革命时期，平江是湖南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马日事变”后，平江工农群众惨遭反动派的“清乡”镇压，激起农民的不屈反抗。192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平江人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扑城”战斗，农民达十万余众。正是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更加激烈、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的形势下，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在同年6月被派到平江换防。共产党员彭德怀时任该师第1团团长。

彭德怀到达平江后，于7月22日上午召开了驻平江县城和城郊的排长以上军官会议，进行了武装起义前夕的紧急动员。随后，彭德怀在县城天岳书院前召开了第1团官兵的誓师大会，宣布全团正式武装起义，并布置了作战任务。下午1时，平江起义爆发了。由于部署得当，起义部队打垮了县城内的反动军队，占领了平江县城，释放了被关押的数百名工人、农民，取得了起义的胜利。随后，黄公略率第3团第3营起义官兵，贺国中率随营学校100多名学员也赶到平江与起义部队胜利会合，起义队伍总数达到2000余人。7月24日，起义部队在平江县城召开大会，隆重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辖第13师，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13师师长，滕代远任红五军党代表兼第13师党代表，邓萍为军参谋长兼师参谋长。次日，起义部队又成立了红五军军委，邓萍担任书记，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等担任委员。

平江起义后，湖南军阀纠集五个团的兵力围攻平江县城。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等人于7月30日主动撤出平江县城，向平江、修水边界的山区转移。

2. 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

1928年8月6日，红五军突出重围，进占修水县城，暂时摆脱追兵，

在修水休整了几天。在红五军的帮助下，成立了修水县委和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8 月 14 日，红五军撤离修水，于 18 日占领了铜鼓。次日，复由棋坪、双坑返至平江黄金洞。

8 月 20 日，红五军在黄金洞接到湖南省委指示信。省委要求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①]。于是，彭德怀、滕代远率主力向万载一带发展，伺机南下，打通湘东与赣西的联络，期与朱毛红军会合。黄公略则率部分队伍，留在平、浏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8 月 23 日，红五军重创敌军后，复又撤回黄金洞。待敌向黄金洞合围之际，红五军又迅速撤出黄金洞，经修水、铜鼓，开向万载，与敌绕圈子。9 月 9 日，红五军主力在万载受挫，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络的计划落空，不得不折向铜鼓，第一次挺进井冈山未成。万载受挫后，红五军陷入十分不利的处境，枪支不满千数，士气多不振作。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红五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即时总结失利的教训，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对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工作。首先，清洗了那些未改造好的旧军官，遣散了一些思想不坚定者，吸收了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将一些优秀工农分子提拔到指挥员的岗位上来；同时，彭德怀还亲自到士兵中去做工作。

9 月 17 日，红五军攻克铜鼓县城，击毙了敌县长，部队士气为之一振。由于进行了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9 月中旬，红五军开始了第二次挺进井冈山的军事活动。

11 月底，红五军第 3 纵队和特务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下，从万载出发，于 12 月上旬进抵江西莲花高州。高州老百姓听说红五军是去井冈山找朱毛部队的，热烈迎接部队。翌日，部队离开高州，直接向宁冈挺进。

由何长工率领的策应彭德怀部上山的红四军一部分在莲花的九都与红五军会合了。彭德怀集合红五军部队，跟随何长工率领的红四军特务营、独立营，直接向井冈山挺进。

3. 新城会师

红五军离开莲花后，经永新县境，越过七溪岭，于 12 月 10 日来到宁

---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5 页。

冈新城。宁冈县委、县政府及正在新城一带整训的红四军，得知红五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城墙外、街道旁，到处都是石灰水刷的大标语："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向红五军学习！"新城内外，站满了从各地涌来的群众。

何长工把红五军的队伍安顿在新城东门外的历山、王下村，军部设在王下村的"敬爱堂"。随后，前往茅坪向毛泽东、朱德报告。历山、王下村的乡亲们，像迎亲人一样，把红五军战士领进家家户户。几个月来转战千里，红五军看到的尽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看到根据地人民安居乐业、喜气洋洋、亲如一家的情形，无不为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感到骄傲、佩服。

不久，何长工领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来到"敬爱堂"。随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向红五军的同志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朱毛会师以来的情况，彭德怀、滕代远等也介绍了平江起义和两次上井冈山的曲折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介绍和商议，最后决定：为纪念广州暴动一周年和欢迎红五军上山，于12月14日召开两军会师庆祝大会。

12月14日上午，宁冈县城新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新城西门外的稻田上举行。田中搭建了一座土台，台上高挂着"庆祝红四、五军胜利会师大会"的红布会标，两侧张贴着陈毅撰写的一副对联："在新城，过新年，欢迎新同志，打到新军阀；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①

红四军5000余人、红五军第3纵队和特务大队800余人，加上当地的地方武装和群众近万人参加了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在会上讲了话。彭德怀说："井冈山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她是中国革命的一盏明灯。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学习红四军的建军经验。"② 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后，说："我们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来我们还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③ 会后，红五军即开赴茨坪等地

---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53页。

休整。

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合，是继朱毛红军会师以来的又一次大会师，极大地鼓舞了边界军民的斗志，有力地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揭开了党领导下的井冈山斗争新的一页。

第四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后期斗争

一、第三次反“会剿”的失败

1. 柏路会议

红五军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消息，使国民党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威胁。蒋介石立即撤换了朱培德，委任何健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的消息传到湘赣边界。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深感事态严重。敌军6个旅18个团之众即将扑来，而我红军只不过4个团6000余人，兵力悬殊太大。

这时，中共“六大”决议等许多重要文件送至边界。为此，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商议，决定立即召开军队与地方党的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研究迎战破敌之策。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60余人参加了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联席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传达“六大”有关决议；通过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讨论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如何迎击敌人的“进剿”。在讨论如何迎击敌人的“进剿”时，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凭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鄂赣去，有的主张到湘南去，有的主张到赣南去。会议既否定了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最终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实行“围魏救赵”。

会议决定：红四军和红五军进行混合编制，红五军第3纵队编为红四军第30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30团党代表。由彭德怀率领第30团和第32团防守井冈山；红

四军大部向赣南出击，到外线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内外配合，粉碎敌人的“会剿”，同时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

柏路会议于1月7日结束。会议后，边界各县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动员，会同部队再次加固了工事和挑粮上山，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资准备。

2. 红四军出击赣南

柏路会议以后，前委和毛泽东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工作：向红五军官兵通报敌情，统一思想，做好迎战准备；将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的地方赤卫大队、暴动大队组成边界赤卫总队，由鄢辉任总队长，刘作述任党代表，统一调配，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互为掎角；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人事调配，为适应战事需要，改组了边界特委，以邓乾元为书记，邓乾元、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5人为常委，统筹边界群众反“会剿”的战事准备和动员组织工作；原特委书记谭震林调任前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专做军队职工工作；将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调任前委秘书长，一同随红四军出征；为进一步加强守山部队力量，1月13日，毛泽东又在下庄召开了前委会议，根据红五军的请求，从红四军中抽调一部分得力干部，充实守山部队领导，任命张子清为红五军参谋长，何长工担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第32团团长。

1929年1月10日起，红四军主力开始在茨坪、小行洲集结，毛泽东、朱德对他们进行了政治动员，组织军事训练，布置出击路线、序列等事宜。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兵分两路向赣南出击。一路经下庄、小行洲、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合为一路。

红四军下山那天，红五军、红四军第32团的指战员及山上的群众数百人纷纷冒雪前来为红四军主力送行。红四军在行军途中，张贴了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指出了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布告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项政策主张，号召全国工农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努力奋斗。行军途中，部队还散发了根据党的“六大”精神而编写的《共产党宣言》，同时，红四军还向沿途群众散发了油印的数百份“六大”决议案，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3. 第三次反“会剿”斗争失败

红五军主力下山后，何健即令进至遂川的第1路李文彬部的第21旅、进至资兴的第5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15旅，向赣南追击红四军主力。同时，命令进至永新一带的第2路张兴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第3路王捷俊部一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带的第4路吴尚部一个旅，向井冈山进逼，企图一举剿灭井冈山这块红色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人领导守山军民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坚守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的主要内容：全山动员，鼓舞士气，坚定全军官兵守卫根据地的信心，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互相支援，与井冈山共存亡；具体研究守山的措施，调配轻重武器，要求各部修筑工事，储备粮食；研究了应急措施，决定万一五井被冲破，红五军冲出井冈山往赣南与红四军联络，边界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则尽可能埋伏各县坚持斗争。

彭德怀将红五军的军部设在茨坪，命令刘作述、鄢辉领导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赤卫大队，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何长工率第32团一营部在山下开展游击斗争以袭扰敌人。

1929年1月26日，何健率总部从萍乡移至莲花，亲自督战。27日，湘赣两省各路“会剿”军队共十余团的兵力，采取“四面围攻”的战术，以湖南方面为主攻，凭借优势兵力，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各大哨口发起了猛攻。

在敌人大军压境轮番进攻的严重情况下，红五军将士和地方赤卫队员，冒着风雪严寒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从1月27日到29日，守山部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人的指挥下，进行了三天三夜的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山上群众冒着危险为红军抬水送饭、抬运伤员；山下的地方武装在何长工等指挥下，也不断地利用熟悉的地形给敌人以打击，使敌寝食难安，有力地减轻了各大哨口的压力。

1月29日晚，进攻黄洋界的敌军收买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游民，由他带路，绕过正面工事，从哨口右翼小路摸进小井，黄洋界哨口因此失守。黄洋界哨口失陷后，彭德怀立即带领100余人的队伍前往救援，途中与敌相遇，经过激战，未能成功。30日早晨，守卫八面山哨口的100多名红军指战员，弹尽粮绝，几乎全部牺牲。继黄洋界、八面山失守之后，桐木岭、白银湖一带也被赣敌占领。敌军乘势而进，三路重兵直逼茨坪。为保

存有生力量，避免红五军全军覆没的危险，彭德怀根据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制定的反“会剿”应急措施，收拢红五军主力，从遂川方向向南突围，往赣南与红四军取得联系。

敌人占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2 月又调集赣敌第 5 师第 54 旅、第 12 师第 35 旅计 4 个团的兵力，向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坚守在九陇山的永新、莲花、茶陵县赤卫大队，在刘作述、鄢辉等指挥下，凭险抵抗，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丢失阵地。至此，第三次反“会剿”失败，井冈山根据地沦陷敌手。

井冈山失守后，1 月 29 日，敌人从黄洋界插入小井村。当时，小井红军医院的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 100 余名重伤员没有办法突围出去。敌人进村后抓获了这些重伤员，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妄图得到红军情报，但终无所获。敌人最后用机枪扫射，把 100 余名重伤员杀害在小溪边的一块稻田里。他们牺牲后，当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掩埋了他们的遗体。

二、井冈山失守后湘赣边界军民坚持斗争

1. 湘赣边界临时特委的组建

井冈山失守后，敌人对根据地一方面实行“三光”政策，残酷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一方面又利用自首政策欺骗党内外的动摇分子，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致使边界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根据地失守后，冲出包围圈的边界特委停留在遂川边境。由于遂川敌人力量雄厚，遂川党组织被破坏，边界特委无法与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暂时失去作用。这时边界各县党组织也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除永新县保存完好外，宁冈、莲花、酃县、茶陵都损失不小，遂川只剩下一个书记和几个基层支部。

与此同时，各级政权组织也大部分被敌人打散了。地主豪绅纷纷向农民反攻倒算，夺回土地。边界的武装力量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其中，遂川县赤卫大队和酃县赤卫队随红五军突围，遂川赤卫队在中途被敌人打散，酃县赤卫队只有一部分返回酃县，一部分则往资兴十二洞去了。所幸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县的地方武装无损失，他们与王佐部一起，坚持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开展游击斗争。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边界共产党人开始了恢

复党组织的工作。1929 年 2 月，边界特委委员兼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来到九陇山，召开了宁冈、茶陵、永新三县党的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刘真、宛希先、朱昌偕为常委，朱昌偕为书记，统一领导边界斗争和收容整理工作。

3 月 11 日，原特委副书记陈正人从遂川来到永新，会合了宛希先、朱昌偕。这样，原特委中的 5 个常委已到了 3 个。于是在 12 日召开原特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永新召开特委扩大会议。14 日，特委扩大会议召开，讨论研究了边界工作，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特委。新的临时特委以朱昌偕、何长工、宛希先、刘真、陈正人 5 人为常委，朱昌偕为书记。

新的临时特委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健全、改组和扩大各地党组织，积极深入地宣传、发动群众，发起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在适当的时候召集边界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新的临时特委的领导下，边界的永新、茶陵、宁冈等县党的组织大部分很快健全起来，并开展了正常的活动和斗争。“到 1929 年 4 月，各地党组织已基本得到恢复，边界党员人数发展到 5000 人左右，各项工作重新出现了勃勃生机”[①]。

2. 割据区域的恢复

1929 年 3、4 月间，蒋桂战争爆发。由于军阀忙于内部争斗，驻守边界的正规军队陆续撤走，只有永新县留驻 1 个正规团。趁此机会，边界临时特委当即决定，将红五军李灿领导的第 1 大队、袁文才、王佐部队与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各县抽调的武装合编，组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 1 团，下辖 2 个营。第 1 营为袁、王部队，下设 3 个连，王佐为营长；第 2 营由各县赤卫队和李灿的第 1 大队组成，编为 2 个连，李灿为营长。两营共有枪 400 余支。

红军独立第 1 团成立后，在边界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展开了英勇的反击。第 1 营以大小五井为游击中心，向遂川、酃县、宁冈游击；第 2 营以九陇山为游击中心，向永新、宁冈、茶陵等县游击。

红军独立第 1 团的游击斗争活动使边界的豪绅阶级异常恐慌。时值蒋桂战争爆发，进剿的正规军队开始撤走，他们急忙于 4 月拼凑了一个所谓

① 罗学渭、肖长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6—137 页。

"茶、永、酃、宁四县联防"组织,"会剿"九陇山。结果,被红军独立团打得一败涂地,宁冈靖卫队几乎全被消灭。

打破了四县联防"会剿"之后,红军独立第1团收复了宁冈、莲花两县割据区域,边界工作开始恢复。至1929年5月,边界各县党组织先后恢复和健全,并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拥有永新县委、莲花县委、酃县临时县委、遂川临时县委、茶陵特别区委。宁冈分为南、北两个特别区委,直接归特委指挥。

此外,永新的小江区、潘梅、天龙山、绥远等地,宁冈的三、九两保,大小五井等地都有了秘密的苏维埃组织;莲花、遂川、茶陵、酃县都有了公开的割据区域。同时,各县的地方武装也相继得到恢复和扩展。除编入红军独立第1团的武装外,各县都有赤卫队,拥有440支枪,其中,永新200支、莲花100余支、宁冈50余支、酃县30支、茶陵20支、遂川5支。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割据出现新的局面。

3. 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

1929年4月中旬,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奉前委命令,经过20天的一路拼杀,重新回到边界。彭德怀"在茅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并从红五军中"拨了两千银元救济老百姓"①,茨坪和大小五井的男女老少每人分得两块银元。5月2日,红军到达宁冈茅坪,会见了李灿、何长工等人。

红五军的归来使边界的力量顿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民众一扫第三次"会剿"失败的阴霾,再度激起胜利的信心。然而,红五军的归来,也再度引起江西敌人的注意,敌军随即以两团的兵力迅速从永新开拔,深入我中心区域,企图攻击红五军。

为配合红五军共同担负恢复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5月10日,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在宁冈古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以及红五军领导人。会议由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全面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问题及特委本身的工作,并在军事斗争及其策略方面作出了重要决定:

第一,采取"集兵政策"。将组建不久的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1团编为红五军第6纵队,王佐任司令,何长工任党代表。

---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第二，制定了游击政纲。主要内容有：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分配给工农；摧毁国民党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压迫民众的团体；摧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并焚烧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债约；解除军阀部队和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的武装；处决压迫民众的官吏、地主、资本家；没收外国资本的大商店、大工厂和银行；保护小商业营业；保护邮政；优待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投诚和俘虏的士兵。[①]

第三，划分了游击区域，实行分区游击。会议还提出了政治指挥中心由宁冈转移到永新农村。

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是井冈山根据地后期斗争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了行动纲领，为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

三、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

1. 袁、王罹难

1928 年年底，中共“六大”决议传到井冈山，其中关于“对土匪的关系”中提出“对土匪武装要严厉镇压”，“对其首领应当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均应完全剪除”。这实际上是一种“左”倾错误政策。袁文才、王佐此时已是党内同志，分别担任红四军第 32 团正、副团长职务，其部队经过改造已成为红军的一支重要武装，而不是什么“土匪武装”。因此，毛泽东曾就此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为了保护袁文才，毛泽东在率红四军出击赣南时特意把他带到身边，而袁文才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问题的那段文字，心里十分害怕，竟私自离队返回宁冈。

1930 年 1 月 18 日，根据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建议，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在遂川于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王部队。

2 月 22 日，袁文才、王佐分别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要他们带

①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7 页。

部队到永新集合编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袁、王历来崇拜毛泽东，接信后未加思考，即率部于22日傍晚到达永新城。当日，袁、王及其部队被安顿在事先就布置好的地点住宿，并有意把袁、王部队的驻地与他们两人隔开。同时，边界各县负责人也率本县地方武装相继到了永新。

当晚，边界特委在永新召开包括袁、王的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会上当面指出袁、王受编不受调，袁文才开小差逃跑，勾结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权等问题。袁文才据理力争，并一一辩驳。朱昌偕等拥护彭清泉的意见，王佐等反对，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彼此都拿出了手枪。

当晚彭清泉派特委书记朱昌偕赶到安福，并将一封书信给彭德怀，请红五军速来永新。在朱昌偕的蒙骗下，彭德怀派出红五军党代表刘宗义、队长郭炳生率领的第4纵队，随同朱昌偕于24日拂晓前赶到永新城，将袁、王及其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彪、陈梦平等枪杀。

2. 井冈山根据地沦为白区

袁文才、王佐被杀后，袁文才旧部的连长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各带十几个人几十条枪逃回山上。1930年3月初，谢角铭、王云龙两部联合"通电反共"，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分别被编为宁冈、遂川两县反动武装靖卫团，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沦为白区。宁冈、遂川两县党和地方武装丢失了红军经营两年多的最后阵地。

由于谢角铭、王云龙的叛变，宁冈、遂川两县的党和革命群众，特别是谢角铭、王云龙所占据的地方的党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至此，井冈山斗争历史结束，湘赣边界的斗争进入到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党中央为袁文才、王佐平反，两人被追认为烈士。

第五节　井冈山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

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红色文化，它承载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它离我们现在已经很久远了，但其深厚的红色历史底蕴仍然极具宝贵的理论价值和教育价值。

一、井冈山红色文化的理论价值

1. 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井冈山军民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对斗争实践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性概括。这些理论性的概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奠基石。

第一，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党和红军如果没有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就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了。毛泽东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指出其存在和发展的影响与前途：“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① 可见，毛泽东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到“夺取三省政权”，到“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是一种大胆而又成熟的战略构想，也是富有远见与独创的理论概括。这种战略构想与理论概括，无疑为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与游击战术的思想。

从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就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实行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确地对待俘虏和投诚白军的政策，等等。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套游击战术原则。这些都是在井冈山斗争实践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总结红军斗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第50页。

经验时特别强调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① 这个重要思想到古田会议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第三，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政策。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土地革命"，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② 1928 年 5 月，在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上又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方针，随后掀起了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风暴。1928 年 12 月，毛泽东总结一年来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亲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根据地内土地分配的原则、标准、方法及土地税的征收等一系列具体政策。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而且为以后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鲜活、宝贵的经验，为我党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第四，提出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自始至终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一是提出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大本营是根据地的核心、堡垒，大本营不建设好、巩固住，根据地就有后顾之忧。二是提出了"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思想。这是巩固大本营的重要保证，具体举措就是"大力经营永新"。在毛泽东看来，"永新比一国还重要"，亲率部队在永新塘边、夏幽等地蹲点，调查研究，草拟分田纲领。三是关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他批评了在政权建设中"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的"独裁专断的恶习惯"的党政合一的现象，提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③ 四是建设井冈山（大小五井）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认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建设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66 页。
② 同上书，第 48 页。
③ 同上书，第 73 页。

作用。

第五，提出了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思想。

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感叹地说道："'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①毛泽东道出了在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艰辛与困难，当时的"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庭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土客籍的矛盾和纷争很厉害，以致出现"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格局。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在1928年两次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并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九月"洗党"。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由于时局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井冈山来不及充分发挥和阐述，到古田会议期间才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撰写和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

2.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提供原动力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兵井冈，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黑暗中摸索出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革命道路。

如果当时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敢创新路，而是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与经验，那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先辈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独辟蹊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与源泉。当年革命先烈本着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与干劲，促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① 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井冈山革命军民在面对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政治打压和生存困境之时显出的那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艰苦奋斗精神面貌，让无数后人为之景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弘扬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拓创新、勇创新路的精神。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必然。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前人或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三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遭遇过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失败，可谓一路荆棘，一路艰辛。但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道路，总是从蹒跚迈向稳健，从崎岖走向平坦。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在 21 世纪新的历史征程中，革命先烈开天辟地的壮举必将催生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力量，给我们奋起直追、和平崛起、不断融入世界潮流的自信。当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步伐受到阻力时，井冈山军民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精神和作风将给我们以不竭的动力，给我们以藐视困难、勇于克服困难、乐观豁达的精神。我们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奋斗、迎难而上，以革命者“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胆识和气魄沉着应对各种风险、危机和考验，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信心百倍地沿着中国特色主义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 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中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通过访贫问苦，倾听民诉，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初步形成了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井冈山上颁布“三大纪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5 页。

律、六项注意”的遗址、第一个在“连队建立支部”的遗址、三湾士兵委员会旧址、插牌分田遗址、建立农村圩场遗址、边界代表大会遗址都是历史的见证。这些遗址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已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它们是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这种为人民谋利益、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将广大人民与党紧密相连，调动了当时边界所能调动的最大力量，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种为民谋利益、鼓舞人心的凝聚作用是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所不可或缺的。

毛泽东曾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①] 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是我们党的斗争史一个缩影。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执政大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以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己任，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党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的执政环境、执政任务和执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党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我国快速发展中得到了切实改善与提高，党也因而更广泛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党也获得了新的生机。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旨在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的这一决定为战争年代形成的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党的自身状况来看，当前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现象，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形象，疏远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方面，一些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和业务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0页。

素质不高，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制度也存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加以解决。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使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率领全国人民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二、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红色文化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它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作为一种承载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的重要载体，因其蕴涵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厚重的先进文化、丰富的革命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在当代仍具有超越时空的强烈感染力、说服力与震撼力。因此，运用这些红色资源对当代人民大众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强大的教育功能。

1. 利用革命遗址遗迹，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三个主义”教育活动

一个人倘若没有理想信念，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倘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理想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在对实现共产主义、对建立自由民主富强国家矢志不渝的追求上，体现在对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始终如一的践行中。井冈山精神由此成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光辉典范。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精神的贫乏反而日益凸显。因此，充分运用井冈山红色文化，利用革命遗迹遗址进行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际，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用鲜血乃至生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

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①] 革命先烈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卓绝的斗争风范、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统一的绚丽光芒。八角楼、雷打石、读书石、红军洞、标语群、小井红军医院遗址及其红军伤病员牺牲处等革命遗迹遗址，无不折射出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的理想信念之光，闪耀着革命将士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的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军民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力量源泉，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它不仅鼓舞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它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精神支柱和永恒主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融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必将成为我们夺取经济社会建设新的伟大成功的力量源泉。

井冈山众多革命遗址遗迹都在告诉我们，新中国是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和平年代同样不可或缺，历史的记忆同样不能淡忘。我们要高度重视井冈山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使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人心的精神家园。革命先烈这种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和坚持精神，无论是在我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上，还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将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挑战，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而中国共产党能从井冈山走到北京，走向全中国，带领人民大众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集体主义功不可没。朱毛会见、朱毛会师、将士挑粮上山、红色圩场、被服场、兵工厂、转运站等旧址和遗址，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官兵的高度一致，如果没有军民的齐心协力，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而这种融洽的官兵情、军民情正是集体主义生动和集中的体现。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弘扬井冈山斗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

---

① 王一平、段克和：《弘扬井冈山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3日。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井冈山原创性红色物质资源载体，大力发掘建设好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革命博物馆、烈士纪念碑、烈士陵园等后生的弘扬性物质载体，使其充分发挥好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使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人心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井冈山革命遗址及纪念设施，努力倡导以自立自信自强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教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使我们的爱国主义观念、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观念不断增强，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信赖党中央，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2. 充分利用井冈山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

自古以来，旅游就有陶冶情操、增长学识的功能。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红红火火。2004 年 8 月，国家旅游局正式启动“红色旅游”工程。同年 11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出台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规划》，使红色旅游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红色旅游逐渐成为兼具政治教育、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及生活休闲等功能的一种特殊而新兴的旅游产品。

《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对红色旅游和红色旅游资源进行了如下的界定：“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是我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旅游胜地 40 佳、首批国家 4A 级旅游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4 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红色旅游基地之首”。因此，在红色旅游大潮中，蕴涵丰富红色资源的井冈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有着太多的传递革命理想和信念的遗址及纪念设施，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毛泽东朱德旧居、小井医院、黄洋界等历史遗迹。同时，井冈山还有着种类繁多的红色文化作品，包括诗词、楹联、歌谣、戏曲、故事、传说、标语、漫画等，它们直接鲜明地呼应井冈山斗争这一强烈的时代主题，以独特的文化形

式，记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井冈山精神及其赋存的物质遗产，是井冈山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独特的资源优势。作为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的特殊组成部分，在红色旅游的大潮中，拥有丰富红色资源的井冈山，应进一步发掘红色文化内涵，将红色旅游和红色文化教育紧密结合，使它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净化旅游者灵魂的革命朝圣地。

在红色旅游活动中，特别是每逢建党、建军、国庆等重要节庆日，可以组织开展井冈山红色旅游专题活动，让参观者通过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瞻仰井冈山革命遗址、祭扫烈士园林等活动，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和最直接有效的教育。当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不是仅仅有几个纪念地、纪念馆、标志物，或者有几个红色故事就能够吸引旅游者兴趣的。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可能已厌倦了“隔着玻璃看，耳旁别人讲”的固定模式，渴望更多的参与性和自主性，寻求一定的感官刺激，因此，要加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就必须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红色景区的观赏性、趣味性和参与性，才能更好地发挥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

搞好红色旅游活动，应将井冈山红色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如井冈山可以将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与绿色生态景区联合开发，并与当地历史文化脉络整合，深挖红色文化内涵，克服过去开展红色旅游就是观看展览、凭吊先烈等简单做法，精心打造体验式参与旅游，运用电脑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合成声、光、电技术，营造逼真的历史情境，为参观者打造亲临其境的场景，使参观者能够凭借情感、直觉、灵性等投入到各种实境体验当中。当然还可开展“穿红军服、唱红军歌、吃红米饭南瓜汤、走红军路”等参与性较强的活动，营造红军当年工作、战斗、生活的氛围，让旅游体验者有切身感受，避免博物馆解说式旅游的枯燥与单调，使革命文化精神与当代市场需求达到有机结合，吸引大批游客。通过这些直观、生动的体验式活动，使旅游体验者更能够体验到革命先烈那种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精神，从中得到心灵洗礼和思想启迪。

应该说，重走井冈路，瞻仰烈士纪念馆，身临黄洋界、八角楼，重温当年革命先烈奋斗的历史，追寻井冈山军民的足迹，目睹当年艰苦的生活环境，领悟艰苦创业的精神，对个人品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

能直接到井冈山参观体验的人数毕竟有限，因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红色产品的精心包装和策划，利用建党、建军和国庆等节庆活动，通过宣传品、传媒等，将红色旅游品牌推出去，在各地以红色旅游宣传为媒介，大打红色文化牌。通过井冈山“红色”图片展览，弘扬井冈山红色文化，将红色旅游与红色教育转为互动式、开放式教育，让更多的参与者去重温那段历史，体验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去发现、感受、思考和领悟曾经的战争岁月、曾经的烽火英雄，体会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震撼内心的精神世界。

3. 利用井冈山的绿色生态资源优势，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是以资源高消耗、环境强污染为代价换取的，造成了水、大气、土壤等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各种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状况日趋严峻，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如果我们还继续采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惨重。因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唯一选择，而生态文明教育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将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不断升华，这标志着生态文明战略在我国的确立。

2006年2月，江西省第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创新创业江西、绿色生态江西、和谐平安江西的“三个江西”目标取向。[①] 可以说，建设绿色生态江西，把江西打造成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的独具魅力的生态强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具体行动，是巩固和提升江西生态优势的主要举措。在江西深入实施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新的时代征程中，井冈山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井冈山素来享有“革命摇篮”和“绿色宝库”美誉，她不但是红色的，她更是绿色的。红色是历史，是革命山、文化山；绿色是山林和自然

① 虞国庆主编：《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读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28页。

生态，五百里井冈郁郁葱葱绵延而成一个绿色宝库、天然氧吧。井冈山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目前世界上同纬度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天然常绿阔叶林保护区。区域内有脊椎动物360多种、昆虫3000多种，国家Ⅰ、Ⅱ级保护动物30余种，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保护价值巨大。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区内山体峻拔雄伟，层峦叠嶂、井盆相间、溪瀑争艳，自然景观丰富多彩、宏伟壮丽；著名的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哨口等，以其险峻蜚声海内外；小井瀑布群，穿云飞泄、潭瀑连生、气势磅礴，有“五潭十八瀑”之称。2008年5月，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授予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这是我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区。

井冈山在绿色生态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其在引领江西绿色生态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的辐射与示范作用。近年来，井冈山自然保护区非常重视自然保护，依托宣传阵地资源优势，大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在保护区内积极开展了以“认识自然”为主题的科普教育活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爱鸟周宣传活动和招募生态保护志愿者、珍稀植物认养活动，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已成为全国多所高校教学实习基地、井冈山导游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井冈山市中小学生物课实践基地和来山游客增强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井冈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开展生态教育和文化活动、普及生态知识、增强全社会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先后荣获全国国家级示范自然保护区、江西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江西省青少年生态教育基地称号，并被列入中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

当然，井冈山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还可以依托井冈山“山林好，历史红”的品牌，充分运用宣传阵地资源优势，利用节假日，打响“大井冈”牌，通过宣传品、传媒等，与红色旅游宣传及推介活动一起，共同打造红色井冈山、绿色井冈山两张牌，更可以开展井冈山生态文化节活动，将井冈山生态文明教育进一步推向全社会，从而产生更大的生态文明教育的影响。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策应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与江西省实施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的进程中，井冈山必将焕发出新春，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第四章

红 都 瑞 金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瑞金成为全国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进行了安邦治国的伟大实践。

第一节　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是指在 1929 年至 1934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 13 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中央革命根据地是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壮大而发展起来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任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书记。1927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10 月，毛泽东带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工农军也胜利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此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①]。

傅尚文：《伟大的井冈山会师》，《历史教学》1979 年第 4 期。

1929 年 1 月，为了粉碎蒋介石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决定，留下彭德怀指挥部分红军，继续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他们两人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地区，牵引敌人。

在红四军到来之前，赣南和闽西等地已经是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红色游击区。1927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李文林、古柏等领导赣西南地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1928 年 3 月和 6 月，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地区武装起义，创建了永定溪南革命根据地。赣南和闽西位于山区，物产丰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为建立统一的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29 年 2 月初，红四军到达瑞金大柏地，歼敌两个团，占领宁都，2 月下旬，到达吉安东固。3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 月 20 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① 由此决定在赣南、闽西二十多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1929 年 4 月，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瑞金的红五军会合。至该年 7 月，在赣南、闽西先后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等 7 个县级苏维埃政府。1930 年 3 月，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和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标志着赣西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形成。1930 年 6 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别在长汀和湘南成立。8 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还决定在赣南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

1931 年 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由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9 月，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使赣南、闽西连成一片，根据地扩展到 30 多个县境，在 24 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至此，毛泽东和朱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0 页。

德领导的由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组成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拥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1933年3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1933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除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外，各地先后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有：1927年，彭湃领导建立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领导建立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28年，冯白驹等领导建立的琼崖革命根据地，贺龙等领导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及彭德怀等领导建立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许继慎、徐向前等领导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3个军，10万人，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分布于湘、鄂、赣、闽、粤、桂、豫、皖、苏、浙、川、陕等十几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地区①。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二、红色之都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指挥全国各苏区斗争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1.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驻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必然是苏维埃式的。苏维埃是俄文的音译，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创立的政权机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在组织原则方面即明确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②，也就是实行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度；规定了各级党组织的机构和制度，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

①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志·苏区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编：《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织的精神和原则。1927 年 9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第一次公开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1927 年 10 月，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广东海陆丰农民举行了第三次起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党的指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11 月 13 日和 18 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建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尽管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只坚持了四个月，但它为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8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的决议案》，阐明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以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机构，认为“党应在预定的各武装起义区域中，预先普遍地明了地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设苏维埃的可能，……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①。

自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建立的政权，由于也是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形式，故也称苏维埃政权（或政府），其辖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到 1931 年下半年，各根据地陆续建立了自己辖区的苏维埃政权。

1930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以及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共 50 人。李立三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提出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以及苏维埃大会的政治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03 页。

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重要决议。这次大会为动员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大会主席团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全国各苏区。1930年9月15日，"中准会"（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简称——笔者注）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讨论并通过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并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笔者注）。会议决定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府的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地积极做好"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①。

2. 瑞金阅兵

由于各根据地选举代表需时较长，加上交通不便，各地代表一时难以到齐，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先后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战争，致使会议被迫四次延期，最终确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公历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被选定在江西瑞金召开，原因有三：

首先，瑞金地理位置优越。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是赣闽粤三省要冲，东出八十华里，即至长汀，顺汀江而下可至上杭、永定，直达广东潮汕出海；往南顺绵江水道直通赣州，即可与赣南各县沟通水路交通，运输便利。且瑞金地处边陲，离中心城市较远，周围数县未驻敌人重兵。当时国民党军已退守赣州至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一线；宁都县城及其以北地区，还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都还没有赤化，这两县的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强大；于都县城虽已被红军占领，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福建方面，长汀、连城两个县城已被红军占领，大部分乡村已经赤化；武平、

① 王乐平：《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和历史贡献》，《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

上杭两县城还被敌人占领，永定县城为粤敌所占，要收复需费较大力气。而瑞金已被红军占领，且政局稳定。与赣南各苏区县比较，瑞金适中，便于发挥中心辐射的优势①。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瑞金是建立红色区域红色政权的理想之地。同时，这里物产十分丰富，便于红军筹备战略物资。

其次，瑞金群众基础深厚。早在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经过瑞金时，曾帮助瑞金建立过党组织。1929年，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三次来到瑞金，使瑞金人民更多地受到革命的影响。1930年，瑞金先后成立中共瑞金县委、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24纵队。1931年春，全县苏区连成一片。同年8月，以谢唯俊为书记的中共赣东特委机关也从宁都县迁驻瑞金县城，领导赣东各县的革命斗争。全县已经赤化，全面分配了土地②，群众基础好，有利于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1931年8月，邓小平奉命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拘捕并严肃处理了乱捕滥杀的前县委书记李添富等人，释放大批在押的干部群众，恢复、整顿和新建了全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机构；加紧培养本地干部人才；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宣布坚决维护分田成果，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能过分打击富农，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高涨。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他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意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瑞金全县政局迅速稳定③。邓小平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瑞金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为"一苏大会"召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苏区中央局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临时中央同意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为了保证"一苏大会"的胜利召开，毛泽东提议在福建长汀设置一个"一苏大会"假会场，而将真会场放在瑞金叶坪村。时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的曾山和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带领瑞金人民在叶坪村东北的一片树林中，新开辟了一块能容纳万余人开会的广场，并用竹木石块筑起了一座

---

① 余伯流、凌步机：《毛泽东与瑞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② 同上书，第230—231页。
③ 同上书，第229页。

检阅台。整个广场和检阅台被周围高大的树木遮掩，便于及时疏散隐蔽。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琼崖等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共610人，代表所辖范围16万多平方公里的一千多万群众行使了当家做主的神圣权利。

11月7日黎明，在红军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中央苏区的红三军、红四军、红七军各派出一个建制营由各军首长率领。参加阅兵的红军6个方队排列在叶坪松冈子广场一侧。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和瑞金县的群众站在检阅台两侧，一睹英勇红军的风采。大会举行了授旗授勋章典礼，为创建苏维埃共和国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军部队和领导人授予奖旗和奖章。被授予奖旗的红军部队有鄂豫皖苏区红一军、湘鄂西苏区红二军，中央苏区红三军、红四军、红七军、红十二军和三军团，湘鄂边苏区红六军、赣东北苏区红十军、湘鄂赣边区红十六军等10支红军英雄部队。被授奖章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8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站在检阅台上，微笑着向受阅红军将士和赤卫队员挥手致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红军将士，精神抖擞地列成方队，由红旗引导，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红军万岁”，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阅兵仪式刚结束，十多架国民党飞机直飞瑞金县城，企图轰炸“一苏大会”会场。由于红军广场上军民已经全部疏散隐蔽，飞机并没有发现会场目标，只是向县城及近郊扔下一些炸弹，然后飞向福建长汀。

3.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1年11月7日下午3时，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谢氏祠堂正式举行。会议主席台正面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镰刀斧头红旗，主席台两侧挂着一副对联，左联为“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上方悬挂横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项英致开幕词。

11月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发7人组成大会常务主席团；将与会代表分为赣东赣南、永吉泰、闽西、瑞金、红军，以及湘鄂西、赣东北、琼崖、全总和海员等数个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分组

讨论。下午，项英宣读了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工人和劳动民众书》、《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①]。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了《政治问题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指出：在中央苏区，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已经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等等[②]。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写下了两句著名的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大会历时 14 天，听取了项英作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问题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发作的工农检察问题报告、任弼时作的苏维埃宪法问题报告。大会还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困难群众问题等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纲还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不允许帝国主义军队驻扎在苏维埃区域，无条件收回租借地。还宣布，中华苏维埃政

① 沈谦芳、史爱国：《瑞金：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党史文苑》2009 年第 9 期。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5 页。

权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苏联是它巩固的联盟①。

11月19日，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当时这63人中已经在瑞金的中央领导有21人，在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央委员有11人，除此之外的31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下各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红军代表。11月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在毛泽东、项英分别致闭幕词后，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向全体代表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全场掌声雷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闭幕。当天晚上，数万群众提灯演戏，燃放烟火，欢庆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建立，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兼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内，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办事机构。

"一苏大会"结束后，临时中央政府9部1局除教育部在洋溪村办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庙背村办公外，其余8个部全在"一苏大会"会堂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个小房间。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有几个工作人员。1932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又设临时最高法庭和国民经济部。尽管办公条件差，但是工作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

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历史意义

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重重包围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为中国革命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才能最终夺取城市，取得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776页。

革命胜利。

第二，有利于对全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实行统一的领导与指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全国各根据地党政军各机构的统一指挥，促进了全国各苏区的发展与壮大。

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与以往中国的所有社会制度相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工农大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第二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执政实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进行了安邦治国的伟大实践。

一、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和首要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中央苏区在建立和巩固政权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第一，确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①。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人民具有真正的权力。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所言：苏维埃政权需要使用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第二，苏维埃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苏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是最高的行政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① 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主要制度形式，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时实行会议制，凡属重大问题，均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其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集体讨论，通过会议表决方式作出决定或决议。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委员会负责指挥全国的政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作工作报告。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与人民委员会平行的机构，还有最高法院、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教育、粮食、国民经济、内务、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工农检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同时设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总务厅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确立的政体，是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代表大会制，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

第三，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各级苏维埃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既是议事机关又是工作机关，集立法权、监督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整个苏维埃国家体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均是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赋予权力，并向它报告工作，对它负责。在闭会期间，则向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苏维埃政权运用宪法、法律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宪法大纲以及民事、土地、劳动、刑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基本制度，规定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和各项事业的方针政策，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政策及其成果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在司法方面，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最高法院、地方裁判部、军事裁判所等机构，制定了相关的程序法令。

在权利保障方面，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规定：凡十六岁以上的苏维埃公民不分男女、种族、宗教的区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民族平等权、劳动权等各种权利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这是人民参政议政的基础和保证。为了保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页。

障人民群众的这一基本政治权利，又先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为了更好地使人民行使民主权利，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①]。中央苏区内，共有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②]。

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③]毛泽东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他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真理成功地与中国苏维埃民主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广大劳苦大众第一次真正成为政权的主人，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

二、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发展苏维埃经济是头等大事，也是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因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经济方面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在工业方面，必须“为保障完全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等）”；需要“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在商业方面，苏维埃政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必须严禁商人的投机”；“为着整个苏维埃

① 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② 陈松友、潘丽萍：《毛泽东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4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④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贸易与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改良劳动群众必需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在财政与税收方面，要“消灭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的捐税制度和其一切横征暴敛”，“取消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各种债务”；“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在市政方面，苏维埃要“减轻城市贫民的房租，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的房屋和财产”，等等[①]。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中央苏区掀起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生产建设运动。毛泽东号召“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②]。为此，他以极大的精力，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的农业建设、工业建设、商业贸易、粮食生产和财税征收等各项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第一，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成为苏维埃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用品的原料”[③]。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一是开展户户、村村的互助合作，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克服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二是大兴水利，开垦荒地，推广先进技术，建立了犁牛合作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条件，江西苏区原有的山塘、水圳、水坝等几乎都进行了一番整修，为农业丰收奠定了基础；三是组织广大群众开展劳动竞赛，进行检查评比，对优胜者奖励耕牛、农具、种子等。通过以上措施，苏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红军给养有了保证[④]。

第二，工业建设。苏维埃政府在积极领导根据地农业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生产。首先，兴办了一些生产军事物资的工业，如兵工厂、被服厂等。随着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为了生存，苏区开始大力发展民用工业和手工业生产。苏区的民用工厂有织袜厂、纺织厂、造纸厂、钨矿、化工厂、铁厂、造船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95—7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③ 同上书，第131页。

④ 同上。

厂、煤矿、盐井等。在“一苏大会”之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也有较大发展。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之后，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促进了苏区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商业贸易。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中央苏区的商业贸易分为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三大类[①]。国营商业主要是苏维埃政府统管下的各级对外贸易局和粮食调剂局经营的业务。1933 年 4 月，成立中央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又称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由钱之光任局长。该局的主要任务是出口苏区盛产的粮食、钨砂、生铁、竹木等，换回苏区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等。苏区除公营商业外，还重视发展合作社商业，促进苏区辖境内的商品流通，抵制投机商操纵市场，维护群众经济利益。对私营商业，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政策。“一苏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明确规定，“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②]。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收优惠措施，活跃和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粮食工作。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之时，中央人民委员会就委托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内务部共同负责粮食调剂工作。调剂工作的具体任务是：通过购、销、调、存业务，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同时，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以换回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供给军用，改善人民生活[③]。1934 年 1 月，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成立，陈潭秋任部长。省、县设立粮食部，区设立粮食科，乡设粮食委员，由此，整个苏区政府间的粮食组织体系基本形成。为了保障粮食供应，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对粮食进行有序管理，发行苏维埃政府粮食票证，实现苏区粮食调控。二是以乡为单位组建粮食合作社，不少城区还组建了城市粮食合作社。三是增加粮食产量。中央苏区的各级粮食部门支持发展粮食生产，增加苏区粮食生产总量。四是采取临时突击措施筹集粮食。从 1933 年起，中央苏区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依靠各级组织的力量，在全苏区开展了三次借谷运动。第一次借谷运动发生在 1933 年 2 月，兴国、瑞金、长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3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95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2 页。

汀等地的苏维埃政府和粮食调剂局发动群众展开了热烈的借谷竞赛运动。短短两个月完成借谷20万担任务，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第二次借谷运动是1934年6月，当时正处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关键时期，完成借谷24万担。第三次是1934年9月底，完成借谷任务58万担[①]。三次借谷运动，有力地支持了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第五，工商税收管理工作。为了增加税收，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制定了《农业税暂行税则》、《商业所得税征收细则》、《土地税征收细则》等各项税收规章制度。为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发展工商业，1932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同时，苏维埃政府还统一了税收政策；规定以前剥削农民的田赋、契税及一切田亩捐一概取消；对红军及其家属，苏维埃学校教员以及满二年以上的工人一律免征土地税。

第六，财政金融工作。为了确保苏区政权的正常运行，成立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邓子恢、林伯渠先后任部长。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建立统一税收、建立统一收支、建立预决算制度、建立国库制度、建立统一会计制度等措施，出色地完成了统一财政的工作。在革命战争中，中央苏区财政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中央苏区1932年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第一期发行60万元，第二期发行120万元。其他根据地也发行过这种公债；1933年7月，中央苏区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二是开展经济建设。中央苏区积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将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等商品大批销售到白区[②]，增加了中央苏区的财政收入。

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建立统一、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毛泽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的指示，把“接收金库”作为银行工作的突破口，将国家银行分设总行、分行与支行，国家金库同样分设总金库与支金库，统由国家银行分级接收、管理，而且逐步健全、完善了金

① 温时明：《中央苏区时期粮食工作概况》，《中国粮食经济》2003年第3期。

② 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库条例以及会计、预算、决算、统计等一系列制度，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效地杜绝了整个流程中的漏洞①，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苏区金融体系，使苏区经济日益好转。

三、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土地革命逐步成为农民运动的关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重要保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没收地主土豪劣绅、富农控制的土地。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基点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31 年 11 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成立了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管理机构，张鼎丞和高自立先后任部长。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寻邬深入调查中国城乡的社会结构和寻邬的土地革命的情况，提出并阐明了土地革命中若干重大的政策问题，较好地解决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抽肥补瘦"、非农民是否分田、地主的房屋、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作用等问题②。1931 年 2 月，毛泽东按中央决定又批示各级政府发出布告，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1933 年 6 月，中央苏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对划分阶级的标准作了明确统一的规定，使查田运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得到遏止和纠正。

土地革命的开展，使苏区的广大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极大地提高了苏区民众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

---

① 陈淀国：《毛泽民曾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名人传记》2009 年第 8 期。

② 何东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9—202 页。

四、中央苏区的军队建设

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人民军队的建设。

第一，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武装斗争的策略以及建设新型军队的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原则。一是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把革命军队真正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三湾改编第一次把建党与建军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这一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完善。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决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和制度。二是明确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古田会议决议》阐明了人民军队的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人民军队的任务和性质。三是实行新型的军民关系和军队内部的民主平等关系，强调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①。

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

第二，设立红军统帅部，指挥全国红军。1931 年，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全国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1930 年 8 月，红军第一、三军团组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共 3 万余人。1931 年 12 月，组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的力量。随后的两年中，红军迅速扩大，到 1933 年，中央苏区有 7 个军团，约 10 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红色政权，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第三，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相结合。除了正规红军外，地方武装是苏区革命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各县普遍组织了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地方武装还是

---

① 王继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9—143 页。

红军主力部队的重要来源，1933 年 5 月，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号召下，兴国模范师和瑞金模范师全体将士报名参加中央红军奔赴反“围剿”的前线，极大地增加了红军的战斗力。

第四，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从 1930 年 10 月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及南方其他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重点“围剿”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和苏区广大群众协同作战，取得了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在创建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广大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涌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故事。第四次反“围剿”时，苏区群众倾全力支援红军。1932 年 7 月至 9 月仅赣南的兴国、于都等 13 个县参加主力红军的就达 8690 人，参加地方红军的约 2 万人。

五、中央苏区的文化事业

苏维埃文化教育事业是伴随着硝烟炮火成长起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有力武器。1931 年 11 月，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组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徐特立任代理部长。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人力、物力、财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结合当时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

第一，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1931 年，苏维埃政府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1933 年 10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的《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决议案》明确规定：“苏维埃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为着实现对一切男女儿童免费的义务教育到十七岁止。”当年，苏区内各乡村都因陋就简办起了列宁小学，中央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 50%，比国统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出 40%。因此，美国记者斯诺高度赞扬苏区教育“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一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①]

第二，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苏维埃政府为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

① ［美］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59 页。

和红军的战斗力，因地制宜举办夜校、识字班组、扫盲俱乐部等各种形式的苏维埃成人班。据统计，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江西、福建、粤赣三省苏区有补习夜校6462所，扫盲俱乐部1656个。兴国全县共办夜校1900多所，35岁以下的不识字男女差不多都上了夜校。兴国全县夜校学员中，妇女占了69%；识字组组员中，妇女也占60%[①]。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及高（初）级列宁师范、短期师范、小学教员训练班等干部教育学校。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也迅速发展，如职业中学、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军医学校、卫生学校、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班、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等等[②]。

第三，文艺创作十分活跃。1932年，在瑞金成立的中央工农剧社是苏区最为活跃的剧团之一，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在苏区各地成立工农剧社的分社，红军各部队也相应地建立自己的剧团。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战斗接连不断，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搞好宣传鼓动工作，是激励民心士气、战胜强大敌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因此，他们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常常直接加入宣传工作者的行列，有的还亲自编写剧本并登台表演。

第四，新闻报刊事业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先后创办、出版的报纸杂志有130余种。其中，发行量和影响力较大的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斗争》等。《红色中华》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主要刊登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重要文告、决议、法令、宣言等，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该报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生动，除发表社论、新闻、专电、时评外，还辟有各种专栏，深受苏区广大军民喜爱，发行量很大。《青年实话》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它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活泼，经常向根据地军民宣传马列主义常识，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解释苏区革命斗争实际中的诸多问题。《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主要刊登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关于苏区军事斗争、红军建设的战略决策和指导文章。《斗争》为党刊，是中共苏区中央

---

① 余伯流、凌步机：《毛泽东与瑞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② 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页。

局的机关报，发表党的文献和重要文章300余篇。此外，《苏区工人》、《战斗》、《党的建设》、《布尔塞维克》等也是中央苏区重要的报刊。中央苏区新闻报刊和新闻工作者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对红色革命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声音和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更准确、更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给中央苏区军民以很大的鼓舞和教育①。

第五，体育事业呈现勃勃生机。随着中央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群众性的体育事业也生机勃勃。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体育运动盛会，也称“五卅”运动会。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为“五卅”运动会题词：“锻炼工农阶级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毛泽东的题词成了当时中央苏区体育工作的总方针。来自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军团，江西军区，江西省少先队，兴国等19个代表队180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田径等18个体育项目的比赛。苏区体育运动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它与一切旧式的体育有本质的区别，以自己鲜明的特点，写下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人民体育运动的新篇章，这些特点是：将当时的体育运动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军事斗争的体能和技能，运动的项目也尽量往军事体育或与之接近的民间体育方面相对接；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即选用一些当地的传统体育项目做补充，并就地取材，自己修建运动场地和自制一些简陋的体育器材开展运动；领导带头，官兵同练，军民互动，即党政军领导带头，与普通士兵和百姓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军队和地方群众互相支持和帮助，同场竞技②。苏区的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旧的文化教育制度，开创了工农政府办文化教育、人民享受文化教育权利的新时代。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实现局部执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的局部执政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局部执政实践是新中国全面执政的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党和国家培养和造就了大批革命人才，为

① 周建华：《中央苏区的主要新闻报刊》，《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4期。

② 唐国平：《中央苏区体育运动的特点》，《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革命人才，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人才的准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邓小平，以及张闻天、李富春、陈毅、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张鼎丞、邓子恢等，都来自中央苏区，他们大多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难得的开国执政人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数都是在反“围剿”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苏维埃共和国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经过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幸存者中，绝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第二，中央苏区的执政实践，培养并初步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坚决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加强组织建设，坚持同涣散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斗争；强调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这为在艰苦的农村和革命战争环境下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供了必要条件，并在理论上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廉政实践

在中央苏区激烈的战斗环境下，红色政权依然能够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壮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廉洁政府的理论，进行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实践。

一、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及其原因

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利益、让工农兵普通群众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革命政权。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新政权处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之中，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新政权中。

一些人凭借手中职权，用涂改账目、销毁单据、假造凭证等手法进行贪污。在江西瑞金县也发现多起贪污事件，如县苏维埃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和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等，合计大洋2000余元。该县区委组织部长钟志龙贪污富农捐款52元，军事部长范大

桂贪污174元，区副主席钟观林吞没犯人伙食费。中央财政部会计处长把打土豪得来的一块金表、一支自来水笔及布匹、鞋子占为己有。与贪污现象相伴随，浪费现象在当时苏维埃政府中也相当普遍。中央机关总务厅一次预算不实，就浪费棉布料一万余元，该厅厅长赵宝成对于行政费用和管理建筑，大手大脚，几个月内浪费近三四千元。

一些干部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滥用权力，损公肥私。门岭县洞头区一位军事部长，手上金戒指、金手表样样都有。于都县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动下，一些机关干部私拿公款，做谷米出口、食盐进口的投机买卖，大赚利润。于都城市区苏维埃3个主席9个部长，就有3个主席6个部长是做投机生意的。

一些干部高高在上，敷衍塞责。如万泰县苏维埃有的干部坐在办公室里，今天发一个命令，明天发一个训令，后天发一个通令，但始终不肯到下面去巡视、考察一下事情的真相。宁化县的县主席竟不知常驻工作人员有多少。中央互济总会财政部长谢开松，工作一贯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导致2000多元的开支下落不明①。

苏区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

在思想上，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苏维埃政府中少数意志薄弱的人员。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成为政府中的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当时苏维埃区域经济落后，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红军和各级政府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红军筹款和夺取敌人粮饷以及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物资来维持。有的地方账目混乱，干部随用随拿，这就为贪污浪费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制度上，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加之处于战争环境，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上，对制度建设没有重视。当时苏维埃政府虽然也制定了一些制度，但很不完善。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取消了红军筹款，中央苏区的红军经费和地方财政来源只有靠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因此，各级政府按规定向群众征收农业、商业、工业等税款。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直接与经济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而苏维埃财政制度却没有统一健全，很多地方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财政纪律松弛。这就为一些利欲熏心

① 高学军：《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4期。

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上述原因，贪污浪费、行贿受贿等问题在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时有发生①。

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在部分地区、部门的存在与滋长，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加剧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影响了革命事业的继续发展。

二、中央苏区的反腐斗争实践

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直接影响革命战争的发展，危害了红色政权的生存。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确保政府廉洁的重要措施：

第一，加强立法工作。1931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条文。大会还通过了设立工农检察部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察部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一部分，代表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利益，有权对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组织纲要》，对各级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和突击队的组织任务和工作方式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

针对各级苏维埃政权中的贪污、浪费严重的事实，1932 年 7 月 7 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12 月 15 日，发布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 26 号训令，规定：（一）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都必须严肃处理，贪污公款在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者，处以 2 年以上 5 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 2 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 100 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二）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

① 窦效民、王良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47 页。

全部或一部分，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三）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第一、二条处治之。（四）苏维埃机关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①]。上述条例和法规的制定与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并使苏区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934年1月22日的"二苏大会"，为掀起反腐倡廉斗争高潮做了思想动员。毛泽东向大会作的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案》，都一再强调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前者特别指出贪污浪费的危害，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而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后者着重阐明苏维埃政权机关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以及防止官僚主义的方法。

第二，严格财税制度。（一）统一税收。1931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暂行税则》和《暂行财政条例》，规定"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按照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税则征收"。这样，就把中央苏区的税收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二）建立预决算制度。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统一财政编制预决算制度》的第2号训令，规定"各级财政机关，一方面是一个国家财政上之总统，另一方面同样的要受各该级政府之行政负责人员的命令和指挥"。到1932年年初，在苏区全面实行了财政预决算制度，规定每月25日以前，造报下个月的预算，每月5日前，将上个月的决算表上报审核。（三）统一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颁发了《统一会计制度》的第12号训令，做出了统一会计制度的五项规定，统一印制了各种会计簿记单据等。（四）建立审计制度。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财政审查委员会，开始建立财务审计制度。1933年9月，设立中央审计委员会和地方审计委员会，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财务收支审计。（五）建立国库制度。1932年，颁发《国库暂行条例》，加强了国库管理。[②]

第三，健全民主制度。这是保证苏维埃政府廉洁的根本措施之一。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尤为重

---

① 韩延龙等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② 窦效民、王良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8页。

要。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以下几项措施：（一）健全市乡代表会议制度，保证工农兵监督政府的权力得以实现。通过代表会议，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二）广大群众参与政权管理，实施监督权利，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取决于民意。（三）划分适当行政区，使政令和民意畅通。由于残酷的对敌环境，大多数根据地建立在偏僻的边界地带，基层政权过大，同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不够。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将苏维埃地方政府分为省、县、区、乡四级，每级政府的管辖范围都比以前要小得多，从而使民众的意见能够畅通地反映到苏维埃政府来，并迅速得到解决①。

第四，实行各项监督制度。一是建立政府监督制度。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工农检察部，负责监督苏维埃法令、指示的执行和检举国家机关、企业中的贪污腐化及违法乱纪行为。各级苏维埃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工农检察机构。工农检察机关有向各该级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的工作人员之权，若发现犯罪行为，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案，有权报告法院，以便实施法律上的检察和惩办；若发现各机关内的官僚主义者和腐化分子，有必要时可以组织群众法庭，以审理犯法行为的案件，该项法庭有权力判决开除工作人员，登报宣布其官僚腐化的罪状等。在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之下设立控告局。控告局负责接受群众对苏维埃机关、国家经济机关及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并调查控告的事实②。二是实行群众监督。苏维埃中央政府专门颁发布告，号召群众监督各级政府的经济开支，动员群众起来同贪污腐败分子作斗争，并建立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组织，构成群众性的监察组织体系。突击队是工农群众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之下，监督、检察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种方式。凡是有选举权的人都可以参加突击队。轻骑队是在共青团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监察组织。此外，工农检察部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街道、村落均设立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由他们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违法失职消极怠工以及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进行

① 高学军：《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 年第 4 期。

② 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3 页。

监督，并以通信方式向其所属的工农检察机关举报[①]。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红色中华》在其发刊词中对其宗旨给予了明确的说明："第一，组织红色区域内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不但要引导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热烈地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法律、命令及一切决议，能运用自己的政权，达到镇压反革命的阶级，实现自己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二，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找出正确的方法，指示各级苏维埃有计划地有日程地进行工作，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②]《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分别辟有"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红板"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板"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则专门揭露那些贪污浪费案件，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

第五，领导干部带头进行廉政建设。1932 年 2 月 17 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第 3 号通令，要求"所有地方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在着节约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约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为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体现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各地苏维埃政府都对工作人员的数目和经费使用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很低，乡以下工作人员自带伙食，不要公家开支。县区以上政府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一般都低于红军部队。这些规定保证了区乡苏维埃政府机构的精干，也保证了公职办事人员保持廉洁奉公的品德，对预防贪污浪费、消极腐化的思想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严厉惩处腐败分子。首先，将重大贪污分子判处死刑。钟圣谅、钟铁青分别担任中共胜利县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

① 黄明哲：《中央苏区时期党赢得民心的基本经验及启示》，《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 6 期。

② 《红色中华》第 1 期，1931 年 12 月 11 日。

主席，两人都是参加革命早、经受过农民暴动和革命战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但是，随着地位的上升和权力的增大，他们的个人私欲也逐渐膨胀起来。1932年春，他们伙同他人将缴获的鸦片烟土私自倒卖，吞并赃款。钟铁青还贪污公款，生活作风败坏。他们的犯罪事实很快被举报并被查处。1933年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依法判处钟铁青死刑、钟圣谅监禁两年。这是苏区查处的第一起重要领导干部因贪污腐化被判处极刑、重刑的案件，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唐仁达是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因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余元，于1934年1月被枪决，充分显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严明，建立真正廉洁政府的决心，因此，深受老百姓的拥护①。其次，开除贪污腐化者职务，送交法庭惩处。如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刘道彬、袁雨山贪污腐化，工作不负责任，被开除职务，送交法庭惩办。这些案件的处理，表明了苏区政府执法如山，坚决打击贪污腐化行为，从而捍卫党和人民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经验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它既纯洁了干部队伍，巩固了红色政权；又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并积累了宝贵的党建和政权建设经验。

第一，为苏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保障作用。节约经费、制裁贪污浪费、打击经济犯罪，稳定了苏区财政。通过监督和审计，中央苏区政府的廉政建设有了显著提高；通过一系列法规的执行，中央苏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发扬了率先垂范、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中央苏区所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置于法律之下，有效地打击了腐败分子，巩固了根据地建设。

第二，改善了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逐渐培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干部工作作风有了巨大转变。在这方面，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的干部是典型，被誉为“乡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苏区干部处处起模范作用，坚持做到“十带头”，即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执行任务，带头慰劳捐献，带头节

① 何立波：《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检察风云》2008年第9期。

约粮食，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带头购买公债，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集股办合作社。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不脱产、不拿薪、自带伙食去办公，戴斗笠、穿草鞋、走乡串户的好风气。群众赞扬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区的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真诚地为群众谋利益，开启了人民政权的一代新风。

第三，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斗争始终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的各级组织对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是最有力的监督。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运动，通过严肃的法纪和果断的措施，有效地打击了腐败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及群众。党非常重视依靠民主监督的力量推动廉政建设，逐步制定了以民主监督制度为根本的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中央苏区的廉政实践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自身建设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了党和政府各方面的工作，并为以后我党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当然，这场斗争也存在不少缺陷，如有斗争扩大化，某些政策过激，有些案件量刑过重等现象，但这和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不无关系①。

第四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局部执政的当代价值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前夕，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 年 12 月，陕北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办事处。1937 年 9 月，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结束。

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实践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中国的雏形在此初次形成，江西瑞金也被人们誉为"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

---

① 窦效民、王良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8 页。

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同时他还指出：“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我们应当认真学习，温故知新，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示，获得力量。”尽管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逐渐离我们远去，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当代执政的现实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实践初步锻炼了党的执政能力，积累了治国理政，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建设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提供了现实借鉴。

第一，必须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多次要求和告诫各级党员干部要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民生问题始终是苏区中央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局部执政，关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局部执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正是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使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苏区时期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动人场面，在党和革命受到重创的时刻扩大了红军队伍，壮大了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国人民大众作为价值主体，以党自身作为实现与满足人民利益和需要的工具，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行为准则，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把党的价值追求和实现，完全融合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幸福事业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了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执掌政权。

中央苏区的执政实践告诉我们：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是执政为民的关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脱离实际，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做出不符合群众利益的决策。这就更加需要党员领导干部增强群众观念，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

作。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现在，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的方法简单、作风粗暴；有的盲目决策，给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有的与民争利，甚至直接损害和侵犯群众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还是政治立场上出了偏差，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工作思路，增强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中央苏区的执政实践告诉我们：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执政的根本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与苏区精神中“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如何，关键的一条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服务于人民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而不是一句口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存在着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难题。这要求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让广大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必须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制度建设，在重视民众、关心民众思想的指导下，所制定的一系列法规，都较好地体现了“工农兵政权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谋福利”的原则，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符合实际的民主参与实践形式，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理政、民主监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前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要着力完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的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三，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但是党仍然非常重视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当今世界，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应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明

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的生产力发展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今天，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就必须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原则。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屡遭外来侵略的悲惨经历中得出的刻骨铭心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现代化事业长足进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奋斗。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到1931年，奋斗了整整10年，才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辖境只是全国的局部地区，但是其社会制度，与以往中国的所有社会制度相比，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工农大众，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结果。

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发达的西欧，由于时代局限，马克思不可能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指出一条具体的革命道路。俄国革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广大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工作的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如果说，井冈山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那么在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开始结出硕果——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精神表现得非常活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对土地革命路线，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继承和发扬中央苏区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实践，不断赋予中央苏区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央苏区精神真正成为我们党不断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各种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我国现阶段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的、发展仍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转型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和谐的现象是正常的。但如果对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不加以控制，而任其发展，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今天，我们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看，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看，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各种矛盾和问题。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唯一道路；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说明，我们必须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广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途中，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弘扬苏区时期一切从实际

① 赖宏、罗伟军：《论中央苏区局部执政作风及其时代价值》，《党史文苑》2008 年第 7 期。

出发的求真务实精神，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好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借鉴

中央苏区在我党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廉政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廉洁的政府和一批最廉洁的官员，它为我党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我们应以史为鉴，继承党的优良的廉政建设传统，既要满怀信心地搞经济工作，又要坚定不移地抓党风廉政建设。

当年，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果，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严峻的革命形势在客观上需要苏维埃政府的廉洁高效。苏区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优势，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因而，苏维埃政府客观上就必须是一个廉洁、高效、替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信任、所支持的政府。只有这样，苏维埃政府才能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壮大。

其次，不断完善的监督机制是苏维埃政府廉洁高效的有力保证。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党政军一体化的监督体系。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体系还是红军都非常注重廉政建设。二是建立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等监察组织。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注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使苏维埃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监控。

再次，加强思想教育是苏区政府廉洁高效的重要保证。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法规，尽快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开办了多期培训班，培训县、区、乡苏维埃干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有针对地对他们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敲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警钟。对苏区党、政干部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灌输和思想

教育，大大提高了苏区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的作风也对苏维埃的廉政建设起了重要的表率作用，使广大干部重视廉政建设，并能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①。

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建设的一大热点问题，就是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江泽民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胡锦涛强调我们要"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切实改进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中央苏区的廉政举措给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要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中央苏区时期，群众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良作风和现象，可以随时向控告局告发。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依法惩处。从而保证了苏区干部精简、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干部腐化现象屡屡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进一步认识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毫不动摇地反对腐败。

第二，新时期强化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之路。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后，针对党内的腐化现象，提出必须"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无情的斗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廉政制度，确保了党员和干部的廉洁。这些廉政制度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最终形成、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巩固，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就要抓住反腐败这个重要环节不放松，建立健全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的法律和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制度建设以后，有效的监督是关键。我们应该在监督机制、监督力度、监督办法上不断完善。加强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增强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做到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同时，在廉政建设中，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① 黄永良：《试析苏维埃政府廉洁高效之因》，《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开展反腐倡廉。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永远是我们造成反腐败斗争强大声势和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第三，重视并严格要求党政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中央苏区干部清正廉洁，为民办事的好作风，既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结果，又为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干部基础。苏区广大干部开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革命战争胜利和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我们应该看到，腐败现象是与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本不相容的，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必须重视并严格要求党政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教育党政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秉公用权；广大干部要坚持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通过优良作风的养成，抵御腐败思想的侵蚀。

四、苏区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新型的苏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孕育了富有战斗力和理想精神的苏区文化。在中央苏区，留下了许多极富特色、极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文化资源，如红军纪念碑、长冈乡调查纪念馆、长征出发地、苏区革命博物馆，等等，还有许许多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央苏区奋斗的足迹，……这每一处遗址、每一件珍贵文物都是中央苏区人民和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史，都是一座座永恒的丰碑，成为教育后人的丰厚的红色资源。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9月在视察赣南革命老区时所指出的：“回顾我们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苏区红色资源是当前加强广大干部和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最丰富、最有力、最鲜活的教育资源。

瑞金市象湖镇党委高扬苏区精神主旋律，建设红色学习型党组织。其主要经验做法是：一是坚持把弘扬苏区精神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

重要内容。要求做到“五个必须”，即每月必须上一堂红色教育课；每年必须到革命旧居旧址前进行一次现场教学；每年必须开展一个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新干部上岗前必须接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培训；新党员必须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进行宣誓等。把苏区传统好作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等列为革命传统教育的主课程。做到系统学习和专题学习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持久开展革命传统的教育活动。二是充分激活学习载体。该镇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中，充分利用瑞金市180多处革命旧居旧址、33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设立28个党员干部的红色教育基地，并有效地借助这些“天然课堂”和“鲜活教材”，每年组织开展十多次的参观体验活动。三是搞活形式，拓宽渠道。用听红色报告、读红色经典、看红色戏剧、唱红色歌谣、讲红色故事、访革命旧址、办红色赛事等方式，让红色教育“活”起来，使苏区精神的学习教育做到了入耳、入脑、入心。其做法得到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

赣南师范学院着力挖掘红色教育资源，把革命故事和英烈事迹编入党课，使大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接受熏陶、受到感染。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大力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如举办大合唱、“红色之旅——大学生导游之星大赛”、组织“庆长征胜利70周年——赴瑞金史迹考察”活动、开设“红土地讲坛”等。将大学生社会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不断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努力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该院在红都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苏区工作模范县兴国等三个县市设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和弘扬苏区传统相结合，增强了社会实践的效果。该院每年暑期都组织十余支社会实践小分队奔赴老区基层，深入老区群众，帮助大学生了解老区的革命历史与传统、感受当年红军之路的巨大变迁，进一步增强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为了保护和利用好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资源，提高育人功效，党和政府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投入了数亿元，对红色革命旧址群进行了保护；在保护中加大了开发利用力度，让人们在旅游中接受教育。人们在探访苏区红色革命旧址的过程中就会身临其境，感受到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从而坚定理想、信念，继承革命传统，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

第五章

红色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道路走向何方，成为摆在每个革命者面前的迫切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共创建了13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井冈山革命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革命道路。

第一节　红色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列强扶植各自的在华代理人，在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城乡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很不平衡。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统一中国，国共两党实现了初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割据道路。但是，自1927年冬至1930年初，“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一直存在于地方党、红军和中共中央内。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就很难向前进步。为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加以阐述，最终形成了中国红色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

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大部分土地集中在皇帝、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

地。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同时，族权与政权紧密结合。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迟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18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了扩大海外市场，掠夺原料和劳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1.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导致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1842 年 8 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二年，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趁火打劫，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侵略特权。割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自由航行，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由此，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856 年至 1860 年，英法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1894 年，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1900 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次年，签订了《辛丑条约》，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总之，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由一个拥有完整领土和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变成一个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有了初步发展，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国由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变

为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的半封建社会。

2. 列强控制下的军阀割据

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但是，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粉碎了列强的瓜分迷梦。在这种形势下，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扶植各自的代理人，在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其中，力量比较大的有奉系、皖系、直系、滇系、桂系、粤系军阀。军阀政府名义上是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列强，成为他们在华的代理人。

为了争夺政权、地盘和税收，军阀之间的战乱不断，“在民国期间，举凡地方性和地区性，以至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十百次之多。许多次战争，军阀间是为了争夺对一个行政区或一个地区的控制，或为区域性经济流通网络而战”①。

3. 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并存

19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与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销售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购买市场。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及其对封建经济结构的破坏，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面粉业和丝织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纺织业由1915年的22个厂，增加到1922年的44个厂。面粉业由1916年的67个厂，增加到107个厂。丝织业增加了63个厂。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银行增加了108个②。在某些城市，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

①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2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发行，第210页。

主要形式。

就全国范围而言，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井冈山斗争时期曾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如此描述革命前边界地区的经济，“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因为它处边陲的原因，受资本经济的侵蚀颇迟，洋货业在市场不甚发达，有些地方的交易还是‘日中而市’的逢圩办法，如宁冈的茅坪，遂川之黄坳小井等是”①。

土地是农村的重要资源和生活资料，但是，土地的分配很不均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发现，该县的土地中，地主的土地占30%，农民的土地占30%，公田占40%之多。公田包括族产、庙产和学产等，多数掌握在地主和富农手中。② 在湘赣边界，65%以上的土地操纵在地主手中，大多数农民没有或有很少土地，正因为如此，农村中大多数的群众渴望土地革命。

4. 城乡之间：政权与族权力量的不平衡

在城市，封建政府建立起各级行政机关，驻扎了军队，建立起了较为有效的统治，势力非常强大。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帝国主义国家在通商口岸的势力急剧膨胀。在农村，普遍地聚族而居，农民处于封建剥削之下。例如，在湘赣边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③。通过建祠堂、修族谱、把持公田，族中的豪绅地主控制了族人，进而压榨贫苦农民，农民处于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为了完成前一任务，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进行了探索，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洋务运动，以康为有、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这些探索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为了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

---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发行，第535页。

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二、第一次大革命的道路与经验教训

1. 国共两党实现初次合作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即现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此次代表大会还提出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进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尊重共产国际的提议，但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共产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 年 1 月至 1923 年 2 月，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弱小，如果单凭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要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统一战线。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革命累次失败，其结果使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更加厉害”②。几经挫折后，孙中山希望能改组国民党，为国民党注入新鲜的血液。

国共两党都有共同的目标和合作的意愿，加上共产国际的居间推动，至 1923 年，两党的合作渐趋实现。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要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必须把中国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一个政党之下；工人阶级的力量尚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4、335 页。

② 同上书，第 217 页。

未强大起来，不能形成一个能适应革命需要的大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①]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现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2. 第一次大革命

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为了培养革命所需的军事和政治人才，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黄埔师生不仅成为北伐军的骨干，而且在之后的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征讨了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杨希闵和刘震寰，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为北伐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也把北伐作为第一要务。

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述及三年来国共合作所取得的成就，“自此以后吾两党革命之联盟已于三年来引导中国民众，努力奋斗，五卅运动之崛起，国民政府之成立，以及军阀之崩败，国民军之形成，皆使革命势力得极广大之发展；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恐惧战于吾人联合战线之下”[②]。

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147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

师北伐。北伐的对象有三个——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吴佩孚的势力在湖北、河南、湖南和直隶保定一带，拥兵号称30万。孙传芳的势力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拥兵20万。张作霖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拥兵35万，并掌控着北洋军阀政府。

参加北伐的军队共有8个军，6.5万人。其中，第1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军长为何应钦；第4军由忠于孙中山的粤军第1师整编而成，是一支经过战斗磨炼的部队，其中叶挺独立团作战尤其勇猛。1926年10月，湖北省置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奠定了基础。到1926年年底，国民革命军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四省的省城及省内的主要城市，基本上摧毁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在有些地区，贫农或其代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沉重的打击。

3. 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以国共合作为前提，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自两党合作之议起，直至国共合作的彻底分裂，两党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并越来越多。中国共产党方面，当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遭到多数共产党员的反对；1924年7月，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主张和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其准备与国民党决裂①。中国国民党方面，部分党员反对和共产党党内合作，认为“国民党的主义终和共产主义不同，两个不同主义的党绝不会合作到底。与其合而后分，不如还是在党外对于某一问题或某一个时期合作”②。

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警惕。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

① 转引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页。

②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从大革命的失败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军队、发动群众和坚持革命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在军队方面，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取得民权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同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动员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群众运动的失败。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刻决定领导民众进行武装暴动，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起义正是这一反思后的行动。

三、红色革命道路及其理论基础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季举行暴动；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土地革命由此兴起。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并于1927年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村，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揭开了井冈山革命道路——中国红色革命道路的序幕。

但是，革命根据地流动不定，苏维埃政权往往建立在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偏僻之地，没有任何外援；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相比，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非常落后。红军数量很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质供给非常困难。与此相反，对手——国民党的力量却异常强大，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控制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命脉；军队装备较好，物资供应充足。基于这样的力量对比，有些人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提出质疑。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就很难往前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加以回答。

1.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赤色政权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下列五个条件取决了其存在和发展：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二，大革命的影响决定了中国小块赤色政权的发生和能够比较长期地存在。第三，小地方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的红军的存在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及正确的政策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①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尤其是一部分力量弱小的红军在偏僻的乡村里到底能坚持多久，这个问题不仅在湘赣边界较为普遍，中共中央起初对此也并未抱很大希望。1928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井冈山前委的信中，指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有很多错误和缺点，认为“你们的军队一旦退走，革命的胜利亦多半随之而失败”，目前的工农红军“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②

针对中共中央对苏维埃政权所存的担忧，毛泽东、朱德在给中央的回信中，首先指出了苏维埃割据政权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然后指出，割据政权必须根据统治阶级的状况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才能使割据政权存在和发展。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有力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在湘赣边界红军和群众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对割据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511—513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0 页。

件和策略的分析与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远在城市的中共中央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斗争。

2. 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红四军前委的回信：集中兵力与固定区域的割据

1928 年年底，湘赣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最大的第三次“会剿”，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主力不得不撤出井冈山，向赣南游击。本来就对割据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抱着怀疑态度的中共中央，此时更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建立割据政权，而是保存红军实力。1929 年 2 月，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朱德和湘赣边特委，要求朱德、毛泽东“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并要求他们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①]

1929 年 4 月，红四军在瑞金收到了中央的二月来信。毛泽东、朱德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分析都“太悲观了”，反革命高潮过后革命力量能很快恢复。他们指出，中央提出的分兵要求在过去的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分兵使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分兵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并对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能分兵游击，领导者在恶劣环境中也不能离开部队。同时，强调在赣南的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朱德、毛泽东仍然坚持在农村建立割据政权，“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②]

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前委的信后，虽没有作正式的更正，但后来的指示完全没有二月来信中的悲观情绪，对红军行动的主张也与红四军前委一致。但是，二月来信给一部分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仍然存在。为了消除二月来信在红军中的负面影响，前委将回信与二月来信同时在党内发表，但是，革命处于低落时期这一客观形势及游离不定的险恶战争环境，使得一部分同志对红军的前途估计颇为消极，对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的割据道路持怀疑态度。红军中的这种情绪，集中体现在 1930 年元旦林彪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37 页。

② 同上书，第 673—675 页。

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中。为了消除这种情绪，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阐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理论。

3. 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彪的信中充满着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情绪，主要有以下四个观点：一是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二是在行动上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三是不主张在闽粤赣交界区域建立赤色政权；四是主张实行流动游击政策，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不如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

毛泽东在回信中指出，林彪对时局的悲观估量，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以下四点：第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组织等）也是弱的；第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第三，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亦然，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实质；第四，现时的客观情况容易迷惑只观察形式不观察实质的同志，特别是在红军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围困，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一时的特殊的小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都不可乐观，而革命胜利前途非常渺茫。

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中建立割据政权的重要性，认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应该建立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最后，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现时局面的适当形容词”。[①]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鼓舞了革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63页。

命者的信心。同时，总结了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节　红色革命道路的内涵与特征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力量特别强大；在军阀割据的政局下，广阔的中国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极不平衡的现象，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红色革命道路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

一、红色革命道路的内涵

1. 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大革命失败后，血淋淋的事实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之后的实践中，武装斗争一直是革命的主要形式之一。武装斗争之初，各地党部在指导或规划暴动时，存在以下三种错误观念：一是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因为不信任群众力量的缘故，所谓暴动完全与群众无关；二是不顾群众力量。主观上认为“不暴动即是机会主义”，无往而不暴动，甚至于一次罢工，打杀一两个工贼，都称之为暴动，于是又出现“无动不暴”的倾向。三是不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①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逐渐与群众结合在一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几乎完全成了军事的斗争，因此党与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怎样应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红军与地方各级党组织每日议事程序中的重要项目，打仗成了日常生活。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力量的壮大，国民政府军队加紧了对红军的“围剿”。红军和苏区群众的武装斗争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一次反“围剿”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页。

个战斗组织而成。因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

2.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没有他们的参加，国民革命是无法成功的。要取得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参与，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重要生活资料，大部分的田地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乡村的宗族势力较为强大，公田占有较大比重，但是，公田往往控制在乡绅手中，并以此树立起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佃农及半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从地主手中租种田地。针对这样的土地占有状况，1927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应“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①]。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但把解决土地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方面，甚至认为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了过激的无政府主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进行了土地分配。通常情况下，以乡为分配单位；山多田少的地方，如永新的小江区，也有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进行分配的，但极少。起初，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后来依据中共中央指示，改为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把土地分给农民后，视具体情况征收土地税。宁冈征收了20%，遂川、酃县、永新等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考虑到农民太苦，没有收税。[②]

为了使土地分配有章可循，1928 年 12 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具体地规定了土地没收、土地分配和征收土地税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土地法，是对 1927 年冬至 1928 年冬湘赣边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由于没有经验可循，这个土地法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第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第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不足，在以后制定的《兴国土地法》、《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有所变化。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531、532 页。

1929年初，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发，土地革命的浪潮随之席卷赣南闽西。至1929年7月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止，闽西各处普遍地进行了土地斗争，如烧地主田契、分土豪谷子、向土豪派款、抗租等。永定、龙岩占三分之一的地方进行了土地分配。[①] 江西苏区普遍地进行了分田。经过土地革命，赣县、公略、兴国等县农民分得了不等的土地。分得土地后，农民积极参与、支持土地革命，为革命贡献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推动各阶层积极抗日成为最迫切的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②]，逐渐向减租减息的方向转变。

3. 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

若没有一个革命的区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便失去了依托。毛泽东率领军队上井冈山后，很快就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有一团力量以上的红军，实在是需要一个根据地，来作收容伤病兵，修理枪械，有储辎重，短期休养地，办理各方面交通等事，若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许多实际问题实在不能解决”[③]。因此，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成为边界党的一个重要任务。

建立根据地，往往选择地形险峻、物资较为充足、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为了巩固根据地，一方面，依靠群众去巩固根据地。要求边界党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④] 另一方面，建立根据地后，要依靠群众进行割据。红军的割据与群众的割据不同，红军的割据单独用军事力量去占领一个地盘，在红军割据下的群众震于红军的声威，成了红军的老百姓，这样的割据非常不可靠。群众的割据出于群众自身的要求；群众武装起来驱逐敌人，这样的割据，才能建立起永久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共建立起13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4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9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7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

地成为革命发展的重要依托。起初，中共中央认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把革命势力局限在某一区域的“保守割据”，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越来越认识到建立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要坚持奋斗下去，如果革命队伍要准备蓄积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与强大敌人在力量不够时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除陕北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都失去了。但是，基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依托。

二、红色革命道路的特征

中国红色革命道路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三个特点。

1. 长期性

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民众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能达到的。革命初起时，由于民众对革命的了解不足甚至于无，以及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行了不少反面的宣传，因此，民众对革命非常冷漠，国民党方面的军队对红军作战也表现得非常顽强。1928 年 11 月，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每到一地，冷冷清清的，经过宣传之后，群众才慢慢地出来。和敌人打仗，不论哪一军都是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起初，某些地方党执行了错误的烧杀政策，小资产阶级也“挂起白带子”反对红军和共产党。经过宣传和改变政策，这种局面才逐渐改变。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农民卷入到土地革命的洪流中。

土地革命兴起后，一方面，有人质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尤其是对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这么一条农村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能否取得胜利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在对国民党刻骨仇恨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5 页。

召开的八七会议，不可避免地带有“左”倾、复仇的情绪。因此，急于暴动，求胜心切，反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

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对国民党、红军的力量作了理性的分析。一方面，是国民党力量的强大，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它得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承认和援助；它拥有现代化的军队，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非常充足。另一方面，是红军力量的弱小。中国红军成立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在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偏僻之地，没有任何的外援。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区域非常小，即使是最盛时也并不很大。根据地相对而言是流动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数量很少，红军的武器很差，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非常困难。在这样的力量对比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不言而喻。因为国民党力量的异常强大，革命力量无法在短期间内聚积，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毛泽东指出，“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①

革命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革命没有胜利的可能。毛泽东指出，尽管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是，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毅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国民党方面则恰恰相反。②

2. 曲折性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中，由于政策和指挥失误、客观上存在的物质困难和党内的路线错误，革命屡有失误，甚至出现了较大的挫折。

（1）政策和指挥失误与边界八月失败

毛泽东率领军队上井冈山后，建立起湘赣边界苏区。1927 年冬至 1928 年 2 月，边界地区发展较好。自 1928 年 3 月起，湘南特委、湖南省委的一些错误政策，导致边界开始失利。1928 年 3 月，湘南特委代表周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21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191 页。

鲁到边界，指责边区烧杀过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政策一变。1928 年 4 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不是很多，但没收城市中等商人的财产及对乡村小地主、富农进行派款勒款非常普遍。

1928 年 6、7 月间，湖南省委三次致信井冈山前委，政策数变，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对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他说，“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①。

（2）物质缺乏和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原因之一在于这里拥有较富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这种富裕只是相对而言，限于满足当地民众所需。当大部队的外来红军到达井冈山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造成乡村全部地破产，日益激烈地崩溃”；物质飞涨，“等于上海的物价”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红军的人数超越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承担容量；二是革命之初执行了一些破坏经济的政策；三是白色政权对井冈山实行经济封锁。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红军的物质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28 年 11 月，井冈山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述及红军中的严重经济困难：“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处。……现在全军五千人（正式红军）以上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决。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③

1928 年 11 月，彭德怀的红五军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合，红军声势更加浩大，给养更形紧张。割据区域的物质更加缺乏，且一时无法解决。1929 年年初，红军主力不得不相继撤出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游击。不久，国民党建立起了对该区域的有效统治。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在曲折中继续前进，数月后，红军在赣南闽西立稳了脚跟，并以赣南闽西为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 页。

② 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第 525、526 页。

心，建立起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3）“左”倾错误和中央苏区的丧失

党内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第一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27年8月至1928年初。第二次“左”倾错误发生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两次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危害。而1931年至1935年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所带来的危害更加严重。

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最大挫折，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长征初期，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除陕北根据地外，党在其他地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如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等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

尽管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并不意味着最后的失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抗日战争的到来，并在抗战中逐渐壮大。

3. 不平衡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种种矛盾，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首先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

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全国的革命高潮和全国的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1924年至1927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

达妥协议，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第三节　红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革命道路。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井冈山革命道路继续实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解放区内进行土地改革，并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一、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 年 9 月，毛泽东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 年 4 月以后，区乡苏维埃普遍地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区域不限于边界数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斗争中，红军的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目标是“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一枝独秀，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时，全国其他地区也建立起了农村根据地，红军的声势逐渐壮大。

二、全国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当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之初，中共中央认为建立根据地等于是把革命限制在固定的地区，不让革命运动向外发展，是典型的割据观念。1930 年 10 月之后，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 页。

1. 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主要基于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远离统治中心等因素。但是，该区域的经济只是相对富足，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石，军粮全靠附近城乡输入。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日益引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重视，加紧了对该区域的军事进攻。1929 年 1 月，红军主力相继撤出并向赣南闽西一带游击。他们发现，赣南闽西的群众基础相当好，发展前景非常可观。经过红军的努力，至 1930 年 10 月，赣南、闽西已基本上连成一片。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首次对赣南、闽西根据地提出了"中央根据地"、"中央苏区"这样的区域概念。1931 年秋冬间，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真正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正式形成。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地区的农村武装割据也蓬勃发展起来，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共建立起 13 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和革命向前发展的重要依托。

2. 全国红军的发展

全国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发展相辅相成，红军的发展是农村根据地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根据地的发展则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依托。红军的发展既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

中国工农红军由零星的工农游击队伍发展而来，1927 年至 1934 年，工农红军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1928 年 4 月，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军第 4 军，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全军万余人，枪二千余支。至 1928 年 7 月，红军武装增加了一倍以上。到 1934 年，总计全国红军（包括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已发展近 30 万人。

红军的主要构成："在质量方面，红军在这一时期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就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骨干加强了。在中央苏区许多基本的红军队伍当中，党员占全体成分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八；无产阶级的成分，即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平均占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至于工人模范师中，差不多完全是工人、雇农、手工工人、店员等无产阶级的成分。"① 这些数据或许不完全准确，但是，能大致反映红军中的主要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75 页。

成分。至1933年年底，红军粉碎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四次“围剿”，胜利的因素固然很多，红军战斗力强无疑是其中之一。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局部执政

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未能在地域上把所有苏维埃区域统一起来；但是，中央苏区内实行统一的行政制度、经济政策，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统一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这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实质上各自为政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出现了两个性质不同的对峙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大法，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

在行政方面，颁布和实行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命令、地方苏维埃组织系统条例和工作条例、各级苏维选举和改选章程与细则，等等。

在经济政策方面，颁布了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允许在苏区投资工商业的条例、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例、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禁止不断平分土地的指令，等等。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实行预算和决算制度，并且每隔一个月或三个月公开向群众公布收入和支出的账目。

在发展教育方面，尽管苏区经济困难，人才缺乏，但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例如，在中央苏区宁都一县，就组织了350个初级列宁小学校，85个平民夜校，许许多多的识字班，13个俱乐部，在列宁小学校读书的就有7560人以上。在列宁小学，对贫农、中农的子女实行免费教育，只有富农的子弟才缴学膳费。

在解放妇女方面，颁布并实行了婚姻条例，不但主张男女平等，而且主张在每个苏维埃机关或委员会的领导中，至少要有1/5或2/5是劳动妇女。同时，在每个苏维埃政府里设有改善妇女生活委员会。

在群众组织方面，苏区成立了赤色工会、贫农团、救济会、反帝同盟等组织。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就此结束。三年的局部执政，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的行政管理人才，为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崛起与壮大准备了条件，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号召，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①

1935年12月，红一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内战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进行的游击战争

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游击战争的原则，并提出了游击队建立根据地的任务。1937年，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山西后，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指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要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深入敌人的侧翼，创建根据地和发动群众。② 毛泽东还指示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日军占领华北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华北"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③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③ 同上书，第354页。

1938年初起，八路军大力向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沦陷区发展。中共中央指示，冀晋豫全区党与八路军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及地方游击队”。[①]

南京及其邻近地区沦陷后，1938年5月，毛泽东指示项英率领新四军在南方的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即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城市之间的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②]

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抗战结束，大部分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此，党内外许多人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尤其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阐述了游击战争发生的客观实际环境及其担负的重任。指出，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游击战争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在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游击战争也将逐步向运动战发展。[③]

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整个游击战争，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在敌人后方起削弱敌人、钳制敌人、破坏敌人运输的作用，并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同时，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在内线战场上配合正规军的战斗。[④]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是主要的，敌后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并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② 同上书，第5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④ 同上书，第417页。

171.4 万余人，其中日军 52.7 万余人，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这样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的抗战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战争；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占领中国的大片国土，但是却只能占领重要的城市和交通线，无法占领广大的农村，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到敌占区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看到：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的支持，不可能持久。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至 1940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 16 块根据地，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 1 亿人口。194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了 120 万人、民兵 220 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 19 块。在此基础上，敌后军民开始了大反攻。

3. 减租减息政策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自瓦窑堡会议开始，苏维埃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1936 年 7 月，为了使土地政策更能符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进一步改变了土地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后仍分给他们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1937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凡是比较普遍、认真、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为了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民抗日，一方面，规定地主应该普遍地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①]

4. 大生产运动

1940年和1941年，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根据地的经济极度困难。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前方，拿起枪战斗；在后方，拿起锄种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朱德亲自率领部队到南泥湾进行垦荒，晚上住在茅棚里，把荒无人烟、鸟兽纵横的南泥湾开垦成了“陕北江南”。359旅是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在旅长兼政委王震与副旅长苏进的领导之下，上自首长下至勤务员、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积极参加劳动。他们胼手胝足辛勤劳作，建筑了1000多个平整光洁、舒适宽敞的窑洞，开垦了11000亩的荒地，种植了粮食、蔬菜和棉麻。1942年，该旅收获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瓜5万个，养猪1819只，鸡743只，鸭107只；秋收之后，还准备了冬季用的木炭和柴。经过大生产运动，部队生活一天天地好转。在伙食方面，每人每月吃2斤肉，每天每人5钱油、5钱盐、1.5斤菜，会餐时还常吃鸡、鸭和大米。战士们穿着自己劳动果实换来的新棉衣，盖着新棉被、羊毛毯子，棉鞋、手套齐全。战士们不仅有舒适的物质生活的保证，而且开展了丰富的体育活动和文化生活。[②] 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共中央令各根据地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

1944年，太岳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共开荒58000余亩，产粮25400石，产菜400万斤，部队生活大有改善。1944年，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45年，整个解放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③]

经过大生产运动，实现了军队生产自给，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因而能够扩大军队。此外，还带来一系列的好处：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增强了部队的纪律性、改善了军民关系、改善了军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283页。

② 《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解放日报》社论，1942年12月12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1024页。

队和政府的关系、促进了全民的大生产运动。[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四军、八路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伪军和日军；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不但使军队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了战斗，而且扩大了军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8 月 9 日，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

五、解放区的大发展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能迎来安定、和平的建设环境。但是，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思考。执政的国民党希望能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遏制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则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重庆谈判的成果并没有阻止全面内战的烽火在解放区点燃。

1. 解放区的大发展

自 1944 年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在沦陷区建立的敌后根据地称为解放区。其时，解放区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1944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把扩大解放区作为 1945 年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②]。几天后，又致电程子华，令他率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③]

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的努力，至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召开时，共建立起 19 块解放区，人口已发展到 9550 万人，军队 91 万人，民兵 220 多万人。从地域范围来说，解放区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07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7 页。

③ 同上书，第 430 页。

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之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继续向南推进，在湘、粤、赣等省建立起游击区。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解放区的人口发展到1亿人，军队120万人，民兵220万人。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能承认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但是，重庆谈判中未能解决该问题。中共中央深知，解放区和军队是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后盾，因此，强调“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②。

在巩固老解放区的同时，中共努力扩大新解放区。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例，从1945年8月至12月，面积扩大了一倍，人口也增加了一倍。1949年，当解放战争在北方发展时，为向南方推进，中共开始在南方建立游击区，并提出“一九四九年应是南方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广大发展的一年”③。

1949年年初，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对解放区的印象非常好，“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支援前线。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超度自我牺牲之英勇，为民前锋，不辞劳瘁”。④

2.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区解决土地问题的目的，不仅限于改变土地占有状况，而在于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动员民众。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内战的进展，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经历了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的变化。

1945年12月，国共两党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此，中共中央将减租减息列为1946年解放区十大工作方针之一。通过在新、老解放区进行减租减息，以达到团结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动员民众、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设后方的作用。

1946 年 5 月，国民党方面积极布置全国内战，国共全面内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在武器装备、兵力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民心的向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中央认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7 年，全面内战已爆发，就实力而言，中国共产党无疑处于劣势，要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被认为是争取解放战争胜利最基本、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在 1947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平分土地的要求，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①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 1948 年秋，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后，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军。各地农民送粮、送被服，而且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组织，支援战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土地改革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3. 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1946 年 6 月 30 日，国民政府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标志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当时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 430 万人，占有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7 页。

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装备精良，有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中国共产党方面，总兵力为127万人，没有海军和空军。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之初的劣势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一方面，对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小米加步枪将会强过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另一方面，他清醒地预见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必须改变以根据地为依托的游击战术，以运动战作为战胜蒋介石的主要作战方法，“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①。

内战爆发后第一年，即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国民党军队则处于战略进攻地位。1946年，国民党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分，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分，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分，气势汹汹。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全面进攻计划。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第一年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歼灭国民政府正规军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34万人②。

1947年6月底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豫西，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解放军在第二年作战中消灭敌人兵力共达152万余人，解放土地15.5万平方公里，人口3700万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政府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至此，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政府军队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7页。

② 同上书，第1229页。

力在长江以北已经被消灭，为人民解放军渡进江南解放全中国提供了便利。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被推翻。

4. 规划新中国的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开始规划新中国的蓝图。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阐述了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和权力构成：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邀请张东荪、符定一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接着，中共发出了“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人士相继进入解放区，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毛泽东在1949元旦致辞中明确提出，将在1949年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代表共634人。9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机关、军事制度和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民族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高岗为副主席。建国大业至此宣告完成，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第四节 红色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开辟了一条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红色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的开篇。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产业工人的力量非常弱小；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政权，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在斗争实践中，培育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并成为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源泉。时至今日，红色革命道路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武器。

一、红色革命道路的历史地位

1. 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一步步加剧。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阶级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的精英人物掀起了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是，甲午战败标志着这场运动的破产。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借助开明皇帝之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先进技术，改变中国"瓜分豆剖"的局势。然而，戊戌政变为这场短暂的维新运动拉上了帷幕。由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的民主、共和之理想却并未能实现。回顾这段历程，毛泽东感慨万千："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①

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国人继续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众多的思潮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学习苏俄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富强。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方志敏、李文林、贺龙等革命者也在各地的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

1965年，当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回顾了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历史，充分肯定了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作用："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同一时期，方志敏在赣东北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他领导的苏区，由于路线、方针对头，广大群众拥护他，赣东北苏区很快扩大成闽浙赣皖苏区，红军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方志敏同志是一位很有理想、很有气魄的革命家。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①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民有了民族解放的新武器，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起初，大部分年轻的共产党人认为，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中国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苏联取得了胜利。因此，可以模仿苏联，通过攻下某个城市，掌握政权，然后再向农村辐射，实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因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决定用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时，三大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大城市为中心或以进攻大城市为目标。但是，起义都失败了。失败后，起义的部队都无一例外地向农村甚至是山区转移，革命的火种才得以保存。

最早意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向农村发展的无疑是毛泽东。"八七"会议结束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有意调毛泽东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说出了自己今后的打算：我不愿意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以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改组省

①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委，领导秋收起义。[①] 如果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已经明确地知道他将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显然并不符合事实。只能说，在湖南做过农村调查的毛泽东较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但仍然是以进攻长沙为目标。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

客观地说，当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出一幅在农村建立割据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蓝图。但是，在这条革命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打消“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鼓舞和坚定革命者的信心，自1928 年至 1930 年，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红色革命道路理论。

2007 年 10 月，胡锦涛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它们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3. 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欧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力量。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在这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和领导者，农民则是同盟者。无产阶级既可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代议制掌握政权。革命者可以通过控制城市，进而掌握乡村。

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不但有强大

---

① 吴晓梅：《倾听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1 页。

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革命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因此，革命的主要形式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业虽然有了发展，但是规模不大，数量也不多，因此，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有限，“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①]。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过于弱小，只有同贫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不可能走欧洲革命同样的道路。有农村生活经历，并在湖南农村作了社会调查的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1926年9月，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②]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③]

中国的人口构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由于新党员大多来自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观念较为薄弱。如何把农民占多数的党改造成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要进行武装斗争，军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红军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所构成；再加上忙于行军打仗，未能对红军中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红军内存在种种的错误思想。如何肃清这些错误思想，把红军改造成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支革命军队，进而夺取政权，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又一重要课题。

与欧洲国家不一样，尽管中国有一些繁华的大城市，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

---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2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③ 同上书，第16页。

市"[①]，城市无法完全统治乡村。经济上，绝大部分乡村仍保留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结构上，宗族势力仍在很多乡村占据着统治地位；思想文化上，革命前夕的农民基本上没有革命意识，没有阶级斗争的概念，宗族意识与认同统治着农民的头脑。如何在乡村中建立政权，壮大革命势力，进而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借鉴。毛泽东率领部队，在井冈山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逐一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

4. 培育了具有原创意义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2001 年 6 月，江泽民考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进行了概括："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井冈山斗争时期，条件异常艰苦。"当时我们在井冈山生活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住的是破草房，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的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强调："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②]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军队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条国外、国内都没有过的革命道路，如果没有敢闯新路的首创精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从后人的眼光来看，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的开端；但是，在当时来说，即便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上山"的举措亦不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把红军的力量限制在某一区域的"保守割据"。在农村根据地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要根据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来展开革命工作，应在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1 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7—229 页。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办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进行了驳斥。针对前者，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①。针对后者，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整风中，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真理，强调要有的放矢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回忆起井冈山革命这段历史，毛泽东感叹：“没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没有井冈山做后方休整地，战斗的胜利就没有保障。”② 只有处理好军队与群众的关系，群众才能成为革命的依靠，为此，毛泽东提出并逐步完善了红军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井冈山精神与之后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在基本内涵上是一致的。井冈山精神具有原创性，后来的革命精神都是对它的继承、发展、丰富和弘扬。没有井冈山精神，就没有后来的种种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奠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本源。直至今天，井冈山精神仍在发扬光大，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③

二、红色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红色革命道路的经验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重要源泉

井冈山革命道路——中国红色革命道路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割裂的教条主义虽然一度占据主要地位，并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革命是沿着这条道路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8页。
③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进的。1941 年，毛泽东总结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 1942 年开展的整风运动，进一步强调必须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必须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期间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一实际情况，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③] 在社会发展动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当时动荡的世界环境和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泛滥所带来的影响，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针对中国客观上存在的经济文化的不平衡状况，提出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人先富，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针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所有这些，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这些伟大构想，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所有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到 20 世纪末，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 页。

③ 同上书，第 63 页。

④ 同上书，第 65 页。

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征：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二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加速调整，但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加快发展，但是，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四是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但是，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大量依靠进口，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五是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任务繁重。六是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七是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八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九是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网络信息的影响日益广泛，同时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十是社会总体安定团结，同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各类犯罪活动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依然严重存在，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①] 总之，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社会矛盾和

① 赵学清编：《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凸显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

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发展趋势，胡锦涛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红色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开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光辉历程中，我们党继续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道路，发展和坚持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2. 红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代表和依靠广大群众的观点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开始重视和群众的关系，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依靠群众的力量。中央苏区时期，这一传统继续发扬。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必须为群众谋利益和依靠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强调革命必须为群众谋利益：“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① 1944年，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号召，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

解放战争时期，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方法，是从群众中来；政策决定后，要拿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拿到群众中去执行。对的，就有群众拥护；错的，就没有群众拥护。群众反对的、不拥护的，就有问题。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②] 代表和依靠群众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③]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④]

胡锦涛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6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综上所述，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在苏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这一观点继续发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

3. 红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党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理论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走不同于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红色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个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指导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和功绩，同时坚决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理论。他结合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建立经济特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思想，都是理论上的卓越创造，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发展趋势，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商。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4. 红色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的基础上再解决实际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有些同志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周密的研究，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去学理论，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1941年，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批评了这两种态度。并指出，要有的放矢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提倡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校风和学风。

解放战争时期，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得到提倡。以土地问题为例，在1947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特别强调土地改革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而

不是一切以领导的指示为准绳。[①] 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作风有利于土改在各解放区的顺利进行。

“文化大革命”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践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制约着新局面的打开。为了打破这种僵局，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关注，人们开始进一步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78 年 9 月，邓小平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②]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同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987 年 8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③] 这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科学结晶。在邓小平之后的历任国家领导人，都继续高举这一旗帜。江泽民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④]；胡锦涛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精简会议和文件，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弄虚作假”。

中国共产党在红色革命道路时期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作风，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而且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6—12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9 页。

第六章

红色革命文化

第一节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生成

一、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生长史

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许多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据统计，1955 年至 1965 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 325 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 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 25 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①] 无名烈士更是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当家做主，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江西这块红色土地上孕育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等，在这片红土地上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开端。江西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的革命实践分不开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

1.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早在 19 世纪末，安源就引进西方资金和先进技术采煤炼焦，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最早崛起的地区之一。进入

① 吴刚：《2005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昨在南昌隆重开幕》，《江南都市报》2005 年 10 月 31 日。

20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安源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安源大罢工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江西第一次工人运动，既争取到了路矿全体工人的眼前利益，又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罢工历时5天，“秩序良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①]。因此，安源大罢工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②]

2. 南昌八一起义

南昌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3. 秋收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部胜利会师，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

为了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在1928年10月至11月，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科学地阐明了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有力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标志着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具体解决了如何在农村中坚持和发展革命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凝聚了共产党人和井冈山军民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也反映了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② 虞国庆：《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读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4.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929 年，毛泽东、朱德等人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之后，逐步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5.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934 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 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共 8. 6 万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长征。21 日，红一方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突围。以红 1 军团为左路前卫，红 9 军团随 1 军团左侧跟进；红 3 军团为右路前卫，红 8 军团随 3 军团跟进；军委第 1、第 2 纵队居中，红 5 军团殿后，继续西进。25 日，渡过信丰河，通过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6. 方志敏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 年 1 月，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江西弋阳、横峰的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0 年 6 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1930 年年底，成立红军第 10 军。1931 年，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到 1932 年年底，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包括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西弋阳、横峰等 26 个县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方志敏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①

1934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 10 军与以红 7 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合编为红 10 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继续担任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1935 年 1 月，先遣队与优势敌人作战失利，方志敏受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继续转战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8—99 页。

浙赣坚持游击战争。

7.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长征后，中央红军主力在项英和陈毅等领导下，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第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斗争。

1934年秋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以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的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红军和游击队在阵地防御作战中损失很大，苏区内的全部县城和大部分乡村被占领。1935年2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的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所属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在突围中部队大部损失，余部分别到达闽西、闽赣、赣粤边和湘南地区。项英和陈毅几经周折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5月，原中央苏区全部失陷。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种有利地形，与国民党军和地方保安团队的持续清剿进行斗争。1937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其他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下辖4个支队，共计一万余人。

8. 上饶集中营革命者的斗争

闻名于世的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1941年1月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同年3月在江西上饶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的人间地狱。这里监狱四周架设起铁丝网，监狱门外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日夜站岗，主要囚禁皖南事变中谈判被扣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弹尽粮绝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还有部分从东南各省地方抓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共700余人。这些爱国志士在狱中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凶残的国民党特务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成功地举行了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谱写了一曲曲气贯长虹的无产阶级正气歌。

二、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态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是人们的一种高级精神生活，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广义的文化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物态文

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二是制度文化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等；三是精神文化层，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它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系列的革命文献、文物、文艺作品、革命歌曲和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革命根据地、革命领袖人物故居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文化氛围。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其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物化形态的红色资源和精神形态的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经过特定历史和生活锤炼，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印记，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象征。红色文化的灵魂就是“红色精神”，在江西，这种红色精神主要体现为“井冈山精神”等。①

1. 红色物态文化

（1）农业物态文化

根据地革命战争所需物资的来源和根据地军民吃、穿、用等生活物资的来源，主要来源于根据地。根据地就保留了许多当年红军和人民群众使用过的农业生产设施和工具。

（2）工业物态文化

为了解决军民生活必需品及军事用品，根据地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当时根据地的民用工业有榨油、制陶、印染等，军事工业有兵工厂、被服厂、缝纫厂、印刷厂等。从这些物态存在的工业设施和产品，可以看出当年根据地工业生产状况。

（3）经贸物态文化

为了克服根据地财政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积极发展商业贸易，保障物质供给，活跃根据地经济。1928年根据地先后创办了银行，发行了货币，同时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下开展商品流通，贸易组织形式主要有经济公社、合作社和个体商店等，安定了军民生活，活跃了经济。

（4）革命遗址、旧址、纪念设施

江西各地的革命遗址、旧址、纪念设施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仅

① 李水弟主编：《红色文化与传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瑞金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居旧址就有18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在江西赣南，有“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宁都起义旧址等历史事件发生地，有石城阻击战遗址等战场遗址，有瑞金中央造币厂旧址等生产地，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纪念场馆，有毛泽东旧居等名人故居，有上犹营前烈士陵园等陵寝陵园。这些广泛分布在江西各地的革命遗址、旧址、纪念设施，记录着苏区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是江西红色历史的珍贵物证，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的物质载体。

2. 红色制度文化

红色制度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例如，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它对工农民主政权的政治制度、基本任务和施政方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民族政策以及外交方针都作了纲领性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宪法性的文件，尽管其内容尚不完备，体例亦不健全，但它总结了革命政权建设经验，赋予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成为中国人民以后制定宪法的基础与范本，大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法制化与民主化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3. 红色精神文化

红色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江西是一块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光荣的土地培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英雄儿女，他们的血染红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也承载着他们不朽的功勋和伟大的精神。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是在当时的特定革命环境里，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思想。在江西这块红色土地上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就是这种红色精神文化的象征，它们集中表现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对崇高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身上，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中关于文化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集中体现。综观共产党人文化观，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新民主

主义文化观是指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及文化建设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一基本性质出发，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中，无产阶级所要革除的对象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①。毛泽东说：“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②

1. 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产生的条件

（1）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接踵而来，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加紧了侵略，而且为了更好地把握和控制中国，他们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输入奴化文化，企图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控制中国人民，致使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积极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使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蓬勃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化领域中，从而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第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的文明历史，作为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2.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其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版，第 665 页。

② 同上书，第 706 页。

丰富的内涵：

（1）为发展和创新先进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进而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系，从而为打破文化的封闭性，发展和创新先进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基础对观念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一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决定了文化的性质，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决定了其性质；二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约着一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其次，科学地指出了文化对社会经济、政治巨大的反作用。毛泽东在肯定经济、政治对文化有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他还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

（2）科学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一，无产阶级领导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是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第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内容和形式。这种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中华民族的，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结合，但并不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而是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强调的是科学的内容。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同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第四，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强调的是大众的方向。这种文化应该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就是民主的。

第五，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无疑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寻觅而最终找到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指导下的文化建设当然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①]

总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继续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这种文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节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特征与内涵

一、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1. 生成的开端性

第一，江西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把安源路矿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这年秋天，毛泽东来到安源，宣传革命道理。1921 年年底，李立三在安源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1922 年 2 月，成立了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安源路矿党支部。1922 年 5 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1922 年 9 月，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安源，参加组织大罢工的领导工作。9 月 14 日，震撼全国的安源路矿 13000 人的大罢工爆发，并最终取得了完全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

第二，江西南昌是中国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

---

① 孙建娥：《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 页。

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1933 年 7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自是年起，每年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三，江西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第四，江西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享誉中外的“红色故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2. 内容的丰富性

第一，江西红色文化表现形式丰富。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以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江西红色文化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它既包括红色的物质文化，也包括红色的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等。红色的物质文化具体表现在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贸易与红军在根据地建造和使用的建筑、使用的徽章、服装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红军的革命思想和精神风貌，这种体现在物质上的红色文化是红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和意志的象征。非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在革命根据地，红军开展了红色教育、红色体育事业，进行了红色艺术创作，创办了许多红色报纸和刊物，制定了一系列红色法规和规章制度，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鼓舞着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事业。

第二，江西红色文化精神内涵丰富。江西革命实践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是江西红色文化形成的主要举措。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主要在江西形成的革命精神孕育成为江西的红色文化，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所具备的丰富精神内涵，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开展和胜利打下了基础，是江西人民对全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巨大

贡献。时至今日，就是对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3. 分布的广泛性

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个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11个县）。

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全省共有革命遗址2423处，分布在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

4. 思想的深邃性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思想的深邃性，主要表现在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

第一，井冈山精神产生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闯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井冈山道路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与井冈山道路连在一起的井冈山精神，江泽民精辟地、科学地把它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①。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以其源远流长的革命传统，丰富深刻的底蕴和内涵，光辉卓绝的道德人格典范，自强不息的人文

① 李长春：《诠释新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强调赋予新内涵》，中新网2003年11月18日。

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革命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

我们当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井冈山精神。正如胡锦涛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当然，对革命传统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我们应该把革命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出的新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把它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井冈山精神是江西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我们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①

第二，苏区精神形成于党领导创建、发展革命苏区的实践中。

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根据地是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央苏区。苏区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泉。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深入实际调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主建政、开拓进取、创造第一的精神状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苏区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至今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基本内涵

1.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经过五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

① 肖云岭、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时期创造的“红色文化”，不仅是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影响，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毛泽东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他的文章、讲话及书信所涉及的中国传统典籍，不胜枚举。由于具备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底，毛泽东对祖国文化典籍的运用可谓信手拈来、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正是由于红色文化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使得红色文化对广大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群众具有一般意义的指导价值。正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做到古为今用。”

红色文化的产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而形成的。“实事求是”在古代指的是一种求实治学的态度。毛泽东则对“实事求是”做出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 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此外，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舍生取义、反抗强暴等优秀品质，凝聚成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共产党人的传承和发扬，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之一。

2.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

红色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创新的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央党校教授韩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庆祥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四层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一般原理、一般原则，一般原理和一般原则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种行动指南，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这个问题都是具体的，所以这个一般原则和方法论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要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就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与中国当代实践发展的要求相结合；四是马克思主义要破解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到底是要解决中国问题，要取得成果。①

共产党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这个文化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在这样的文化创新过程中，毛泽东走在时代的前列。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及同盟军的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走的都是俄国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秋收起义时进攻长沙受挫，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努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相继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大胆创新。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

① 韩庆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华网2010年7月25日。

共产党人具有这样的文化创新意识和能力，才使得中国革命在江西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形成了江西的红色革命文化。

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文化发展才能延续。江西红色革命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先进的、创新的文化。它为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变革进行了必要的精神准备，并为此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保证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实现。

3.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新”，是相对于近代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①] 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而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大地上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所形成。所以，没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江西的红色文化。

江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较早，而且是在新民主主义初期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区，江西红色革命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几次大的斗争都是在江西进行的。可以说，这些对江西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文化成果。

2003 年 4 月，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到江西省调研，深入革命老区兴国、瑞金、于都、赣县、井冈山等地，提出“井冈山精神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②]，充分肯定了包括井冈山在内的江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开创性作用。

---

① 刘建美：《什么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网 2002 年 9 月 14 日。

② 刘云山：《弘扬井冈山精神，继承光荣革命传统》，《江西日报》2009 年 11 月 8 日。

第三节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红色宣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毛泽东早在红军创建之初，就明确把宣传列为红军的第一工作，甚至上升到决定红军生死存亡、革命兴衰成败的高度。南昌起义之后，从井冈山红军初创时期起，共产党就把宣传队列入了正式编制，大力加强宣传队的工作。毛泽东曾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大工作。""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①] 红军中的宣传队担负着宣传鼓动、战地勤务、唱（教）歌跳舞、开展体育游戏、演出戏剧等各项任务，从各方面服务于战争，实际上确实是有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三位一体的功能。

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中，军团剧社和师宣传队的同志们，就经常用歌声、口号，或放留声机唱片，或发动战士唱山歌比赛，沿途张贴标语等方式在行军途中鼓动战士。当时红一方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所写的《战时政治工作报告》中，明确肯定："开展简易的文体娱乐工作，如读报、识字、唱歌、猜谜、讲笑话或设置宣传棚、布置标语、画报等，都大大活跃了部队。"1934 年，周恩来在《红星报》上著文，强调了"红军中的俱乐部工作，对瓦解敌军也有很大作用"。聂荣臻在他的会议录中也把"提高红军的文化素质"列为红军政治工作成功的经验之一，他说："红军经常挤时间上政治课，天天唱歌，常有晚会，有舞蹈，有机会就开展文化娱乐活动。"[②] 在革命斗争时期，红军中活跃着一支写标语、贴传单、唱歌跳舞的宣传队。宣传队员都是从连队挑选出的年轻活泼、口才流利、懂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的战士。这支队伍最大的优势是经受过枪林弹雨的考验，熟悉战士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此，他们的宣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所喜闻乐见，成为红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红色宣传因其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受众面广，更是成为红军凝聚军心民意、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艺术武器。当年广大红军宣传工作者克服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47 页。

② 汪德荣：《试论红军宣传队的建立和发展》，《新文化史料》1991 年第 6 期。

重困难，因陋就简创作出的大量宣传作品，历经几番风雨剥蚀、数度沧桑巨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后人真实地复制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光辉岁月，还原了战火纷飞的历史场景，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抹光彩夺目的红色印迹，被誉为红色“活化石”。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深感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地方群众和红军官兵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要让他们了解和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认识并承担红军的历史使命，就得采取一种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方式。

1. 红色标语

红色标语是红军当时宣传革命的重要方面。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省会——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的枫林村，发现了多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这些标语书写美观大方，有的书写在革命旧址外墙，有的书写在居民家中，虽历经风雨沧桑，至今仍然清晰可辨。据当地百姓介绍，红军撤离后，为保护这些标语不被国民党军队破坏，当地百姓用石灰把其中的一些标语粉刷遮盖保护起来，才使得这些标语保存至今。这些宣传标语中，尤以共青团闽浙赣省委旧址内的“不是血淋淋的战争便是死！”“工作青年化！思想普罗化！言论阶级化！”和闽浙赣省委旧址外墙的“革命的工农群众快起来冲锋挺进到红军中去宣传冲破敌人的四次围攻！”这些标语集中体现了赣东北辉煌的革命斗争史，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条标语一幅画，胜似千军与万马。1928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十余万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所谓的联合“会剿”。红军因战前宣传到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军民携手，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永新县龙源口一举击溃了赣军杨如轩、杨池生部，取得了龙源口大捷。战后红四军宣传科的宣传员满怀胜利的喜悦心情，用麻刷蘸石灰水书写了一条酣畅淋漓、大快人心的标语：“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红军第四军宣传科。”红军在该县留下宣传标语 1.26 万条，其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大、涉及部队范围之广，堪称全国之最。有的标语率真直白、幽默诙谐，比如“中国白军挨户团半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拥护红独师万万岁！”“红军到，干（穷）人笑。要使干（穷）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土豪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跑。”更多的是阐明主张、图解政策，比如赣南苏区城乡触目可及的宣传标语：“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打土豪分

田地，实行土地革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实行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包办婚姻"等等。江西崇义县思顺圩场上有几幅宣传壁画，其中一幅画着一个军阀在刺杀一个百姓，揭示的是"军阀压迫工农"的主题。还有一幅画着一个地主在跟一群农民算账，农民据理力争，表达的是"彻底分配田地"的愿望。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起居不同。"这是朱德同志当年写在井冈山龙市红军军官教导队旧址——龙江书院石门上的一副对联。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国民党进剿红军，在对根据地进行疯狂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在当时红军内部，"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正是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使红军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都能保持高度的团结。

2. 红色宣传画

红色宣传画也是当年红军宣传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以宣传鼓动、制造社会舆论和气氛为目的的一种绘画，一般带有醒目的、号召性的、激情的文字标题。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省会——横峰县葛源镇的葛源村，发现了一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留下的宣传画，距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这幅宣传画画面宽约 2 米，高约 1.2 米，通体以毛笔用白描的手法绘成。画中，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手持冲锋枪，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刚毅的脸上透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江西武宁县大洞乡彭坪村还有一幅宣传壁画，画面一边是红军战士持枪冲锋呐喊："工农兵联合起来，快起来，推翻国民政府，牌旗已经折毁地下来了！"另一边是白军官兵跪地举手乞降："好啊！同志们你莫开枪，我来投降你！我缴枪给你！"江西上栗县东源乡小枧村还有一幅宣传壁画，只见画面上蒋介石俯首帖耳，跪倒在日、英、美、法 4 个洋人面前，一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名曰：国民党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写真。

《红星画报》是由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社编辑出版的第一份画报，在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中，《红星画报》像一颗璀璨的红星闪耀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成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的重要阵地，更是启发教育红军战士的良好教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画报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当时，人民群众和红军官兵识字的不多，要让他们了解和接受党的主张，懂得为人民扛枪打仗的道理，就要用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因

而，以画为主、文字简短、形象直观的读物，特别是画报，最为广大群众和红军官兵喜闻乐见。在画报第七期上有一幅名为《支部应成为游击队火车头》的宣传画，它形象、生动地宣传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带头作用，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映这一题材的经典作品。

3. 红色歌曲

红军报刊上还刊登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部队中广为传唱，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山地行军歌》写道："我们都是无敌的红军，爬高山如平地，奋勇前进，哪怕它峰高坡陡，坑深路又小，迈步向前进，不要稍留停，让我们艰苦耐劳，英勇和善战，这一次的胜利必定属我们！"这首歌充分体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红军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长征的胜利。[①]

在红军中做鼓动工作的宣传队员，总是在行军队伍里前后串。队伍一上山，就会看见他们在路旁插着的小红旗，吧嗒吧嗒地打着竹板，嘴里唱着："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队伍走过去，他们拔下红旗又往前赶，到另一个山坡上等队伍去了。以宣传队为基础，由干部和战士参加的业余战士剧社曾创作了许多戏剧和歌舞，配合了当时的斗争任务。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到处修碉堡，步步为营，并提出一个欺骗国民党士兵的口号："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红军宣传队针锋相对编了一个歌剧名叫《血汗为谁流》，表现国民党士兵修碉堡时的饥寒劳累、挨打受骂。有一次歌剧演给四五百名俘虏兵看，他们一开始仰在草坪上装出一副傲慢不驯的样子，过一会儿就坐了起来，再看下去便掩脸哭鼻子了，最后喊开了口号："打倒国民党，我们要参加红军！"当时，宣传队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工农群众，检查部队的纪律，瓦解敌军和教育俘虏，搞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给连队战士教唱红军歌曲等。

在红军部队里，还经常举行文艺晚会，鼓舞士气。不过，那时的剧团都是业余的。参加演出的演员除宣传队的宣传员外，有不少是自动参加演出的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许多领导同志也登台表演，如当时担任师直党总支书记的杨成武、团党总支书记的王集成等都当过临时演员，这对宣传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歌声。《红色青年

① 田秀荣、陈岩：《红军创办的第一份画报》，《中国档案报》2010年7月22日。

战士之歌》这样唱道："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这首歌至今仍回荡在很多老红军的耳边，他们回忆说，当年只要唱起这首歌，大家浑身都是劲。

当时，还有一种宣传形式，就是搞化装宣传。所谓化装宣传，就是演活报剧，演斗地主、斗"洋人"的戏。演反面人物的演员要穿上地主、"洋人"的服装，戴上高帽子进行游乡、游街。扮"洋人"的宣传员还要想办法把鼻子弄得高高的，腹部塞上点东西装成大肚皮。这种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效果也不小。但由于那时文艺人才不多，所以一般都是运用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的形式比较多。

红色宣传中还有像红色教育、红色歌谣、红色戏剧、红色诗词等形式。

二、红色教育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统称苏区。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苏区的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发展，确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根本对立的教育方针和制度，也确立了崭新的苏区教育体制。中央苏区的教育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纪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壮丽诗篇。

1.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提出

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为了提高红军和工农群众的文化与觉悟，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政权，苏维埃政权明确提出了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服务的宗旨。1931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这些规定指出了苏维埃政权领导的教育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所有并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是要废止一切封建旧教育、宗教教育和国民党的

专制教育，建立符合根据地具体情况、适合当时民众需要的教育。苏维埃政权的教育任务是实现普及教育，使劳动人民子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要对成人尤其是青年施以社会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促使他们参加阶级斗争和苏区各方面的建设。

1934 年 1 月，苏区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会上作报告，对几年来苏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任务作了总结。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① 关于苏维埃文化教育的任务，他说："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对苏区教育总方针和总任务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以及苏联教育经验的理解和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提出的。它强调苏区的教育方针就是要使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提出了苏区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领导革命斗争的高级干部。这一表述合乎苏区斗争的实际条件和实际需要，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最初的、较为明确的表述。这一教育方针的提出，既为苏区各项教育事业的实施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指导纲领，也为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2. 中央苏区教育的内容

（1）社会教育

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把工农群众教育称为社会教育。为了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苏区把"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作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并采用夜校、识字班、补习学校、星期学校、半日学校、读报组、识字牌、俱乐部、列宁室等多种多样的教育方式，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初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教育系统。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35 页。

第一，建立“识字运动委员会”和“消灭文盲协会”等机构。

识字运动委员会是苏区早期专门管理社会教育的机构。中央、省、县教育部内设有社会教育局（科）；区、乡苏维埃政府设有专管干部。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下，各乡村为动员组织工农群众开展识字工作，一般以乡村为单位设立“识字运动委员会”，乡为总会，村为分会，作为领导开展识字运动的机关。总会由委员 3 至 9 人组成，互推 1 人为主任。分会由委员 3 至 5 人组成。分会之下，以居住相近的 5 至 6 家邻居或 10 人左右编成一个识字小组，推举组长 1 人，组织组员识字。

1933 年 10 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消灭文盲决议案》，决定今后社会教育“当以乡为基本组织。每乡设立一个消灭文盲协会”。“旧有的识字运动委员会和分会取消，从乡到中央均组织消灭文盲协会，成为独立系统的广泛的群众组织。在行政上，受各级教育部指挥、监督并帮助工作进行。”1934 年 3 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消灭文盲协会章程》，规定在中央、省、县、区、乡、村、工厂、企业、街道分别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其任务是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之下，组织广大群众消灭文盲”，“每个会员的任务就是负责教育或学习文字和常识”。同年 9 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又制定《消灭文盲协会组织纲要》，进一步规定了消灭文盲协会的工作任务和组织系统等。

识字运动委员会和消灭文盲协会作为苏区社会教育的管理机关，建立起苏区自上而下的消灭文盲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在领导苏区工农群众开展识字运动，消灭文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用夜校、识字班、俱乐部、识字牌等形式。

苏区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众多，而其中最基本、较正规的有夜校、识字班和俱乐部。夜校又称工农补习学校，是苏区工农群众利用晚间读书识字的学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和编制。1933 年 8 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夜校办法大纲》，规定“夜校必须设立校长负专责，同时要在学生中选举班长一人，组长若干人，帮助校长进行工作”。1934 年 4 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又颁布《夜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规定所有的政府机关、群众团体、俱乐部、工厂都要创办夜校或半日学校，学习内容有识字、政治、科学常识等，夜校的教员由区教育部开办夜校短期训练班或乡夜校教员经常训练班培养。

识字班是苏区扫盲运动中最基本、最精干、最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

它是为没有条件上夜校的群众成立的学习组织。苏区识字班建立非常普遍。1933 年 6 月，苏区政府颁布《识字班工作》，规定每个识字班设班主任 1 人，主持全面工作。识字班制定了记录和检查制度。每人各立一簿，记载每日识的字，几天或一周由消灭文盲小组长收齐送老师阅改。凡识满 3000 字就算扫了盲。班主任除进行识字教学外，还要根据学员识字情况填写“识字成绩表”和每月“识字工作成绩表”，并经常开展识字竞赛活动。

俱乐部是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是苏区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1934 年 4 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俱乐部纲要》，规定在各级政府、机关、各大工厂、企业、工会、合作社设立俱乐部，其工作包括政治、科学讲演、读报、讲报、运动、游艺、唱歌、演戏等。凡公民都得参加俱乐部。各俱乐部接受各级社会教育科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俱乐部既是群众的娱乐场所，也是进行社会教育的一个机关。在俱乐部里，把集体娱乐和教育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采用讲演、唱歌、演戏、开晚会、出墙报等多种方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因而在革命根据地的农村社会教育中，俱乐部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①

识字牌普遍设立在革命根据地农村的交通路口或其他公共场所，每隔几天换一次生字，每次写一个字或几个字，让过往群众学认。毛泽东认为“此法效大”。所以后来根据地就广置识字牌。方圆几十里内的村庄路口，识字牌上都写着同样的生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边查路条，边教识字，过往群众须认会、写会才肯放行。在这个村路口认会的字，也许到下一个村就忘了，于是站岗的儿童团员就再教认一次。这样走上几十里路，经过了四五个村子，通过反复几次的教认，过往群众就把生字记住了。

总之，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广大农民通过各种教育形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从而使他们开始摆脱愚昧状态，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2）儿童教育

苏区十分重视儿童教育。苏区儿童教育的方针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苏

---

① 王其森：《浅述苏区的群众文化》，红土情网 2005 年 7 月 8 日。

区小学称列宁小学（在1930年很短的一个时期称劳动小学）。学制最初为6年，1933年改为5年。列宁小学施教方针是：要把小学教育同政治斗争相结合，要把小学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教育过程中发挥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列宁小学的课程设置，初小有国语、算术、游艺、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高小有国语、算术、游艺、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苏区还兴办了一些托儿所减轻妇女的负担，并“使小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①]。

3. 干部教育

由于长期革命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苏区必须培养和训练大批各级各类干部。在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苏区的干部教育，以由各根据地举办训练班进行短期培训为主。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干部教育由地方举办发展为中央、地方并举，干部训练班、干部学校并举，并逐渐走向制度化、正规化，从而形成干部教育系统。

（1）在职干部教育

苏区干部大部分是通过在职学习来提高的。苏区在职干部教育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在中央、省、县各级机关内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二是举办干部训练班。苏区举办的在职干部短训班主要有省委训练班、县委训练班、支部流动训练班、新党员短训班等几种形式，以在职学习为主，学习“党的建设”、“支部工作”、“党员须知”、“经济建设”、“党与苏维埃”等科目。

（2）干部学校教育

苏区的干部学校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从类型上看，有红军教育系统、党政群众团体系统、教育系统等。从管辖系统上看，有短期的政治学校、职业学校、师范学校与小学教员训练班等，以县立为主；政治学校、职业学校、初级师范等，以省立为主；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等由中央政府管辖；中央列宁师范、高尔基戏剧学校等由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中央农业学校由教育部与土地部合办。

干部教育更是革命战争的急需，所以苏区非常重视。中央苏区教育是多类别、多层次的，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培养了一支忠于苏维埃的领

① 刘彦华：《中国学前教育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导干部。总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央苏区政府尽最大努力用各种形式，克服重重困难，打破常规来培养和训练干部，使广大干部成为政权的各项事业的保卫者和管理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样卓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苏区的干部学校在办学方面较有特色的、影响较大的有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苏维埃大学是中央人民委员会创办的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1933 年 8 月创办于瑞金洋溪，毛泽东任校长。《苏维埃大学章程》规定学校培养目标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级干部为任务”。红军大学全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3 年 11 月创建于江西瑞金，其前身是 1931 年建立的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高等军事学校，以培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军事技术与指挥艺术，以及模范的铁的纪律，艰苦奋斗、英勇牺牲、顽强制胜的战斗作风”的高级军事政治干部为目标。其后身是著名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4. 师范教育

中央苏区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教师的匮乏。1932 年，创办师范学校培训小学教师，科目有政治、算术、理化、常识、体操等，后来发展为中央列宁师范学校，课程更广泛，除上述课程外，还有历史、地理、生理、画图等。1933 年，创办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培养教育行政干部。1934 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师范教育统一为四种：小学教员训练班、短期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高级师范学校，都开设相当多的科学课程。①

三、红色体育

在“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的总方针指导下，体育受到红色革命政权的重视，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革命根据地体育运动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增强了战斗力，培养了人才，活跃了力量，积累了经验。

1.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体育

自 1927 年 10 月开辟根据地到 1929 年 1 月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在

① 孙建娥：《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4—230 页。

这样紧张的战斗岁月中，工农红军结合部队训练，开展了爬山、行军、打野操、做游戏等军事体育活动。毛泽东对战士们说："你们要加强训练，打好野操。要锻炼好身体，才能打敌人。"[①] 当时，每隔三五天，就要组织部队练一次野操，把部队分成两个连，比赛抢山头。1927 年冬，驻守井冈山茅坪附近的红军战士，经常在步云山练习爬山。

2. 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

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1）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

第一，体育工作的方针。苏区体育的工作方针是："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需要"。[②]

第二，体育工作的领导机构。苏区体育在行政上归教育部门领导。中央苏维埃设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地方则由省、县、区教育部门及乡教育委员会分管。群众性的体育工作，最早是由《青年实话》杂志（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负责。后经《青年实话》发起，一些单位赞助，在 1933 年"五卅"运动大会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作为组织和领导全苏区赤色体育运动的机构，并通过决议加入"赤色体育国际"。"赤色体育会"是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群众体育组织，对苏区开展群众体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俱乐部和"列宁室"。中央苏区在基层单位负责体育领导工作的是俱乐部及所属的"列宁室"。"俱乐部的工作，……讲演、游艺，更可以用大众文化的方式"。就是：体育方面未必每个地方都可以打乒乓球、篮球，但在最偏僻的地方，可以组织踢毽子、放风筝，或赛跑、跳远等简易运动的竞赛。俱乐部这种组织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吸收国外的与总结自己在工农运动中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娱乐组织。

第四，党政各部门的重视与领导带头。当时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团体经常对体育运动作出专门指示。毛泽东亲自带头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他在瑞金叶坪河中教战士和青少年游泳，与警卫比赛跑步、爬山，还当过篮

① 何启君等：《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66 页。

② 曾飙：《中央苏区体育史》，红土情网 2004 年 12 月 6 日。

球裁判员。他还与徐特立亲自组织修建沙洲坝的大操场。朱德也很喜欢参加体育活动，对红军干部战士有过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指示，比赛时还亲自做拉拉队队员。康克清经常和女学员一起参加跳高、跳远。她喜欢游泳，亲自带领女学员到双清河桥下去玩水。邓小平、聂荣臻喜欢跑步，邓发、张爱萍、杨勇等经常打球，任弼时是苏区中央局篮球队的中锋，等等。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到1933年进入了一个高潮。

（2）红军中的体育运动走在苏区前列

当时红军开展体育活动的特点，一是紧密结合打仗为战争作准备；二是普遍开展的项目很多。主要开展一些军事体育项目，如射击、刺杀、劈刀、跑步、爬山（抢山头）、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另一些项目如跳高、跳远、持竿跳高、投标枪等，也和军事需要紧密结合。在部队列宁室、俱乐部中开展的体育项目有乒乓球、篮球、足球等，还有单双杠、爬竿、打秋千等。在部队整训时，或在红军学校里，普遍采用“三操二讲堂”制度。即每日上3次操，2次室内讲课。每逢“五一”、“七一”、“八一”、“九一八”等节日或纪念日，常常要举行各种规模的运动会，比赛各种军事技术和体育项目。在举行检阅、野营、誓师大会、联欢会等活动时，也有许多体育内容。至于红军中的体育干部，主要依靠“学生队”、“教导队”来培养，这既是军事干部也是体育骨干的主要来源。

（3）青少年中的体育运动非常活跃

在中央苏区，除了红军外，最有条件开展体育活动的是青少年。在列宁小学、儿童团、少先队、共青团中，体育活动相当活跃。列宁小学，又称人民学校，对7～15岁的儿童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学校的运动场，至少有一个平坦的草坪，一些体育用具和设施，如秋千架、杠子、跳远的沙地等。苏区的学校体育课内容，仍是以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为主，另有游戏和少量的球类活动。除了列宁小学的体育活动外，还有以儿童团、少先队为组织形式的（主要是课外或校外的）体育活动也很活跃。

第一，儿童团的组织及其体育活动。儿童团是8～14岁的儿童组织。体育也是儿童团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各地儿童团要定期下操，但操的方式不要专操正步，应该多操散兵、集合、掩护、前进、攻击、退却及各种游戏体操。”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也提到，“童子团（八至十五岁）

每个星期下三操，都在人民学校指挥下，操得很好。"① 1933 年 4 月 1 日儿童节，举行了中央苏区的共产儿童团大检阅。

第二，少先队的体育。苏区少年先锋队的年龄规定为 16～23 岁，与赤卫队同为红军后备军性质的组织。少先队应做体育卫生工作，如体操、赛跑、跳高、跳远、旅行、打拳及卫生运动等等。为了系统地开展少先队的跳远活动，1934 年，少先队中央总队部编写了《少队游戏》与《少队体操》两本教材，这是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体育教材与小学体育课参考书。1933 年，闽赣两省举办了少先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体育比赛。

（4）运动竞赛的广泛开展

中央苏区每逢重要节日、纪念日或重大集会、检阅之后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其中以 1933 年举行得最多。中央苏区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是 1933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指导思想为："锻炼我们的身体，适宜于阶级斗争，养成工农的集体精神。"红军一、三、五军团，江西军区，江西省少先队，公略、胜利、博生、万泰、安远、兴国等县的选手，福建省少先队，上杭、长汀、武平等县的选手以及中央机关的选手共 180 多人参加比赛。这次运动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大会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委员会。

机关和干部学校中的体育运动也很活跃。1933 年 8 月，苏维埃政府创办苏维埃大学，后来又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他们的体育运动以篮球等球类项目为主。中央苏区的工厂、农村和妇女界的体育运动也有所开展。

这些红色体育，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体育，是人民大众的体育，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觉锻炼，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体育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党和政府坚持体育服务于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指出了"锻炼工农阶级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和"锻炼体魄，好打日本"② 等不同时期的体育方针，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各时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增强了战斗力，培养了人才，活跃了生活，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7 页。

② 毛泽东：《体育专刊》，《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2 日。

四、红色艺术

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而开展起来的。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工农群众，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结合起来，走上了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在这一新形势下，使人民群众了解革命的意义，进一步广泛地发动群众，革命文艺便被提上了日程。在紧张的战斗环境里，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和专门人才十分缺少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适应环境的需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除去主要的民间形式以外，也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如戏剧、曲艺、诗歌、散文等各种形式。

1. 戏剧歌舞

戏剧活动首先是从红军开始的。翻了身的群众在党领导下，很快就把红军的活动方式学过来并加以推广。演出节目以小型居多，一般都是集体创作。有活报剧、话剧、歌剧、舞剧以及民间形式采茶戏、花鼓戏等多种。歌舞剧中的音乐大多数来自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与革命歌曲。剧本内容大部分是反映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有些戏正面地歌颂了红军的英勇战斗精神和战斗的胜利，揭露了白军的罪行并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有些戏动员群众当红军或拥军优属；有些戏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表现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斗争；有些戏激发人民抗日斗争的精神；还有一些则以婚姻自由、提高文化水平、反封建迷信为内容。演出方式灵活机动，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稍加剪裁，把当事人组织起来，兵演兵，将演将，进行真人真事的演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虽然不免粗糙，但由于所包含的革命内容的强烈，对群众愿望表达的及时，因此演出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中央苏区，瞿秋白、李伯钊等组织领导了工农剧社、蓝衫剧团等戏剧团体，深入贯彻党的革命方针，采用了话剧、戏曲、歌舞等表演形式，创作演出了《活捉张辉瓒》、《送郎当红军》、《茶篮灯》、《扇舞》等多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经典剧目，以艺术的形式描绘了红色区域的崭新风貌。尽管还不很成熟、不规范，但它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戏剧、歌舞的发端。

根据形势的需要、群众的呼声，苏区掀起了红色戏剧文学的高潮。中央苏区第一个专业化的剧团成立了，取名“八一剧团”。负责组织工作的

有黄火青、伍修权、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等，其中还有越南籍的红军干部洪水。叶剑英、何长工倡导并组织了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和工农剧社。苏区中央局宣传部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李伯钊担任校长。周恩来、彭湃、方志敏、聂荣臻、罗荣桓、肖克、罗瑞卿、李克农、李卓然、沙可夫等许多党和红军的领导在苏区的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中，点燃了戏剧文学的创作激情，一手进行着反“围剿”，一手创造着苏区的红色新文化。他们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的间歇，参与创作反映党的历史和红军生活的文学剧本。

周恩来在中央红军中是总政委，他青年时代曾热心于话剧的创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话剧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把“红军摩拳擦掌决心杀上庐山，粉碎蒋介石在庐山策划中的对苏区的‘围剿’计划”搬上舞台。口授三幕九场的文学剧本腹稿，由胡底执笔录出，剧名便叫《杀上庐山》。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五军团政委朱瑞、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还有罗瑞卿、李克农等将士纷纷参加演出。

闽浙赣苏区的方志敏不仅主笔创作了话剧《年关斗争》，还扮演了其中的主要角色。在他的影响下，赣东北苏区的领导邵式平、方志纯也参加了演出。

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演出了沙可夫编剧的《我——红军》，该剧最后一幕是被红军俘虏的白军师长被押解上场，演员战士们从幕后牵出的竟是在反“围剿”战斗中俘获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军师长。观众的意外，顿时化作剧场的沸腾。

据不完全统计，苏区在红色戏剧高潮时，演出团体多达60多个。现在尚能搜集到的剧目名称近百部。苏区红色戏剧文学的特点是：反映火热的现实革命斗争；体现了时代精神；塑造了兵、农、工等舞台新的人物。虽然因其战斗性较强，而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有时较为粗糙，但它思想进步、感情真挚、细节真实，是以新的生活气息和全新的人物形象感染苏区观众的。[①]

2. 红色报刊

在发展通讯报告文学方面，革命根据地内各级报刊的作用很大。《红色中华》曾明确地向通讯员和读者提出要“创造中国工农大众文艺的报告

① 刘涓迅：《苏区和长征中的文学脉搏》，中国作家网2007年5月21日。

文学"，并在1933年5月1日，开始增辟文艺副刊《赤焰》，号召通讯员和读者"努力地去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在文艺的形式中写作出来"。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通讯报告，内容范围很广，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战斗、劳动、工作、学习、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活动。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多偏重于战斗经过的描写，也叙述了许多战斗中的英雄事迹，表现手法粗犷，具有较强的政治鼓动性。

红色报刊是中国共产党向工农兵开展新闻宣传的有力武器。随着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到1934年，"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①] 据不完全统计，到红军长征出发前，在中央苏区发行的报刊，已达有100多种，其中创刊于瑞金的就有30余种。这些报刊为我们认识"山坳里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1931年12月11日，苏区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同时创刊。不久，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也创刊了。张闻天、瞿秋白、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等与革命文学结过缘的领导先后担任过《红色中华》的负责人，李伯钊、任质斌、韩进等红色戏剧家参加过编辑工作。这些报刊较早设立文学副刊版面的是《红色中华》报，1933年3月3日，该报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这一天的文学副刊是"'三·八'特刊"，有诗歌、散文和宣传画等。4月23日，该副刊将刊名定为《赤焰》，并且出了"'五·一'纪念专号"，有诗歌、散文、话剧、歌曲和宣传画等。这个月的"'五·卅'纪念专号"和当年的"'八·一'纪念专号"除了诗歌、散文，增加了小说。李一氓创作的小说《南昌起义的故事》、李伯钊创作的歌词《红军家属王二嫂》等均发表在《赤焰》副刊上。其他报刊也有适当版面刊登一些诗歌、笑话、谜语、歌曲和剧本征集启事等。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的红色报刊，活跃了思想文化阵地；在正确舆论的引导下，读报成为苏区干部群众政治、经济活动和文化、教育乃至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红色报刊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是苏区人民的良师益

① 徐新平：《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6期。

友，它激励和鼓舞着苏区人民自觉参加政治和军事斗争，参加各项建设事业，把苏区建设成为敌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红色报刊对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有着重大的作用。

3. 革命诗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赣南书写的革命诗词是中国文艺百花园中的奇葩。在这几十位诗人革命家中，当以毛泽东和陈毅为代表。毛泽东在《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中咏出了“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风景这边独好”的千古佳句；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等十多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的《访问瑞金》、叶剑英的《梁上伯坚来击筑》等众多诗篇既是对历史的记忆，又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今天诵读这些动人诗篇，仍具有感人至深的教育意义。

4. 革命歌谣

“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广大群众习惯把自己这一时期的歌谣称为红色歌谣，说明了它与传统歌谣的不同。1934 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青年实话丛书”的《革命歌谣选集》序言中，曾介绍代英县两个区的歌谣运动情况，从中可看出当时歌谣所起的作用：红军在作战冲锋时唱歌，在战斗胜利后唱歌，行军时唱歌，休息时也唱歌。他们在集会时即席和群众对唱，唱歌成了当时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传统歌谣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多半通过侧面的嘲笑和讽刺，而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则是理直气壮地正面歌唱革命，歌唱斗争，歌唱胜利。例如，

骑虎不怕虎上山，骑龙不怕龙下滩；
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心也甘。

——《死为人民心也甘》

头上包个烂帕帕，脚上穿个棕袜袜，
背上背个饭笆笆；我为穷人打天下，
你当我做啥？

——《我为穷人打天下》

在这类作品中，歌颂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数量最多。有些是正面歌

唱红军英勇斗争的，如有名的《上前线》（注：《上前线》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由肖华将歌词重新作了修改，收入电影纪录片《五首战歌》中）它充满着强烈的战斗气氛，表现了红军的胜利信心。

根据地的情歌，是在革命的雨露中滋长起来的，它很自然地把爱情和革命联系起来。没有革命，没有红军的胜利，没有革命政权的存在，他们的爱情就没有保障，因而革命变成了青年男女维系爱情的主要条件。爱情的坚贞建筑在双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上。《送郎当红军》的主题歌在这些情歌里占了不小比重。例如，

绵水清，绵水浅，
水清水浅我的哥，
你去从军莫忘我。
绵水长，绵水深，
水长水深过几春，
不立功劳不成亲。

——《绵水清》

感情深厚，革命的立场又十分鲜明，看不出一点感伤情调，更多的是对革命斗争精神的鼓励。又例如，

喂，太阳那个落坡四山黄啊，
犀牛那个望啊月姐望郎，
哝呼呀呼嗨，姐望郎呵。
喂！记得那年菜花黄，
我送那个红军上山梁，
叫声那个哥哥早回转罗呵，
老百姓的痛苦记心上。
喂！站在那包谷地旁，
望着那摩天岭上，
四山那个云彩放红光罗呵。
犀牛那个望啊月，
犀牛那个望啊月，

姐望红军哝荷呀荷咳，
早回乡罗喂！

——《盼红军》

井冈山头连青天，汪洋大海不见边，
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嫌低海嫌浅。

——《恩人毛委员》

从短短的四句歌词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发自肺腑的感激和对他领导的无限信任。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战斗频繁的环境中产生的。虽然有些作品艺术加工不够，但它是完全崭新的文艺，这种文艺作品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文艺自觉为政治服务、专业文艺工作与群众文艺同时并进、文艺作品与群众联系密切、群众娱乐与进行革命教育相结合，等等。革命根据地文艺的这种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工作中，都被继承下来并且有了更大的发扬①。

第四节 江西红色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

1. 红色革命文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红色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文化形态。红色革命文化是带有社会主义特质和革命传统本质的，也是一种一直被我党和人民所推崇的与时俱进的文化品质，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红色革命文化是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长期文化积淀，它的形成过程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精神品质的影响。

红色革命文化承载着我们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是丰富生动的革命教材，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群众歌谣》，中国网络文学联盟 2004 年 10 月 10 日。

系建设的有效手段。因此挖掘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和保护、红色文化精神的传承、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红色文化产业的开发、弘扬红色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曾精辟地指出："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①

红色文化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浓缩了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和崇高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本质要求。②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要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2. 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其指导思想上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而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红色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决定了它的

---

① 《胡锦涛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中国革命史发扬光大党的传统》，新浪网 2006 年 7 月 26 日。

② 杨槐：《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社科党建》2007 年第 12 期。

先进性。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包含了精神和物质等多个层面的内容。红色文化的精神层面主要是指党带领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思想不但激励人民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同时也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的物质层面主要是指革命战争时期所保存下来的遗迹、旧址、旧居、纪念物以及反映红色历史和革命精神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稀缺的精神文化产物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革命老区凭借已有的知名度，转变观念，由单一的政治教育模式向市场经营模式转变，逐渐将红色文化资源推进市场，发展红色旅游，创造红色文化产业品牌，从而推进了老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在其服务对象上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红色文化，其核心内涵之一便是真心实意地为大众服务，代表了当时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把群众利益与革命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把群众利益放在革命的中心任务的高度，反复教育中央苏区的党员和干部："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 中央苏区的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红军将士，不仅牢记党和红军的宗旨，而且自觉付诸行动。他们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可见，为群众谋利益是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文化先进性的重要表现。

红色革命文化是合乎时代发展规律的先进文化，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要继续充分挖掘和利用好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积极弘扬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和主导精神，唱响代表时代发展方向、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旋律，为弘扬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二、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感染力和真实性

1. 红色文化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感染力

革命传统教育是利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这些革命传统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鼓舞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奋发图强，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巨大动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可以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继承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的精神。

长期以来，我国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虽然形式很多，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学校的课堂教学当中，这样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革命的认识，树立和培育了他们正确的理想信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性不断降低，因此有必要创新革命传统教育的形式，增强其感染力，而红色文化的发展就符合这一时代要求，近年来，一股“红色文化热”的兴起适应了大众对红色文化的情感期盼和灵魂托付。

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传播其理念、彰显其精神有利于红色革命精神深入人心。一是红色文化是开展青少年德育的有效载体。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堂传统课都是鲜活的教材，都折射着革命先辈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操的光芒。用鲜活的历史告诉青少年，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建立在他们对祖国深厚的爱之上。一个人对祖国爱得越深，历史的责任感就越强烈，人生目标就越明确，人生信念就越坚定。古往今来，彪炳史册的无一不是忠诚的爱国者。红色文化正是彰显革命历史的新平台、新课堂，其感召力是学校和书本不可比拟的。二是红色文化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近年来兴起的红色旅游之火暴是始料未及的，除了人们对那段红色年代充满向往之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人们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敬仰那些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人们在红色旅游中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山河是美的，红色热土承载的红色文化也是美的。革命老区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和古朴淳厚的民俗民风，使旅游者在愉悦中感受山河之美，体验华夏民族的博大精深，感悟那段烽火连天斗争岁月的艰辛和今天幸福生活的不易，从而主动地、真诚地

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和理想信念的教育。通过红色旅游这一时尚方式将历史知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传输给大众，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①] 因此，江西要高度重视革命遗址遗迹的建设、保护和利用，深入挖掘思想内涵，把弘扬宝贵精神财富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让人们在参观游览中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熏陶。同时要坚持贴近群众、大力改进创新，充分利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提供的有利契机，多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体验式、互动式教育，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2. 红色文化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真实性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在《十送红军》的歌声中，80 多年前军民依依惜别的场景让人感动与沉浸其中。一场展现井冈山斗争史的情景歌舞剧《井冈山》又出现在人们面前。该剧由近 600 名农民演员参加演出，该剧营造出极富感染力和冲击力的大场面、大场景，悠扬的音乐、炫目的灯光、冉冉升起的红旗、硝烟弥漫的战场让游客在现代的表现形式中感受历史，感受红色文化。

近几年来，为了增强红色文化的真实性，各地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红色文化活动，让大家能够亲身体验到红色文化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使得好像摸不着的红色文化走进人们的现实生活。由江西电视台主办的"中国红歌会"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创新。"中国红歌会"是中国江西卫视于 2006 年举办的大众歌手选秀赛，是为纪念长征 70 周年首创推出的大型电视活动，此后又连续举办了 4 届。红歌主要是指红色经典革命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健康进步歌曲，此外，还包括世界各国革命经典歌曲。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将"中国红歌会"作为全省红色文化品牌活动着力打造，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井冈山上免费观看红色电影，穿越"时空隧道"听黄洋界炮声，则是井冈山为突出其革命传统教育的真实性而采取的又一重要措施。在革命圣地观看革命电影会让人有更难忘的感受。系列红色经典电影《东方红》、

① 许静、罗惠兰：《"红色文化热"的兴起及其价值功能》，《江西日报》2008 年 10 月 13 日。

《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在井冈山茨坪体育场、龙市会师广场、新城区市政府广场免费放映，游客可以在饱览井冈山秀美风光之余放松心情，回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悟当年红军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敢闯新路、勇于胜利的革命精神。而80多年前红军如何作战？举世闻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模拟再现工程会告诉你。坐在“黄洋界保卫战”3D动感电影城里，你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轰隆”一声炮响，打穿了历史的隧道，打回到几十年前与敌军作战的战场。这也让我们对红军战士肃然起敬！①

三、打造红色文化产业的优质品牌

2003年9月，文化部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② 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界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③

红色文化只有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产业品牌，才会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江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红色文化，应该充分发挥江西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努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实现江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为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近几年来，江西深入挖掘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改建、扩建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系列纪念场馆，举办井冈山精神大型展览、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等系列会展，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掀起我国红色旅游的浪潮；先后推出了中国红歌会、大型情景歌舞剧《井冈山》

---

① 陈致群等：《井冈山八大活动捧出红色文化盛宴》，《江南都市报》2008年9月9日。

② 《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文化产业网2007年11月12日。

③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通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2004年4月1日。

等系列歌舞；拍摄了《井冈山》、《共和国之魂》、《共和国摇篮》和《军旗从这里升起》等系列影视剧和电视理论专题片，在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取得了良好成效，打造了一批红色文化产业品牌，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江西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1. 打造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品牌

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重点加强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2001 年，江西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山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2001 年，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口号。2004 年 10 月 20 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 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江西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1] 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名列其中。同时，江西还打造了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

2. 打造红色文化艺术产业品牌

近年来，江西省积极把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面向市场、经久不衰的精品力作，转化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优秀文化作品。同时，创新红色文化题材的内容和形式，积极探索红色文化发展新路，以优秀的红色文化精品为龙头，打造江西红色文化艺术产

---

① 吴刚、李伟：《2005 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昨在南昌隆重开幕》，《江南都市报》2005 年 10 月 31 日。

业品牌。绚丽多彩的江西红色文化是打造旅游、演艺、出版、音像、动漫等文化产业品牌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江西在现实中立足于时代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实践，在创新与发展中实现对红色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创造，从而赋予江西红色文化更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第一，推出了“中国红歌会”、大型情景歌舞剧《井冈山》等系列歌舞，拍摄了一些红色题材的影视剧和电视理论专题片。“中国红歌会”是江西精心打造的一档大型电视节目，在全国兴起了一股红色热潮，从井冈山唱到人民大会堂，从江西唱向全中国。截至2010年，“中国红歌会”已连续举办了5届，全国共有18万多人报名参加，5000多人通过江西卫视荧屏演唱红歌，收看节目的观众超过2亿人，100多万人次通过短信、电话、网络表达对红歌会的喜爱。由此，在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从2006年开始，江西省委宣传部主持创排了大型情景歌舞剧《井冈山》，该剧将《十送红军》、《井冈山上太阳红》、《请茶歌》、《八月桂花遍地开》等脍炙人口的革命经典歌曲融入现代舞蹈、戏剧、音乐中，并通过电脑灯光布景制作，把井冈山美丽风光再现于舞台，增强了红色经典剧目的时代感和感染力。江西省话剧团创排的红色经典剧目大型音乐诗画剧《可爱的中国》，突破了传统概念上的话剧形式，表现形式上采用抒情与叙述相结合的手法，以诗化的语言、多元化的场景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被观众评为“音乐震撼、画面绚丽、台词深邃、净化心灵”的优秀舞台精品。拍摄了《井冈山》、《浴血坚持》、《共和国之魂》、《共和国摇篮》和《军旗从这里升起》等红色题材的影视剧和电视理论专题片。

第二，兴建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系列纪念场馆。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指导下，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八一”起义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改扩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改扩建后，自2007年11月免费开放以来，已接待海内外游客200万余人次。2005年，江西对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进行扩建，新馆占地面积17000平方米，通过声、光、图、物等形式，再现了革命烈士英勇斗争的光辉岁月。该馆跻身首批79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每年参观人数达60余万人次。投资2000万元、被誉为“中国第一画”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全景画馆，充分运用了多媒体技术，激烈的战斗场景以动态的画面效

果呈现出来，让观众在感受强烈视觉冲击的同时，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思想和心灵深处的震撼。

第三，举办了井冈山精神大型展览、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等系列会展。2003 年，江西隆重推出了《井冈山精神大型展览》，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巡回展出，观展人数达 50 万余人次，被誉为“用红米饭、南瓜汤酿成的精神大餐”，在全国掀起了浓厚的“井冈山热”。2005 年以来，围绕“红色摇篮，绿色家园”主题，江西省与中央有关部门共同主办了 4 届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成为展示红色文化的重要舞台、宣传红色精神的重要窗口、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平台。[①]

当前，江西为打造自己的红色文化品牌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应该进一步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举办红色文化展览活动、红色文化产品推介会等形式，扩大江西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提高江西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做大做强江西红色文化产业。江西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手段继续打造红色品牌，立足江西红色资源优势，使之变成思想，变成无形资产，变成精神财富，进一步弘扬革命传统，建设先进文化，着力打造更多的红色文化精品。总之，江西红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要站在江西中部崛起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了解红色文化产业在市场上的实际和潜在需求，从体制、内容和手段上不断创新，充分挖掘、整合、开发江西红色文化的宝贵资源，延伸文化产业链，树立江西红色文化产业新形象，为江西在中部的崛起作出新贡献。

四、导引江西崛起的文化主流意识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

从 2001 年年底江西提出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到 2004 年中央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中部地区日渐呈现出与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相互促进的发展热潮。近年来，江西在实现崛起的道路上探索前

① 廖国良：《江西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展现红色文化的魅力效应》，《经济日报》2009 年 4 月 14 日。

行，正一步步朝着既定目标奋进，这些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绩是中部地区崛起的缩影。

1. 江西要崛起，加快发展是根本

加快发展，需要的是振奋精神；而要振奋精神，关键需要有强大的文化来引导。江西人民逐渐认识到导引江西崛起的文化主流意识是革命时代形成的红色文化，而井冈山精神，就是中国革命留给江西的宝贵财富。2001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考察江西时，赋予了井冈山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江西人民认识到，思想准备是先导，加快发展必须以解放思想来破题，江西的大发展必须依靠“坚定信念、敢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的强大力量。从此，江西拉开了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序幕。中共江西省委在当年的文件中指出：“活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弘扬井冈山革命精神，学习兄弟省市经验，走加快江西发展的新路。”井冈山精神从此被定位为江西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动力保障。从 2001 年起至 2003 年，江西连续 3 年每年开展一次全省性的主题教育活动，这是连续不断地为加快改革发展而解放思想进行的“热身”，使得红色革命文化引导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成为江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①

2. 江西要崛起，必须以红色文化为引导

在当代，文化力是综合实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衡量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江西要实现在中部崛起，必须以红色文化为引导，这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为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提供精神动力，它不仅能有效地凝聚全省人民的力量，而且能有效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发扬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的拼命精神，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能有效地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公民道德素质，开发人的智力资源，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三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导向，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能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指引正确的方向。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主流意识的体现。江泽民指出：“八十年

---

① 徐金鹏等：《中部崛起的“江西步伐”，井冈山精神为力量之源》，《瞭望新闻周刊》2004 年 12 月 13 日。

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① 这里的先进文化的旗帜就是主流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就其生成发展的历程来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生成的重要基础，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历史和现实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要发展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对执政意识形态的整合创新功能，实现红色文化的精神引导江西在中部崛起。

3. 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只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而在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当中，红色文化占据重要内容。

第一，红色文化对于我们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红色文化对于我们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

①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001年7月1日。

作用。

第三，红色文化对于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①]

在当今这个时代，主流文化引导已成为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干事业的重要前提。没有主流文化来指引，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意志，整个社会统一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理念就无法形成，就无法更好地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中去。江西发展的实践表明，江西红色文化已经成为江西实现中部崛起的文化主导，它是全省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推进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① 高岸起：《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科党建》2008 年第 12 期。

第七章

红色革命精神

如何珍惜和发扬红色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有过精辟的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一定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①]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②] 江泽民在论述民族精神时指出，民族精神要"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③]，才能使民族精神得到更好的锤炼和升华。2007 年 7 月 26 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42 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我们要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和全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伟大历程，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中，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虽然革命前辈们大多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铸造的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辉煌业绩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学习和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发挥其凝聚人心、激扬斗志的作用，同心同德描绘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图景。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00—80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7—368 页。

③ 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学习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4 页。

第一节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集成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既渊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它孕育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革命主体的实践和能动创造下，它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江西地区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之中。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1.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渊源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

一种精神的形成，不可能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传统文化对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总是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传统去创造自己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红色革命精神的孕育和产生，便是深深地植根于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之中。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五千年的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它是生生不息的、勇于奋斗的、敢于胜利的精神，是为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崇尚革命的首创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得以延续的精神血脉。

从这条精神血脉流淌着的血液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人红色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5 页。

命精神的源泉。例如，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民族之性格；创榛辟莽、敢为前驱的创造之精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知行之方式；胸怀天下、精忠报国的爱国之情感；重义轻利、清介自守的高尚之品格等。

2.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优秀传统的发展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封建主义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在革命实践中对其进行了根本的改造，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了中华民族精神之精髓，浇灌出了革命的精神之花朵，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革命精神，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升华。

一个民族精神必须进而采取某种新的东西，但是这种新的东西能够从哪里发生呢？这种新的东西必须是一种比它自身较高等的、较博大的概念——对于它的原则的一种扬弃——但是这种举动便要引起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了。[①] 时代特征便是这种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把自身的时代属性不断融入民族精神，从而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容，发展了民族精神的表现方式，提升了民族精神的现实价值。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围绕着革命斗争实践不断创新，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能够反映和体现当时革命时代主题、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红色革命精神。

二、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社会国家逐步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挽救民族危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实行戊戌变法、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起民主共和制。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封建王朝复辟丑剧的不断上演，表明了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只有近代物质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变革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从精神上对中国的国民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灾难无比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真正的希望。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

---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1. 红色革命精神孕育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界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的思想提供了精神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环境，也为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尤其是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序幕，为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五四运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五四精神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是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运动中，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他们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革命的实质，转而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 年 5 月 5 日，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 年 11 月，《国民》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1920 年 8 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中国先进分子通过五四运动，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强大力量，这对他们自觉地走到工人中间，开展宣传活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带来了契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革命精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

2. 红色革命精神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从 1920 年年初开始，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讨论组建共产党，随后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为了阐明共产党人的宗旨、原则和策略，加紧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阶级组织，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1921 年 3 月，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召

开了代表大会，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宣告开幕。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严重干扰。为了安全起见，会议改在了浙江嘉兴的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一致认为，必须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遵照列宁同志建党的学说，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革命主体的实践与能动创造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江西地区的实践与能动创造的过程之中，铸就了安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的红色革命精神群。

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重要产业地区设立分部，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积极领导和参与工人罢工斗争。

1.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发起的，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的关注。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都曾奉派到安源工作或巡视指导。这些干部中，既有早已扎根于群众当中，对实际情况比较熟悉的干部；又有曾留学国外，对欧美和俄国的工人运动有着相当了解的干部；也有擅长指挥全局的干部；又有精通实际工作的干部。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斗争实践锻炼，安源路矿罢工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

从1921年秋天到1930年年底，安源工人运动历时近十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21年秋至1923年2月初，是革命运动的开创阶段，主要是把安源工人阶级自己团结起来；第二阶段，从1923年2月初

至1925年9月，是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后安源工运继续高涨进入全面兴盛时期，在继续团结自己的同时，又团结了农民和其他工人的阶段；第三阶段，1925年10月至1927年7月中旬，是与农民运动及其他民众运动全面结合，组织工人参军助战，配合北伐战争的阶段；第四阶段，1927年7月中旬以后，是参加秋收起义，创立和配合工农武装割据，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阶段。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阶级，团结自己、团结人民、配合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敢为人先、勇于开拓、团结奋斗和义无反顾的“安源精神”。

2. 南昌八一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敌人因“八一”的枪声惊慌失措，人民因这个伟大的时刻欢欣鼓舞。周恩来在起义胜利后向集合于总指挥部的起义军讲道：“革命想靠军阀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支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归革命委员会领导了！”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在南昌起义过程形成了敢为人先、听党指挥、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八一精神”。

3. 井冈山的革命道路

1927年9月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一次伟大尝试。起义受挫后放弃会攻长沙而进军井冈山，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转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井冈山的斗争，实现了我党历史性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仅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新的发展道路，而且培育铸就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解读，但“坚定信念、求实创新”始终是其核心和灵魂，并在此基础上辐射出跨越时空的特质，历久弥新，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源头。

4. 中央苏区的伟大实践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正是在那段血与火淬炼的岁月里，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铸就形成和积淀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为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争创第一等工作的开拓精神；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理念；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反腐倡廉的优良作风；讲究民主与法制、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等优良传统。

5. 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

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主要是由方志敏领导的。1928 年 1 月 2 日，方志敏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江西省弋阳县窑头村召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决定发动农民举行弋横起义。弋横起义为后来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 1 团和创建赣东北苏区奠定了基础。方志敏从 1928 年至 1933 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不仅诞生了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也诞生了方志敏精神。

6. 万里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漫漫长征路，成就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壮丽诗篇，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铸就了震撼世界、超越时代的长征精神。

关于长征精神的内涵，江泽民指出：“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

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①

由此可见，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形成，不仅生动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理论创造和具体革命实践的完美结合。可以说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群的基本内涵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 28 年艰难曲折的民主革命历程中，曾经先后产生过闻名遐迩的安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和长征精神，等等。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强大精神武器。正是在这些红色革命精神的引导和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理想的旗帜，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一、安源精神

安源精神是伴随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新篇章。在持续十年的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中，安源精神集中展示了安源工人阶级的先进群体意识。1922 年 9 月 14 日，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和党支部、工人俱乐部的具体指挥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在罢工中，英雄的安源工人以坚如磐石的团结奋斗的精神，机动灵活的策略艺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历时 5 天，取得了罢工的完全胜利。大革命时期，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阶级为推动湘赣两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支援和配合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堪称“江西之冠”的业绩。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人阶级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首

①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0 页。

先高举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成为秋收起义的先锋队和主力军。随后，安源的党组织又在湘赣边界继续领导了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全力支援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战略转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持续10年的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中形成的安源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

安源工人运动发生于党成立之初，中国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启动之际，如何在当时血雨腥风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性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走出一条工人阶级改造社会的新道路？这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党还是安源工人阶级，都是一项极富冒险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可贵的是，面对此种挑战，安源工人阶级在全国工人运动中做出了表率，他们发扬一股敢闯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创造了中国工人运动中的诸多第一，始终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运动之初，他们就创办了我党最早的地方党校，组建了我党在产业工人中第一个基层支部；创办了我党早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工会组织以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工人学校，在这些组织的作用下，他们举行的1922年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当时“绝无仅有”的完全胜利，成为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开端，之后他们又建造了我党历史上最早最大的工会大厦；创办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第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并最早发行股票，这也是我党在全国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培养了党第一批经济管理专门人才。有赖于这些最优秀的工作成就，当时的安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人阶级继续领先，在秋收起义中，他们是起义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并在全国第一次举起了与国民党决裂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战斗中他们更是敢于争先、冲锋在前，是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对此，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曾经给予高度评价：“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一系列的首创成就和先进事迹，乃是安源工人运动历史中最为辉煌与最为亮丽的部分，而其中所透出的那种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气概，亦应是安源精神最能震撼后人的地方。

2. 义无反顾的坚定意志

安源路矿工人从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便始终在党的指引下，义无反

顾地坚持斗争并且不可遏止地向前发展，从未被敌人的强大所吓倒，也从未在失败和困难面前退缩和动摇，充分显示了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1922年大罢工中，面对资方和军队的威逼利诱，路矿工人不为所动，一直“作最后的对峙”，谈判代表刘少奇在敌人要将他“斫成肉泥”的淫威面前，坚决不答应无条件复工。就整个运动而言，正是在这种义无反顾的坚韧不拔意志的支配下，安源工人运动显现出长期发展而不溃散这么一个显著特点，即使是在这期间的两次全国性革命低潮中（1923年二七惨案后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人运动仍然奇迹般地“巍然独存”，而且继续高涨，即使在自身的两次失败（1925年9月失败与1928年8月失败）后，也能重整旗鼓，迅速恢复，而且复兴以后的运动都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体现出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坚定意志。

3. 团结奋斗的群体观念

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启发下，安源路矿两局工人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亦始终贯穿于整个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在这场历时五天的罢工斗争中“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当时“俱乐部的命令，胜过军令，遇有事故即一呼百应，如臂使指”。可以说，这次大罢工最后获得的“完全胜利”，是安源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精神的胜利。正如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时，《北京工人周刊》发表的祝贺题词所说的，“安源工友能有这样令全国工友羡慕不已的成就，没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安源工友能团结且能奋斗的缘故”。需要指出的是，安源工人阶级的团结奋斗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团结自己，结成牢固的阶级团体，而且还反映在能团结农民，争取和发动他们起来支持和参与革命，事实上安源工人运动不是由工人孤立地进行的运动，而是一开始就团结其他民众共同反抗的运动。

4. 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一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历史，就是安源工人阶级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创业史。在持续10年的革命运动中，安源工人阶级从没有满足于取得的成就而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而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不断开创运动的新局面。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就曾不失时机地参加和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由自身的联合，进而扩向工团的产业联合、地区联合和全国联合。可以说当时安源点燃的革命烈火燃遍了神州大地。在运动形式方面，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也是层层推进不断深

人，开始主要是开展工人罢工运动，随后紧跟着大革命的兴起，又向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深入农村广泛发动农民运动迈进，最后又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新道路，开创萍乡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必须看到，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中，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最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历程，堪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发展的一个完备典型。而在这进程中，无不闪耀着安源工人阶级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二、八一精神

八一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生成的红色革命精神。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首次高举义旗，实行武装反抗。这一伟大壮举，鲜明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首创精神，同时也蕴涵着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爱国至上，精忠报国”、“一身正气，救民于火”和“敢为天下先”的民族精神。这种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相融合的精神，凝聚成特定的“八一精神”。

1. 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

南昌八一起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领导和发动的伟大壮举。这一伟大壮举的精神“原动力”，来源于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7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7 月 27 日，在南昌城内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 30 日晚举行起义。就在前委讨论南昌起义实施的关键时刻，中央常委张国焘来到南昌，并传达共产国际电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①]张国焘将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主张极力拉拢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起义方可举行。这遭到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等人的坚决反对。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和胆魄，审时度势，认为：“我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靠张发奎”、“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②] 周恩来的意见和决断，得到了前敌委员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页。
② 同上。

会领导人的全力支持。

2. 听党指挥的坚定决心

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突变决定的，起义的全过程呈现了“听党指挥”的定式与格局。

南昌起义的计划确定前，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6月间在武昌就对周恩来表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① 周恩来在起义前夕征询贺龙意见时，贺龙表现尤为热烈。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坚定地向前委书记表示：“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以总指挥贺龙为代表的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始终听从党的指挥，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贺龙在南下广东抵达瑞金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南昌起义军将士“听党指挥”的最典型、最鲜活、最动人的事例。身为共产党员的起义领导人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更是“听党指挥、忠诚不贰”的军事将领。

3. 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

南昌起义胜利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单纯的军事进攻，期盼得到苏联的军火援助，进行第二次北伐，结果主力败散。周恩来认为：“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② 朱德后来总结回忆说：“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结合，而去了广东。”③

朱德是率领南昌起义余下部队走上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旗手。朱德上山，代表了南昌起义后期的正确方向，却经历了从“赣南三整”到“朱毛会师”的千里转战的曲折与艰辛。当年9月底起义军主力叶挺、贺龙部队在汤坑、揭阳、潮汕一带严重受挫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两千余人，及时撤离三河坝，转战赣粤山区。到达江西安远地区时，部队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在极端危难的时刻，朱德毅然进行“天心圩整顿”，召集军人大

---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主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③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会，发表著名演说，一扫郁结在起义将士心间的失败阴霾。朱德说："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次南昌起义就等于俄国的一九〇五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天心圩思想整顿后，朱德接着又进行了组织上的"大余整编"和军事上的"上堡整训"。朱德的"赣南三整"与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是同一时期进行的，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经过"赣南三整"后，部队兵精将锐，提高了战斗力，走向团结统一。湘南暴动后，朱德同陈毅等一起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带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就找到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最佳归宿，走上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朱德毛泽东"式的井冈山道路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4. 为民奋斗的根本目的

南昌起义首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而这支军队的宗旨在南昌起义一开始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致前委信中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南昌起义前夜，《中央委员宣言》就明确提出了"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① 起义胜利当天，起义军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②。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则郑重宣称：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就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③。南昌起义的根本目的及其实施，构建了新生的人民军队的宗旨，同时也体现了南昌起义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奋斗目标。

三、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是什么？中共两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都十分关注和重视井冈山精神，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作了精辟的概括。胡锦涛 1993 年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指

---

①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 页。
② 同上书，第 20 页。
③ 同上书，第 36 页。

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①] 江泽民2001年视察江西时,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作了"24个字"的概括,"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②] 我们认为,对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应把握以下方面:

1. 坚定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

坚定信念、矢志不移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井冈山军民一切力量的源泉,也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所系。井冈山的斗争,既有辉煌与胜利,也有低迷和挫折。在井冈山斗争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时,边界阴霾四起,红军和群众中都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阐明了小块红色区域在四周白色势力包围之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并深刻指出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全国政权的取得。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党内林彪等人和中央"二月来信"的右倾悲观倾向,在福建古田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精辟地描绘了"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学说。一年多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诞生,应验了毛泽东这一科学预见的英明与正确。这种深邃的目光、远大的理想,正是毛泽东信念坚定的突出表现。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主动投身革命,关键是他们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入党参加红军,不是为了做官、挣钱,也不是为了贪图享受,而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

2. 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

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的艰难奋战才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始于井冈山。在井冈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面

---

① 韩京承:《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② 《江泽民在江西省考察工作指出:结合群众实践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基层为百姓办实事好事》,《人民日报》2001年6月4日。

对严酷的军事斗争外，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经济斗争。当时的井冈山，基本上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军用和日用品及现金的缺乏，造成了极大的难题。到了冬天，许多士兵穿的还是两层单衣，为了御寒，战士们坐在稻草堆里，背靠背抵挡寒冷。米虽然靠地方供给，但由于部队人多，吃饭非常困难，有时候连南瓜都吃不上。

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毛泽东、朱德等带领红军战士，一面坚持武装割据，一面采取许多重要举措，创造性地在宁冈大陇开办红色圩场，沟通赤白贸易，在遂川草林保护中小商人，活跃边界经济；在桃寮创办被服厂，解决部队的穿衣、军需；在茨坪设立公卖处，免除苛捐杂税，加强经济流通；在上井创办红军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调剂货币流通；在茅坪、小井创办后方医院、红光医院，上山挖草药，一切土法上马，及时救治伤病员。与此同时，还组织广大军民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解决食盐奇缺的问题；创办军械处，自制土枪土炮，修理坏枪，补充弹药；组织红军指战员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劳动，发展粮食生产；发动军民一起挑粮上山，储备充足粮食，应付敌人进攻等。正是靠着广大军民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摆脱了困境，渡过了难关，巩固了红色政权。在战争和困难面前，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领导，始终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带头率先垂范，与军民们同甘共苦。他们和普通士兵一样，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穿两层单衣，点一根灯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连大名鼎鼎的朱军长，也像个“伙伕头”。这种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

3.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杰出代表。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① 这条革命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是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这条新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从中国的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际出发，独辟蹊径“闯”出来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但起义部队接连受挫，在面临全军覆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果断决策，独辟蹊径，引兵井冈，实现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的战略转移，首创了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拓了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新道路。井冈山道路既是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较量中“打”出来的，也是同党内“左”倾错误的较量中“斗”出来的。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党内一些人主张大肆烧杀的“焦土政策”以及远离根据地大本营、冒进湘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建立了巩固的军事根据地。同时，毛泽东和前委还十分注重党的建设，从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到古田会议批判红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的建党路线和建军纲领，其间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的风风雨雨，才从政治上、思想路线上加强了党的建设，巩固了党的领导，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4. 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

井冈山的斗争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在血与火的拼杀中进行的。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井冈山军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取得了新城战斗、五斗江战斗、草市坳战斗、龙源口战斗等胜利，粉碎了赣敌的四次进剿，而后又通过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井冈山保卫战打破了湘赣两省敌人的两次“会剿”。在这些战斗中，井冈山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英勇拼搏，出现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红二十八团三营营长萧劲在龙源口战斗中被敌弹击穿腹部，他忍着剧痛自己把肠子塞回腹内，包扎好继续带领战士冲锋，夺回高地后英勇牺牲；宁冈县茅坪乡苏维埃政府秘书谢甲开，在“三月失败”中为掩护群众转移不幸落入敌手，坚贞不屈，被敌人开膛破肚、砍成四块。这样的壮烈事迹不胜枚举。他们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顽强拼搏、无私奉献是井冈山精神的要义。

5.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频繁激烈的反围剿中、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党和红

军取得一个个胜利，使根据地在四周白色恐怖之中生存发展。龙源口大捷、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等三大著名战役都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辉煌胜利的。党始终将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在自己周围，保持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从而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军民团结的钢铁长城。而构筑这种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党群关系，首先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在战斗十分频繁的情况下，依然把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就是毛泽东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通过对宁冈、永新两县广泛的社会调查写下的。以这种社会调查用来作为制定党和苏维埃政府各项政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制定和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及三大任务，有力地加强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密切了军民、党群之间的关系，因此受到了边界人民的衷心拥护。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对边界各县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深深感觉到土地问题是农民群众最大、最重要的切身利益问题。因此，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毛泽东就布置边界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昔日缺田少地的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田地，尝到了甜头，了解了共产党、红军勤政为民的宗旨，认识到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真正救星，代表了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在参军、参战、征粮等各个方面倾尽全力支援红军。

为了保障土地革命的成果，毛泽东按照“工农武装割据”的要求，帮助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指示边界各县颁布“施政纲领”，并针对各地虽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不少地方的施政仍存在“名不副实”的现象，指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纠正，真正做到立党为公、取信于民。这从1928年的宁冈县三区八乡苏维埃政府所发布的布告中就可充分看出，同时也可以从1929年1月红四军下山时毛泽东亲自拟写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公告》中得到诠释。如“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这种一切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风，是井冈山精神的根本。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是丰富的，我们在这里仅就它的主体方面作一些扼要的分析。我们认为，在井冈山精神的丰富内涵中，敢闯新路是核心，坚定信念是灵魂，艰苦奋斗是基石，无私奉献是要义，依靠群众是根本。这

五个方面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统一体，各具特色，相互依存，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四、苏区精神

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最为残酷和经济封锁最为严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党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伟大的苏区精神——“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执政为民、群众路线，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苏区精神是我党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继承和升华，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本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苏区精神包含以下内容：

1. 坚定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

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继续战斗的坚强支柱，是产生巨大动力的力量源泉，井冈山革命时期，面对迷茫的革命前景，一些共产党人开始动摇，提出了革命究竟要进行多久的疑问。针对党内动摇情绪的存在，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中说道：“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经过一次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终于建立起来了，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尽管此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和艰难，但是，红军广大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在革命征程中无论环境多恶劣，情况多紧急，始终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等待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的工作理念

在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各方面都处于探索的阶段，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搬苏联模式，这种自以为是、脱离实际的做法严重阻碍了苏区的发展，给苏区工作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 1930 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坚持“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并提

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①] 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还带领广大干部深入调查，结合苏区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使苏区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情况好转，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3.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念

1934 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到：“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正是依靠广大苏区干部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作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动员和团结起广大人民群众，构筑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曾说过：“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②] 正是因为在苏区期间，坚决执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措施，红军才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和长期经济封锁，建立和发展了红色政权，才有革命犹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态势。

4. 艰苦奋斗，廉政奉公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是对中华民族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本质、最客观的描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严格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公正廉洁，反腐倡廉。苏区时期，尽管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非常落后，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苏区领导干部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同心协力，患难与共，艰苦创业，人民的生活初步得到改善。

五、方志敏精神

方志敏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依然坚守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不朽之作。“爱国、创造、清贫、奉献”是方志敏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领域的弥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9 页。

足珍贵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永远称颂和传承的，江泽民总书记曾说过："这决不是说要大家效仿方志敏所说的过去那样一种生活，而是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浩然正气。"① 方志敏精神就是"具有坚定信念的爱国主义、清贫的工作作风、创造性的工作方式、忘我奉献的工作态度"。

1.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忠于党、忠于人民是方志敏毕生信奉的最高信念，他所著的《可爱的中国》感情真挚、脍炙人口，在这部书中，爱国主义情怀表露无遗。他始终坚信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必胜，即使遭到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直至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信念依然——"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② 同时，他为中国光明前途勾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欢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③ 今天，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中华民族已傲立在世界的东方，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这无疑是对方志敏烈士壮烈牺牲的最好告慰。

2. 清贫的工作作风

方志敏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两个铜板。敌军非常震惊：一个中共的重要领导人竟如此的寒酸。崇尚清贫朴素的生活，是方志敏精神又一重要的特征，正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④ 方志敏在《清贫》中回忆了自己的革命生涯："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

---

①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文汇报》1997 年 1 月 29 日。

② 《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1 页。

③ 同上书，第 142 页。

④ 同上书，第 167 页。

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① 方志敏的一生勤俭节约，廉明公正，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他说：“为着阶级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拉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党的事业。”② 五个“不稀罕”、五个“宁愿”，充分体现了方志敏不为财富而折腰，不为权贵而倾倒。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但应该看到，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极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思想堕落，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牟取私利搞腐败。应该把方志敏清贫节俭的思想灌输给千千万万的领导干部，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永葆青春。

3. 创造性的工作方式

创造性的工作方式是方志敏精神又一大独特的亮点，是方志敏敢为人先，奋勇而上的勇气的最好体现。在革命过程中，很多时候，方志敏并没有得到中央及时的指示，而是依靠根据地的客观情况探索革命的道路，把农民武装逐渐发展成为正规红军，进而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进行创建苏维埃的工作；靠从当地实际出发，按照农民群众的要求和革命实际需要，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得方志敏精神呈现了一个闪亮的独特的理论视点——方志敏的创造精神。在创建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他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都有许多独特创造。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处处充满着方志敏的“活跃的创造”：比如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党建原则，建立巩固的强大的赣东北党组织；政权建设方面，苏区巩固地向前发展，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农业、商业、外贸体系；文化建设方面，开创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苏区文化事业；军事建设方面，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

4. 忘我奉献的工作态度

为了革命的胜利，方志敏不仅将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革命，把自

① 《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6 页。

② 同上书，第 163 页。

己的亲人也奉献给了革命。在他的鼓励下，兄弟姐妹纷纷参加革命，但革命是残忍无情的，他的弟弟方志慧、堂兄方远辉、方远杰都相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始终抛弃个人的荣辱，他对中央贡献军事力量，也贡献财力。军事方面，他同意将红十军划归给中央组建红十一军。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期间，赣东北红军又派出南下独立团加入红七军团，驰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财力方面，在赣东北根据地他自己开支节流，每年都给予中央苏区一定的资金支持。1931 年，上缴中央黄金 650 两。1932 年 1 月，两次派交通员给中央送去 350 两黄金。1933 年 1 月，中央苏区面临敌人的严密经济封锁，方志敏仍然决定让调往中央苏区的红十军随带了大量的金银和所需物资。之后，他又派警卫连专程送去金条 2 箱、白洋 48 箱，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他的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值得中华儿女学习和敬仰。

六、长征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毛泽东在 1935 年长征途中所写的一首七律诗，短短的几句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红军长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坚持不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壮丽的史诗。毛泽东曾经说过：“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① 七百个日日夜夜、环境的恶劣，食物的匮乏都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面对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英勇的红军将士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勇气，运用机智的战术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四渡赤水，奇袭金沙，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尽管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广大工农红军战士视死如归，敢于牺牲，最终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胡锦涛总书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他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9—150 页。

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① 长征精神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中一笔宝贵财富，尽管当年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劳永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困难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充斥着诸多的艰难险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应继续跟随红军长征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 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年过半百的老红军，有稚气未脱的小同志，还有刚强的女战士，但就是这样一支看似衣衫褴褛、弱不禁风的队伍，有着"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博大胸襟。一批批战友倒下了，但红军战士们掩埋好战友们的尸体，擦干泪水，继续未完的征程。是怎样的力量在激励、推动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引领他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凭着永远跟党走、甘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才有了今天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和平繁荣的幸福生活。长征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更是理想与信念的伟大胜利，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更应该记住这个理想和信念，才能创造更辉煌的明天。

2. 艰苦奋斗，不惧艰险

长征途中，艰苦奋斗的例子不计其数，"麦面疙瘩汤、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汤、青稞、牛皮带、旧牛皮鞋、牦牛肉、包谷、小米、南瓜、蕨根……"——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出来的部分食物单子。长征中，食物的缺乏成了最大的问题，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吃树皮、嚼草根、煮皮带，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的屎里没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雪地、草地里默默地死去。这是一幅多么心酸的情景！除了食物方面的匮乏，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仿佛是一道无法横越的沟壑。红

①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6年10月22日。

军将士血战湘江、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在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中，有的人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不自觉地停下来歇一歇，结果永远倒在雪山的怀抱里。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但是，这并不能打垮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们。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

3. 团结互助、严守纪律，紧密依靠群众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基础。长征初期，各路红军因为作战风格和战术不尽相同，一整合，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在长征路上也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最终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从那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指挥，风雨同舟，同仇敌忾，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翻雪山，红军战士们你拉一把，我推一下；过草地期间，在忍受饥饿和病痛双重煎熬下，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等等。红军上下团结一致，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长征途中人民群众对工农红军的支持和拥戴，体现了军民的血肉之情。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红军热爱群众，造福群众，人民也拥护爱戴红军。途经藏族区域时，广大藏族同胞筹粮，让“奶茶糌粑装背篓”。不仅如此，沿途参加红军的群众人数达到三万六千多人。回顾历史，二万五千里漫漫长路，红军能完成这犹如史诗一般的长征，与正确的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这不仅是红军与敌人的较量，更是人民与敌人的较量。

4. 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会议。从那以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逐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长征途中也处处闪耀着“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永恒真理的光辉。在后续的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坚持从实际出

发，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战争方略。纵观整个长征的全过程：放弃湘西，转向贵州；取消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确立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舍弃川西，北上陕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突破腊子口……每一个战争方略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息息相关。

第三节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当代价值

一、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基石

1. 历史背景的相似性

第一，江西红色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①]"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②] 中国革命选择了江西，历史记住了江西，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有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正确革命道路的选择，才奠定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坚实基础。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当时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

中国留下了严峻的形势：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境不改变不行。怎么办？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全方面得到贯彻落实。“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①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我国各行各业的持续快速发展，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拿起武器为民族的独立而革命；中国人民打开国门为民族的昌盛而改革。革命与改革的背景是如此的相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2. 科学内涵的相通性

安源工人运动、井冈山斗争、八一南昌起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局部执政、长征胜利，……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也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篇篇动人的乐章，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是值得后人永远称颂和学习的。安源工人运动中，他们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井冈山斗争中他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八一南昌起义中他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敢于斗争，勇于创新；在革命苏区，他们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长征途中，他们乐于吃苦，不惧艰难，勇于战斗，无坚不摧，团结互助。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时指出，“三十年来，我们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6 页。

② 同上书，第 78 页。

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这份成就和荣耀属于所有为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奋力拼搏的中华儿女，他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敢打敢干，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惧艰险，迎难而上、艰苦创业，吃苦耐劳。

红色，是江西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特殊而深沉的历史记忆，它不仅涵盖了那个年代革命前辈们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包含着革命先烈们勇于创新、接受新思想、向往新生活的理想追求。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的人们打破传统，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体现，更是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奋勇争先的真实写照。江西红色革命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科学内涵一脉相通，同宗同根，异曲同工，共同赋予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内涵，树立了中华民族的新形象，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新的伟大奇迹提供了重要精神动力。

3. 革命与改革两者目标的一致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受三座大山压迫，他们的生活一直处于贫困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连续不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旧式的农民起义、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相继失败，国内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革命从江西走来，走向北京，走向新中国的诞生。江西红色革命历史是中国红色革命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数以万计的革命先烈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中国革命的浪潮中，为了自由，为了幸福，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他们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最终，中国人民完成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了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我们党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①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十三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二、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

古代江西在全国地位非常重要，但是近代以后却落后了，现在仍然是中部地区欠发达的省份。我们既要看到江西在古代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又要看到近代江西走向边缘的痛苦历史，从而接受历史的启发，用红色革命精神引领当代江西奋进和崛起。

1. 古代江西社会经济的繁荣

鸦片战争以前，古代江西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可以从经济、文化两个方面诠释。

经济方面。江西农业发达，素有“鱼米之乡”美誉，南朝时，江西已有大量粮食东运，成为当时南朝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唐代江西农业兴盛，粮食、茶、麻等作物有很大发展。南宋及元初，中原人口大批南迁入境，偏僻山区逐渐开发。北宋时江西农业经济位居江南前列。特别是到了南宋，江西农业经济在全国更是遥遥领先。江西手工业发达，唐宋时期，矿冶、陶瓷、造船等业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景德镇是中外著名的瓷都，景德镇青花瓷扬名海外，明代时景德镇已成为瓷都，青花瓷大大发展起来，被称为“国瓷”。古代的另一个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金，冶金主要是铜和铁。江西德兴铜矿在唐、宋年间已经开采，瑞昌铜岭古铜矿是我国和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古铜矿采冶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文化方面。古代江西有着辉煌的文化。特别是宋明时期，江西文化可以说是引领当时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航者。由隋至清，历代中国进士计98689人，江西进士10506人，占10.7%，这表明江西人文昌盛，人才济济。除此之外，江西的诗人、作家众多，如田园派和隐逸诗派陶潜，宋诗派欧阳修、王安石，江西诗派黄庭坚等。理学发源于江西，定型于江西，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都是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最后完成。江西是佛道两教的源流之地，江西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派的发源地。庐山东林寺，是中国佛教十派之一净土宗的发源地。江西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播的中心，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地，有闻名全国的白鹿洞、濂溪、白鹭、象山、鹅湖、怀玉、东湖等书院，官学、私学林立，书院的数量、质量、规模、影响均为全国之首。

2. 近代江西的落后

古代江西的辉煌更凸显了今天的没落。目前江西属于中部一个欠发达的省份。尽管江西地处江南，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历史积淀等条件都很优越，要强于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区。但近代以来，江西的经济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有三：

第一，真正促使江西走向衰退的，是江西失去南北交通主干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京广、京沪等南北向铁路相继建成，但均不经过江西，江西南北交通主干的地位丧失已尽。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江西交通有很大发展，但是与周边地区相比，差距却在拉大。

第二，江西是个农业大省，工商业发展缓慢。近代江西一直以农业大省自居，其主要工业企业，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发展缓慢，质量不高。与其他较为发达的省份相比，江西工业要落后20～30年，由此造成整个江西近代经济难以转型。

第三，思想保守、安于现状。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江西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红色革命历史是江西历史辉煌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江西人骄傲和自豪。但是，江西人传统观念严重，思想过于保守，故步自封。同时，江西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受小农经济的束缚，农民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安于现状，制约了江西的发展和进步。

3. 红色革命精神引领当代江西崛起

2001年12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在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而奋斗”的战略目标，江西人民无不受之鼓舞、为之振奋。过去十年，江西人民解放思想，力争上游，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江西要崛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中我们要充分发扬江西红色革命精神。

安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长征精

神等红色革命精神是江西这块神奇土地独有的精神财富，为江西在中部的崛起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支持和智力支撑。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敢为天下先、勇闯新路。这些特征之间相辅相成，同时为当代江西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大厦的支柱。安源工人运动、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红军长征中，无数的革命先烈胸怀共产主义坚定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振臂激情呐喊："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江西省人民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对远大理想的执著追求精神，要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信江西的未来更美好，我们才不会为前进过程中发生的曲折甚至暂时停滞而手足无措，也不会为与其他发展较快的省份之间的差距、暂时的不如人意而自暴自弃、妄自菲薄；更不会为一时的发展缓慢而丧失信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如何加快江西崛起，确保江西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从现有的本本出发，按部就班是万万不可的，必须从江西实际出发，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江西省是中部一个欠发达的省份，省情与别省不尽相同，生搬硬套、照本宣科绝对不行，只有立足本省省情，从实际出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寻找到出路。从最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江西已初步找到了一条符合江西省情、加速崛起的新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比如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江西省委、省政府立足江西省情、着眼全省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温家宝总理关于"保护鄱阳湖生态环境"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同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精神的最好见证。

依靠群众、艰苦奋斗。依靠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根本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江西革命精神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与全省人民共患难，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为江西崛起的浪潮中。革命战争年代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江西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越是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决避免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好大喜功的恶劣现象出现。要认识到与其他省份的差距和不足，不断探索，励精图治，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稳扎稳打。

三、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

1. 拓展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教育对象

第一，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教育。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作风。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 邓小平告诫全党："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② "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③ 江泽民强调指出："建设好我们的党，首先要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要努力提高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④ 胡锦涛指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教育，提高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的根本保证。把江西红色革命精神融入到提高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素质提高的实践中，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肩负的责任和义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摆正公仆位置；严格杜绝骄奢荒淫、贪污受贿的现象出现，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严格自律的自觉性的紧迫感。

第二，对青少年的教育。自古以来，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革命先辈们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青少年去巩固和发展。革命先辈顽强斗争到底的革命气魄，需要青少年去继承和发扬。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意气勃发、朝气蓬勃、肩负重任的一代，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否后继有人。1985 年 3 月 7 日，邓小平指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9 页。
③ 同上书，第 328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 页。

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① “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②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饱含深情地对青少年说：“二十一世纪是你们的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你们的肩上。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你们去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你们去创造。”③ 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最好的教材。我们要利用先辈们诸多真实、感人肺腑的案例感染、教育、引导青少年奋发图强，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学习革命先辈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的崇高品德，使伟大的江西红色革命精神世代相传，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

第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喊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时代强音，并从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并贯彻落实到党的一切工作和行动中。邓小平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⑤ 中国共产党正是不断教育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才最终取得了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0 页。
② 同上书，第 111 页。
③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2 页。

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2. 拓宽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教育的渠道

第一，学校教育。重视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曾经指出，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是最基本的建设，同时还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由于当前各种思潮的侵袭，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显得非常严峻。我们应该把革命先辈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精神教育与传统科目传授结合起来，融入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日常教学中。随着国家对教育投资力度的逐步加大，学校教育应是今后江西革命精神教育的主阵地。最近几年，许多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参观革命旧址、访问革命老人、看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等等。如江西省瑞金第一中学，校内有一座古老的祠堂，曾是红军中央大学所在地，也是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宣誓入党的地方。学校对旧址多次维修，并在室内专门设立了革命历史陈列馆和校史展览室，既美化了校园，又起到了教育的作用。井冈山市各学校多年来坚持开展“十个一”活动：听一堂革命传统教育课，重走一次红军路，学唱一首井冈山的红色歌谣，撰写一篇有关井冈山精神的论文，参观一次革命旧居旧址，参加一次井冈山精神研讨会，观看一部有关红军的影视剧，种一棵井冈山常青树，帮助一位老区贫困学生，为老区人民至少献一次爱心，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全国各地学校也纷纷利用各种形式用优秀的革命传统教育人，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第二，社会教育。现代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现代人的成长已不完全局限于学校和家庭，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社会教育不仅面对青少年学生，更多的是面对社会的独立成人劳动者。社会具有其独特的条件和优越性，教育形式相对学校和家庭来说，更加多样化，如博物馆、文化站、图书馆等，都是很好的传播手段。因此，社会教育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行革命精神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宣传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精神理念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中，通过社会这个转化器，在人们完成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后在社会进行再教育。良好的道德品质形成与发展，是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综合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仅仅单方面地依靠学校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是很难有效促进全体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品质健康发展的。

第三，家庭教育。“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是社会有机体的组

织细胞，家庭对于人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难以取代的，家庭是“终身教育”，它不仅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先行者，更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继承者和延伸者。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对于子女在思想品质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人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日益增长。独生子女家庭为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对于培养孩子智力水平、身体发展有了更优越的条件，但日益凸显的对立面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因为家长的溺爱和传统意识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挥霍浪费、唯我独尊、安于享乐。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诸多的消极、不健康的因素充斥着孩子们的视野，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信息极容易影响到孩子们的身心发展。面对众多类似问题，加强家庭教育的力度和有效性迫在眉睫，把革命精神教育融入家庭教育的范畴，针对不同的状况，教育孩子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戒骄戒躁。

3. 革新江西红色革命精神教育的载体

第一，大众传媒。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先进。尽管近年来，媒体的作用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争论喋喋不休，但从造福人类的角度看，大众传媒的正面影响是主要的。如何把握好宣传的度显得尤为重要，报纸、电视、书籍、电影、广告、手机等都是大众传媒的载体。江西红色精神教育的宣传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这个有利的工具。例如，江西人民出版社配合江西省红色文化宣传与弘扬，着眼于传播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出版了一大批获得学术界广泛好评和读者喜爱的红色图书，例如，《方志敏文集》、《南昌起义亲历记》、《亲历南昌起义》、《论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史》、《井冈山精神与当代大学生》等。2006 年，江西卫视为纪念长征 70 周年推出了首届“中国红歌会”系列活动。随后每年举行一届，江西红色革命精神也因为“中国红歌会”的热烈开展而得到传承和远播。《红军不怕远征难》、《十送红军》、《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当兵就要当红军》等红色革命歌曲在广大人民群众产生的效应非同凡响。

第二，红色旅游。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在总结江西红色旅游时曾这样表述：“江西是一块正在迅速崛起的‘红土地’，无数革命先辈和英烈在这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给革命后代留下了永远值得学习传承的伟大精神和永远值

得寻访缅怀的红色圣地”。1998 年，江西率先提出“红色旅游，绿色家园”的红色旅游促销口号，引领红色旅游、绿色旅游、古色旅游全面快速发展。红色旅游的形式丰富多彩，伴随生成的红色旅游产品众多，如井冈山景区推出的“吃一顿红米饭，唱一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次红军墓”的“六个一”活动；赣南一些县市推出的“寻访红色故都”、“重走万里长征”等红色旅游项目。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越多，对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越大，对红色文化的弘扬效果越大，同时在拉动消费、确保增长、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贡献越大，红色旅游的综合效应也日益显著。

第三，网络红色教育。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传播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最快捷、最便利的传播方式，是弘扬新时期江西红色革命精神的一条重要途径。因为网络快捷、方便、及时的特性，能够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非常有利于培育和弘扬江西红色革命精神。

为了更好地提高网络红色教育的有效性，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网络红色教育的建设：一是要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使网络资源与江西红色革命精神资源实现充分的整合。在江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红色革命资源，这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课堂”和“实践基地”，所折射出的革命先烈们不怕困难、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进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生动教科书。现在江西省许多高校建立了各种红色网站，初步实现了网络资源与红色革命精神的整合。二要构建以红色资源为载体的网络信息平台，以满足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良好行为习惯培养的需要。良好行为习惯是人才成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要以学校红色教育网站为平台，开发红色教育资源，进行红色革命精神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网络资源与红色革命精神的有效整合，达到育人目的。

第八章

江西红色历史的价值与当代实践

第一节　江西红色资源概览

一、江西红色资源的概要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里，红色土地与绿水青山相间，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这里，养育了世世代代生于此、长于此的江西人民，锻造了江西人民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的坚强意志；这里，孕育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人民军队的摇篮、共和国的摇篮、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从而成为全国红军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也被誉为中国红色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在江西大地上展开了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上描绘了英勇、无畏、悲壮、永不言败的奋斗篇章。从安源工人运动到八一南昌起义，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到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新四军的组建与开赴抗日前线，从上饶集中营革命志士的斗争到迎接江西全境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都是在江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无数革命先烈在江西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美人生，革命前辈在江西留下了不朽的“红色”传奇；传播和创造先进的思想理论，孕育了红色革命文化，培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实践过程中在赣鄱大地上留下的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

江西红色资源的分布，具有广泛性和集结性相统一的特征。红色的江

西，就像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博物馆，几乎每个县、市都有一定数量的红色资源，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馆遍布全省各地，数量多、分布广。据统计，全省各地建有革命纪念馆19个；已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有11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江西红色资源又表现出相对的集结性，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革命摇篮井冈山、红色故都瑞金等地，共产党人开展了具有原创意义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实践活动，所留下的红色资源不仅非常丰富，而且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井冈山革命旧址群和瑞金革命旧址群就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此外，兴国、于都、宁都、寻乌、上饶、横峰、弋阳、修水、铜鼓、吉安、永新、遂川等县、市，也都保存有数量可观、规模较大的红色资源遗址遗物。

事实上，江西不仅物态形式的红色资源得天独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形态的红色资源思想深邃、理论系统。这既表现为各种革命遗址遗物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实与进程，表现为革命事件所蕴涵的革命道理与思想；表现为革命先烈和前辈所展现的坚定革命信仰、坚强革命意志和崇高革命精神；又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理论家对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与提升而形成的正确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在江西进行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创立和形成的革命理论，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革命理论和精神，既是革命时期的思想灵魂，也是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并引导江西人民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实践，成为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传家宝，由此也构成红色资源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江西红色资源的生成与发展

1. 江西红色资源的生成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留下的宝贵资源，主要表现为革命遗址、遗物、革命事件、革命英烈的英雄事迹以及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因此，红色资源的生成与发展，

必然是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与革命发展紧密相连的。

江西革命实践的发生和江西红色资源的生成，有其内在的社会必然性和主客观条件。在中国近代史上，江西经济社会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方面，随着近代铁路和海运交通格局的变化，随着沿海开埠和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的建立，沿海地区的经济比重逐步加大，而处于内地的江西则逐渐失去了宋明以来在全国经济地理中的重要位置，不再有往日的辉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农民阶级的苦难日益加深。另一方面，随着九江开埠，汉冶萍公司的成立，江西的近代工商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民族资本积累缓慢，深受多重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有这些，为赣鄱大地发起革命准备了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传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的逐步提高，标志着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重任的先进阶级已经形成，广大工农群众已经成为推进中国革命实践新发展的最坚强的依靠力量。

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自此，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开始自觉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中国红色资源由此发端，江西红色资源也由此孕育发生，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南昌二中进步学生袁玉冰、黄道等于1920年夏组织成立“鄱阳湖社”，同年12月，更名为“改造社”，并决定出版发行《新江西》季刊。方志敏于1921年加入了改造社。改造社是江西第一个革命社团，它通过《新江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并本着“劳工神圣”的精神，到劳工群众中去做宣传教育工作。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改造社多数成员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江西》也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1923年至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南昌特别支部先后成立，并出版《青年声》、《红灯》等革命刊物。从此，江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江西红色资源由此生长共存。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在工人阶级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

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由于地缘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分别在萍乡和南昌展开。萍乡的安源路矿是近代江西最大的工业企业，路矿工人在五四以后发展到13000余人。安源路矿地处江西和湖南两省边界，有很多湖南籍的工人。因此，湖南党组织把领导推进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922年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隶属中共湖南支部。从此，安源路矿工人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直接领导安源工人运动，推动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尤其是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创造了幼年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这一时期，以安源工人运动为核心，全省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持续高涨，革命活动所留下的遗址遗物大量增加，标志着江西红色资源的本源和里程碑意义，特别是在安源地区，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毛泽东等同志的旧居等一大批革命旧址以及俱乐部之歌、俱乐部制度等成为红色资源的代表性遗存。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新阐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新发展。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所向披靡，革命形势很快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公开叛变革命，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汪精卫的反共面目也逐步暴露出来，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政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由于江西已有的革命主客观条件和较好的群众基础，江西逐步成为革命新高潮的主要区域。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共武装斗争的重要事件。此外，赣中的吉安东固暴动，赣东北的弋横暴动以及赣南、赣北地区的暴动，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实践。这些武装斗争，表现了中共探索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思路、新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新的革命遗址遗物。最具代表性的有南昌起义指挥部江西大旅社、朱德军官教导团、安源张家湾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等。这就标志着江西红色资源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逐步扩展。

中共领导的起义，相继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在此背景

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寻求中国革命新的道路，决定放弃进攻城市，探索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路。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赣南、广东、湘南而最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一部分进驻井冈山。所有这些，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坚强的军事保障，井冈山由此成为全国革命的核心区域之一。井冈山茅坪、茨坪和“大小五井”的革命旧址群、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井冈山土地法》、党的工作制度等法律制度，尤其是党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培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成为最为宝贵的红色资源。

2. 江西红色资源的丰富与发展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一大批工农武装割据的建立，以“朱毛红军”为代表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南京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和江西湖南等省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会剿”。井冈山前委领导井冈山军民对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第一、二次反“会剿”的重大胜利。在1929年1月的第三次反“会剿”斗争中，由于敌强我弱，井冈山前委决定红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围魏救赵”的方针，从外线打击敌人，以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围。于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主动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把革命的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的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逐步形成，赣东北、赣西南、湘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正如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指出：由于江西的主客观条件，“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根据地军民和全国劳苦工农大众的革命斗志，为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新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与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及各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和广大军民，围绕革命武装斗争这一核心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任务，在先后五次反“围剿”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建设、红军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效，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红色资源。这一时期是江西红色资源丰富与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并在革命实践中首创了中国红色资源最具典型的本源性成果。

在中央苏区时期，江西红色资源发展具有鲜明特点。一是物态形式的红色遗址、遗物极为丰富和集中，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各县以及各革命根据地，留有大量的反“围剿”革命战斗遗址、革命政权机关遗址、革命前辈和领导人旧居、革命先烈的遗物等。二是制度形态的红色资源更加完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等法令，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政权建设、反腐败斗争、经济建设和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制度。三是精神形态的红色资源更加丰厚，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星火燎原”的坚定革命信念，“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创新精神，“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理念，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精神等，构成了伟大的苏区精神的重要方面。四是行为作风形态的红色资源得到进一步发展，“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是苏区作风的真实写照，模范兴国的干部践履的“十带头”则成为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典型，其核心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执政为民、服务群众。五是思想理论形态的红色资源更加深邃，从古田会议开始确立和实践思想建党的原则，在革命武装斗争尤其是反“围剿”斗争中丰富了游击战略战术思想和红军建设思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中发展了土地革命政策和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论。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伟大开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奠基，这也是江西红色资源和中国红色资源的精髓和灵魂。

但是，革命的道路总是崎岖的、曲折的。中央苏区在连续四次取得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于1933年9月调集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更加疯狂的第五次“围剿”。而此时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苏区全面推行，他们在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

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这就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而最后失败。为此，我们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 87000 名多指战员告别瑞金，告别赣南，从于都渡过贡江西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和其他苏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等光辉诗篇，真实地反映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誓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也是江西留给世人的珍贵的红色资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江西各级党组织，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各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驰骋在大江南北，展开英勇的对日作战，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至今，位于南昌市区的新四军军部旧址，成为重要的红色资源遗产，记录着新四军从组建到开赴抗日前线的红色历程。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屡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寻找不同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制造反共事端和一系列惨案，皖南事变就是其中突出的例证。皖南事变后，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干部和共产党员，对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这两次成功的越狱暴动，使 60 多位革命先辈冲出牢笼，重回党的怀抱。这成为上饶集中营斗争的高潮，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监狱中对敌斗争的成功范例和斗争壮举。由此这座由敌人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却成了革命志士留下红色斗争和精神、创造革命斗争壮举的红色资源纪念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迎接新中国曙光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江西党组织领导江西人民，从边区武装斗争到城市罢工运动和学生运动，从组织军需物资支前到政治动员、政治攻心和宣传教育，既支持了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更直接配合和参与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江西的战斗。在此期间留下的红色资源，同样是我们永恒的宝贵财富。

三、江西红色资源开发要览

1. 江西红色资源的政治性开发与“红色”文化事业的发展

红色资源具有天然的政治价值和文化育人功能。因此，对红色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首先是从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教育展开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8月，毛泽东就委托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命根据地访问团把他的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赠送给江西人民。根据中央的有关部署和要求，江西省的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建立了许多革命纪念馆、博物馆，修复、整理、保护了一大批革命旧址、故居，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红色资源的开发和“红色”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文化事业中的一大亮点。

目前，江西共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1个，它们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于都革命纪念馆及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秋收起义纪念地（萍乡秋收起义纪念碑、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兴国革命历史纪念地（纪念馆、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烈士陵园、赣东北特委、红十军旧址等）、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这些教育基地在近年来或改建、或扩建、或重建，既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原貌，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因素，从而更好地展现了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革命斗争的场景和英雄事迹，发挥了更好的教育功能。这已经成为红色资源开发的代表性成果。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与管理，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如位于南昌市黄金地段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扩建工程，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的恢复，兴国将军馆从潋江书院迁入新建的将军园，萍乡秋收起义纪念碑及广场建设，等等。特别是遍布全省各地的60个省级教育基地和268个县（市）级教育基地的建设与管理，以及登记在册的1500多处革命旧居旧址的保护与开发，其开发与管理面广，情况更加复杂，更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更需要地方政府财政支撑和政策支持，需要工作人员的敬业态度和奉献精神。这充分体现了江西老区人民敬仰红色历史、弘扬革命传统、营建精神家园的情怀。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文化育人功能，需要对其进行“再生”开发与创造性提炼，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构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体系。对此，江西省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有益探索，特别是江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专门下发《关于在全省高校推进红色资源教育进校园工作的通知》，对红色资源教育进行了具体部署，并组织高校相关力量进行研究和

开发，构建体现红色革命理论、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红色革命精神为教育主线和特质，融革命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群众观和利益观教育于一体的内容体系。

一是开发研究红色革命理论与党的先进性理论发展的渊源关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价值和政治价值，从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进行以“四信”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观教育。

二是开发研究中国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传承性与发展性，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性、正确性与实践性，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大的政治，实施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让人民所得的利益观和价值观教育。

三是开发研究中国革命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的“源与流”的关系，揭示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实施红色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教育，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根基。

四是开发研究中国革命精神与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相承相融的关系，揭示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清贫精神、长征精神的精神动力作用和时代意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筑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开发和利用红色资源，还需要有恰当的形式。近年来，江西的红色演艺业、红色会展业、红色图书出版业、红色影视文化业等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电视台推出的“中国红歌会”，堪称弘扬革命精神、发展“红色”文化的成功范例。事实上，党中央一贯重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弘扬革命精神，胡锦涛在2008年2月14日视察江西时强调“三保一弘扬”，即“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中共江西省委新世纪之初就提出“弘扬井冈山精神，树立江西人新形象”。缅怀红色历史、获取精神动力，加快改革开放，不仅成为4400万井冈山儿女的共识，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正因为如此，江西省相关部门推出“中国红歌会”后，立即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广泛参与，并影响到海外游子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好人士参加。红歌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的文化需要；又陶冶了群众的情操，

弘扬了革命精神。红歌会真正唱出了优良传统，唱出了革命激情，唱出了百姓精神面貌，唱出了社会正气。

2. 江西红色资源的经济性开发与红色文化旅游业的繁荣

江西丰富的红色资源，既是得天独厚的政治和教育资源，也是一种优质的旅游资源。江西省十分重视红色资源的旅游开发。2000 年，江西就开始打出“红色旅游”牌；200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之际，又提出了“红色摇篮、绿色家园”的口号。2004 年 10 月，开展“2004 年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江西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推介活动。所有这些，极大地推进了江西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为促进红色旅游业的持续发展，2004 年 12 月，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同时，江西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和实施《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按照“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着力构建六条精品线路，即：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赣湘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重点加强包括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

江西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成效，江西红色资源的客观条件均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肯定。2005 年 2 月，在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 13 家单位首次联合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名录》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上，全国红色旅游 30 条精品线路和 123 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南昌—吉

安—井冈山线；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萍乡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井冈山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上饶市的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

近年来，江西抓住全国兴起红色旅游热的机遇，一方面深度开发、挖掘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把休闲旅游与瞻仰革命圣地统一起来，把“红色”体验与红色感染统一起来，打造了一批比较成熟的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另一方面大力改造和建设红色旅游硬件设施，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的快速建设与发展，大大改善了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的交通条件。尤其是一支新生导游、讲解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以及旅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大大提升了江西红色旅游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江西的红色旅游品牌正在形成，并正在联合兄弟省市根据旅游市场发展动向，深度打造中国红色旅游品牌的新路子，促进红色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节　江西红色历史的地位

一、中国红色历史的开端性实践

1. 从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到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缓慢性和滞后性。因此，在近代中国首先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和受众客体。正是这样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声中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积极介绍、宣传先进的理论。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也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初步找到了指导自身翻身解放，从而也是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先进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治组织条件逐步成熟，并于1921

年7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这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担当起领导全民族实现这一伟大使命的重任，就必须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必须教育和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就必须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就必须在工人阶级中培育、发现先进分子并将其吸纳到党组织中来。于是，在建党之初，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和吸纳党员，成为党的建设十分重要的任务。

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党一开始把党建工作的重心放在各中心城市；而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中学生被吸纳到党组织中来。这为党组织的继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党的事业终究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代表全体中华民族的事业，需要更加强大的组织保障。于是，在工人阶级中广泛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增强其阶级意识，提高其阶级觉悟，从而推进中国革命的新发展，便成为当时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和思想认识，党的一大后，为了加强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它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随后，各省纷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机关，湖南省分部在长沙诞生，毛泽东任主任。位于湘赣两省边界的萍乡安源煤矿和为运输该矿煤炭而修建的株（洲）萍（乡）铁路，合称安源路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之一。安源路矿邻近湖南和拥有众多湖南籍工人的实际情况，使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把它列为组织发展和推进工人运动的重点工作范围。

1921年秋，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的公开身份到安源考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直接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序幕。毛泽东以参观矿山的名义下矿井、进工棚，广泛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疾苦和路矿情况，启发工人觉悟。经过一周左右的调研考察，他认为安源是一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好地方。回到长沙后，他与湖南劳工领袖商讨并通过湖南劳工会的工作，劳动组织书记部与安源火车房工人李涤生、周镜泉、朱少连、杨秋生四人建立了通信联系，寄送《新青年》、《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分发到路矿工人中去传阅；把载有各地工人运动消息的报纸不断寄往安源，由李涤生等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在安源传播开来。

同年11月，毛泽东与李立三第二次到安源，他们白天深入矿区调查访问，晚上邀集工人召开座谈会，宣传组织工人团体的必要性，并明确工人团体名称可叫"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2月，受湖南党组织的派遣，李立三携带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介绍信，以兴办平民教育的身份重返安源。他到安源后，积极开展工作，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小学，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以平民小学教师的身份在矿区工人群众中公开活动，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建立了安源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吸纳工人中的先进骨干分子加入团组织；创办了第一所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夜校），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进行读书识字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培养先进分子。在此基础上，安源建党的工作水到渠成。

1922年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发展了第一批工人党员朱少连等6人，李立三任书记，支部机关驻安源矿区，隶属中共湖南支部。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它是中共安源支部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1923年春，在安源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安源地委；到1925年1月，已成为下辖10多个支部230多名党员的地方党组织。中共安源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是中共江西党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是江西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是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的党支部。安源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江西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现。从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农村转移，并开始探索和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诚然，共产党人选择的这条新的革命道路，也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道路。如何使工人阶级政党在农村站稳脚跟，如何使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同农民阶级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统一起来，如何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使农民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如何在农村环境中发展壮大党组织，如何使共产党在农村环境下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等等，均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可以说，在农村发展党员

建立党组织就现实必然地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农村建党，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特点，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而农民阶级则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同时，经过党的教育、启发和培养，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完全可以进入党组织成为共产党员。这不仅因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而且他们的阶级特性也具有相似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对先进分子开放的政党，只要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拥护和承认党的章程，愿意为中国革命而不惜牺牲，并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党的忠诚，积极承担并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不论他的阶级出身如何，他都可以被吸纳到党组织中来，更何况党还可以通过各级组织来加强对他的教育。

毛泽东在创立、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发展党组织的工作。而新发展的党员中，有许多是出身农民的。1927 年 10 月，在茅坪“安家”后，针对当时军心还不够稳定的现象，毛泽东决定在各连队挑选工农革命骨干发展入党，以巩固三湾改编的成果。10 月中旬，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一团二连，出击酃县十都，在移师水口时，他首次发展了 6 名党员，史称“水口建党”。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建党活动。其后，各连队相继开展了建党活动。这就把一批包括农民出身的优秀分子吸纳到了党内，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8 年 2 月，毛泽东率红军来到永新县秋溪乡，打垮了靖卫团，发动群众斗争打土豪，启发了群众的革命觉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先进的贫苦农民。他们出身贫苦之家、斗争性强、工作积极、敢于牺牲。毛泽东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发展了李松林等 5 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在党支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还亲自同新党员谈话，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勉励大家要坚定立场，永远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带领农民群众闹革命。毛泽东离开秋溪乡后，党支部又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共计 8 人，使党支部的党员人数扩大到 13 人。后来，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秋溪乡党支部的党员发展到 50 多人。秋溪乡党支部和党员，承担和执行了传递革命信息，领导和组织工农暴动队，成立工农政府，领导分田分房，打土豪筹款子，支援革命战争，动员

群众参军参战等一系列革命任务，在白色恐怖的困难环境中，积极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毛泽东称赞它是一个能战斗的党支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授予秋溪乡支部为模范党支部，东南特区授予秋溪乡为模范乡。

秋溪乡党支部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亲自建立的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秋溪乡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有效的工作，不仅为保卫红色政权，巩固湘赣边界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表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党探索和开辟的革命新道路，在实践中有了新发展。

2. 从城市武装起义到农村武装割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俄国十月革命不仅给中国送来了先进的理论而且也送来了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直接学习俄国革命先城市后农村的模式，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意图先夺取中心城市，而后掌握全国政权，这是俄国革命给我党留下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把目光投向城市，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发展党组织，领导并促进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甚至于组织了诸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但面对强大的阶级敌人，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武装起义归于失败。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的中国共产党，逐步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于是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之机，中共开始为革命培养军事骨干，并拥有了受共产党影响或直接受共产党员领导的革命武装，如周恩来亲自指导组建的铁甲车队、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但革命的阵营也发生了分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面对敌人的屠刀，唯有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坚强的反抗，革命才有出路。于是，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举行秋收暴动和武装起义，并于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初步总结，特别是对武装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题进行了初步总结，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八七”会议前后举行的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三次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南昌、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此外，中国共产党从 1927 年秋到 1928 年夏，在湘、鄂、粤、赣等十几个省的 150 多个市县，发动近百万工农群众和数万革命部队，举行了 100 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绝大多数因遭到镇压而失败或受挫，但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聚集了革命力量，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以城市武装暴动为主要形式的革命斗争纷纷受挫，这带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新的启示，毛泽东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革命不能再直接援用俄国革命的方式，并开始思考和实践符合中国国情而不同于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的新道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主动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他率领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至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在全国范围内已建成赣西南、闽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革命根据地，覆盖了十多个省的 200 多个县，人口达 1000 万，红军发展到 10 万余人。中国革命农村根据地从井冈山的摇篮，逐步发展为遍布全国的工农苏维埃运动。

3. 红色革命实践的全面展开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是全国红色革命的核心区域，红色革命实践在江西得到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在江西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在燃向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的过程中，首先在江西形成了燎原局面。江西省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江西省的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就在秋收起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的同时或稍后，全省各地的农民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在赣北，德安、星子、永修等县爆发了农民暴动，由此产生了以德安、九江边界的岷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永修云山游击区；在赣西，有著名的万安暴动、吉安东固暴动、吉安延福暴动、泰和暴动、永新暴动、遂川暴动等，逐步形成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直接策应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了弋阳九区暴动和弋横暴动，建立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根据地，这也是毛泽

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与井冈山根据地并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在赣南，南康、赣县、信丰、于都、寻乌、兴国等县，先后发动了农民暴动，建立了于（都）兴（国）根据地，这为后来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后来，在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同时，江西各地的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主要有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并普遍建立了省、县、乡级苏维埃政权。这充分反映了江西省革命根据地发展和苏维埃运动的勃兴。

红色革命实践的展开，在地域上不仅表现为覆盖了江西全省各地，而且有效地辐射、带动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发展。尽管当时党内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识还不一致，但井冈山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也使中共中央对它更加重视，并通过多种方式介绍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从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经常登载介绍井冈山斗争方面的文章，从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促进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特别是湘鄂赣、鄂豫边、湘鄂西、广西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就明确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学习朱毛红军”、“接受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等，以此推进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红色革命实践全面展开、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央苏区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江西红色革命的实际发展进程为背景，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并指导了革命实践的全面展开。江西全省各地的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治国理政的预演，领导了党的建设、军事斗争、土地改革、红军建设、政权建设、反腐败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等各领域的工作，有力地推进了根据建设的全面发展，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局部执政实践和革命实践，为日后领导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建设，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执政、全面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经验。

二、毛泽东思想的奠基

1.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不唯书、不唯上”的思想方法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政

党，是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政党。但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学风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以怎样的思想方法来探索和引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是党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思想路线问题。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相对弱小，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相对不足；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才刚刚起步，而第一批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自身也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就使得我们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从本本出发、从外国经验出发、从上级指示出发、从群众自发性出发的错误思想路线。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接受、学习、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总是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基于实践的需要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现实结合，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割裂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是照搬外国革命经验和模式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是一条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是认识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方法，从而也代表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指向。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显示出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独到见解，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的独到之处。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既是针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作，更是基于我们党成立后近十年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阐论，并第一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

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

① 《毛泽东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①

那么，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制定正确而坚决的斗争策略呢？这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这就是说，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反对和破除"唯书论"、"唯上论"、"唯共产国际论"的教条主义，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不同于俄国，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主体力量、道路和方法也不可能与俄国完全相同，只有把中国的具体国情搞清楚，才能对中国革命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策略，才能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 要搞清楚中国的国情，要了解中国的情况，非开展调查研究不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③，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开篇论断，也是该文的核心思想。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涵。科学的认识，只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正确的决策，必须依赖于正确的认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首先在于调查和把握该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否则，在家里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那只是"蠢人"的行为，是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因此，毛泽东不仅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还重视调查研究的目的、技术方法和具体要求，从而使调查研究能形成正确的结论，真正解决问题。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④ 为此，必须开展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调查研究。不仅要通过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尤其要注意社会经济调查；在社会经济调查中，其对象是社会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面的社会现象；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要进行农村调查，也要进行城市调查。举例来说，在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09页。
④ 同上书，第110页。

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量，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量；在调查商人成分时，不但要知道粮食、衣服、药材等行业的人数，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全面剖析各种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进而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有正确的调查方法。否则，“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①。为此，毛泽东总结和概括了召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选择好调查对象、研究好调查人数、制定好调查纲目、亲自出马、深入调查、亲自做记录等具体的调查技术、方法和具体要求。依此方法和路径，才能使调查逐步深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从而达到“明了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的主要目的。

可见，调查研究就是为了把握中国的国情，掌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是为了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为了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用“本本”来割裂实际。诚然，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 但是，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不能把它作为不可变更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只能使革命受到损失；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其实是反对上级的指示或对上级指示的怠工。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绝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③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 页。

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 我们对待上级的指示也是如此，不可一味盲目执行，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使它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在这里，毛泽东是要在党内和红军中树立一种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既要认真学习和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毛泽东就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模范，是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模范。他总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新政策，如1927年年初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实地考察，秋收起义前的板仓调查和长沙调查，井冈山时期的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等，进入闽西时的长汀辛耕别墅调查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地的调查，等等。正是这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如此，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探索和实践符合中国国情而不同于俄国经验的革命道路。

2.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走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这条革命道路上，中国无产阶级既不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更不是通过议会斗争，直接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既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在首都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也不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样一步到位，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革命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但又有着必然联系的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它又不同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同时，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又分别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阶段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唯有掌握政权，才能逐步实现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最终目标。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引擎支撑下，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从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应该包括这两个阶段的革命道路。但是，限于本书所讨论的范围，这里特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探索与实践而初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面对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的屠杀政策，共产党人没有退却，没有妥协，而是做出了武装反抗的正确斗争决策。但是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或失利。这就为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是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还是放弃以攻取大城市为武装斗争的直接目标，实行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探索了一条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引兵井冈山的正确决策，并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工农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与此同时，各地起义队伍也纷纷走向农村。尤其是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井冈山工农红军胜利会师，不仅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而且进一步同农民运动相结合，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使工农武装割据地区一天天扩大，湘赣边界的割据逐步形成和巩固，边界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这也促成了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向农村转变的实践展开。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实践，以及对这一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端。工农武装割据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环节和必由之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1月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一周年之际所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的两篇著作，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萌芽，也是被井冈山革命斗争证明了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

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但是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的发展是螺旋

式上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围剿”，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3 月 20 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做出了连片割据的决策，这是对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进一步提升。从此，开始了从小块工农武装割据向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展的革命实践。也正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和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于 1930 年 1 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当时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右倾悲观思想，进一步分析了革命形势和对于时局的估量，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时期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在这里把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更大范围工农武装割据，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强调要树立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纠正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连在一块的政权。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的。强调实施“有计划的政权建设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根据地建设的政策。同时，毛泽东对当时革命的主观力量，客观情况，尤其是日益尖锐、复杂和不断发展的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了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很快会要到来的结论。而这种“快要”到来，毛泽东用一种诗人的豪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愿景：“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①

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的悲观主义情绪，围绕着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这个具体问题，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根本问题，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 页。

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之后，这一理论在中央苏区形成的过程中进行了成功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3. 红色革命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观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个阶级（或多个阶级联合）通过国家政权对其他阶级实施统治。所以，政权问题成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夺取和建立政权，是革命的根本目标；而建设和发展政权，是巩固革命成果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革命发展过程中，土地革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红色革命政权建设的实践，为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观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素材和经验。在政权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的革命实践与发展，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经由了建立小块红色政权——连片的较大范围红色政权——全国性政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建立茶陵、遂川、宁冈工农兵政府，进而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到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连片拓展，在各级红色政权的基础上，成立闽西工农民主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再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全国性的红色政权最后建立。其间，伴随着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的红色政权也纷纷成立。

红色政权究竟是一种怎样性质的政权？红色政权就是工农民主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是学习俄国革命胜利经验以苏维埃形式组织运作的革命政权。红色政权的建设在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一起，构成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斗争体系。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特别强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并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红色政权是与国民党政权具有不同性质的新式政权，红色政权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正如毛泽东为筹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起草的指示信所言："新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①] 而政府大门口两边所挂的通红对联："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也是红色政权革命性和人民性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同志们，乡亲们！新年伊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我们的工农劳苦群众解放了！"[②] 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今天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从此宁冈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贫苦工农要自己当家做主了。"[③] 一句话，红色政权就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但是，由于革命初期各方面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新建的红色政权普遍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的现象。这就极大地损害了红色政权的形象，削弱了红色政权的力量。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种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④] 可见，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建立红色政权是件艰苦的工作，而要真正建设好红色政权则将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色政权建设得以比较全面地展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及其施政实践，就充分体现了红色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它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府，是受民主法制监督的政府，因而也是富于效率为民办事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这就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以及工农群众通过选举代表实行代议制的原则。

---

① 转引自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103 页。
② 同上书，第 109 页。
③ 同上书，第 11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 1991 年版，第 71—72 页。

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其成员由各省、中央直属市、中央直属县苏维埃及红军选举的代表组成。全国苏维埃的职能主要包括：（1）选举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2）听取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定；（3）制定、修改宪法和法律；（4）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常务工作。中央人民委员会是苏维埃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负责领导全国政务。中央人民委员会由主席和若干人民委员组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并按期向其做工作报告。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的职责范围之内，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制定适应的行政方针，以维持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其决议。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如涉及大政方针，应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它的主席团审查和批准，遇紧急情况时，可先解决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它的主席团。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部门，它们各司其职，实施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活动，积极推进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全面展开。

民主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苏维埃政权产生的必要前提。没有选举，何谓“苏维埃”？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因此，共产党人在发展根据地，开展政权建设时，尤为重视选举制度建设。特别是在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颁布了相关的选举法规，逐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选举制度，使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真正获得了选举权。《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的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向其选举人作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重新选举代表的权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

主义，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同时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等法规。1933年9月，又颁布了《苏维埃选举暂行法》，它反映和吸收了"一苏大"以后的选举实践经验，是当时一部比较完善的选举法。这样，从宪法到具体法规，对苏维埃选举的根本原则、选民条件、选民登记、选区安排、代表名额、代表任期、代表权利与义务、选举人权利、选举方法、选举组织与实施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一整套选举法律制度，有效地保证和促进了苏区选举实践的发展。同时，在中央苏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中，既改造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又促进了广大工农群众转变政治观念，提高了民主素质。

加强民主监督，是确保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大众自己的政权"不变质的必要条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一是法制监督，二是党政监督，三是审计监督，四是舆论监督，五是群众监督。特别是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它作为与中央人民委员会并列的国家机构，在独立开展审计工作，防止腐败和反对腐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民对于代表的罢免权，既是红色政权民主制度彻底性的表现，也是群众民主监督的最为有力的途径。

广大工农群众拥有了自己的政权，当然也要拥有自己的权利。在苏维埃制度下，广大工农群众享有广泛的权利。根据《宪法大纲》规定，以及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表明，在政治上，工农群众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为其获得这些自由创造物质基础；特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上，尤为重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和工人的劳动权，制定和颁布实施《土地法》、《劳动法》，保护工农群众的合法权益；并取消以往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在文化教育上，提出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之内，施行免费的普及教育的目标，首先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在社会建设上，实行男女平等，承认婚姻自由，并通过各种方法创造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脱离家务的物质基础，使其广泛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保障工农群众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强调苏维埃公民享有反对宗教宣传的自由。可见，这样的政权，已经真正成为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

4.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一切依靠群众，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源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基于对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刻认识，不断深化了关于中国革命依靠力量的认识。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 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②。这样就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的问题，深化了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的认识。

伟大的革命斗争需要先进的理论来指导，而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又孕育产生新的伟大的理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创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了工农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因为“有很好的群众”，有经过大革命影响的“工农士兵群众”。因此，要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宣传教育，充分依靠群众，保卫、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20—21页。

不一起军事化。”[①] 动员群众军事化，这就是相信群众，就是依靠群众。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则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重心逐步向农村转移，更需要对各阶级作出正确的估量，进一步明确革命的依靠力量。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社会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②]。在从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③]。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依靠力量的观点。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尤其是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又从实践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颁布，则以国家宪法的形式确认了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确立了工农劳苦大众是国家主人的地位，保障了广大工农群众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宪法大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也正是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的群众观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其最突出的标志，一是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论断；二是提出了“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观点”；三是事实上提出了“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④]

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不是停留在理论上、政策要求上，而是深入到广大苏区干部的内心，并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优良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共和国领导人简陋的故居；瑞金沙洲坝的“红井”；苏区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 页。
② 同上书，第 114 页。
③ 同上书，第 115 页。
④ 同上书，第 138 页。

民对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腰缠金条的讨米人”的称赞；长冈乡群众留下的内心感激：“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好了”；广为流传的赣南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等等。这些无不记录着一幕幕红色历史的画卷，无不反映出苏区干部艰苦奋斗、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

三、人民军队“军魂”的确立

1.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

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是要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是要掠夺和侵占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是要占有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要向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因而他们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统治，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经由民族民主革命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① 1930 年 5 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在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时，再次明确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到社会主义。”② 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领导和发展广大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政权。到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则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 页。
② 同上书，第 115 页。

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及其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

可见，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由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自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革命从其性质来说，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了，而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包括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把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本主义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专政；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同，它所要推翻的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与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成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唯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

由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非常明确了。它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而完成民族革命的任务；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两大革命任务是相互联系的，只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同样地，只有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才能真正打倒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1 页。

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迫和阻碍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主要方面，他们相互勾结，残酷统治和压迫人民，加上军阀、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走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结成反革命同盟。因此，中国革命面对着异常强大和非常凶狠的敌人。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革命的力量必须在长时间内积聚和锻炼，才能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不是合法斗争和平过渡；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长期占据并利用城市统治和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这就决定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当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还必须是采取一切可能的形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公开合法的斗争配合武装斗争，以城市工作配合农村根据地工作，以瓦解敌军，在战争中消灭敌军。所有这些，都是完成中国革命任务必须先要认识清楚的。

2. 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日益认识到，创建由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不断发展人民武装，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伴随着南昌八一起义响起的枪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伴随着三湾改编决定宣布后，红军将士在操场上响起的整齐口号声，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军魂”开始形成；伴随着古田会议闭幕式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人民军队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建军逐步推进。这样，红军就成为了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了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武装集团，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益，这不是一句空头口号，这需要红军在完

成各项革命任务中来实现。那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红军因为武装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它当然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支柱，当然要去打仗，去消灭敌人。但这不是红军的唯一任务，尽管它构成红军最重要的任务。由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决定，它还肩负着同革命相关的多方面的重要任务，如宣传动员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筹措军款、减轻群众负担等等。

毛泽东针对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现象，在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提出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① 古田会议后，在红军中实行宣传兵制度，连部、营部、政治部等军队机关均有5人从事宣传工作，分别进行演讲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和标语宣传。红军到达一地，便立即进行宣传，进入一个县城只需要三个小时，宣传工作就可以到位即可普遍。通过安民告示，向群众提出和宣传平谷价、废债务、分田地等政策。红军还通过建立工会、农会、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帮助地方建立党的支部、党的区委等，来广泛发动群众干革命。随后，红四军的这些经验在红军中普遍推广，并成为红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红军是新式的军队，它注重军内民主建设。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并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来管理部队的经济、伙食等问题。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至于“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①，“朱德的扁担”等史实，更是官兵平等的真实写照。

红军铁的纪律，是其执行任务、完成任务的有力保障。红军自建立之初就重视纪律建设，重视纪律教育。毛泽东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针对当时红军来源复杂的现实，为了把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改造成纪律严明的新式军队，他对红军队伍进行军纪整顿。1927 年 10 月和 1928 年 1 月，毛泽东分别以口头讲话的形式，向部队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要求，使部队的纪律和作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部队中乱拿乱要群众财物等不良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对此，毛泽东根据进入井冈山半年以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整合原已提出的纪律要求，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正式作为红军的军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工农红军的基本法则，它体现了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明确了红军所肩负的打仗、筹款、群众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对于红军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和红军内部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3.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军人道德组歌》里有一首《听党指挥歌》，其中一句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不变的军魂。”这是对人民军队军魂的清晰表达。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便同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党缔造、培育、建设和发展了人民军队。在人民军队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贯彻始终，并培育成为人民军队的军魂。

在党和军队的关系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②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使然，是革命斗争中得出的正确结论。共产党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政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就是一次总结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会议，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只能对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做了决议。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且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得以初步巩固后，中共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7 页。

央对中国革命经验、革命战争战略、政治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正是在长征胜利一周年之际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对大革命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阐述，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得出了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结论。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①

红军的创建与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它才能发展壮大，它才能真正成为执行革命任务、争取革命胜利的武装集团。毛泽东指出：在1927年到1936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② 在这个革命战争中，红军是主要的武装力量，党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就必然包括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呢？这就要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对红军实行全面的领导。

第一，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这就要使红军自觉地服务于革命大局，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尤其要确保红军的无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② 同上书，第184页。

级的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革命性、人民性；尤其要树立军事斗争服务于政治的观点，批判和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明白红军是一个执行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尤其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因此，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必须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全体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英勇斗争。

第二，党对红军的思想领导。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红军官兵，武装其头脑，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军初创时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里，如何把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占绝大多数比例的军队，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其时，红军内存在着众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等。如果任其滋生蔓延，就会削弱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制约红军的发展壮大，就难以执行党的政治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红军第四军的党内存在着多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① 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来教育军队，加强对军队的思想领导，使红军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坚强工具。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红军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不仅成立了教导大队对革命干部进行教育，而且广泛开展对全体士兵的教育，"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② 至于到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则基本成熟了。古田会议决议得到了普遍实施，不仅按照会议规定的党内教育 10 种材料和 18 种方法加强红军党内的教育，而且创造性地开展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既有红军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正规的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手段，更有对全体红军官兵的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形式，包括动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5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会、连队会、民主生活会、形势报告会、个别谈话谈心、报刊宣传、文艺节目，等等。这样，红军正逐渐成长为党领导的执行革命任务的坚强的武装集团。正因为如此，才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了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才能顺利地实现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党对红军的组织领导。这就是在红军内部建立党的组织系统，并使各级党的组织成为团结红军各级领导的核心。毛泽东在红军初建时期的三湾改编，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经过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统一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在部队各级建立了党组织，班排设小组，连队设支部，营、团以上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①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② 同时，重视加强组织发展工作，从红军士兵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从“水口建党”开始，红军中的党员人数有较大发展，党员和非党员的比例达到1：3。党对红军领导的原则，后来在古田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并成为红军建军的重要原则，在全军实行。到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中不仅建立连队支部和各级党委，而且在党代表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在团以上部队设立政治机关，这样，就形成了党对红军领导的完整的组织体系。他们富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红军中的执行，推进了红军的建设与发展壮大。

总之，党对红军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政治领导是前提，思想领导是核心，组织领导是保证。我们党把这三个方面的领导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实现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② 同上书，第65—66页。

四、党的建设理论的成功实践

1. “思想建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群众成为共产党员的主要来源。这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既不教条主义地排斥农民，扩大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又不迁就和放纵农民的小生产意识和落后观念，把共产党建设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共产党先进性要求同党员主要来自农民阶级的实际结合起来，使一个农民成分的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

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十分敏锐地觉察了“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必须有“很好的党”，必须有党的正确政策。为此，党的建设始终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发展的重要保证。从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到“水口建党”扩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从秋溪乡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湘赣边界各县区普遍建立党组织，党的建设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蓬勃展开，党员人数一度达到一万人以上。同时，党的建设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发展。

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毛泽东总结其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①] 党的正确政策的形成，当然需要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根据革命发展的形势，根据湘赣边界的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但是，如果没有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意志，在行动上积极支持、严格执行和带头实施，那么，所谓“正确的政策”，也将成为空谈。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里的党员基本上都是农民，党组织基本上都是家族式的。“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②] “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家族观念、小生产观念、地方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普遍存在；而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等思想，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组织原则，往往得不到党员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①

针对这件“难得很”的事情，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亲自到永新秋溪乡开展党建工作，并派毛泽覃到宁冈乔林乡抓党建试点，对农村党员开展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培养党员的共产主义观念。边界特委还举办各种训练班，对党员、团员骨干分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亲临训练班讲课，与学员进行座谈。这些教育活动，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二是“厉行洗党”，纯洁党组织。清洗的对象主要是：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意革命的；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当时被清洗出党的党员共有4000人左右，没有洗刷掉而留在党内的同志，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这样，党员数量减少了，但战斗力却大大增强了。三是加强党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928年11月，重新建立红四军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军委，加强了对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协调军队和地方的关系，这也加强了对党的建设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实践中，在艰苦复杂的党建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② 这实际上就是“思想建党”的原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运用与新发展，是“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学说的精髓。

随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革命形势在向前发展。但是，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虽经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教育和改造，但并未完全解决，况且又有一批新的党员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于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为了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1929 年 12 月，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长达三万多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形成了关于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就党建理论而言，《古田会议决议案》科学分析了党和红军中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及其纠正方法，尤其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主要内容、方法、途径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思想建党”的认识，解决了井冈山时期还未来得及解决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的问题，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

古田会议明确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案》一开始就尖锐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① 并号召同志们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地加以肃清”。②

《古田会议决议案》强调把抓好党内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关键；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教育，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教育，组织观念和纪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等，作为党员和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党组织的教育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作为主要方法，并专门通过了一个“党内教育问题”的决议，以规范和指导党内思想教育。决议案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党内教育能够顺利开展，“决议案”明确规定 10 种材料，帮助各级党组织全面开展党内教育工作。这 10 种材料包括政治分析、上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5 页。

② 同上书，第 86 页。

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组织常识、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同时，决议案还根据红四军当时的具体环境，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这就为党内思想教育，不仅规定了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而且提供了具体的方法，促进了党内教育的深入开展。

总之，古田会议确立了我党“思想建党”的原则。这也表明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已初步形成。正如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①

古田会议后，“思想建党”的原则和“决议案”的一系列决定，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施，而且为红军各部队所采用。后来中央苏区党和红军党的建设实践，正是围绕思想建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在脱离幼稚迈向成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日益壮大起来，并迎来了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新的锻炼与考验条件下的党建工作的新实践。

2. 强调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

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它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由其中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选择并坚持一定的理论作指导，制定和确立共同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遵守共同的纪律，采取共同的行动；它是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大众的国家政权为最低纲领，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对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它首先要夺取政权，因而表现出革命政党的鲜明特色。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制定科学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① 正如毛泽东指出：“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② 这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政治集团。

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革命使命和领导责任，决定了它的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都必须政治化、科学化。具体而言，“政治化”既是由政党的一般政治属性决定，更因共产党面对的特殊革命政治任务而使然。只要是政党，它就有自己的政治任务，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任务；它就需要自己的成员形成政治共识，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以达到共同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能例外。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有其特殊的性质、宗旨、任务和使命，它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己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它最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最具有组织纪律性，最具有博大胸怀；因而也最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从而也就最需要“政治化”。“科学化”既是共产党先进性的表现，也是其“政治化”的必然要求。共产党的政治是革命的政治，是基于科学正确决策的革命政治。因此，“科学化”与“政治化”是党内生活和党员思想教育所必需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的政治化、科学化，也是党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又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教育，加上农民出身的党员比例大，因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错误思想在党内普遍存在，特别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比较严重，对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妨碍。对此，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深刻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性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①]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其实质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洗刷唯心主义精神"[②]，纠正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③]。具体方法为教育、社会调查和党内批评。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党员的头脑，掌握科学的理论，做出正确的形势判断。毛泽东指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④]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教育党员，武装头脑，才能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才能彻底洗刷掉唯心主义，才能打破"本本主义"的约束，才能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从而为党员判断政治形势，估量阶级状况，坚定革命信念，确立政治方向，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

第二，必须重视和坚持社会调查，掌握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并形成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⑤]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发现问题并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事实来源和实践依据，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避免主观主义的空想和盲动。

第三，必须开展政治和组织原则内的党内批评，以加强党员的教育，增强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指出："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⑥] 毛泽东特别强调，批评应在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② 同上书，第112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组织内进行，不要在组织外散布不利于团结的言论，更不可以把批评变成攻击个人的工具；批评要讲究事实依据，避免主观武断；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其主要任务是批评和克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不搞无原则的纠纷。毛泽东认为，“至于个人观点，如果不是与政治和组织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已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①。可见，批评是要服从大局、服从政治的。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科学的，才能达到有效的教育效果，既使被批评者受到教育，又促使批评者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既在批评中进行讨论乃至斗争，又在批评后达成政治思想共识而增进团结；既坚持大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解决大是大非问题，又灵活处理“不是与政治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的细枝末节缺点和错误。

3. 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党各方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强调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当然，在贯彻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实践过程中，在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侧重点又是不一样的。对此，毛泽东在 1937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②这既是对新的历史阶段党继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的总部署和总动员，更是对党成立后尤其是 1927 年土地革命以后党建实践经验的现实总结。

事实上，党在成立之初的 1922 年的“二大”上，就确定其“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③ 1927 年党的“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④。1928 年的“六大”党章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2 页。
② 同上书，第 278 页。
③ 转引自范平、姚桓《中国共产党党章教程》，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 页。
④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 页。

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并规定了这一制度的根本内容：一是各级党部均由党员选举产生；二是各级党部向党员定期作报告；三是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服从上级党部的决议。这就从根本原则和具体要求方面，对民主集中制做了明确规定。后来，在延安时期的“七大”上，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成为指导党的建设的根本制度。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我们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度，积极开展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践。第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思想认识，特别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①。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极端民主化思想的根源和危害。“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入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失败。”② 因此，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培育党员的组织观念，加强纪律性，使全体党员忠诚于党，服从组织，积极工作，服务革命。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础。

第二，贯彻民主集中制，积极有效地领导和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③ 党的领导机关要成为“领导的中枢”，要制定正确的党内生活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此，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形成决议，不能太随便，而要调查研究，了解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为正确的指导提供客观基础。党的各级组织的决议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一些重要的决议，必须通过支部会议以至党员大会等形式，迅速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同时上级机关应当派出合适的人员，进行宣讲、动员和报告，以帮助党员群众理解决议的精神，更好地执行决议。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要在认真学习、详尽讨论的基础上，彻底了解其精神实质和意义，并结合实际制定出具体的执行办法，以增强执行决议和指示的自觉性和实效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88—89页。

③ 同上书，第89页。

第三，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① 但是在作决议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广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尽可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开会时使到会人员尽量发言，进行充分讨论，特别是对于有争论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是非，决不可以调和敷衍。当然，对于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不妨碍工作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多次讨论，从而得出明确的结论。这可能是多数说服少数从而变成更大的多数的过程，也可能是少数启发多数从而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这就是多数与少数的辩证法。民主集中制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辩证法。

第四，增强党的组织观念，教育党员懂得党组织的重要性。党员个人的民主政治生活，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必须在党的法律法规框架内进行。任何脱离党组织或者凌驾党组织之上的思想行为，都是错误的，都是党所不能容许的。在党的组织内和组织外是有区别的，不可以把党内的政治活动随意扩展到党外去进行。“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② 但不可以搞个人主义、报复主义，在党的会议上找碴儿报复别人。同时，克服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等非组织观点，应当有恰当的方法和措施，要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集体观念、组织观念。这是我党党内生活的有效实践，为党建理论成熟与实践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节 红色江西与新中国

一、红色江西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最重要区域之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开辟井冈山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斗争历程，执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治国理政的实践，总结和提升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

实践经验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之奠基，把红色江西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同人民军队的壮大、同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客观真实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江西人民永久的红色记忆，也是江西红色历史永恒的价值所在。红色江西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立了伟大的革命理论，培育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引领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安源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正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引导中国革命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转移，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中央苏区和全国范围内的“燎原之势”，中国革命的潮流势不可当，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毛泽东思想得以奠基。正是井冈山革命斗争、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实践，共产党人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创造了先进的红色革命文化。正是基于对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把握，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重大决策，江西是红军长征的起点，并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发祥地。这些革命思想、理论和精神，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而且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原则和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锻造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将帅和开国元勋。以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革命前辈为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政治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杰出政治精英张闻天、王稼祥、项英、董必武、李富春、杨尚昆、胡耀邦等，当年都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和战斗过。在共和国的开国将帅中，有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9 位元帅，粟裕、陈赓、黄克诚、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 7 位大将，以及 34 位上将、106 位中将和 440 位少将，当年都在赣南大地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功；其中，赣南籍的优秀子弟有 132 人成长为将军，包括 3 位上将、10 位中将和 119 位少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主要领导人，各中央局、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各大军区、各兵团主要领导人，当年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总计在 140 人以上，占当时全国同

级领导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此外，还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各重要经济建设单位担任主要领导的同志，当年也在赣南苏区工作战斗过。[①] 可以说，江西是中国共产党藏龙卧虎之地和精英荟萃的人才库，是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造就地和集结地。

红色江西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百多万革命战士和烈士，支持革命、支援前线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两支农民武装，就成建制地改编加入了红军；随着革命的发展，加入红军的战士越来越多。在中央苏区时期，全省的苏维埃运动蓬勃兴起，各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红军队伍日益壮大。仅以赣州地区为例，当时赣南苏区人口共240万人，参加红军的青壮年有33万人，参加支援红军作战的有60余万人。例如，在当年的瑞金市苏区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4.9万人；兴国县苏区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5.5万人；宁都县苏区人口27.3万人，参加红军5.6万人；于都县苏区人口34.3万人，参加红军6.77万人；会昌县苏区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3.86万人；尤其是中央苏区的模范乡兴国长冈乡，全乡青壮年人口407人，参加红军和做革命工作的有320人，占人口比例79%；在红军长征突围前夕，仅于都县就补充红军9700人。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长征的87000多人中，赣南籍子弟达50000余人，占60%以上。[②]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之下，江西省有103万人应召赴前线参战，征兵数居全国第四。[③] 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民兵等人民武装力量和革命群众，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有些队伍还直接参加了解放江西的战斗。据统计，江西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5%；无名烈士更难以统计。赣州市因为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区域，革命烈士多达10.8万人，占江西省烈士总数的43%。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永不磨灭的贡献。

红色江西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

---

① 凌步机：《红色赣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152页。

② 同上书，第145—146页。

③ 虞国庆：《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读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输送。"[①] 井冈山人民为供应红军给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震惊，敌人加紧对其进行"围剿"，致使中央苏区战事频繁，苏区人民为抗击"围剿"，积极筹粮筹款，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长征前夕，苏区人民倾其所有，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捐木架桥，全力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在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征粮占全国的12%；据统计，1938年10月至1941年上半年，江西供应第三、九战区军粮6900万斤，支援邻省军粮4700万斤。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江西，江西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日夜征集军粮、赶做军鞋、运送军需物资，支援解放军。如赣东北的浮乐婺工委发动群众赶做军鞋5000双，饶开德玉工委组织群众征集军粮2000余担，赶做军鞋3000多双；赣南城乡掀起了"支前"高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筹集军需款45000万元，大米6000万斤，柴1400多万斤，草300余万斤。[②]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江西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无私援助和大力支持。

二、红色江西与绿色江西崛起

1. 红色江西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红色江西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开端性实践。江西红色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艰辛的探索，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性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江西红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奠基。这不仅为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直至最后胜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经验启示和理论导引。

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其革命和建设道路选择的客观依据。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特殊的革命道路。同样地，因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② 虞国庆：《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读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182页。

条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邓小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理论、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我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树立并高高地擎起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面旗帜，既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又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义的指导，又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并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同宗同根，与中国革命道路薪火相传，共进发展，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已经焕发了并将继续焕发出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染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将日益发展、更加繁荣。

可见，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基础一脉相承，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思想路线相融相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其基本目标前后一致，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最高纲要始终不变，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价值追求始终如一，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领导核心和主要依靠力量始终不变，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决依靠广大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逻辑与历史的发展。

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到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对于科学地运用社会发展的动力，则实现了由革命到改革的转变，由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变。“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江西红色革命实践就是这次革命的重要部分。当代中国的改革，就是为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如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② 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并相应改革政治体制和各方面的体制，从而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红色历史发展中所蕴涵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当代改革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放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江西红色历史承载着共产党人的革命新创举。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贯穿于江西红色革命实践的始终。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红色江西。改革开放也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因此，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尤其要重视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要打破旧框框、打破旧条条。邓小平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①] 一切工作必须以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标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均必须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思想原则。正如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改革也靠这个。"[②]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所谓新时期，就是从改革开始的，而开放也是改革。甚至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新时期。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才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因为改革开放，才实现了新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方面，总量上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在政治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实施；在文化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逐步提升，先进文化日益繁荣；在社会方面，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因为改革开放，才实现了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福祉，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光明前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② 同上书，第382页。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①

2. 红色江西与绿色江西崛起

毫无疑问，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思想基础、正确的理论指导和鲜明的旗帜保证。

但是，要真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好符合国情和地区实际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地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具体路径，更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沿海、沿江和沿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农村和牧区，由于各自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必然要求其制定不同的具体战略，确立特殊的具体策略，选择具有各自特色的发展路径。

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江西省委、省政府结合省情实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弘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儿和拼命精神，群策群力，科学决策，探索一条绿色崛起的发展道路。

江西当前最大的省情是什么？这需要用全面、发展、辩证的观点加以分析，既要立足江西看江西，又要跳出江西看江西；既要看到自身的优势条件，又要了解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既要看到发展的现状，又要认识发展的趋势和潜力。江西具有“红色”、“绿色”和“古色”的省情特点。“红色江西”这个富有政治意义的概念，它凸显了江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巨大贡献，揭示了以井冈山精神为核心的优良革命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精神动力源泉的功用，同时也内含着江西老区欠发达的事实。“绿色江西”这个富有自然和现代气息的概念，它凸显了江西优越的生态和自然环境，反映了江西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潜力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 页。

和优势，内含着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品牌。“古色江西”这个富有凝重色彩的概念，它凸显了江西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体现了江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内含着江西古朴、传统、欠开放的特点。红色—绿色—古色的统一，反映了江西省情的基本方面，但它更多的是对省情表征特色的描述。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对江西的省情进行分析，认为可概括为两句话：一是生态环境好，发展势头喜人；二是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欠发达地位尚未改变。这是江西最基本的省情，也是最大的省情。为此，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发展路径和战略，积极探索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江西省“生态立省”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酝酿和探索的过程。早在 1982 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就提出要写好“田园诗”、画好“山水画”，以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1983 年，针对山区毁林开荒、湖区盲目围垦和滥捕等短期行为而造成的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的严峻形势，江西省委、省政府开始启动实施“山江湖”综合开发治理工程。“山江湖”工程探索了一种生态修复和发展的新模式，它把治山、治水、治穷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提出了“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治理理念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山江湖”工程实施以来，江西全省的森林覆盖率增长近一倍，水土流失面积下降近 2/3，鄱阳湖湖体面积增加 40% 多，直接带动 500 余万人口脱贫。这项基础性工程，使绿水青山成为江西的优势资源和品牌，并为江西的后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条件，其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令世人看好。为此，国务院有关部委向全国推介“山江湖”工程的经验，联合国专家称誉它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的经典工程，成为全球生态恢复和扶贫攻坚的典范，也是江西走向世界、世界认识江西的一个重要“生态工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又有了新的认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作出了新的探索与实践。2001 年，作出了“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发展定位，即把江西建设成为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后花园。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

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后，江西省委、省政府根据科学发展的要求，在总结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路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立省、绿色发展”的战略，并在2008年年初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2008年3月，江西省委、省政府于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正式宣布启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江西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引领江西长远发展的大战略，是加速江西崛起的大机遇，是惠及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大工程，也是对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致力科学发展的新路子的新探索和新实践。这个大战略、大工程的主要内涵包括：第一，核心是发展。坚持发展不动摇，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是为了经济更好发展、持续发展；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避免因贫穷而对生态的破坏，同时，这又为保护环境和修复生态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第二，特色是生态。坚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围绕生态建设做文章、促发展。大力推广高效农业，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生态产业，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现代绿色物流业和服务业，倡导绿色消费。第三，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经济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统一，以维护生态安全和保护自然环境为基本理念，以低碳化和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为核心价值，以制度建设和考核体系建设为保障，以生态文化建设为抓手，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初步形成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第四，目标是立足江西实际，顺应时代潮流，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江西人民，正在把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引领江西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的重大战略和“龙头”工程，努力实现新的赶超和崛起。在这一战略实施中，省委、省政府始终强调：要以井冈山精神来建设绿色江西，要以苏区干部好作风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投身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建设中去，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造福江西人民、惠及广大江西百姓。

三、红色江西历史价值永恒

红色江西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原创性革命实践的伟大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在江西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和斗争，所创写的红色历史，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

红色江西革命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先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践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首次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井冈山革命道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井冈山革命道路教育农民和红军战士，特别是武装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使他们能够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自觉革命，奋勇杀敌。这就充分展示了理论掌握群众的革命实践成果，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成功经验与价值导向。

红色江西革命实践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观，是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政治根基与源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性实践，这与当代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同宗同根，又与时俱进。坚定井冈山革命道路必胜的信念，构成了江西红色资源的核心思想内涵，坚定井冈山革命道路信念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体现了革命理想的“源”与共同理想的“流”价值的统一性，从而构成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红色江西革命的伟大实践，培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和长征精神，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它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内涵同质，精神同魂，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精神基石。红色江西革命实践，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苏区好作风、革命道德品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道德情操，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相承相融，天然地成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道德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区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凝练的红色资源，历史地印证着它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优质的资源和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区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孕育了真正革命意义的党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发端。中国革命斗争的大局，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中心任务，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作保证，并提供精神动力支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理论掌握群众、武装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大局所必需的理论武装和宣传思想工作。在革命斗争大局下，我党思想政治工作也成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最大政治优势。革命理想信念教育、革命理论宣传教育、革命纪律教育、苏区的肃贪反腐教育，特别是红军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民群众教育，都真实地再现了党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教育成果。这些生动的教育实践与真实成功的教育经验，为加强当代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与重要的借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民族传统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具有较强的免疫力"；[①]"老祖宗不能丢啊！"[②]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及其成果运用，对于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红色资源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优秀文化、高尚品行、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革命先辈、先烈战斗生活过并遗存的物态文化，红军官兵的英雄壮举，红色事件的革命传奇，红色历史文化的魅力，都能够为加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加厚重的历史责任感，成为鲜活生动的教育素材，为开展体验式、情景式实践教育教学，调研考察式的教学，提供厚实的革命传统教育内容和实践基地，也必然会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取得教育实效，从而使红色资源教育教学的价值得以实现。

红色资源的开发创新，为当代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党的十六大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还在全国刚解放

① 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时，毛泽东就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号召，要求“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20 世纪 80 年代末，江泽民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来到西柏坡，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红色资源在民族精神教育中的重大价值，充分运用好红色资源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

弘扬民族精神是培育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以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使受教育者在实践体验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从而有效地把外在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达到精神境界的升华。红色资源的开发过程就是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的过程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它不仅有利于弘扬革命先烈的伟大革命精神，而且有利于与时俱进地创新当代民族精神教育的理念。民族精神教育的最佳方式是身临其境式的实践体验方式。全国各地的红色基地、图片、资料、实物、健在老红军老战士的亲身经历等，使红色资源具有直观、贴近史实和现实生活的优势。这为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教育阵地与鲜活的养分，为实践体验式的民族精神教育创造了永久的品牌价值。

红色资源开发与创新，保证了民族精神教育的方向。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无论革命遇到怎样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理想、信念。正是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激励着革命者在革命的征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挫折，保持了革命本色，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在革命战争年代不能丢，在和平建设年代同样也不能丢，而且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首要任务，关系到民族精神教育的方向。运用红色资源中蕴涵的理想与信念进行民族精神教育，能使受教育者树立崇高的理想，指引受教育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力地保证民族精神教育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廉政实践与宝贵经验，特别是中央苏区围绕着当时的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而展开的廉政文化建设、廉洁作风建设及廉政教育实践，对当代廉政文化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政治价

值。开发中央苏区廉政文化资源，将其形成适时性的建设资源，将其建设资源提升为当代廉政教育的文化形态，再将当代廉政经验的文化形态转化成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廉政建设和廉政教育的实践，这就是其价值实现的意义所在。特别是中央苏区开展的廉政信念教育、廉政精神的培育、廉政价值观的教育、廉洁作风培养，对于当代廉政文化教育必然产生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

红色资源开发及其品牌的利用，对于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具有较好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红色革命遗址的挖掘和开发，红色物态文化的研发，红色人文精神的提炼，红色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利用等，这对于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的设计，提升红色旅游的文化品牌价值，特别是社会教育价值的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增值功用。在江西丰厚的红色历史文化中，蕴涵着传奇的红色故事，惊心动魄的革命事件，经典的红色战例，浩气长存的红色英烈等，通过联合、技术、立体式研发利用，形成红色品牌文化产品，对于红色图书出版业、红色演艺业、红色影视业、红色会展业、红色旅游文化用品业等价值的实现，均有优质性与品牌性相统一的升值功用。

红色江西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首创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论，铸就了伟大的革命精神，生成了具有红色革命意义的先进文化。其历史地位永驻华夏大地，其价值永存民族复兴大业！

参 考 文 献

一、领导人著作

1.《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 1948 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陈云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12.《江泽民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3. 江泽民：《江泽民在江西省考察工作指出：结合群众实践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基层为百姓办实事好事》，《人民日报》2001 年 6 月 4 日。

14.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文汇报》1997 年 1 月 29 日。

1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6.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2006 年 10 月 22 日。

17. 方志敏：《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二、资料集

1.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2. 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1992 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5.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

6.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

7. 萍乡市政协、浏阳县政协、醴陵市政协合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8. 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10. 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1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12. 萍乡市编撰委员会编：《萍乡市志》，方志出版社 1996 年版。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4. 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 2000 年版。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弘扬和培育民

族精神》，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三、专著

1. ［美］斯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吴黎平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3. 韩延龙等编：《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1年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编：《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马齐彬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 中共萍乡市委宣传部编：《安源工人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7.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8. 王继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撰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

10. 刘善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11.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 何东：《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13. 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等编：《秋收起义在江西》，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4.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7. 吴晓梅：《倾听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9. 范平、姚桓:《中国共产党党章教程》,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8 年版。

20. 萍乡市史志办公室编:《中共萍乡地方史》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21. 余伯流、凌步机:《毛泽东与瑞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22. 凌步机:《红色赣州》,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3. 汪立夏、李康平主编:《红色江西:大学生红色资源教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4. 启瑄等编:《红色旅游》,解放军出版社 2006 年版。

25. 窦效民、王良君:《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6. 罗学渭、肖长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7.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8. 孙建娥:《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29. 虞国庆主编:《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读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0. 赵学清编:《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31. 汤家庆:《中央苏区文化建设史》,鹭江出版社 1996 年版。

32. 李水弟主编:《红色文化与传承》,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3. 李康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四、学术论文与报刊资料

1. 魏全木、李淑兰:《学习与弘扬八一起义精神》,《江西社会科学》1997 年第 7 期。

2. 温时明:《中央苏区时期粮食工作概况》,《中国粮食经济》2003 年第 3 期。

3. 李康平:《论中国三大红色资源联合开发的政治文化价值》,《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 5 期。

4. 徐新平：《毛泽东土地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6 期。

5. 钟恒：《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文化》，《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 年第 2 期。

6. 刘建平：《井冈山革命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7.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伍洪祥同志与福建党史工作》，《福建党史月刊》2007 年第 3 期。

8. 周建华：《中央苏区的主要新闻报刊》，《新闻爱好者》2007 年第 4 期。

9. 余伯流：《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铸造——纪念南昌起义 80 周年》，《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8 期。

10. 谢爱林：《论苏区红色文化的现代教育意义》，《教育学术月刊》2007 年第 9 期。

11. 杨槐：《进一步发挥红色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社科党建》2007 年第 12 期。

12. 黄永良：《试析苏维埃政府廉洁高效之因》，《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13. 黄光文、朱龙凤：《红色资源开发中的红色文化传承》，《求实》2008 年第 6 期。

14. 魏佐国：《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刍议》，《农业考古》2008 年第 6 期。

15. 赖宏、罗伟军：《论中央苏区局部执政作风及其时代价值》，《党史文苑》2008 年第 7 期。

16. 兰晓程：《井冈山红色文化及其对根据地建设的历史作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17. 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开发在大学德育中的运用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09 年第 8 期。

18. 李康平：《论苏区廉政经验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运用》，《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19. 李康平：《论红色资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运用的价值与路径》，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4期。

20. 徐金鹏、刘菁：《中部崛起的“江西步伐”，井冈山精神为力量之源》，《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21. 王一平、段克和：《弘扬井冈山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3日。

22. 许静、罗惠兰：《“红色文化热”的兴起及其价值功能》，《江西日报》2008年10月13日。

23. 陈致群等：《井冈山八大活动捧出红色文化盛宴》，《江南都市报》2008年9月9日。

24. 廖国良：《江西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展现红色文化的魅力效应》，《经济日报》2009年4月14日。

后　记

任何一个民族的奋进发，都需要传承其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都需要培育和弘扬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故此，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进行长期、艰辛、有效的历史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步入新世纪、新阶段，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下，这方面的教育更显得突出。2004 年，中共中央接连颁发了加强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重要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的精神和相关政策，更加彰显了中国革命历史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对江西丰厚的红色革命资源进行动态和整体性开发，进行江西红色历史和革命精神教育，正是对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新要求所作出的一种积极的历史与时代有机统一的真实反映。

在本书研究与实证过程中，我们先后到安源、葛源、南昌、上饶、瑞金、井冈山、兴国、弋阳等地实地开发调研和访问。学术团队成员以井冈山精神来研发江西红色资源。每当我们在实地研发江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感染这段红色革命历史中先烈们的英雄伟绩时，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责任感油然而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历史教育，并激励着我们克服困难而真实、尽责、努力地开展研究。

本书研撰人员有：前言：李康平；第一章：于静；第二章：于东；第三章：李鹏；第四章：廖声丰；第五章：黄伟英；第六章：龚春明；第七章：李康平、蒋尊丽、张蕾；第八章：李康平。李康平提出本书的核心概念，并负责本书整体框架的设计。廖声丰作为本书研撰的第二主持人，负责全书的统稿，张吉雄负责全书审稿。

本成果的完成得到江西省委教育工委会宣传部、省教育厅社政处及领导的支持和指导，得到了江西省社科院、赣州市委党史办等专家的诚挚指

导；得到了井冈山市委、上饶市广电局、井冈山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兴国、瑞金、弋阳、横峰、上饶县（市）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到了江西师范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宣传部、科技处、学科处、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的支持；相关专家真诚地给本书提供了成果借鉴。本书被选入“南昌航空大学学术文库”，并得到“南昌航空大学科研成果专项资助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研撰完稿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80 周年；写完后记又正值清明之时，这是我们学术团队为此而献出的真挚的学术礼物，以表我们江西学者对江西红色历史的永恒纪念、对革命先辈的永久怀念。

李康平

2011 年 4 月 5 日